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何伟亚 著 刘天路 邓红凤 译 刘海岩 审校

英国的课业：

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
帝国主义教程



【美】何伟亚 著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本书把中国嵌入到19世纪殖民主义的历史之中，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仅仅是枪炮、商品和各种侵略行为，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一个需要被征服人民自愿去接受的“霸权工程”。正是为了实现这样的霸权，19世纪在华帝国主义通过武器的强制和语言的强制这样软硬两个方面，对清政府和人民进行“规训”，“教育”他们在一个由欧美帝国支配着的世界里，应该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何伟亚超越“中国中心取向”，从西方列强构建新帝国的全球性历史进程的视野，探寻在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殖民环境的联系。对我国学者和读者来说，本书在资料、理论、方法和视野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启示。

作者何伟亚原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坡）国际和亚洲课程主任，现任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上一部著作《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英文版）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列文森奖。

上架建议：历史

ISBN 978-7-80230-891-6



9 787802 308916 >

ISBN 978-7-80230-891-6/K · 111

定价：38.00元

www.ssap.com.cn

英国的课业：

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美】何伟亚·著

刘天路

邓红凤

译

刘海岩

审校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 [美] 何伟亚著；
刘天路，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 - 7 - 80230 - 891 - 6

I. 英... II. ①何... ②刘... ③邓... III. 帝国主义 -
侵华 - 研究 - 19 世纪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0095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著 者 / [美] 何伟亚
译 者 / 刘天路 邓红风
审 校 / 刘海岩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 站 支 持 / (010) 65269967
责 任 部 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 子 信 箱 / bianjibu@ssap.cn
项 目 经 理 / 宋月华
责 任 编 辑 / 孙以年
责 任 校 对 / 孙 鹏
责 任 印 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 14.25 字 数 / 366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891 - 6/K · 111
著 作 权 合 同 / 图 字 01 - 2006 - 4956 号
登 记 号 /
定 价 / 3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中译本序 何伟亚 1

导 论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中国..... 1

第一部分 鸦片战争与通商条约

第一章 亚罗号战争，1856 ~ 1860 年 33

第二章 中国的暴力与法治，1856 ~ 1858 年 52

第三章 北京，1860 年：劫掠、奖赏金和神圣的报复 79

第二部分 在中国重建疆界，1861 ~ 1900 年

导 语..... 131

第四章 构建新秩序..... 133

第五章 欧洲全球霸权时代的清帝国..... 169

第三部分 使中国完全平等

导 语..... 203

第六章 恐怖统治：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惩罚与报复..... 212

——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第七章	将清朝君主去神圣化，1900 ~ 1901 年	264
第八章	记忆手段：把西方铭记成受害者和英雄	306
第九章	被压迫者的回报、再循环和中国爱国主义	343
余 论		378
参考文献		383
西人姓名汉译表		427
译后记	刘天路	439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编 于 沛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巴斯蒂夫人

〔德〕达素彬 〔俄〕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 2003 Duk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根据杜克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译出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

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



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

——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中译本序

非常乐意为《英国的课业》的中文版撰写这一序言。该书英文版的最终完成用了几乎 15 年的时间，所以看到中文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得以出版，自然感到特别高兴。完成这一翻译的是我自 1987 年就一直认识的同行刘天路教授，他曾翻译过我写的几篇文章，而且曾经和我详细讨论过这部书中某些部分的意义。我完全相信他的翻译能力。

大多数中国读者应该会熟悉《英国的课业》一书中所论及的那些历史事件，或许也会有人从中发现与我早先的著作《怀柔远人》有着直接联系的一些论题。事实上，《英国的课业》就是那本书所开始的讨论的继续，它考察了试图劝诱清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教育工程，以及运用身体暴力和语言暴力以使清帝国适应以欧洲为基础的全球性外交规范和商贸规范的各种规训活动。尽管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意义解说可能会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但我力图充分运用史料的支持，来说明欧美帝国主义在 19 世纪中国的影响，说明它在结束清朝统治中的作用。

本书还使用了相当数量此前未曾发表过的新史料，其中有视觉

图片，也有中国、英国和美国官方档案之外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涉及1860年从圆明园掠夺的物品，也反映了这些宫廷物品离开中国以后进入欧美艺术品市场、公共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历史。我相信，关于1860年和1900年进行的劫掠活动本身以及从中国掠夺的物品的命运的详细研究，是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同样有意义的，是关于清帝国统治权的研究。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对清帝国统治权反复进行的攻击，最终给清帝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贯串全书的一个论述点，是中国被羞辱被贬抑的特殊方式。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尚未得到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欧美学者们应有的重视。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暴力，就需要把它与发生在欧美帝国其他部分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分析。在把中国与印度和非洲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解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改变。

在理论方面，本书或许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是运用了德鲁兹式的（Deleuzian）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模式，并把它理解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以及欧洲帝国其他部分反复摆动的过程。通过这种分析，提出了中国也被殖民化了的观点。不过，中国的殖民化是以一种不同于殖民世界其他部分的方式进行的。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理论点，是在公共的历史记忆和各种各样的铭写形式——从石碑到少儿通俗作品——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关于中国的某些形象通过这些媒体固定了下来，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这样，它们就仍然能够在当代的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制造冲突和误解，并且有可能被美国、欧洲和中国某些不审慎的政治和军事领袖用作操控人民的工具。希望《英国的课业》这一类的研究能够削弱这些形象的影响力，并且有助于在各民族之间发展起更具建设性的对话。

何伟亚

2005年8月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ames L. Hev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and London 200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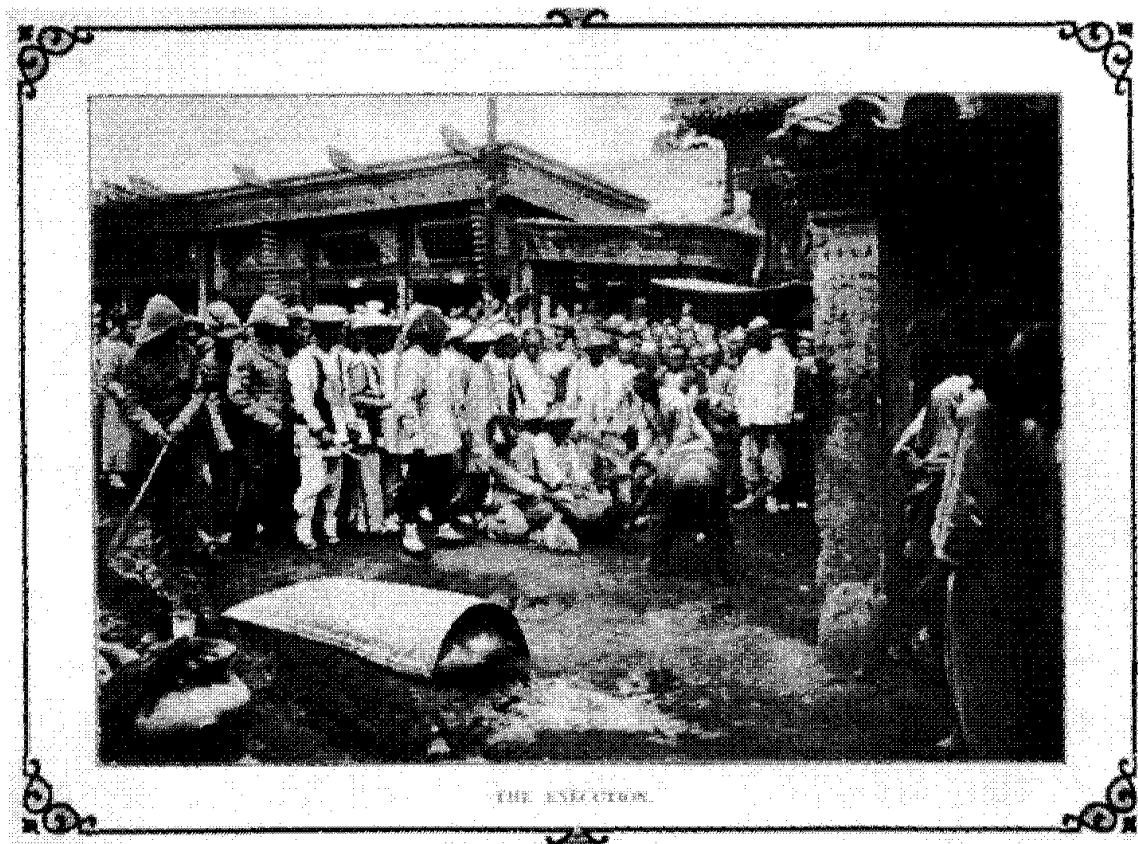
导 论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中国

本书书名的灵感来自一张照片，它拍摄的是 1900 年秋天发生在中国北京的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公开处决场面（图片 1）。这张照片和其他 3 张照片一起，收在英国南部著名海滨度假地布莱尔敦的游客问讯处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小册子深红色的封面上，赫然印着黑色的标题：处决中国义和团民的珍贵照片^①。当我第一次打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照片左下角那几具被砍去头颅的尸体首先吸引了我，但我的目光几乎立刻就从他们身上跳开了。我从前向后看去，看到了一群活着的人，他们围在四周，等着观看正要进行的下一次处决。我能够看清每一个人，甚至可以分辨出他们的不同之处。照片上的大多数人衣着宽松，毫无修饰。多少接触过 19 世纪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的人，可能会对这种衣服比较熟悉——这无疑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穿着。还有几个中国人穿着样式别致的制服，围在将要被刽子手砍头的下一个犯人的旁

^① 感谢多尔（Bruce Doar）于 1991 年赠送给我一本这样的小册子。据他当时回忆，这是他几年前在澳大利亚买的。小册子上有明显的标记，说明它曾经属于一家公共图书馆。

边。这些人很可能是负责地方治安的人和政府官员，负责执行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外国军队所发布的处决命令。我的目光继续向左平移，突然被一个奇异情景吸引住了：有3个人穿着与其他人全然不同的制服。我当时认为他们是英印军队中的印度士兵，他们与其他7个国家的军队一起，在1899~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以后占领了北京^①。



图片1 处决义和团民的场景

Unique Photographs of the Execution of Boxers in China, ca. 1901.

仔细观察同一本小册子中的其他照片，可以看出这些照片拍摄于菜市口。菜市口是清朝京城北京的外城——也叫汉人城——的一

^① 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军事博物馆服饰与徽章部主任威尔逊（Ross M. A. Wilson）认为，这3名士兵都是军士，可能属于皇家马炮部队。1993年3月1日私人通信。



处市场，同时也是公开处决犯人的刑场。这些照片记录了一次公开处决所谓的义和团民的过程。后来，我在美国和欧洲的档案馆中发现了许多和本书使用的照片相类似的图片，它们表现的都是西方军人和外交官现场观看当地的刽子手将所谓的义和团民斩首示众的场景。

然而，考证这些照片的来源以及我对它们的最初观察，并没有能够解释本书的书名。在这些让人联想起欧洲古代政权同样做法的斩首示众行为中，英国的课业在什么地方呢？这张照片如果能反映出某种教程的话，那会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教程呢？而学生又是谁呢？

从这些照片被印制成册的最初意图来看，一类学生可能是购买这本小册子的布莱尔敦的游客。正是通过这样一些媒介，英国公众才得以了解到使那些侵犯“文明”的“野蛮”民族“文明起来的使命”以及对这些民族的惩治。但是，从这张照片中，也可以发现另一种课业的迹痕，这一迹痕隐隐约约地显现在照片右边突出的墙上张贴的一张写着汉字的破纸上。就像现在在中国城市的电话亭和电灯杆上仍然可以看到的那些纸一样，这是一张广告。它上面汉字的意思是说，附近的学校（英文学堂）里开设英文课。

和行刑的场面并列排在一起，这张广告模模糊糊地表现出另一类教程。这类教程的目标，是教育土著人在一个有着陌生的新权力关系的白人世界里，应该如何行为。它也表明，驻在中国的强大的欧洲帝国军队与那些想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复杂关系。也许还可以从中发掘出其他一些意义，但无论提出什么解释，这个广告本身都通过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具体事物，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是一个对于力图在某个地理空间实现霸权控制的力量或实体进行反抗并且与之适应的过程。从刑场转向语言课堂，正是要沿着那条把西方人与非洲和亚洲的“劣等”种族分别开来的殖民区割，去追寻某种过程。在英文课上学习到的那种课业，或

许是帝国软的方面，用来哄劝引诱他者参加到一个往往被想象为合作性的事业中去。而在墙的左边，是帝国硬的一面。这一面的意义，可以在对那些公然抗拒文明语言、抗拒文明语言对殖民秩序的无情统治的人进行的暴力肢解中得到解读。

在此后几章中，将探讨帝国教程的这样两个方面：武器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枪炮不仅仅强迫他人顺从，它也在进行说服。字词和形象不仅仅是说服，它们也是某种强制。尽管清帝国在19世纪后半期受到多个西方列强的侵扰，但本书论述的中心是英国。它的外交官和军官们常常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看做是一个教育过程，一个通过枪炮和笔所进行的、由教育和学习两个方面构成的过程。中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在中国，战争和缔结条约显然是英国进行帝国规训的重要时刻。有鉴于此，有必要先对中国和英国之间发生过的冲突进行大致的描述。这些冲突开始于1839~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于上面这张行刑照片拍摄之时，即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

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

西方对清帝国最初的军事攻击开始于1839年，它导致了中国在外交、经济和文化方面对欧美前所未有的开放。英国与中国开战，是因为清政府官员收缴并销毁了来自印度的鸦片。这些鸦片的所有者，是一些公然违犯中国法律，想把它们运到中国销售的英国商人。但是，中国政府对于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的侵犯，只不过是英帝国和清帝国发生冲突最直接的起因。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英国外交界和商业界要开放中国、使之与扩张中的英帝国进行更大规模交往的欲望。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中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都有着同样的目标。与之不同的是，清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成功地维持着对



沿海贸易的控制，也一直成功地让地方官员来处理对外关系。英国政府官员想直接与清朝皇帝及清政府打交道，最好是在北京设立使馆。而英国商业界则希望废除由清政府批准的中国商人的垄断性行会——公行。清朝皇帝建立公行的目的，是要在广州一个口岸控制所有的欧洲贸易。英国商人对这一制度表示不满，认为它的建立没有经过谈判或者协商。在他们看来，公行的各种“限制”过于繁重，因为这些商人们相信，中国人也十分希望扩大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他们实际上想从欧洲商人手中购买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鸦片。英国外交官和商人们关于自由贸易的信念，最终被用来证明对清朝使用武力的正当性，并且导致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对外关系”新秩序的确立。法国、美国、俄国、德国，最后是日本，都很快地加入到这一新秩序之中。

缔造这一新秩序的主要工具是条约，通常用促进“和平、和睦、通商”的言辞来表达。通过这些法律文件，清政府被迫将西方人想在中国得到的大量权利给予他们。这些条约中的第一个，就是终结 1839 ~ 1842 年的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这一条约废除了公行制度，将香港岛永远割让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 5 个与西方进行贸易的通商口岸，允许外国领事及其家眷在这些口岸长期居住。1843 年订立的《虎门条约》中的 3 个新增条款，又使清政府在这些新开放的通商口岸的主权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第一，条约规定英国领事有权审判在中国犯罪的英国国民，这就是说，在中国的欧美人享有“治外”法权。第二，英国人取得了对其输华商品确定关税的权利，条约中武断地规定了很低的税率^①。第三，英国取得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英国可以不经

^① 西方出口中国的商品关税税率定为从价 5%。当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高达 40% 的关税税率非常普遍。对于这一时期的条约规定和有关事件的讨论，见 Hsu 1990: 168 - 193, Wakeman 1975: 120 - 141。

谈判，自动取得给予其他国家的任何特权。在英国之后，美国和法国政府接踵而至，在 1844 年先后与中国缔结了各自的条约。除了英国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外，美国的《望厦条约》还规定 12 年后进行修约，而法国的《黄埔条约》则加入了传播天主教的权利。

当第一批条约于 1856 年期满时，欧美列强的代表试图开始讨论修改条约，但清政府不愿意接受对其主权施加新的限制，由此引发了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以英国和法国的胜利以及圆明园的焚毁而告终（这方面更为充分的讨论，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1860 年缔结的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条约增开了 10 个通商口岸，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整个中国自由通行，并且给予缔约国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权利。此外，中国还要偿付两场战争的费用。

在 20 年中输掉了与欧洲列强的两场重大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了自强活动。它进行了各种内部改革，改革的领导者试图通过从西方取得新技术来改造清朝的军队。正如下面更为具体的讨论所指出的，这些努力只产生了非常有限的作用。1884 ~ 1885 年的对法战争未能取得全面胜利，结果使清朝失去在东南亚的影响。10 年以后，西方化的清朝海陆军被日本打败，用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自强活动的不足。到 19 世纪末，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已经在清朝领土上明确划分了势力范围，一些评论家已经开始认真地讨论中国很快就要被分割成多个欧洲殖民地的可能性了（图片 2）。这种情况看上去非常可能成为现实，以至于以往只是善于利用欧洲国家对清朝取得军事胜利的机会来为自己谋利的美国政府，这时也呼吁在华“门户开放”，以便让所有国家都能够有同等机会来开发中国市场。

美国 1898 ~ 1899 年倡议“门户开放”是否是阻止了其他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非常清楚的是，中国对欧美侵略的反应不久就以义和团起义——一个得到清朝统治者上层中一部分人支持的民众运动——的形式表现了出来。1900 年夏天，



图片2 俄国分割中国。德、日、美、法盯着自己的一份，而忙于对付布尔人的英国缺席

Le Monde Illustré, 28 July 1900.

义和团和清朝军队攻打北京的外国使馆区以及天津的外国租界。列强派出远征军镇压了这次起义，强制实现了高压下的和平（见本书第三部分）。义和团失败以后，清朝再次试图进行改革。这次改革的方向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西方化，而且还包括政治层面的改革。然而，这些努力太无力，也太迟了。到 1911 年，英国规训的主要对象清朝皇帝及其帝国政府，作为一个行使职能的政治实体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国家为模式的中华民国。

对 19 世纪在华西方帝国主义的评价

由此看来，欧美对中国的侵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应该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解释这一影响，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问题。在 20 世纪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居住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西方人大都把对清朝使用武力看做是必需的，是一种积极的好行为（Bickers 1993a）。中国人尽管对这样的态度经常表示厌恶，但又被新的军事技术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科学所吸引，因为技术和科学生动地说明了西方富强和中国衰弱的原因。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后者同时也把西方侵略看作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都认为西方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应有的苦难，给中国国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与此同时，他们也都相信，西方的侵略和半殖民主义会唤醒中国人的新精神，培育出最终会结束以武力强加给清朝的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这一基础广泛的民族觉醒，在中国国内和中国之外的许多欧美人士或者进行辩护，或者公开与之对抗（Cohen, 1997: 251 - 254; Bickers 1999: 143 - 144）。

当然，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并不仅仅是对抗。比如，在美国就出现了立足于美国例外论的另外一套思想。这里所谓的例外，是说美国并没有像欧洲国家和日本那样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租借地，它



的门户开放政策在西方侵犯中国的高潮中保护了中国。也有美国人指出，美国在华传教事业通过在布道、教育和医疗方面持之以恒的努力，无私地帮助中国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美国人的这些善行综合到一起，被认为构成了中美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①。

或许是受美国例外论的影响，美国学者进而提出了自己对西方在 19 世纪中国所起作用的想法。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他致力于在中国民族主义和西方的反应这“两极”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先驱者，费正清把历史的焦点，从在中国的英国历史学家们主要关注的帝国战争和来之不易的“权利”（Eames [1909] 1974; Morse 1910 - 1918），转移到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尤其是传教士们所作的贡献上。此外，他把关注点转向一些新机构，比如按照“条约体系”设立的清朝海关，而“条约体系”本身也被看做使中国对外关系“现代化”并且推动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媒介。就清朝海关来说，费正清（Fairbank 1957, 1968）认为，海关是鸦片战争冲突之后出现的中西合作的许多共同成果中的一个，他甚至设计了“共治”（synarchy）一词来表述这些成果。费正清及其追随者们也谈论“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强调的是推动“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被破坏、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合作活动发端的那些过程。在这一框架中，费正清不仅有抹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倾向（Barlow 1993: 238 - 247），而且（与马克思同样地）认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产生了积极和必要的正面作用：它唤醒了沉睡着的亚洲社会，推动它们摆脱了停滞不变的过去^②。

① 有关美国人对中美关系这一特殊性的论述，见 *The China White Paper* 1967: 1。对这种“特殊关系”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全面分析，见 Hunt 1983。

② 在马克思看来，变革的动力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亚洲和中国并不系统的论述的讨论，见 D. Lowe 1966: 15 - 29。费正清（Fairbank 1958: 147）则认为，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

在过去 20 多年里，费正清的这一研究取向开始受到批评，这些批评大都反对停滞的东方只是被动地接受充满活力的西方推动的观点。这一新史学可以组织在柯文（Paul Cohen）所谓的“中国中心”史观的标题之下（Cohen 1984：238 - 247）。与马克思与费正清不同，主张中国中心史观的史学家们深入地研究中文历史档案，以探寻中国本身的因素在充满活力的变革过程——这种变革过程贯穿着几乎全部中国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 Wakeman and Grant 1975）。就第一次鸦片战争到 1949 年共产党革命的这段历史来说，现在已经有了关于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个人和群体在通商口岸的新城市中心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具体研究（见以下各书相关文章：Elvin and Skinner 1974；Wakeman and Yeh 1992；Hao 1970, 1986；Cochran 1999, 2001；Tsin 1999；Lee 1999；H. Lu 1999）。历史学家们发现，有很多事例表明，中国的商人和企业家们——其中有些人与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社会有联系——与欧美在华商人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有力的竞争。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中华帝国在中亚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交界地区不断扩张和殖民的历史，尤其是清朝时期的历史，并且非常中肯地提出了如何把这一现象与 19 世纪欧洲侵略关联起来进行研究的问题^①。

“在中国发现历史”尽管是一个极其有益的转折，但它倾向于把清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置于背景的地位，西方似乎成了一个始终被物化了的历史工具，对它本身的面貌与特征则不再需要进行仔细的研究。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考察两部与本书特别有关的以中国中心史观进行研究的著作，这就是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柯文撰写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Esherick 1987；Cohen 1997）。在欧美的中国研究中，他们无与伦比地重建

^① 本书第五章对清代中亚地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探讨。有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新近研究，见 Rowe 2001：417 - 426；Hostetler 2001。



了义和团起义的历史，成功地把义和团人性化。周锡瑞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阐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他将此作为一项波普尔式（Popperian）辨伪工程来完成的任务。他系统地运用了大量证据，来说明关键的两点。第一，义和团并不只是一次一般性的民众起义，相反，它在中国民间宗教运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它并不是一次反对清王朝的起义，而是对西方入侵中国乡村地区的抗议。柯文那部精细的社会史竭力要完成的任务，是要超越有关义和团事件的纯粹叙述性的历史。他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新方法，就是试图去理解那些实际参加者们对于亲身经历的那些事件的感觉。在论述过程中，他力图去说明义和团在中国和西方是如何被神话化的。

除了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内容丰富的研究以外，这两部著作还有着共同的史学目标，就是试图提出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所独具的方法论问题。周锡瑞的目的似乎是要表明，把中文档案和二手资料结合在一起，可以对义和团运动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而且可以运用同样的资料，批判早先的西方中心主义关于义和团的观点。对于研究其他跨文化冲突中的民众运动，尤其是19世纪末欧洲大扩张时期的民众运动，这一方法有着明显的意义。柯文的著作努力从多个层面发掘义和团起义的历史，从而导致对于历史研究方法进一步的深入思考，这就是要更多地去思考怎样才能对历史进行合乎情理的、多方面综合的解释。然而，无论是从这两部著作的主旨内容来看，还是从它们对史学方法所作出的贡献来看，似乎都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两位学者都把西方在华活动看做是一个既知的历史存在。这个西方与费正清及其学生们所探讨的那个西方，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尽管由于现在对西方帝国主义采取了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而使有关的研究与此前稍有差别，但研究重心仍然稳固地放在中国。两位学者都未能突破西方在华帝国主义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国—西方二元体系，也没有把欧美国家的在华活动置于全球环境中去考察。

或许是费正清坚持不把殖民主义理论用于中国研究的做法妨碍了学者们进行比较，比如把中国东部沿海与英法在南亚、东南亚或者非洲的殖民地进行比较。

然而，缺乏比较性的研究框架只是中国中心取向所表现出的部分问题。同样重要的是，相对来说，西方在华活动仍然未能作为一个问题而得到深入研究。例如，尽管认识到了暴力的过度使用，但对在中国进行的独具特点战争，以及这种战争与在其他地区进行的帝国战争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并未进行任何考察。对于 19 世纪欧洲人所设想的他们正在对之发挥作用或者正在对之作出回应的那个“中国”，也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换句话说，欧洲人观念中的这一中国来自何处？中国是怎样被制造成一个需要某种关照、管理和监护的对象的？这种中国观念又是怎样维持其存在的？由于缺少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研究，就存在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这就是会认为在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为本质特征的时代的不幸副产品，尽管这个时代的某些方面遭到了反抗，但这整个时代终究是进步的。

全球史和西方侵华问题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把中国历史发展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性框架之中。在这方面特别具有意义的是，到 19 世纪末，许多评论家在思考欧洲国家在中国采取的各种行动时，已经开始使用瓜分和殖民化这一类词语了。尽管这一瓜分并未实现，但像 19 世纪 80 年代瓜分非洲那样把中国瓜分掉的幻想的存在，就表明了中国历史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跨地区环境。除了很少几个例外，参与武力侵入中国的国家同时也是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殖民帝国的国家。欧洲的民族国家、美国、最终还有日本，如同在中国一样，在这些地区镇压了当地人反抗侵略的斗争。与此同时，它们相互之



间也在进行着竞争。在 1860 ~ 1914 年间，这些强国瓜分和重新分配了大约占地球表面积 1/4 的领土。英国已经非常庞大的帝国又增加了大约 40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法国增加了 350 万，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各自增加了 100 万平方英里左右。俄国和荷兰分别巩固了它们在中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地位，而美国和日本则从旧的帝国（西班牙和中国）那儿夺取了将近 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Hobsbawm 1989：59）。

为了与过去建立的帝国区别开来，或者就我们的研究来说，为了与 18 世纪建立的清帝国区别开来，19 世纪后半期对全球这一大规模的分割常常被历史学家们视为新帝国主义。把这一时代与较早的帝国历史时代（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以及中国的各个帝国）区别开来的，不仅在于进行帝国构建的政治实体异常之多的数目，也不仅在于自称皇帝的欧洲君主的数目，而且在于新的交通、通信和军事技术与欧洲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扩张的资本主义史无前例的结合。科学技术推动下的经济繁荣把西欧和中欧的一部分从乡村和农业社会改变成为城市和工业社会，欧洲的民族国家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重组。到 20 世纪中期，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机器，它的任务是把自己国家的人口标准化，使他们成为训练有素的、便于管理的劳动力，同时增加海外领地，作为其原料来源地，以刺激发展，与其他强国展开竞争。美国和日本也经历了与此相似的过程。欧洲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一直延伸到整个世界，它们强占海外领地，不仅是为了得到它们的资源，也是由于它们毗邻或者位于交通线和通信线上。这一扩张同时哺育出一种新的欧美文化，它的基础是一系列“科学的”理念：白人种族优越、有关民族和文明发展的新理论（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传播文明的使命等。通过神启宗教和技术优势来结束“异教”民族的“原始”和“野蛮”，是新帝国时代的欧美人的梦想（Adas 1989）。这一憧憬激发出来的旺盛精力和勇猛精神，与新帝国的国家动员能力相结

合，似乎要压倒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中国沿海地区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到这一全球性的历史进程之中，但方式与其他殖民地有所不同。可能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真正考虑过要在政治上夺取中国，尽管英国至少曾经有过一次有条件进行这种尝试的机会。中国既没有被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征服或者成为殖民地，也没有被分割成由这个或那个国家直接控制的几个政治实体。相反，由于多种原因——清帝国辽阔的疆土、众多的人口以及欧洲人关于沉睡的中国终将醒来、再成强国的那种挥之不去的感觉^①——的结合，欧洲列强选择了通过既存的中国政权来进行操控、调节和运作的方式。

本书认为，为了实现对清代中国施加影响的这种间接形式，一项教育工程发挥了作用，这项教育工程本身就是殖民化的一种形式。欧洲的外交官以及为清政府出谋划策的顾问们试图通过各种强制的和利诱的手段，教育清朝的上层人物和一般中国人，在一个军事上和经济上都由以欧洲为基地的帝国支配着的世界里，应当如何恰如其分地行使自己的职责。大英帝国——这个在 1911 年清王朝垮台以前一直在中国占有支配地位的欧洲帝国，率先成为清朝政权的主要导师。

我把研究聚焦于帝国主义教程，既不是想重新振兴中国对西方回应的分析框架，也无意于对清代对外关系提出一个更加兼顾中外两面的观点^②。我的基本目标是要重新开启对在东亚的欧美帝国主义的研究，阐明 19 世纪在华殖民主义的性质。为完成这些任务，

① 或者，如拿破仑的话所表达的那样，“让中国龙睡吧，因为它要是醒了的话，会让世界震惊的”（引自 Hibbert 1970: vii）。

② 所谓更加兼顾中外两面的观点，我在《怀柔远人》一书中曾经有所探讨。其要点并不是把清朝和西方关于马嘎尔尼使华的记载统一起来，而恰恰是要保持这两方面记载的不同之处，以便能够更仔细地研究它们各自的独特性。对这一方法更详尽的阐述见 Hevia 1998。



本书利用了一些常规的外交史和经济史未予利用的资料。我希望能够找到某些方式，对中国中心研究取向进行补充和重新思考，并且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带回到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讨论中来。

可能会有人认为，本书未能充分利用中国方面的记载，结果使得中国因素的能动作用又一次被忽略了。的确，本书主要使用了欧洲和美国的资料，但另一方面，和其他殖民地的情形一样，西方列强所使用的战略战术也深刻地表现了本土的诸多层面——从城镇和乡村茅屋里的普通人到清政府官员和清宫廷——的反抗和调适。刺激欧洲人做出反应的并不是一些消极被动的客体，他们在 1839 ~ 1901 年间与中国社会各阶层交往的记载把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清楚。比方说，在通商口岸，中国商人常常经营得非常成功，甚至于有一个英国领事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商人，而外国商人只不过是他们的“代理商”而已^①。可以对清廷做出类似的评论，特别是在以下考察的几个问题上。例如，尽管 1860 年的《北京条约》允许欧洲人觐见清朝皇帝，但清朝上层仍然非常巧妙地设法避免了欧洲外交官和清朝皇帝的直接接触，在 1896 年以前只进行过一次正式觐见（见本书第四章）。另一个例子涉及俄国和英国在中亚进行的“大博弈”。如果不去注意清朝对西藏和它管辖下的中亚地区——包括蒙古、青海和新疆在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维持其控制的话，俄国人和英国人在这里进行的各种行动和反行动，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见本书第五章）。

^① 见 Nicholas Hannen to the Earl of Rosebery, 10 May 1893. United Kingdom, House of Common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以下简作 BPP), vol. 18: 196 - 197. 梅德赫斯特 (Thomas Medhurst) 是最早指出中国商人控制通商口岸贸易的人之一，见 Medhurst to Sir. Rutherford Alcock, 24 August 1869, BPP, vol. 2: 368. 璧利南 (Byron Brenan) 在一份就在华贸易状况于 1896 年 10 月 15 日给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勋爵的报告中有同样的看法，BPP, vol. 20: 193 - 228. 也见 Murphy 1974; T. Rawski 1970。

尽管在后面还要论及诸如此类的有关中国因素发挥作用的事例，但本书的主要焦点仍然集中在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在华活动上。这一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就是认为以往对于这些活动的解释，一直受到被用来评价西方冲击作用的分析框架的限制。在这一点上，看看马克思和费正清所强调的重心，可能会有所启示。马克思运用的主体分析框架是经济/物质框架，主要通过资本主义作用这面镜子来理解中国的变化。而费正清则与之相反，主要是强调西方在精神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的冲击。西方的冲击破坏了本土的思想传统及其在文化上的表现，使之节节败退，从而导致了传统的否定，造就出一个能够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新杂交文化。有关西方对华冲击的这样两种解说，其重心的不同十分显见。不过，强调经济物质的解说或者强调文化过程的解说，是不是以某种多少具有说服力的形式，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解释或者试图抹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存在，并不是问题所在。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解说在讨论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时，赋予某种因素以特别重要性，或者把它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说实在的，把经济发展设定为解释历史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强制。强调思想和知识变化的解说大致也有相同的问题，正如费正清的研究所表明的，当文化被整个置于精神层面并因之成为物质的对立面的时候，这一解说也就变得更加令人怀疑^①。

为了举例说明马克思和费正清的解说的局限性，我们可以考察各种各样的物质体在不同的帝国建构之间的流动。在这方面，外国使节们赠予清朝皇帝的那些常常被称为“贡品”的物品，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子。在马克思主义的解说中，这些贡品会被理解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是统治集团上层对于经济剩余的占

^① 当然，这只是文化的理想主义解说被应用在中国研究中的一种方式；见 Farquhar and Hevia 1993。



有 (Marx 1973: 472 - 473)。与之相较, 费正清几乎没有在贡品中看到多少经济价值。贡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如何在再现中国中心主义以及中国文化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Fairbank 1942)。两种解说都没有特别注意贡品本身, 也没有注意通过贡品所形成的关系。正如我在另一项研究中所指出的, 贡品在中文资料中被称作“方物”, 即是向皇帝进呈这些物品的统治者所统治的领土上出产的特产。而皇帝又把来自其国土上的东西赐予其他统治者。这种贵重物品的交换, 被理解为在作为尊者的清朝皇帝和作为卑者的其他统治者之间建立起某种政治关系, 其目的恰恰就是要共同缔造世界的宇宙—道德秩序。在我看来, 不能把这些物品本身及其特殊的流动约化为纯粹的经济价值或文化价值 (Hevia 1995b: 128 - 130)。相反的, 它们是表述行为的姿态, 因为它们在政治关系甚至自然关系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 劫掠行为是 19 世纪每一次西方在华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可以看到, 某次劫掠活动甚至包括偷窃欧洲君主以前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物品。那么, 这样的一次劫掠究竟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呢, 还是西方文化类型的表现呢? 在这种迷惑中又看到英国有着复杂的管理劫掠行为的法规而法国完全没有此类法规的时候, 选择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变得更为困难。必须加以考虑的还有军事战役的“传统”。对英国来说, 这类传统源自此前不久在印度的军事冲突的历史, 也源自对普遍人性或者不同阶级或种族士兵的行为性质的坚定信念。另外, 还有被劫掠的物品。这些物品多数来自清朝皇帝的收藏, 或者来自中国北方的上层贵族们。对于这些收藏者来说, 这些物品有着极为不同的特殊意义。但一旦它们流动到欧美人的领域, 同样是这些物品, 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们可能会被归类于战争奖赏, 归类于军事战利品, 归类于赠送给英法君王的礼品, 归类于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出售的商品, 归类于博物馆的藏品, 归类于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展品, 归类

于古玩，以后还可能被归类于高级艺术品。此外，在这些物品每一次被赋予新的意义时，它们也伴随着不同形式的特定活动，包括拍卖市场及其售品目录，博物馆和博览会的陈列组合（Bennett 1995；Greenhalgh 1988），以及“古玩”的收藏（Thomas 1991，1994）。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种，都难以简约为纯粹的经济解说或思想意识解说。这些活动也不能被看做是它们涉及的实际物品的唯一代表。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些清朝臣民也参与了劫掠活动以及此后进行的劫掠物品的销售，问题就会变得更为复杂。

还可以举出与此相类似的其他例子（后面几章中将列举许多此类事例），但这里要说明的关键一点是，无论是假定停滞的中国对抗进步的西方的较早解说，还是晚近出现的中国中心研究取向，都不能轻而易举地解释贡品、劫掠这些含义丰富、变化多样的现象，也难以解释它们那些有着多种意义的作用。然而，比确定贡品和劫掠这些范畴的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对这些范畴的探讨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进一步提出了对被物化了的“西方”一类对象的质疑，以及需要把这类对象历史化的问题。同时，它也向我们提示，应当如何考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 19 世纪的活动，才有可能说明全球性进程与其在中国的局部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下一节就将讨论这些问题。

解析被物化的“西方”与把中国纳入殖民研究

如上所述，费正清及其批评者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使用“中国”和“西方”这对对称词语来立论。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叙述一直在固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语，并且假定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在这样的历史叙述所制造出的历史中，西方变成了一个处于历史探究范围之外的越来越被自然化了的实体。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十分难以理解的趋向，尤其是考虑到近年出现的许多有关欧洲在



华群体的研究已经对西方的一致性提出了质疑，其中许多研究令人耳目一新^①。当然，这种非常实证性的研究并不是打破被固定化的西方概念的唯一方式。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质疑欧洲自18世纪以来在世界历史上的特权地位，特别是质疑有关欧洲“文明”唯一性的论断，或者欧洲是世界历史发展和进步的领导者的看法^②。正如新近许多批评者所论述的，颠覆这类预设的方式之一，是将欧洲历史非自然化或者“区域化”，就像拉比诺（Paul Rabinow 1986）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 2000）提出的那样，把欧洲历史发展过程变成一种陌生的或者地方性的历史。不论是把研究重心放在殖民地外围，还是置于帝国的中心，对外交部官员、外交官、殖民地官员、士兵、商人和传教士那些最为平淡无奇的活动，都应该重新进行评估，对它们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性，都应该提出质疑。就本书所进行的研究来说，这类重估包括：对条约和条约成文方式的详细审视、对翻译过程以及翻译在帝国教育工程软硬两方面所起作用的分析、战争中的军事活动和劫掠以及有关中国的实用知识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但是，要有效地完成这一重估工作，在研究欧美对华入侵历史的时候，就不能受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正式”帝国（也就是直接统治的被征服领土）的假定界限的束缚，也不能受现代区域研究常用的相互隔离的区域界限的限制。换句话说，必须把19世纪欧美在华殖民活动与其他殖民地关联起来，并且置于帝国中心地区的历史环境中去进行考察。

把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放到这一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中，在分析本书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时，就可以规避许多传统的框架。对被物化

① 对于英国商人在华社群及其与外交部冲突的先驱性研究，见 Pelcovits（[1948] 1969），也见 Bickers 1999 和 Scully 2001。

② 对于欧洲唯一性新近的重新评估，见 Landes 1998。霍克斯彻尔德（Hochschild 1998）提供了另一种使欧洲非自然化的方式，非常具体地叙述了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制造的各种恐怖。

了的统一的西方进行解析，并将历史事件置于全球范围内去考察，就不会把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冲突看做是推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孤立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不会把它们看做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斗争，而是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帝国建构在帝国的获取、维持和扩张中的政治考量和战略考量。这也使得我们可以把清帝国、英帝国、俄帝国以及其他地区性强国——那些对非毗邻地区有着领土要求的民族国家或者区域性政治实体——看做是一些相互竞争的国家组织、政治共同体或是群体力量，它们竞相争夺对欧亚大陆、非洲、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土地和人民的控制权，或者参与到对这些土地和人民的掠夺之中^①。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类群体力量也包括那些在殖民过程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殖民地人民^②。我们的研究中最突出地体现这一点的，是 19 世纪 60 年代英国侵华远征军中的锡克人和帕坦人的非正规骑兵部队，1900 年解救驻华使馆的远征军中的孟加拉枪骑兵，1860 年支援英法联军的中国“苦力”部队，以及 1900 年参加天津战役的由英国人指挥的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这支部队甚至参加了 8 月穿越紫禁城的阅兵式！

解析被物化的西方，还意味着没有必要把欧美对外扩张和掠夺看成是一个具有一个中心思想和一致动机的统一的或是整体性的事业。如库珀（Frederick Cooper 1997：409）所指出的，殖民主义并不是为了进行统治而采取的一套相互关联的行动，而是一系列往往需要取得被征服人民默认为“霸权工程”。此外，欧美各民族国家相互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也极其复杂。新近的殖民研究已经表明，没有任何两个殖民事业——即使是由同一个帝国进行的——是一模一样

① 从这一视角出发，清帝国既可以被理解为与欧洲民族国家冲突中的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也可以被理解为帝国主义力量。本书第二部分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

② 库珀和斯托勒（Cooper and Stoler 1997）的文章提供了大量事例，说明殖民地人民是如何在反抗殖民秩序的同时对殖民秩序作出贡献的。



的。在非洲和亚洲进行的帝国战争和殖民化既没有整齐划一的模式，也未呈现出完全相同的面貌，其结果也不是预先注定的。殖民化始终是一个混乱无序的过程，有许多不同力量同时从不同方向推动或是阻滞这一过程。此外，土著人民的起义和暗中对欧洲人统治的反抗并非是什么特例，而是一种正常现象。从这些起义和反抗活动中，产生出许多描述“土著人”残暴和野蛮行为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使得人们认定，殖民地人民不适合做劳工，必须对他们严加监督^①。

然而，尽管殖民化是混乱无序的，但也存在着一些旨在创建秩序的方法，力图用权力和权威的合理结构，把帝国中心和殖民地外围联结起来。此外，正如赛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的许多批评者们所强调的那样，东方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强权统治：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在阶级、种族、性属等方面的相互冲撞中，各个殖民体系也在发生着变化（Ahmed 1992；Bhabha 1983；Loomba 1998；L. Lowe 1991；D. Porter 1983），最终造就了新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换种方式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表面上看是殖民主义的典型模式，而实际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类型^②。更何况，它本身就是由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殖民体系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实行着不同形式的政治统治、文化统治和经济统治^③。就像我们能够认识到的，鉴于殖民冲撞的不断变化和多样性，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

① Cooper 1997：413。有关“土著”劳工这一观点的重要例外是“中国苦力”，见下面关于苦力贸易的论述。

② 后殖民研究的批评者们注意到了用印度作为例证的倾向，似乎它能够作为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样式。结果，其他的历史被包含到印度的历史之中，中国或者加勒比地区历史发展的特异性消失了。见 Parry 1987；Chrisman 1990。

③ 本段吸取了库珀和斯托勒（Cooper and Stoler 1997：1-56）关于殖民主义的精彩概括。然而，他们宽广的框架并没有中国和日本的位置，也没有对一些较为古老的帝国建构进行讨论。这些古老帝国的结构和历史，比如大清帝国，提供了有关权力和权威的另外一些情景，可以用来与欧洲帝国进行有益的比较。关于清帝国的讨论，见 Hevia 1993，1995b；Millward 1998。

的关系既不会是一目了然的，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和那些欧洲政治控制似乎更为正式化的殖民地一样，中国在 19 世纪后半期大部分时间里的情形也是极其复杂的。同时，如同欧洲与其他土著地区接触的许多事例一样，中国的情况也表现出许多似乎相互矛盾的发展过程，它们提出了十分棘手的道德问题，对之很难轻易做出历史的解释。比如，对于 19 世纪中国十分腐败的鸦片贸易和意在行善的传教活动——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两方面的活动所要渗透并且重新塑造的是同一群人和同一个政治实体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二者一致起来呢？当武力的使用是以产生于人文主义道德传统中的某些抽象原则——这些原则在“二战”后也为普世的人权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为理由，来证明利己主义的暴力行为的正当性的时候，我们又应当如何解释这种武力的使用呢？当赤裸裸的侵略声称代表着法治并且把自己表现为正在全球进行着法治的伟大事业时，我们对之又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加以解释呢？当某些中国人在 20 世纪一方面声称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地放弃历史悠久的文化信仰和本土知识而去信奉西方科学和政治形态的时候，我们又如何理解他们呢？我们应当如何判断——从哪一方的利益来判断——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正如有关的殖民研究所表明的，其原因部分是因为欧美帝国的构建既是一个破坏过程，也是一个建构过程：它颠覆了那些古老世界和理解它们的方式，并制造出一些新东西来取而代之。从 1850 年以来，帝国构建的这两个过程都在加速进行，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印度^①，甚至出现了破坏过程和再殖民化过程在同一个地区反复进行的现象。此外，如前所

① 我们可以像陶西格（Taussig 1987）试图做的那样，用同样的观点去考察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



述，19世纪的帝国构建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其他形式。其中一个关键差异，是有关殖民地本土人民及其社会实践的知识的生产。这些知识生产出来以后，就能被用来管理、监督和改造殖民地人民。有关他者的信息，包括产生统计数据的大量工程，通过新的信息保存和档案管理的方式制造并组织本土人口，同时又使各种各样的异国习俗悄悄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①。对这些初期工作进行补充的，是大规模的绘制地图和土地勘测工程。这些工程描绘出许多新鲜的地理单位，并且清楚地划定了此前不曾存在的边界。由此产生的新的行政版图改变了殖民地人民的地理观念，一个新的架构覆盖到了旧的宇宙—道德共同体之上。除了信息的积聚和地图的绘制以外，新帝国主义还包括翻译工程，其中有些工程规模巨大，其目的是要使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交流的意义固定下来，并将交流的许多形式标准化。而所有这些任务又都要依赖于在这一时期改变了欧洲和北美的运输和通信方面的技术革命。轮船、铁路和电报在帝国中心和它的殖民地外围之间，制造出一个高速的网络式界面，使得资源能够贮存在一些节点（集结地）上，并且能够在发生危机时迅速地按照需要被配置到这一系统中的其他地方。比如在1900年，就能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整个军团及其装备从印度运送到中国。

新帝国主义这些充满旺盛活力的特点，在1860年以后的中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并且把东亚和殖民世界的其他部分紧密地联结起来。然而，在此同时，西方在中国的开拓也有着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就像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们所论述的那样，欧美帝国的扩张有时是受机会主义驱动，有时是为了进行防御，同时又始终处于与其他帝国的竞争之

^① 这一信息积聚的过程与福柯（Foucault）用“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一词所讨论的情形相类似。

中，结果就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不平衡性^①。例如，德鲁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利（Felix Guattari）就认为这种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机器”特有的病症。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机器”，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生产设施，它在新的接触地带反复进行着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越是要“去疆界化”，“为了从[物质]流动中榨取剩余价值而对之进行解码并且使之成为公理，那么，资本主义的辅助设施，如政府机构和法律与秩序的力量，就越是要尽其所能地再疆界化”（Deleuze and Guattari 1983: 34 - 35），把已经被解码了的东西再重新编码。可以把这些辅助设施理解为一组欧洲文化、社会和政治形式的再生和重新配置，它们为帝国主义去疆界化的进一步行动提供了某种生命维持系统。

就中国来说，我们可以注意通商口岸中强行设立的某些特定建构，这些建构的目的是维持西方势力，并制造出能在中国环境中持续进行解码和再编码的人（其中一部分是中国人）^②。或者，我们可以把贸易和对华战争看做是资本主义机器中的解码者，而“和平友睦通商条约”和有着许多有形建构和制度的通商口岸，则可以被看做是具有再疆界化或者重建殖民秩序功能的机器。而重建秩序本身，转过来又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分解和重新编码。治外法权提供了这一过程的一个例子。它在对中国主权重新进行编码的同时，也制造出一系列深深渗入到中国国家政治中的去疆界化，而法庭、关税征收程序和条约修订等辅助设施则重新在中国再建疆界。

① 与不平衡发展相关的一组词语和概念，全都表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主要争论即殖民地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在殖民地环境中的悖论的观点：它破坏了旧的生产方式，却制造出一个革命性的进步的生产方式来取代它。另有人认为，殖民地的实际转变并不是整体性的，相反，大量的旧的生产方式与欧洲帝国引入的生产方式并存——因此出现了不平衡发展。有关这一问题争论的全而评述，见 Bottomore et al. 1983: 83 - 85, 498 - 503。

② 如一个领事所说，中国商人控制英国商品向中国内地的运输和销售并无碍，贸易的发展是“首要的考虑”（BBP, vol. 20: 198）。



这里，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提供了把西方在华势力某些似乎相互矛盾的状态——特别是从本书开始所用照片中能看到的帝国教程中软硬两个方面——整合起来的非常有用的方式。与此同时，如罗伯特·扬（Robert Young 1995：166 - 174）所指出，必须警惕，不要被德鲁兹的资本主义机器论所迷惑。罗伯特·扬认为，这一理论很容易导致过分机械论和决定论，这就意味着“把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移植过分简单化了”。他更愿意把德鲁兹提出的资本模式解释为一种“疆界书写机器”，并且由此提出了作为“一种历史模式”的“叠覆式”铭写和再铭写，“这种模式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并不是简单地被破坏，而是相互层积在另外的文化上面，从而引起了斗争。这些斗争本身反而增加了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层叠，推动这些文化更进一步地被译转进不断增加着的文化拼合体之中”（Young 1995：173 - 174）。

但是，对回到这一过程里的文化因素，最好理解为被移植到或者悄悄潜入新构建中的一些历史的碎片，一些被翻新了的传统。通商口岸上海和加尔各答出现了有着中世纪规矩的兄弟会组织（例如共济会）；北京、天津和一些省会城市里的天主教堂展示着不同形式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天津的英租界赫然耸立着诺曼城堡式的戈登堂。新式的和旧式的军队——有些是招募本土人组成——被授予中世纪的纹章、奖章和徽章，彰显着游侠骑士的男子汉精神。维多利亚成为大英帝国的女王，统治着按欧洲封建制命名方法重新改组的印度贵族。黄包车这类形式的事物的出现，把为数极少的得到正面肯定的东方事物之一——中国劳工，与西方的金属辐条车轮、橡胶轮胎和弹簧车厢融合到了一起。由这种不平等交换产生出的这类事物传播出去，成为印度和非洲殖民地景观的一个主要特征^①。殖

① 在尤尔和伯奈尔（Yule and Burnell）的 *Hobson-Jobson*（[1886] 1994）一书中可以轻易找见罗伯特·扬所发现的这一过程的许多其他例子，它们不仅包括英印词语，还有一些跨越英国在亚洲的接触地区的词语。

民地本土人民仿造这类由不同形式组合而成的事物并熟练地加以运用，把一些本土因素补充到这类混合事物中，从而产生出被某些学者称为“殖民现代性”的现象（Barlow 1997）。

分层、叠覆、译转、斗争，这些概念作为有用的方式推动着我去思考，思考从鸦片战争向和平友睦通商条约的运动，思考从战争暴力向美国驻北京使馆举办的以清王公为贵宾的茶会的转换。换句话说，这些概念让我们能够把研究重心放在发生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历史事件所独有的特殊性上，并且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外接触的典型产物——费正清有关共治的绝妙范例中国海关或者清朝新外交部（总理衙门）之类的文化拼合体——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无休止的铭写和再铭写的过程。罗伯特·扬的论述也表明，由帝国的资本主义及其辅助设施装配起来的秩序重建的世界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离散文化（如果实际上存在过这类文化的话）的消失，以及融合文化的增殖（Latour 1993）。帝国中心地区如此，殖民地外围地区也是如此。这种融合文化的形式不仅可以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见到，也可以在同一时期的帝国中心地区见到，比如伦敦和巴黎^①。

如果说，罗伯特·扬叠覆式层积的理论提出了如何使殖民权力和统治结构中那些繁复的相互作用概念化的话，那么，对于探讨帝国边缘或者人口稀少的边界地区中殖民程度较弱的情形，这一理论也是极其有用的。被科努里（Arthur Conolly）称为“大博弈”的过程（Edwards 1975: vii; Cheng 1957; Davidson-Houston 1960; Lamb 1960; Morgan 1981），也是一种文化拼合现象。这一过程包括

① 语言是这种增殖的一个制造者，如约尔和伯耐尔（Yule and Burnell [1886] 1994）所清楚表明的。人们或者可以想到“洋泾浜”英语，它本身就叠覆着多种元素，这些元素反映着从非洲到东亚的解码和再编码运动（见Crow [1913] 1973: 11-14 对中国的论述）。同样的模式在帝国边缘也可见到，见刘禾（L. Liu 1995, 1999）对汉语新词语的讨论。



英俄在整个亚洲的战略性战争，它真正开始于英国 1848 年击败旁遮普的锡克族军队^①。在 1854 ~ 1856 年进行的一场短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着手进行一场阵地战，目的是要遏制俄国向中亚的扩张，并且保护英国在地中海、欧亚大陆南部（即印度和缅甸）以及中国东部省份的利益。在远东战场，对英国战略家们来说，最坏的情景就是清帝国的崩溃和被瓜分，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的话，只有俄国能够从中获益^②。

因此，英国战略家们所面临的问题相当困难，需要在两方面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他们试图让清政府更加合作更加顺从；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清王朝能够变得更加强大，使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其领土主权。笼罩在这些地缘政治问题上的，是两个困扰着英国领导人的历史先例。第一，他们不想让中国成为另一个奥斯曼帝国，一个被内部分裂势力折磨得非常虚弱的政治体，一个列强侵略的对象。事实上，这种变动正是“东方问题”最初的主题：在欧洲向东方扩张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古老帝国的衰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动荡。第二，他们也不想让中国成为另一个印度，一个全方位的殖民事业，它能够彻底耗干英国的资源。当然，他们也希望阻止俄国对亚洲的控制。

与当时的许多实际参与者一样，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Kim, (1901) 1981; A. Wilson 1977: 43] 等帝国扩张的鼓吹者和新近一些历史学家都认为，英俄在亚洲的竞争被普遍看做是一场双

① 在英帝国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锡克战争，占领旁遮普使英印帝国扩展到阿富汗边界；见 Byron Farwell 1972: 37 - 60。

② 威妥玛 (T. E. Wade) 致外交部的信提到瓜分的危险，见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以下简称 FO), 17/748: 397。有关英国对俄国进展的看法，见 H. Rawlinson 1875; Boulger 1879, 1885; 也见 Ward and Gooch 1923, vols. 2 and 3, 近年的研究见 Hopkirk 1992。关于俄国的顾虑，见 Fletcher 1978c: 326 - 327; 关于俄中在中亚的竞争，见 Clubb 1971; Paine 1996。

方智慧的较量。从东北的满洲黑龙江地区一直伸展到西南的阿富汗，在如此广袤的弧形地区展开这样一场角逐，用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的话说，英国和俄国都需要一双“警觉而洞察一切的眼睛”（Rawlinson 1875：203），来收集和评估各种情报，以策划自己的行动和针对对方的反行动。然而，在此同时，尽管英俄的行动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场双边竞争，它们却都不可避免地要与清帝国打交道，因为清帝国征服了中亚一些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地区，并且于 18 世纪使西藏成为其藩属（此说不当，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译者注）。如果不能理解或者不去考虑清帝国在中亚的活动的活动的话，就会导致战略上的失算，对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的各各种力量做出错误判断。换句话说，参与大博弈的人需要掌握类似于在帝国其他地方产生的那些知识的有关这一地区土地和人民的知识（见本书第四章）。当然，大博弈中的阴谋诡计与中国东部更加公开、更加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大博弈行动的秘密性质需要欺骗和秘密行动，需要对当地人民进行间接操控。这方面的秘密活动包括让英国人冒充“土著”，也包括训练当地人作为英国代理人进行活动。边界的混淆或者变得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恐惧心理，害怕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潜伏着看不见的或者难以辨识的威胁。就英国人来说，这样的恐惧心理包括担心不列颠群岛可能会遭到入侵（Pick 1993），担心俄国哥萨克会突然袭击中国和印度，担心企图搞垮大英帝国的“东方”阴谋。从诸如此类的虚幻想象中产生出令人恐惧的各种荒谬事物，反过来又困扰着帝国、帝国档案以及“后帝国”世界（见本书第九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俄国与清帝国在中亚的争夺，就会为思考维持帝国存在和延续的斗争中的各种帝国想象、幻想和幻觉，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

总而言之，尽管在欧洲民族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的权力关系，但权力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单向性的。扩张



的双重运动（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为人民、物质和思想观念的多向流动——这些流动能够破坏或者加强殖民权力赖以建立的那些变化着的基础——制造出新的网络^①。换句话说，殖民化不是简单的征服和管理问题，所有的殖民环境中都渗透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反抗和适应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一些有关自身和他者能力的虚幻构想支持或者破坏着殖民政策。由此看来，很难设想会存在着任何一种纯粹的殖民化形式或者一种能够固定我们对殖民进程的理解的既成模式。

相反，我们可以把帝国时代形成的所有实体都看做是半殖民主义的各种形式——尤其是文化拼合体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英属印度，尽管它有着殖民地中的殖民地的经典地位。作为欧洲扩张的再疆界化“机器”，各种殖民设施为了实现完全的统治——尽管这种统治从未真正实现过——而竭尽全力。它们也在性属、种族、阶级等方面制造出一大堆矛盾，具体表现在接触地带中形成的各种特有制度中。因此，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并非处于“真正的”殖民世界之外，而只是非洲、南美洲、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出现的不完全殖民形式的一个变化形态。而且，与其他这些地区一样，中国也充满了由异质元素结合而成的集合体。促使这些集合体生成的，是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过程中的特有节律，是权力和交流的地区性循环间歇、中止和瓦解的特有节律，是新形式铭写过程中的特有节律。欧洲扩张所造成的这种浪潮般波动着的节律，又受到帝国神经系统中多向流动的制约。构成帝国神经系统的交通和通信渠道，以更为复杂和高速的解码和再编码模式，把帝国中心和殖民地边缘联结起来。正是这些模式，尤其是它们在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表现，是本书关注的中心。我们的研究把中国放置在19世纪改变人类世界的

^① 从这一视角看，以前讨论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显在矛盾，也可以理解为由历史的叠覆式层积以及接触地带形成的杂交建构的增殖而造成的。

全球化力量之中，而不是把它置于这一力量之外或者它的外围。

然而，我是不是应该言归正传了。本书并不仅仅是一部有关历史的著作，它本身就是历史。它由三个部分构成，最终到达那个后帝国时代。第一部分由三章组成，先是叙述 1856 ~ 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件，然后考察了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过程，这些过程从根本上重新规范了清代中国与欧洲帝国的关系，并且在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口建立了驻有欧洲外交官的使馆区。第二部分有两章，论述 1860 ~ 1900 年的几十年间在中国重建秩序的过程，以及清帝国在新帝国主义这一更大的全球性框架中的位置。第三部分讨论 1900 ~ 1901 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列强对北京和华北的占领，其目的不仅是要考察 19 世纪清代中国的最后一次再疆界化，而且要讨论在华欧美帝国主义的社会和文化衍生物。在对有关中西关系的权威性叙述的建立和传播过程的诸多方面进行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对有关在华殖民主义的性质及其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做出某些结论。

第一部分

鸦片战争与通商条约

第一章

亚罗号战争，1856 ~ 1860 年

《南京条约》批准以后还不到 10 年，清帝国和英帝国之间就又发生了战争。这一战争在英国被称作第二次和第三次中国战争，而更普遍的叫法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从 1856 年到 1860 年进行了 5 年，同时也有法国和美国军队参加。英法联军和清朝军队之间的大规模战事发生在 1857 ~ 1858 年以及 1860 年，而美国和英国海军也分别于 1856 年和 1859 年与清军发生过较小规模的战斗^①。围绕这些军事行动，在英国和中国内部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辩论，美国、法国和俄国驻华外交官们对英国行动的看法也不一致。然而，当战争最终于 1860 年以清朝战败而告结束时，这些国家的公使们都抛开了他们的分歧，利用中国的软弱缔结了新的条约。本章先简要地概述这些历史事件，接下去的两章将对这些事件的意义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英国和美国试图开始就修改第一次鸦片

^① 前者发生于 1856 年 11 月，当时有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受到攻击，美国指挥官阿姆斯特朗（Amstrong）准将攻占了广州附近的炮台并摧毁了 167 门大炮。见 Morse 1910 - 1918: 432 - 433。

战争结束时缔结的条约与中国进行谈判。它们反复提出的要求表达了它们当时的关注点，就是谋求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它们也想解决第一次鸦片战争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即进入广州城并获得在广州城永久居住权的问题。由于清廷全力贯注于国内的叛乱^①，开始谈判的努力在整个 50 年代始终未获成功。在这期间，英国和法国正在克里米亚与俄国作战，它们的驻华代表们也只能与清朝当局打打嘴皮官司而已。不过，当克里米亚战争于 1856 年结束后，英国政府派出了几艘炮舰来到香港，希望以此打破僵局。当这种显示武力的措施显然未能对清朝官员发生作用时，英国首相巴麦尊（Palmerston）勋爵便等待着找到一个合适的事件，用来作为对华开战的理由。这样的一个事件于 1856 年下半年发生了。

亚罗号事件，1856 年 10 月

10 月 8 日，由于怀疑一艘三桅帆船亚罗号涉嫌走私鸦片，广东官员扣押了这艘在香港登记并且悬挂着英国国旗的小型沿海商船，并且逮捕了船上的船员^②。英国领事巴夏礼（Harry Parkes）认为这一行动违反了《南京条约》，要求钦差大学士、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船员和这艘商船。两天以后，叶名琛归还了 9 名船员，但仍然扣押着其他 3 名被怀疑为海盗的船员。巴夏礼拒绝接受叶名琛的和解姿态，并且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要求叶总督正式道歉。

事态一直僵持到 10 月 20 日，这一天，巴夏礼会见了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和英国舰队指挥官西马糜各厘（Michael

① 当时的主要起义是开始于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此外还有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叛乱和华北地区被称作捻军的更为传统的农民起义。更具体的概述，见 Hsu 1990：221 - 258。

② 和黄包车一样，这种三桅帆船也是中西技术的混合体，它由西式的船体和中式的索具装备组成。



Seymour) 海军上将。在会见中，巴夏礼建议向叶名琛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在 24 小时之内答应英国的要求。如果叶名琛拒绝的话，英国海军便将摧毁黄埔岛和广州之间的炮台。如果叶名琛对此仍然无动于衷，就占领紧靠广州城墙的炮台，如有必要，还可以占领广州城，从位于珠江的炮舰上炮轰广州的总督衙门。包令和西马糜各厘同意了巴夏礼的建议，于是巴夏礼于次日向叶名琛发出了最后通牒。叶名琛立即释放了其余的船员，但没有理会道歉的要求。他还采取了预防措施，调动其管辖的所有军队，加强珠江各炮台的防卫，并且建立了一个由高官组成的委员会来帮助他应付这一危机 (Wong 1976: 169)。

叶总督没有在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内表达他的道歉，西马糜各厘的海军便占领了广州城外的几个炮台，破坏了大炮，并摧毁了防御工事。在遭到这一攻击以后，叶名琛停止了广州所有的对外贸易。此后，包令要求得到立即进入广州城的权利。这一要求被叶名琛所拒绝，于是英国炮舰开始炮轰两广总督衙门，每 10 分钟轰击一次。由于兵力不足并且失去了城外的防御，叶名琛转而向广州及其腹地的民众寻求支持 (Wong 1976: 171)。但是，英国人没有等到他组织起反抗，便猛烈炮轰广州城并占领了叶名琛的寓所。这位总督逃到城内另外一个地方，以争辩亚罗号事件的是是非非来答复英国人。英国人对此的回应是把轰炸扩大到广州城更大的地区，并且占领了珠江沿岸更多的炮台。到 11 月中旬，事态陷入僵局。叶名琛既没有兵力也缺少军事技术来把英国炮舰赶出珠江，而英国人在海军发起攻击以后，也没有足够的陆军把战事继续下去。包令在挑起危机之后，写信给加尔各答，要求派兵增援。

在战争的这一初期阶段，包令和巴夏礼原以为英国的武力足以让叶名琛以及广州屈服。然而事与愿违，这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并且把清政府背后的广大百姓动员起来了。与此同时，这一急于求成的好战政策的失败在英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香港总督要求从印

度增兵以后不久，英国议会就对巴麦尊政府的中国政策展开了辩论。

亚罗号事件的消息通过海底电报到达伦敦的时间是1856年12月29日，到次年1月的第一个周末，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关于珠江军事行动的报告就出现在《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上。《泰晤士报》（*Times*）和《晨邮报》（*Morning Post*）紧接着就发表社论，支持包令，指责叶总督，认为他的行为威胁到英国在1840年获取到的条约权利。然而，其他报纸和评论性刊物则不那么支持政府。比如，《每日新闻》（*Daily News*）和《喷奇》（*Punch*）就认为，包令和巴夏礼无视叶名琛寻求妥协的努力，执意挑起战事^①。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New York Daily Tribune*）的文章，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Torr 1968：11 - 17，36 - 44）。

围绕亚罗号产生的问题很快就在议会两院展开了讨论，并于3月3日通过了对政府的谴责。巴麦尊政府因之倒台，重新进行选举^②。巴麦尊在此后的选战中，以谴责叶名琛总督及其对英国尊严的侮辱为选举纲领，鼓吹对华战争，并且以85席的多数重返议会。但是，甚至在选举结果明确之前，巴麦尊勋爵就下令从印度派兵到香港，并且将一名比包令更有权力的皇家代表派往中国。

1857年4月12日，第八代额尔金（Elgin）伯爵布鲁斯（James Bruce）——他的父亲曾经将帕台农神庙上的大理石檐壁拆下，运送回英格兰——被任命为女王陛下特使及在华全权代表。给额尔金的训令明确了此行要达到的目标：（1）赔偿英国臣民所受到的伤害和财产损失；（2）在中国所有口岸完全执行条约的各项规定；

① 有关报刊的评论，见 Wong 1998：153 - 165。

② 关于这一辩论，见德尔比（Derby）勋爵的发言以及其他人士于2月24日和26日在上院的发言，载 *Hansard's*, 3d ser., vol. 144, cols. 1155 - 1245, 1310 - 1388。关于下院的辩论，见 *Hansard's*, 3d ser., vol. 144, cols. 1391 - 1485, 1495 - 1585, 1589 - 1684, 1726 - 1850。哈特（Hurd）对这一辩论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并且讨论了议会的派系斗争，见 Hurd 1967：47 - 60，也见 Wong 1998：196 - 198。



(3) 开放更多的口岸和长江，以推动对华贸易；(4) 取得在北京常驻公使的条约规定。在补充指令中，额尔金受命争取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更大的行动自由达成一项协议。此外，为了确保廉价劳动力能源源不断地进入英国的殖民地，额尔金要争取达成一项允许所有清朝臣民自由移居海外的协议。如果北京政府不愿意满足这些要求的话，指挥所有在华英国陆海军队的额尔金受命可以分阶段使用武力。第一步占领广州，第二步封锁大运河，第三步阻断长江和黄河的交通运输，第四步封锁通往北京的北河。如果清政府仍然反抗，额尔金可以攻打北京。为了保证充足的资源来完成这些任务，从印度和新加坡派出了新的海军和地面部队 [*Correspondence 1859 (CESM) 1-7*]。

中国事态的发展，1857 ~ 1858 年

额尔金伯爵于 1857 年 7 月初到达香港，但由于印度发生了叛乱（即所谓的印度兵变），他难以立即采取行动。然而，到这年年底，他有了足够的兵力可以支配，而且取得了法国、美国和俄国驻华代表的暗中支持。这些代表现在都愿意跟随英国，以改善各自国家的在华地位^①。额尔金不是没有过怀疑和顾虑。在他看来，英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尤其是对傲慢的清朝官员——这些官员在和外国政府代表们打交道时，非但不运用智慧和讲究实际，反而依赖于欺骗手段——“冷漠自大”的回应，实在是“愚蠢的”。此外，他还怀疑“亚罗号这个肮脏问题”是否值得人们那样关注（Walrond 1872: 209, 211-212, 217, 219）。

① 伯驾（Peter Parker）于 1856 年曾经试图修改美国条约，但未获成功。见 Morse 1910-18, 1: 416-418; Swisher 1953: 312-326。俄国人一个月以前也遭到了同样的失败。

额尔金的这些疑虑很快就被撇到一边了。在“外交的形式和习惯”方面，他似乎一直得到法国使节葛罗（Gros）男爵的指导（Walrond 1872：209）。在葛罗的帮助下，额尔金对危机采取了一个外交教科书式的行动。1857 年 12 月 12 日，他向叶名琛总督发出了一份书面的最后通牒，列举了英国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英国方面的要求，并且表示这些问题没有讨论和谈判的可能，叶名琛总督必须马上履行现有的条约规定，并且同意就修改条约进行谈判。额尔金声称，如果这些要求遭到拒绝的话，“他只有痛苦地命令海陆军指挥官们再次对广州发动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他给了叶名琛 10 天的答复时间。与此同时，额尔金命令依然指挥驻香港英国海军的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做好战争准备（CESM 95 - 97）。

两天以后，叶名琛总督做出了回复。他显然并没有明白要答复的是一份最后通牒，在回信中还是回顾了 1842 年条约签订以来在广州发生的事件，并且补充说，英国的某些要求，包括在广州城内的居住权和修订条约，在《南京条约》的清朝文本中并不存在。关于居住权问题，叶名琛提到，1849 年的香港总督文翰（George Bonham）曾承认条约的中文文本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Fairbank 1953：279 - 280）。因此，叶名琛认定英国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并且把目前的僵局归咎于巴夏礼领事。然而，他同时也给英国使节提供了一个退却的台阶，说他猜想额尔金的信一定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他雇用的某个心怀叵测的人写的（CESM 94，121 - 124）。额尔金收到这封信的翻译件的当天，在其日记中吐露说，叶名琛的回复“纯粹是一派胡言”（Walrond 1872：212）。

额尔金毫不顾及外交习惯的慎重原则，下令向广州进军。12 月 28 日开始攻打广州，到 1858 年 1 月 5 日，英法军队就占领了这座城市。叶名琛总督被俘，被拘禁于广州港上的一艘英国海军军舰上。一个月以后，以一种严重违背外交“形式和习惯”的方式，叶名琛被送往加尔各答，并最终死于囚禁中（Wong 1976：193 - 197）。此



外，总督衙门中的总督档案也被缴获。这些档案文件控制在额尔金的语言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和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的手中，在此后的事件中成为他们个人拥有的一种力量。

占领广州顺利地解决了广州居住权问题，但额尔金使命中要通过新的条约来处理的其他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准备下一步行动时，额尔金试图利用占领广州这一有利条件。英国和法国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来统治广州，并且把这一不同寻常的安排当作与清廷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在此后三年时间里，一个以讲究实际的巴夏礼为首的联合委员会借助英国式的殖民地法律制度，在广州重建了新的疆界^①。然而，在此同时，俘虏叶名琛和占领广州也使得额尔金勋爵失去了可以与之谈判并能够负责的中国政府代表。于是，额尔金先致信北京，向清廷通报了他的行动，然后挥师北上。在福州和上海停留时，额尔金得知他已经进行了一堂极其有效的英国课业：他俘虏叶名琛并把他押送印度一事，“在清朝官员中间产生的影响甚至比占领广州还要大”（*CESM* 231）。

当额尔金在中国沿海扬帆北上时，清廷对南方事态的发展还不是十分清楚。直到1858年1月中旬，皇帝才接到叶名琛总督1857年12月27日的长篇奏折。在这份写于英法联军攻打广州前一天的奏折里，叶名琛介绍了他与美国、英国和法国使节的交涉，指出了英国在印度所面临的问题，回顾了他对亚罗号事件的处理，并且概括了他对英国最新要求的回复。叶名琛已经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表示12年前没有人会想到英国人进广州城居住和修约问题会导致当前的危机。但他还是向皇帝保证，他会对外国人严加防范，明示怀柔。力量、忍耐和理解三者兼用，或许会使外国撤出它们的兵

^① 据魏斐德（Wakeman 1966: 175）研究，在占领结束时，多年来一直深受土匪、叛乱者和政府横征暴敛之苦的珠江三角洲乡村农民，对外国占领带来的和平局面表示感谢。

船。如果外国兵船退出，他将立即向皇帝报告这一好消息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610 - 619；Swisher 1953：334 - 346]。咸丰皇帝读到这份奏折后，于1月17日向军机大臣发布了一道谕旨，对叶名琛加以赞许（《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619 - 620）。

然而，一旦英国行动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种看法立刻就改变了。10天以后，清廷从一份由广州主要文武官员联合具名的奏折中，得知广州已经陷落。这些官员把失败的责任归之于叶名琛，使皇帝和军机大臣们感觉到，造成这一不幸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总督处置不当和判断错误。于是，叶名琛被革职，其他官员则交部议处。然后，清廷思考下一步的行动。3月30日，清朝官员在上海通知额尔金勋爵，皇帝决定任命一位新的两广总督，要求他回到广州等待新总督到达。额尔金拒绝改变原有计划，并且指责清朝又一次违背了《南京条约》：传达皇帝信息的官员并不具备与额尔金同等的品秩。一周以后的4月8日，额尔金率军在中国北方登陆。

天津条约，1858年6月

英法联军于1858年4月底抵达北直隶湾（指渤海湾——编者注），和他们一起到达的还有美国公使列卫廉（William B. Reed）和俄国使节普提雅廷（Putiatin）伯爵。26日，额尔金获悉直隶总督谭廷襄、内阁学士乌尔焜泰和其他两名省级官员受命与他进行谈判。在双方第一次会晤时，额尔金明确表示，他只与具有和他相同权力的官员进行谈判，这就是说，这些官员要具有便宜行事全权，即有权当场做出决定，而不需要将谈判的每一项内容都向政府转达。他还要求这些官员出具相应的全权证书。据威妥玛（他手中掌握着有关的中文和英文文件）说，1842年谈判和签订《南京条约》的两名清朝官员耆英和伊里布，就具有额尔金所要求的这一权力。当谭廷襄表示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权力时，额尔金中断了谈判，下令在



北河口开始军事行动^①。5月20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炮台，摧毁了炮台上的大炮。然后，额尔金溯河而上，将战事推进到天津。

面对英法联军随时准备进军北京的姿态，由于兵力不足，咸丰皇帝又派出两名更高级别的官员来到天津，与额尔金进行交涉。一位是满族贵族、大学士桂良，他在30年的官场生涯中，担任过许多文武官职，在1857年晋任大学士之前，曾在北京和天津所在的直隶省担任总督。除大学士官职之外，桂良还被授予钦差大臣的头衔^②。另一位官员是吏部尚书花沙纳。额尔金对他们的全权证书表示满意，也认为他们确实是清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于是开始与其进行谈判。在此后3周里，对新条约的具体条文进行了仔细推敲，并最终于1858年6月26日在天津签订。与此同时，清朝谈判代表们也同法国、俄国和美国缔结了条约。

中英条约通常被称作《天津条约》，它要求在北京和伦敦建立常驻公使的外交使馆，外交使领官员可在两国间自由往来。在非外交方面，英国公民获得了许多令人满意的特权。沿海和沿长江开设了新的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商人和游客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基督教传教士传教无需经过批准。条约还规定，双方在上海举行有关关税问题的协商。这一协商于11月初完成，新的海关税则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按药材类征收关税（CESM 426-434）。最后，在一项只有英国条约才有的条款中，规定清政府在其公文中不得再使用“夷”字——英国将该字翻译成 barbarian。在单独的一项专条中，规定中国赔付银200万两，赔偿英国在广州的损失，另外赔付银200万两，赔偿“大英君主只得动兵取偿”造成的“军需经费”（CESM 347-355）。条约最后一条规定，两国政府将在一年之

① 美国和俄国公使曾劝说额尔金接受他拒绝接受的清朝代表的证书，见 CESM 304-305。

② 1854年，桂良曾与抵达大沽要求修约的英国、美国和法国使节进行过交涉；见 Hummel 1943: 428-430。

内，在北京完成条约的正式批准。

清廷最终被迫应允了英国所有的要求，额尔金勋爵现在想表示一下他的宽宏大量了。在缔结关税协定的同时，清朝钦差大臣明确表明，公使驻京仍旧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恳求额尔金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作为英国在北京派驻公使的替代办法，清政府提出委派职位与英国代表对等的政府大臣，与额尔金或其继任者在英国希望的任何一省进行谈判。额尔金在致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伯爵的信中，建议英国政府接受这一妥协。额尔金认为，如果条约按原计划得到批准的话，由英国使节“在北京以外选择一地驻节，或定期造访京城，或在公共事务急需时随时造访京城”，是符合英国利益的（*CESM* 405, 408）。然而，第二年的大沽事件使得额尔金建议完全失去了被接受的任何可能性。

大沽炮台，1859年6月

在1858年失败之后，清政府重新修筑了大沽炮台的防御工事，并且设置了一系列障碍物，以阻止溯北河上行。在此同时，英国则任命了额尔金勋爵的弟弟普鲁斯（Frederic Bruce）为英国使节，受命前往北京交换条约的批准书。普鲁斯1859年5月到达中国时，时任两江总督、驻节上海的钦差大臣何桂清提议在上海就地互换条约批准书。普鲁斯显然认为，他必须避免任何可能支持北京“天下霸权和民族优越的信条”的行动（Costin 1937: 288），因而拒绝背离英国在与清廷交涉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惯例。他只能与政府大臣进行交涉，并且要按英国使节以往的进京路线进入北京，按照条约规定交换批准书。于是，在舰队司令贺布（James Hope）指挥的舰队以及同样前往北京换约的法国新使节布尔布隆（M. de Bourboulon）陪同下，普鲁斯启程北上。

当英国人于1859年6月16日抵达大沽时，清朝地方官员通知



他们，为了防御南方的叛乱者进攻，河道已经被封锁。这些官员要求普鲁斯在更北边的北塘登陆，再沿那边的河道前往天津。普鲁斯一定是认为，这个时候的任何退让都是一种挫败，于是命令贺布清除河道上的障碍物。到6月25日下午，英国炮舰已经初步开辟出一条通道，并且开始驶向炮台附近的一处阵地。在那里，中国的大炮以令人吃惊的准确性向它们发射。英国的4艘炮舰被击沉，2艘遭到严重损坏，伤亡人数惨重，英国舰队司令本人也受了伤。攻占炮台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到这一天晚上，英国方面共伤亡434人，其中89人死亡（Fisher 1863：184 - 198；Hurd 1967：181 - 184；Beeching 1975：268 - 272；Hibbert 1970：242 - 244）。

大沽的胜利在北京引起一阵狂喜，同时也使英国人感到惊慌失措。在与欧洲军队的战斗中一直没有表现出任何突出能力的中国军队，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有战斗力？在现场和在伦敦的英国观察家们断定，中国一定是得到了外部的帮助。有人猜测或许是俄国人提供了军事援助，其中包括炮台上熟练的炮手。事实上，确实有报告称曾经发现大沽炮手中有人的头上戴着毛皮帽子。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把清军指挥官蒙古将军僧格林沁指为反抗英国的爱尔兰冒险家科林森（Sam Collinson）。^①

在这些谣言流传的时候，僧格林沁报告清廷，英国作战舰队已于7月14日全部撤离北直隶湾。在同一份奏折中，他还提醒说，英国军队尽管已经撤退，但被失败所激怒，很可能会调集援兵，再次北犯。因此，必须时刻警惕，只要英国人再受到一两次重创，便会停止侵犯。朝廷还必须防范其他列强。僧格林沁指出，美国公使华若翰（John Ward）此时正在北塘，准备启程赴京，交换上年缔

^① 赫德（Hurd 1967：184）和希伯特（Hibbert 1970：244）都提到了这个传说，但没有提供表明它出现于1859年的资料。不过，这一故事第二年确实已经流传开来，沃克（Colonel Walker 1894：179）在8月24日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它。

结的条约的批准书，应避免滋事，遵照此前关于换约的协定进行。此外，如果处置得当，甚至有可能说服华若翰向英国方面传达一个信息：在取得大沽胜利后，清廷有权要求英国进行赔偿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1499 - 1501；Tsiang 1929：81 - 82]！

进犯北京，1860 年 8 ~ 10 月

就在清廷盘算着如何充分利用它在大沽的胜利时，失败的消息传到英国。随着更多细节的披露，在普鲁斯采取的行动是否得当的问题上，舆论出现了分歧。有些人认为，他应当接受中国的邀请，在北塘登陆；而另外一些人则反驳道，额尔金勋爵已经确然无疑地得到了从北河通行的权利，因此，普鲁斯坚持要走这条路线是完全正当的。甚至连巴麦尊勋爵的内阁在这一问题上也发生了分歧，在返回英国后被任命为邮政大臣的额尔金勋爵就劝告不要采取过分鲁莽的反应（Costin 1937：293 - 300）。

当辩论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内阁却在法国人的刺激下采取了行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决定为法国的荣誉而进行报复，宣布向中国派遣一支远征军，以洗雪大沽失败的“耻辱”。关于华若翰在交换美国条约批准书时所受待遇的消息，也成为刺激英国人的另外一个因素。有报道说，中国要求华若翰遵守清廷的礼仪，但遭到拒绝，结果华若翰未能觐见清朝皇帝。最后，他只好在海边的北塘而不是北京交换了批准书（F. W. Williams 1889：297 - 326；Banno 1964：110 - 119）。巴麦尊政府由此认定清廷又回到了与外国打交道的传统方式，于是决定只在清朝首都交换条约批准书，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在这年秋末和 1859 ~ 1860 年冬初，英法政府同意共同组织一支联合远征军，还是由代表各自政府缔结了《天津条约》的英国外交官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率领。尽管英国政府担心这次远征会进一步动摇清朝统治（如果清朝统治被来自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



所推翻，英国获得的那些条约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但额尔金仍然受命要求清政府为大沽事件道歉并为这次远征的耗费增加赔偿。他还得到指示，如有机会，争取获取香港岛对面大陆上的九龙半岛（Costin 1937：316）。就在这些计划还在英国制订的时候，普鲁斯未经授权，于3月8日从上海向清政府发出了一道最后通牒：如果英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向中国开战。作为回应，清政府要求普鲁斯回到北方，在不带军队的情况下进京换约。与此同时，在上海的钦差大臣何桂清——清廷的回复就是通过他传达给普鲁斯的——接到命令，要求他就《天津条约》中皇帝和军机大臣们一直认为不可接受的某些条款，尤其是公使驻京和赔款的规定，重新与英国展开谈判 [*Correspondence 1861 (CRAC)* 34 - 36, 42 - 43]。然而，这些努力并未取得结果，普鲁斯拒绝就他认为《天津条约》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进行谈判。

1860年6月26日，《天津条约》签订两年后，大沽军事冲突一年后，英法两国政府联合宣布对华开战。两天以后，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到达上海，并且召集他们的随行人员。巴夏礼和威妥玛再次成为额尔金的译员，罗亨利（Henry Loch）被任命为他的秘书。接着，英法代表启程北上，与分别驻扎在北直隶湾的大连和芝罘的英法军队会合。

英国军队司令是镇压印度1857年起义的英雄克灵顿（James Hope Grant）将军（Farwell 1972：138 - 139）。克灵顿麾下的军队共有13000人，其中大约1/3来自印度的军团，包括费恩和普罗宾骑兵队以及两个在印度起义期间招募的非正规炮兵队。步兵由8个营组成，分别来自一些野战团，包括皇家苏格兰人团、女王的皇家西萨里团、巴弗团（东肯特团）、国王的皇家步枪团、爱丁堡公爵的威尔特郡团，以及汉普郡团、埃塞克斯郡团和东萨里团。所有这些部队都曾经参加过镇压印度起义。也有一些部队来自皇家海军轻步兵、皇家炮兵和皇家工兵。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的7000名法国军队，由

孟斗班 (Cousin Montauban) 将军统率。法国军队由 101 和 102 步兵团、第二骑兵营、两个工兵连、4 个炮兵连以及一个海军陆战团组成 (Knollys 1875: 29 - 31)。集结在香港的还有英国海军和法国海军, 以及一支 2500 人的华勇营, 这支部队后来在攻占大沽炮台时一战出名 (Graham 1901: 170; Walker 1894: 210; M'Ghee 1862: 210)。

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于 7 月 30 日在北塘登陆, 开始了联合作战。由于北河仍然被封锁, 克灵顿将军企图从陆路进攻大沽炮台。然而, 这一战略带来了许多难题。整个滨海地区到处是潮泥滩、被一条条两边筑有陡堤的沟渠分割成的盐池以及绵延数英里的湿地。不过, 这种地形所造成的困难很快就被解决了。侦察兵们找到了一条凸起的堤道, 可以从北塘到达小镇新河。从这里沿北河而下大约 6 英里, 就可以到达大沽。8 月 12 日, 英国部队攻打新河。尽管蒙古骑兵表现得“极其勇敢和坚定”^①, 但印度非正规骑兵队在新式阿姆斯特朗枪的支持下, 夺取了这个小镇 (Walker 1894: 171 - 172)。

当英法联军准备进军新河时, 直隶总督恒福与额尔金勋爵取得了联系。他表示不清楚英法联军登陆的目的, 希望能与额尔金进行会谈。额尔金在答复恒福这次和随后的来函时声称, 只要中国政府不答应普鲁斯 3 月的最后通牒, 开放通向天津的北河, 他就不会停止军事行动 [CRAC 98, 100, 105' - 107, 112; Loch (1869) 1900: 47 - 50]。随后, 联军奉命沿着大道和堤道南下, 于 8 月 21 日攻占了大沽炮台^②。在经历了一年前的失败之后, 英军认为夺取大沽炮

① 虽然有不少记载称清朝军队指挥不当或者缺乏组织, 但英国士兵和平民都注意到了清军的勇敢精神。引文见 Graham 1901: 162; Anglesley 1975, 2: 231。

② 在这次战役后不久发表的英文记载中都有对战斗的描写, 见 M'Ghee 1862; Swinhoe 1861; Wolseley [1862] 1972。其他记载见后来出版的回忆录, 见 Knollys 1875; Walker 1894; Allgood 1901; Graham 1901; J. Harris 1912; Stephenson 1915。英国和印度部队的历史中也有相关记载, 见维克斯 (Wykes 1968: 81) 书中刊载的英国国旗在大沽炮台上飘扬的一幅画。



台非常重要，应该给参战部队授予战斗荣誉。这次战斗后，专门制造了胜利奖章，部队的团旗也加上了“大沽 1860”的字样^①。由于一年前的失败现已雪耻，英法军队便掉转方向，向天津进军，并于 8 月 25 日占领了天津。此后不久，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得到通知，参与《天津条约》谈判的桂良以及恒福、恒祺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当桂良于 9 月 1 日抵达天津时，额尔金以为，或许还需要再进行“一些威吓”，才能完成他的使命（Walrond 1872：349）。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桂良却表示，英国的所有要求将全部得到满足。此后几天，巴夏礼、威妥玛、法国译员美理登（M. de Méritens）、德拉马（Abbé Delamarre）和中方人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英国谈判代表们报告说，桂良和其他钦差大臣并没有他们在 1858 年时所具有的同样权力（CRAC 155 - 156）。额尔金和葛罗立即中止谈判，声称在到达通州以前不再与清政府谈判代表进行任何讨论。通州位于北河的终点，离北京城墙大约 15 英里远。于是，英法军队继续前进。

英法使团于 9 月 11 日到达离天津 20 英里左右的杨村，收到了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送达的文件，声言他们具有相应权力。但额尔金和葛罗拒绝与他们交涉（CRAC 161 - 162），英法军队继续前进，并于 14 日抵达大致位于北京和天津中间的河西务。在河西务，额尔金向克灵顿了解了军队补给的情况，并在收到清朝钦差大臣表示接受联军全部条件的信函后，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同时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前往通州，与怡亲王进行进一步的交涉（Walrond 1872：352 - 353；CRAC 170）。

清朝钦差大臣们在与额尔金的使者们的初次会见时，出具了授

^① 奖章和团旗的事例见 Davis 1887 - 1906, 5: 134; Weaver 1915: 191 - 193。战斗荣誉的全部名单见 Leslie 1970: 85 - 86; Singh 1993: 133。

予他们谈判全权的谕旨。在此后的会谈中，各方议定可以达成一项包括额尔金所受训令中提出的所有附加条件的初步协议。此外，各方都同意在北京交换 1858 年天津条约的批准书。鉴于感到敌对状态现在已经结束，各方还议定联军停止前进，在通州城东大约 6 英里的张家湾驻扎。然后，额尔金勋爵将在 1000 名武装人员陪同下前往北京（CRAC 171）。

9月17日，巴夏礼在罗亨利、《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Bowlby）、两名文职官员德诺曼（de Norman）、托马森（Thomson）以及一支 26 人的骑兵小分队的伴随下，在通州向怡亲王转递额尔金确认以上协议的文件。当英国使者开始讨论最后细节时，他们发现气氛明显地改变了。清朝钦差大臣们表示，他们对额尔金想带进北京的士兵数量以及额尔金坚持要将英国女王的一封信亲自递交到皇帝手中的要求感到非常不安（CRAC 172）。由于在这些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巴夏礼及其同事退出会谈，在一些清朝低级官员的陪同下，到张家湾为联军选划宿营地。一到那儿，他们就发现清朝军队加强了防御，周围地区还分散驻扎着蒙古骑兵。巴夏礼于是派罗亨利去向额尔金报警，他本人则返回通州向清朝钦差大臣进行交涉。按照巴夏礼的记载，怡亲王告诉他，在和谈完成以前，清朝军队不会撤走（CRAC 229）。可能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清廷得知天津知府石赞清被英军扣留。怡亲王命令僧格林沁逮捕了巴夏礼及其随从，而清廷现在也决心开战，悬赏斩获联军官兵的首级^①。

额尔金立即做出了反应，率军向通州前进。英法联军于 9 月 18 日在张家湾击败了清军，接着又于 20 日占领了通州。第二天，

^① 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2315-2321；Hsü 1960：102；英军在圆明园获得了这道上谕的草稿，将之译成英文。额尔金把它看做是逮捕巴夏礼的一个原因，见 CRAC 206-207。



这场战争中最后一次重大战役在通州东面的张家湾和西面的八里桥展开 (Anglesley 1975, 2: 228 - 231; Knollys 1894, 2: 141 - 142; M'Ghee 1862: 174 - 178; Davis 1887 - 1906, 5: 127 - 129; Walker 1894: 201 - 202)。僧格林沁的部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最终被击败。北京门户洞开。军事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及其顾问们，包括怡亲王在内，逃到北京东北约 200 英里的承德避暑山庄。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求和 (Banno 1964: 171)。

9 月 22 日，恭亲王通知联军，他拥有全权，并且要求停战 (CRAC 175)。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拒绝停战，要求首先释放巴夏礼和其他被囚禁的人。恭亲王回复道，一经停战，将立即释放巴夏礼等人^①。恭亲王的交涉很可能是为了争取时间。或许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恭亲王还说，由于皇帝已经离开北京，去进行一年一度的狩猎，所以额尔金勋爵不可能将女王的信件亲手交给皇帝。由于预见到英法军队要攻打北京，恭亲王一直在北京城外调集军队，而在北京城内，则设立了一个城防机构 (CRAC 183 - 184; Banno 1964: 172 - 177)。当谈判再次明显地陷入僵局时，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命令英法军队进军北京。10 月 5 日，在北城墙安定门外的西黄寺设立了大本营。在此同时，英法军队则继续向北京北面和西面推进，搜寻清军的残存部队。10 月 7 日，法国军队到达了一处有围墙的园林，他们认定这就是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在击溃了园内一些留守人员以后，法国人开始劫掠这所皇宫。很快地，英军官兵也参加到劫掠之中。

当圆明园的劫掠正在进行的时候，一封最后通牒发给了恒祺：限令北京的清军于 10 月 13 日向联军交出安定门，否则就将攻破城墙，炮轰北京城 (CRAC 188)。这封最后通牒发出的次日，巴夏礼

① 双方就这方面的问题交涉了好几天，未能达成协议。见 CRAC 175 - 187。

和罗亨利被释放，但其他被俘人员的下落和命运仍然不得而知。随着最后期限10月13日中午的临近，恭亲王就圆明园遭到洗劫一事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进行赔偿。同时，他还要求就安定门的控制问题进行谈判（CRAC 195 - 196）。联军拒绝对此做出答复。最后期限到达前几分钟，安定门打开了，战争——就其所有实际目的而言——最终结束了。

在此后几天里，巴夏礼一行的其余幸存人员以及死者的尸体抵达了联军军营。总共有36名联军人员被逮捕，他们被俘后，被分成5组。巴夏礼、罗亨利、5名法国士兵和1名印度骑兵分在一组，他们都于10月8日安全返回。第二组有德诺曼、安德森（Anderson）中尉以及费恩马队的5名印度士兵。这一组当中，4名印度士兵于10月12日活着回来，其他人的尸体于14日运回。第三组有3名法国士兵和5名印度骑兵，其中1名法国士兵和4名印度骑兵于12日活着回来。第四组包括1名法国军官、《泰晤士报》的鲍尔比先生、4名印度骑兵和第一龙骑兵卫队的列兵菲普斯（Phipps），其中只有2名印度士兵得以生还。最后一组有3名法国士兵和4名印度士兵，全部被杀^①。英国军队的巴巴松（Barbazon）上尉和随法国军队来华的德吕斯（Abbé Deluc）是在另外的情况下被捕的，据信他们已经在八里桥战役之后被斩首。鉴于有近20人被杀害，另外还有数人严重受伤，额尔金勋爵认为这样对待这些被俘者是“凶残的犯罪”（Walrond 1872: 365）。

额尔金为此向恭亲王提出了正式抗议（CRAC 216），然后与葛罗男爵商议如何采取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必须为死者家庭争得金钱赔偿，同时需要进行惩罚，惩罚对象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清朝统治者。由于他们无法去惩治那些责任人（皇帝、怡亲王、僧格

^① 这里列举的名单来自克林顿将军1860年10月22日给陆军部长的正式报告，见 War Office Archives（以下简称WO）32/8237。



林沁)，他们决定将愤怒发泄到皇家宫殿上。但在具体哪一处皇宫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Morse 1910 - 1918, 1: 610 - 611）。最后，额尔金自行其是，决定把毁掉圆明园作为“神圣的报复”（Walrond 1872: 366）。第三章将具体讨论对圆明园的毁坏，这里只需说明，法国人拒绝参与这一行动。

毁掉圆明园以后，整个事件迅速走向结束。1860年10月24日，额尔金在数百名士兵护送下进入北京，前往天安门南面紧靠紫禁城城墙的礼部。在礼部，他会见了恭亲王，与其一起签署了《北京条约》，并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确认了英国有权在北京设立使馆，迫使清政府为1859年大沽的“误解”道歉，确定了800万两银的赔款，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并且将九龙割让给英国，允许华民出国。此外，《北京条约》还规定，中国皇帝要发布谕旨，命令在京城及清帝国各省公布《天津条约》[Mayers (1877) 1966: 8 - 10]。第二天，葛罗男爵进京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

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英法军队撤出了中国北部。第二年，普鲁斯返回北京，设立英国使馆。与此同时，根据恭亲王的指示，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常简称为总理衙门）。从这时开始，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就由北京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而不是由驻在通商口岸的钦差大臣负责。另外，咸丰皇帝1861年8月去世后，发生了宫廷政变，恭亲王与慈禧、慈安两太后得以摄理朝政，辅佐小皇帝同治。英国人发现北京出现了一个他们可以与之合作的政权（Hsü 1990: 262 - 266）。这样，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一种和平的局面主导着此后的40年。第五章将讨论这种和平局面的性质，而接下去的两章则试图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本章所叙述的历史事件。

第二章

中国的暴力与法治，1856 ~ 1858 年

前一章把第二次中英战争的具体经过组织成一个标准的历史记载，平铺直叙地叙述了战争中的各个事件及其结果。推动这些事件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冲突和通过条约对这些冲突的解决。一般说来，条约被看做理性谈判的范畴，它通过契约的形式将双方的义务和利益明确下来。作为一种创建秩序的过程，和约的谈判、签署和批准与战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更为重要的是，条约也可以不通过战争来签订。但是，从实际上看，尤其是就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的行为来说，没有战争，19 世纪的条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欧洲之外，“国际”法的统治无一例外地都不得不通过武力强行实现。对于大多数亚洲人和非洲人来说，似乎只有在枪炮的逼迫下，才能理解条约的逻辑。

本章和下一章将探讨 19 世纪后半期在欧洲全球性扩张的背景下，暴力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正如导论中所讨论的，这一扩张的模式是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的来回振荡，是颠覆旧权力网络与建立新权力网络的反复进行，是战争与法治的相互交替，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不断转换。

1840 ~ 1860 年的 20 年间，这样的模式在中国表现为欧美资本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侵入清帝国，表现为殖民者居住区在北至上海的中国沿海岸地区的不断增加，表现为和日益增加的鸦片走私有关的违法行为的恶性蔓延。这种变化给中国东部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在人口剧增已经给中国农业经济造成沉重压力的情况下，西方的人侵使得中国的流民、匪盗和“苦力”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他们有的举行反抗清朝的起义，有的则成为东亚以外的欧洲新老殖民地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去疆界化也产生了一个新的企业家阶层，其中一些人是当地人，另一些人来自东南亚的华人社群。他们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也为通商口岸的欧洲居民提供服务。

为了详细考察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过程，本章将讨论为欧洲列强入侵清帝国提供了主要途径的四种生产机制。它们包括鸦片贸易、击溃清朝防御体系的先进军事技术、将中国纳入全球交流圈的翻译工程，以及把欧洲主权观念灌输到清朝政体之中的各种手段。可以认为，这些机制都不是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把它们看做是一个更为普遍的帝国去疆界化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就能够思考它们在 19 世纪中叶给中国沿海地区带来的独特影响。

1858 和 1860 年的去疆界化

人们常说，欧洲人到中国去主要是为了商业目的，也就是说，是要通过贸易活动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那些中国特有的商品。直到 19 世纪中叶以前，这种贸易活动主要由清朝官员和具有垄断经营权的商人们进行管理和控制。从中国输出的是茶叶、生丝、瓷器，输入中国的是新世界的白银，后来则是鸦片。在欧洲方面，拥有贸易、航运、销售专营权的特许公司主导着与东方的商业贸易。到 18 世纪末，已经在印度确立了强大的商业和政治行政地位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控制着中国与欧洲间的大部分贸易。在清朝方面，清廷试图通过操控中外接触的方式来控制贸易。历史学家所称的

“广州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中国商人和欧洲贸易者之间的冲突，同时对这些贸易征收关税。

自 1759 年开始实施的各种规则创造出一个把贸易活动限定在广州一个口岸的管理制度。尽管欧洲人不能建立居住地，也不能进入广州城，但他们每年都可以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进行商业交易。13 家具有垄断权的中国商行负责组织这些交易活动，并且为商品的价格和交付提供担保（Hsü 1990：150 - 154）。尽管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一些代理人经常抱怨这些“限制”，但公司还是变得极其富有。这种制度也使清政府受益匪浅，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帝国的财富，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也很少发生。

这种令人惬意的制度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满足了最基本的要求。随着生产转向经济作物茶叶的种植，随着这一地区的运输网络和流通网络逐渐集中到广州沿海一带的商品集散中心，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面貌开始发生变化。随着茶叶、生丝和瓷器被收集起来运往欧洲和美洲，中国的一部分劳动力和物质生产也被带入一个此前非常陌生的建构之中，这就是以伦敦为中心把英国、印度和中国沿海联结起来的跨区域经济。

商业和鸦片

当英国人主导了对华贸易以后，英属东印度公司希望以英国制造品取代白银作为交换媒介。然而，使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和英国制造商们感到惊奇的是，中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微乎其微。最终，为了平衡在亚洲的贸易，英国人引进了印度的鸦片。尽管雍正皇帝于 1729 年禁止鸦片的贩卖和吸食，嘉庆皇帝于 1796 年禁止鸦片进口，但鸦片不仅在中国找到了现成的市场，而且还被证明是一个去疆界化的特殊机制，彻底重整了中国与欧洲的商业关系。此外，随着鸦片吸食的蔓延，中国沿海一带的鸦片走私和海盗活动日益猖獗，也在破坏着旧的商业模式，制造出新的模式。1800 ~ 1820 年间，每



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一直在 4000 箱左右，每箱装有 140 ~ 150 磅左右的鸦片。这一进口量足以支付欧洲和美国希望购买的所有茶叶与生丝。

然而，这种贸易平衡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两个原因导致了它的终结：一方面，英国国内要求打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使得这一垄断于 1830 年被正式取消。另一方面，在中国，由于非法的鸦片消费迅速增长，造成白银开始流回欧洲，使英印帝国和英国的英镑成为主要的受益者。1820 ~ 1830 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上升到 9000 箱。在此后的 5 年里，这一数量增加了一倍。而到英国和清帝国之间发生第一次战争前的 1839 年，鸦片进口数量再次翻番，超过了 4 万箱。诚如近来一些学者所论证的，正是鸦片这种产品，使得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Wong 1998；John Richards 2002）。

与此同时，清政府继续坚持着鸦片禁令。因此，鸦片的销售就需要一个精心策划的密的运输和流通网络。这一网络与“合法”的交易渠道齐头并进，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合二为一。一旦出现问题，就能够通过贿赂清政府官员加以解决。与此同时，白银外流引起通货膨胀，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东南地区的农民生活日渐贫困，社会失序，犯罪猖獗，最终导致了叛乱。这一腐败浪潮——沦为鸦片吸食者的人民，从鸦片利益中收受贿赂的官员，逃避地方管理的交易网络，脱离了日常生产的社会本体——将中国东南地区去疆界化，并且将政治和经济的冲击波传送到清帝国的中心——帝国的都城北京。随着东南地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转向清政府难以施加影响的跨国市场体系，清王朝的权威以及通过经济活动来保障朝廷富有、满足臣民需要的能力，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清政府的反应和其他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做出的反应大体相同：力图制止鸦片走私。正如本书导论所指出的，这项措施的结果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 1842 ~ 1844 年间与英国、美国、法国签订的和平友睦通商条约中那些史无前例的重要内容所引起的再疆界化 [Mayers (1877) 1966: 1 - 4, 49 - 58, 76 - 83]。由于通过战

争和条约的结合建立起了合法的立足点和行动基地，鸦片驱动的去疆界化的第二次大浪潮便经由通商口岸新建立的欧美居住区再次掀起。这些受保护的接触地带逐渐成为许多四处流浪的雇佣兵和大量行为可疑的生意人的寄居之地。这些新来的人有中国人、东南亚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在从事利润丰厚的鸦片走私。尽管鸦片交易活动还处于地下状态，但已经开始沿着长江向内地扩展。它一路铺设下新的关系网络，将腐败传播到更为深入的中国内陆。到1850年，输入到中国的鸦片每年超过了5万箱。在接下来的5年内，这一数目超过了6万箱，而到50年代末，更是增加到8万箱。鸦片销售和鸦片吸食超乎寻常的发展彻底摧垮了清帝国的统治体系，使之失去了对鸦片的控制能力。

混乱的鸦片贸易还引起了其他一些严重后果。尽管表面看来，鸦片走私是向中国渗透最理想的工具，也有利于平衡英国和美国的对华贸易，但是它也给清朝和西方的官员们带来形形色色的治安问题。例如，到19世纪50年代初，海盗活动已经变得非常普遍，英国海军部被迫采用悬赏制度来控制中国沿海的海上航道（Fox 1940：106-128）。但这些努力被证明只是权宜之计，海盗活动仍然与沿海地区的合法贸易以及走私贸易同步增长。据1857年驻广州的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称，犯罪活动增加的首要原因是通商口岸吸引了来自各国的行为卑劣的外国人，他们“和正当商人们争夺商业地盘，把进入口岸从事贸易的特权转换为进行欺诈和暴力活动的工具”。阿礼国认为，治外法权赋予外国人的司法豁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设立一个惩戒体制，以使商业活动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消除各种弊端，净化通商口岸（CESM 55-60）^①。

^① 额尔金也曾提到“某些外国冒险家的可恶行为”，肯定了阿礼国的看法。见CESM 260；255，263，333，346页也有相似的评论。



阿礼国的分析切中了问题的要害。鸦片贸易扰乱了条约允许的“合法”商业，并且引发外交上的冲突：走私活动吸引了海盗，海盗又威胁到商船的正常航行，从而导致外国领事与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关系的紧张（Fairbank 1953：335 - 337；Fox 1940：118 - 119）。与此同时，通商口岸的特权地位使得一些中国人利用各种符合外国法律的合法手段，来逃避清朝政府的管理权^①。举例来说，关于商船的所有权和注册问题，船主只需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将一条船在香港注册，挂上英国国旗航行^②。船主还可以像科布登（Richard Cobden）所说的那样，雇用那些在香港到处游荡的“浪荡子、流浪汉或者无所事事的年轻水手”充当外国船长，利用他们来吓阻清政府官员的盘查。由于被清政府官员扣留而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三桅帆船，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③。尽管这艘船在中国制造并且由中国人拥有，却是在香港注册，而且当它在广州港被扣押的时候，有一个名叫肯尼迪（Thomas Kennedy）的英国人担任船长。各种迹象表明，肯尼迪正是阿礼国与科布登所说的那类外国人。船上的14名中国水手中，至少有两人据称是海盗，而且这艘船很有可能正在从事鸦片走私活动（Wong 1998：43 - 66）。

从以上简短分析中，可以看出鸦片作为去疆界化的宏大机制所产生的力量。无论是贩运还是吸食，鸦片都会使人上瘾，从而能够制造出像亚罗号那样的不断繁殖的庞大杂交体。鸦片网络已经不再能明显地分成完全中国人的或者完全外国人的了，它把英国官员和清政府官员一起推进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对立与冲突的局面之中。另一方面，把鸦片看做是完全独特的，认为它以某种方式处于合法的

① 见黄宇和（Wong 1998：3 - 4）的分析，他引用了福钦（Fortune 1857：425 - 426）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述。

② 注册美国船只的情况与此相同；见 Fox 1940：128。

③ 引文引自科布登关于亚罗号事件的叙述：见 *Hansard's*, 3rd ser., vol. 144, col. 1400, 26 February 1857。

或更可接受的商业形式之外，也是一种夸大。就能够产生兴奋和依赖性这点来说，鸦片和造就了以欧洲中心的全球经济的其他那些能使人上瘾的物品——比如蔗糖、可可或者其他含有尼古丁和咖啡因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类令人产生依赖性的“软件”侵入到流通和消费的流动之中，改变了流动方向，从而对人的身体和地理空间进行了重新整理，或者更恰当地说，进行了重新编码。随着这类物质巧妙地潜入到社会机体中，发挥出它们的魔力，就会重新塑造欲求，使之改变方向，从地方经济转向跨国市场。不仅仅在中国是这样，在欧洲也是如此。可以说，这一过程使毒瘾具有了在全世界重建文化疆界和地理疆界的现代属性，同时也创造出打破东西方截然区分的全球性毒瘾的共同历史。

军事技术

与鸦片相比，新的军事技术以更加迅速的速度使清代中国去疆界化。这方面的关键之处不仅仅在于新式武器，还在于组织和运用这些武器的崭新方式。就像鸦片引起了从地方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变那样，武器装备的变化也是印度历史发展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发生在那里的帝国征服和殖民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方面，有两种技术机制尤为突出。第一种是新产生的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地面与海上军事力量，它们的制胜要诀已经不是数量，而是速度和在战略要地运用压倒性军力而形成的威慑作用^①。在陆地上，配合步兵作战的，还有由归顺英国的印度人——比如锡克人和帕坦人——组成的轻骑兵（Farwell 1989）。而步兵则被训练成为具有高度纪律性并装备有最新式武器的作战单位。这些武器包括最新设计的手提式步枪，它采用了来复线枪管，从而改善了射击精度，射击速度也由于有了独立的弹药筒或子弹而得到提高

^① 有关欧洲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见 Ralston 1990 和 McNeill 1982。



(Headrick 1981; McNeill 1982)。当这些技术被运用到中国的时候，轻骑兵与步兵并不是用来进行大规模战役或者旷日持久的战事，而是被用作可以快速调动部署的军事力量。这些部队虽然仍然需要依靠运输和补给系统的密切配合，但它们能够迅速地加入到战斗之中，利用优势火力和机动性消灭当地的反抗力量，临时性地占领重要目标^①。这些军队也可以在持续性炮火轰炸的掩护下或者在持续性炮火轰炸之后立即按计划行动。

而进行炮火轰炸的，是另外一种新技术，或者不如说是几种新技术在一个平台上的组合：炮舰。炮舰吃水浅，蒸汽驱动，机动性强，配载火炮和燃烧火箭。与帆船不同，炮舰可以进入中国沿海的内河，摧毁沿河的炮台，攻打有城墙保护的城池，威吓当地的居民 (Headrick 1981: 43 - 57)。1840 年和 1857 ~ 1858 年在广州发生的战事，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 1857 ~ 1858 年广州之战中，炮火轰炸还发挥了另外一个作用。对令人痛恨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总督衙门和城内普通民房进行的炮火轰炸，为英国人此前遭受的屈辱报了一箭之仇。

在 1860 年中国华北进行的战役中，又有一种新武器添加到这一技术组合中，这就是阿姆斯特朗炮。这是一种后装式野战炮，其战斗力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检验 (Knollys 1894: 161)。该炮不仅被用来轰击位于通向北京的北河河口的大沽炮台，还与高机动性的轻骑兵部队协同配合。1860 年在新河和张家湾，这些炮队击溃了与之作战的蒙古骑兵，在海边与北京城墙之间打开了一条畅通无阻的前进道路 [Graham 1901: 166; Knollys 1875: 12; 1894, 2: 139, 161, 168; M'Ghee 1862: 126; Walker 1894: 171 - 172; Wolseley (1862) 1972: 179]。

这种军事形式的去疆界化，以其海上形态和陆地形态，对鸦片

^① 有关英国军队及其 19 世纪在亚洲和非洲参加的战事，见 Farwell 1972; 1981。

体制进行了补充。迅速的、毁灭性的暴力的目的，是要表明抵抗是徒劳的，并且把反抗迅速地转变为屈服。从这一层面分析，技术驱动的暴力既是工具性的，又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工具，又是一种表现技术——一种“可调节的威慑力”^①，可以熟练地控制它的用量和力度，直至彻底改变敌人的精神世界。这样看来，它的作用不仅是破坏性的，而且是建设性的。一方面，它留下了可以看得见的损失——死者的尸体、被毁坏的财产、被切断或者被封锁了的交通线；另一方面，它也在授课。1860年后，清政府便开始寻求同样的武器，并雇用西方人训练清朝军队来使用这些武器了。作为一种规训，快速战争就这样成为一个再疆界化的因素，一个解码和再编码的工具。

翻 译

乍看上去，将翻译与阿姆斯特朗炮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似乎有些不伦不类。然而，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时代，翻译过程就被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一种通过另类手段进行的战争。在中国的英国语言学家们常常利用自己作为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或者英国官员与中文文本之间的中间人的特权地位，来缩小或者彻底消除英语和汉语在语言上的歧义。换句话说，他们努力寻求一种世界通用的意义交换方式。然后，经过这种语言处理的产品又被加以语言修饰，用来鼓吹更具侵略性的对华政策。这种活动最重要的实践者包括巴夏礼、李泰国和威妥玛等人，他们都是把清朝官员的书面文件和口头陈述翻译给额尔金勋爵的关键人物。

在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间的斗争中，他们把翻译当作武器来运用。其中有两个字翻译最为重要也最为有效。一个是“贡”字，

^① 在扬州的英国传教士受到攻击之后，为了得到赔偿，舰队司令凯帕尔（Keppel）对海内吉（Heneage）上校所说的话。见 China No. 2（1869）：41。



这个字在当时——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这样翻译——被英国人翻译为“tribute”（贡品）。选择这个单词，不仅会让人们联想到东方的专制政权以及藩属关系，而且还会使具有独立精神的英国人感觉到一种不平等不合法的经济交换形式，他们不愿意为了获得参与一种受到约束的商业交流的权利而被认为是进贡。另一处相似的情况是把“夷”字翻译成“barbarian”（野蛮人）。其实，这个字也可以被译成“foreigner”（外国人）或“stranger”（外人）^①。然而，当被翻译成“barbarian”时，“夷”字就具有了这样的意义：它表示清朝皇帝及其官员们思想深处的那种傲慢不逊、盲目尊大和深拒固闭。

这种翻译策略的作用在《天津条约》里表现得最为显明。条约第五十一款永远禁止清朝官方文件在涉及英国人时使用“夷”字。此外，英国还进一步要求清政府通过官方渠道颁布这项禁令，要让整个帝国的官员和民众都知道不得藐视英国人（*CESM* 354, 385）。因此，当看到英国的语言学家们在清政府的往来文书中查找那些表示中国皇帝比英国女王尊贵的字眼的时候，或者在看到这同样一些语言学家们1858年在广州、1861年在北京公开训诫当地居民哪些字词不能用来指称英国人的时候（*CESM* 164, Rennie 1865, 1: 71-72），我们就不应该感到太多的惊奇。

单个汉字的翻译对英国在华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翻译1858年和1860年战事中缴获的清政府官方文书，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两次战事中都有大量文件落到后来担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威

^① 有几个英国人认为这些翻译的意义过于狭窄，其中包括马戛尔尼使团的参加者、大清律例的翻译者斯当东（George Staunton）。汤姆斯（Peter Thoms）也有同样的看法。而其他人，包括鸦片商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和英国领事密迪乐（T. T. Meadows），都坚持认为“贡”和“夷”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贡品”和“野蛮人”。见 Basu 1993; L. Liu 1999: 131-134。

妥玛及其中国助手手中，他们一起从中把那些有关英国和其他欧美列强的文件找到并挑了出来^①。

第一批缴获的文件来自叶名琛总督在广州的衙门。从 1858 年 1 月至 6 月 26 日《天津条约》签订，威妥玛及其助手们一直在处理这些文件，对其中许多文件做了摘要，也全文翻译了一些文件^②。这些翻译的成果出现在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给他们各自政府的报告中，也有一部分出现在英国议会文件和美国的公共档案文书中，还有些文件出现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英国人的个人记载中。换句话说，威妥玛这些翻译的传播，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以及在华外国人对 1857 ~ 1860 年间历史事件的认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缴获文件的翻译在 1858 年的谈判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它们为英国领事们提供了为自己辩护的依据，来向额尔金勋爵表明他们并没有进行任何编造。这些文件表明，正像在华英国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声称的那样，中国的官员们排外、固执，对外面的世界既无知又惧怕。英国的语言学家们引证这些文件，使得额尔金相信，对付中国人迷惑和拖宕手法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使自己看上去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凶暴的野蛮人”。额尔金 1858 年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而到 1860 年他决定烧毁中国皇帝的圆明园，并且考虑是否也同样毁掉紫禁城时，很可能想到了这一聪明的建议。

这些翻译除了影响额尔金勋爵的谈判策略外，还被用作对付清朝官员的武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 1842 年与伊里布一起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满族官员耆英了。英国摧毁了大沽炮

① 其中包括顾盛 (Caleb Cushing) 谈判达成的中美间第一个条约，以及布坎南 (Buchanan) 总统给清朝皇帝的信件等。额尔金勋爵将它们还给了美国公使列卫廉，他对英国动用武力的态度似乎也由反对转向了适度的支持；见 *CESM* 158。

② 见 *CESM* 152, 221, 234, 270 - 298, 第 234 页列有这些文件的清单。有关这些文件的命运的讨论见 Pong 1975: 3; Wong 1983: 5 - 6。



台之后，额尔金勋爵在天津设立了大本营，并在那里会见了清政府的两个高级官员桂良和花沙纳。我们还会记得，在他们出示耆英和伊里布所拥有的那种钦差大臣的关防和敕书之前，额尔金一直拒绝同他们进行谈判。然而，在敕书和关防到达之前，耆英先来到了天津。英国人担心耆英的出现可能是一个拖延谈判的计谋，就设法摆脱他。威妥玛从广东文件中找到了耆英1844年写的一份奏折。根据威妥玛的翻译，耆英在这份奏折中把他的对策解释为“羁縻夷人”^①。按照额尔金勋爵的秘书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的说法，他们决定让威妥玛和李泰国出其不意地将这份奏折出示给桂良、花沙纳和耆英，以此来羞辱耆英，迫使他退出谈判^②。这一谋略非常成功，使耆英违抗皇帝的命令，擅自离开天津^③。不久，他被交到宗人府审讯并被判处死刑。

耆英所面对的那种困境，也正是清廷本身现在所面对的困境。这些官方文件，作为清政府管理和控制其广袤帝国的命根子，不仅能够被用来制造意想不到的危机，而且，这些官方文件被欧洲人所占有还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清廷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时已经失去了对其自身话语体系的控制。当鸦片腐蚀着那些给皇帝写奏折的人的时候，他们所写的奏折本身现在也受到了某种形式的审查和监控。这种审查和监控的性质，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英国的语言学家们不仅通晓中国的语言，他们还能把它转化到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在那里，这一语言被有效地“祛魅”，它的权威也被消解掉。

那些清朝官员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特殊形式的去疆界化的

① 威妥玛的译文见 *CESM* 175 - 177。这份著名奏折的另一个译文见 Teng and Fairbank 1963: 37 - 40。

② 额尔金有关使用这一手法的叙述见 *CESM* 334；威妥玛的引文见322页；俄理范的记载，包括威妥玛翻译的全文在内，见 Oliphant [1859] 1970: 357 - 366。

③ 有关耆英的记载，见 *YWSM*, XF 3: 942 - 943。

渐积影响，但这一点在《天津条约》第五十款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一款规定，条约的英文本而不是中文本表达的是条约的“正义”，而且条约的中文本已经与“英文原文详细校正”。两国政府间今后所有文书均遵照同样的程式办理^①。就这样，清帝国突然之间就要以一种既未精通又未理解的语言和术语去思考它的屈服了。按照外国模式进行“校正”，这种算不上微妙的转折同时也启动了一个全新形式的再疆界化，这就是获取已被解码的清朝资料，再在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语言中把它们重新编码^②。

在继续进行论述之前，我想再举一个把翻译作为去疆界化手段的事例。1860年，英军分别在河西务和圆明园缴获了清廷的来往信函。据额尔金勋爵的语言学家们所说，这些文件同早先得到的资料一样，证明了对清朝使用武力的必要性。但它们也还有另外的用途。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文件被转呈给外交大臣拉塞尔（Russell）勋爵，可以极有说服力地证明额尔金勋爵的某些决定是正确的。例如，在圆明园缴获的一份谕旨表明，皇帝嘲笑了认为他应该按照西方外交礼节来接受美国代表华若翰觐见的想法。在新河缴获的另一些文件指明了斩获入侵中国的欧洲士兵和印度士兵头颅的悬赏金数目，僧格林沁的一道奏折则请求皇帝快速离开北京，这样就不必被迫在自己的首都与欧洲使节们打交道了。朝廷的谕旨还命令清朝军队在钦差大臣同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谈判的同时，继续进行战斗（CRAC 115 - 124, 205 - 207, 260 - 267, 269）。和其他一些文件一样，这些文件也被收入议会的出版物。在这次战争结束后一两年内公开发表的各种私人记载中，也能看到这些文件的概括性内容，比如克灵顿将军随员中的翻译施文贺（Robert Swinhoe）的记述^③。

① CESM 354。中文译本见 YWSM, XF 3: 1014 - 1023, 相关条款从 1022 页开始。

② 有关中国和日本翻译欧美国际法过程的分析，见 L. Liu 1999; Duden 1999。

③ Swinhoe 1861: 312 - 315; Wolseley [1862] 1972: 243 - 257。克灵顿将军的战争记录中也有一些清政府文件；见 Knollys 1875: 164 - 189, 1894, 2: 172 - 175。



这样，对清朝内部文件进行权威性解码的能力，对于打破中国的原有秩序，对于创造一个额尔金勋爵及其属下可以用来为其行动辩护的道德基础，都具有战略上的价值。把语言压缩进一个严格对应的系统之中，以及把翻译文件用作进攻性武器，都起到了动摇清帝国行政报告制度的作用。在一个靠信息上传决定下达进行运作的政治体系里，报告网络被破坏对清帝国统治权造成的损害，或许并不亚于英国的炮舰。同时，被译成英文的清政府文件通过通商口岸的社群、伦敦的政府机构以及报纸和在战争参与者所写的各种记载到处传布，也为英国在华政策的正确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这就是说，这些翻译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把欧洲人书写的历史记录合法化，把女王陛下在华代理人的各种行动从一个自利、贪婪、走私鸦片、卑鄙无耻的低俗境界，提升到正义征服和普世受惠的高度。额尔金勋爵和他的顾问们相信，中国和世界都会因为英国使用武力而变得更加美好。

主 权

利用清朝文件的翻译来证明并确认英国在华行动正当性的做法，还遮蔽了欧美在华活动其他一些更为基本的方面，不过在此同时，它也把国家主权平等的问题提了出来。对于当时的和此后的许多人来说，主权平等问题即便不是冲突的唯一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①。本书的目的既不是要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不是要讨论后来对这一问题的解说，而是要探讨主权和主权平等观念本身是如何成为一个重要的去疆界化机制的。进一步说，尽管这些观念在欧洲有着复杂的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与中国发生冲突之前很久的年代，但清帝国与欧洲民族国家间在主权平等问题上的

^① 这种解说思路开始于1793年的第一个英国使节，并且一直延续到费正清提出的中国“传统”外交关系的“朝贡体制”。对这一发展的详细讨论见 Hevia 1995b，第一章和第十章。

争执，也有着自己的历史轨迹。这一冲突涉及清廷的某些礼仪，这就是欧洲人所说的“叩头”——在中国皇帝面前屈膝跪地的屈辱性做法。然而，如果对新兴的资产阶级男性观念缺少认识的话，就很难理解这一行为被赋予尤其是被英国人赋予的特别意义。在这方面，问题的关键是把男性身体当作一个表达意义的载体，一个能够通过其动作和姿势传达包含一定意义的信息的载体。

礼仪和主权者男性主体 萨克雷 (William Thackeray) 在创作于 19 世纪中的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中，担心掌管历史的缪斯女神是否能够摆脱礼仪的困扰。同她的姊妹悲剧女神一样，历史女神克利俄似乎成天忙于诸王的事务，“毕恭毕敬地服侍他们，好像她只不过是负责宫廷典礼的女主人，与记录普通百姓的事情毫无关系似的”。萨克雷对于历史而不是君王统治的关注推动他去思考，“历史”会不会永远地“跪拜下去”，或者克利俄会不会“直起身来……以自然的姿势站立着”，而不再像宫廷侍从们那样“卑躬屈膝”、“躬身告辞”，“面对君主拖着谦恭的脚步倒退出门外” (Thackeray 1991: 13 - 14)。

这里，有意思的是萨克雷对克利俄的屈从和潜在解放的象征性描写，以及把这些动作本身与女性形象联系起来的方式。这些身体动作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那些意义结合在一起，就把欧洲人对中国人令人感到屈辱的那些行为的陈述，放置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建构之中。比如说一个人如何用身体姿势来区别奴役与自由的问题。只有被奴役者才下跪，才卑躬屈膝，才躬身告辞，才拖着谦恭的脚步倒退着离开；而自由人则挺直站立。这样一些身体姿态所强调的是自然行为和非自然行为的对立，同时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世界的物质空间再疆界化过程中发生的某些转变。与下跪和直立这一对反义词具有相同意义的，还有高与低、洁净与肮脏一类反义词。它们不仅反映出 19 世纪城市及其居民在社会阶级和居住区域上的差别，而且还把奴役状态女性化为跪着的侍女，就像萨克雷笔



下的克利俄一样 (Stallybrass and White 1986)。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和帝国的构建者们正好与之相反：他们总是笔直地站立着，只有在被凶残的野蛮人击伤或者杀死的时候，才会双膝着地。

萨克雷对王室礼仪的描述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讽刺，一种嘲弄，它把英国 19 世纪的宫廷典礼从政治礼仪领域移置到一个崭新的领域，这个新领域可以被称作政治舞台，或者更准确地说，可以被称作英国帝国主义的豪华盛典^①。到 1820 年，对宫廷礼仪的抨击似乎都围绕着这样一个论据展开：人性的启蒙已经表明，这类行为都是非理性的，是毫无意义的虚饰，是地地道道的矫揉造作^②。但是，与我们在功利主义思想和工具理性引导下所预期的情况恰恰相反，无论是君主政治还是礼仪形式，都没有在英国消失。柏克 (Edmund Burke) 反而认为，用理性来揭示国家的权力机制是非常不明智的 (Eagleton 1990: 58)。以柏克这种扰乱人心的看法为先兆，宫廷典礼和其他国家礼仪开始走向公开化。在这一过程中，权力被重新包装成为一种表演 (Bennett 1995: 59 - 88; Greenhalgh 1988: 52 - 81)。国际博览会、征服庆典、皇家婚礼和葬礼、纪念碑落成式等壮观的大场面，不仅有插图报刊对之进行报道，也有商业广告为之进行宣传，国家力量的展现成为大众教育和大众消费的对象 (T. Richards 1990)。这样一些活动的进行，就把权力的表象与真实区别开来，把向大众公开的东西与背后隐藏的东西区别开来——一面是有着人本主义表白的权力的公开面相，一面是讲究实力和利益的现实政治。然而，在 19 世纪，只有那些将这两者合理

① 还可以在一些有关法律和民族的著作中找到对宫廷礼仪进行的负面评论；见瓦特尔 (Vattel 1916, 3: 367) 有关维也纳会议后外交活动的权威性评论；也见亚当斯 (John Adams) 的评论 (Charles F. Adams 1853, 8: 251 - 259)，以及克罗斯比 (Crosby 1991: 57) 引用的麦考利 (Macaulay) 爵士的评论。

② Cannadine 1983: 101 - 102。有关英国文学中讽刺君主制的研究，还可见 Stallybrass and White 1986: 101 - 102。

结合起来的政治秩序才可以称之为强国。

公开展示出来的权力和隐藏着真实权力之间的关系，反过来又表明，在表象背后存在着某种工具主义：真正的权力是能够破坏并且随之改变另外一个统治秩序的强力或者力量。只注重表演性大场面和外在形象的政治实体，在欧美人的思想中几乎没有任何分量。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1793年论述亚洲礼仪的壮观和皇室的浮华远在欧洲宫廷之上时所使用的这种近乎崇敬的语言，对于他的后继者们来说，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了（Cranmer-Byng 1963：123 - 124，131）。巴麦尊勋爵的政策已经明确表明，英国不想再以亚洲的方式参与亚洲的“盛典”。在印度、东南亚和东亚，英帝国的代理人致力于改变政治权力结构，他们或者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结构，或者根据新知识所造就的对亚洲思想的“理解”，来操纵旧的结构。

英国宣称比亚洲优越，和历史发展的另外一条轨迹也有关系，这就是欧洲各国间关系的再概念化和标准化。这一过程是在1820年维也纳会议之后，通过一部被称为“国际法”的有关外交活动的统一法典来完成的。一国首脑与另一国大使的礼节性会见，成为相互承认主权的最重要场合。承认主权被理解为对主权平等原则的接受，它构成了履行以条约形式表达的契约规定所需要的理性主体。条约的诸多条款明确规定了权利、义务和责任，同时也用来管理欧洲外交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者：商业交换。大使和领事们努力为商人及其货物提供各种便利，使之能够穿越他们自身穿越过的同一条边界。同外交一样，贸易活动也围绕着平等、交换和由主权者男性订立的契约等观念展开。

正是在举行国家间礼仪的场合，有关外交和商业活动的这些新观念与有关资产阶级绅士所应采取的身体姿态的新认识，结合到了一起。随着维也纳会议的举行，合乎体统的会见形式被彻底自然化，并且发展成为理想的全球标准。当大使觐见东道国国家元首



时，要在前进过程中三次鞠躬，将国书或信任状直接呈递到国家元首手中，互相寒暄后，再以进去时的同样方式退出。他们不用单膝或双膝跪地，在低头鞠躬时，只是站立着弯下腰部。到 19 世纪中，这种互相承认主权和国家间平等的形式已经被广泛接受^①。唯一重要的例外是那些后来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地区，以及中国和日本，不过日本此后不久也顺应了这种影响整个世界的欧洲特有礼仪。

中国问题 19 世纪北大西洋民族国家那些经过启蒙的市民会十分自然地认为从奥斯曼帝国一直到日本沿海的各个国家，实行的都是专制政体。然而，到该世纪中期，这些专制政体中的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被迫接受了欧洲的外交形式。中国是一个主要的例外，因为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化”的政治实体不同，中华帝国要求所有面见皇帝的人都要向皇帝叩头，以表示自身的“卑下和谦恭”^②。按照 19 世纪欧美的许多男性观察家的说法，中国宫廷礼节所要求的那种崇敬，只有基督教的上帝才能接受，不应用于任何人类^③。

由于礼仪已经受到发展中的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荣誉与尊严的定义的质疑，对于具有欧洲现代性的直立着的“自由臣民”来说，叩头便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他者。像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这样国际关系方面的权威人士对叩头的愤怒谴责，以及对最初访问中国的欧洲人，特别是对据称曾于 1795 年向中国皇帝下跪的荷兰使团成员的嘲笑^④，表明在资产阶级活动家们看来，在中国皇帝面

① 有关主权和维也纳会议对外交规则的影响，见 Hinsley 1969: 275 - 288, 1986; Jones 1984: 20 - 21。

② 如默里（Hugh Murray）所说，在中国，“古代的惯例”是政府统治的真正“灵魂”；见 Murray et al., 1836 - 1843, 2: 161 - 164。

③ 见 J. Q. Adams 1909 - 10, 43: 295 - 324; F. W. Williams [1889] 1972: 318; 也见英国领事密迪乐和直隶总督李鸿章谈话的报告，FO 17, 748: 377。

④ 见 J. Q. Adams 1909 - 10。也见巴罗（John Barrow [1806] 1972: 9 - 15）对 1794 年荷兰使团的抨击。戴闻达（Duyvendak 1939: 1 - 4）记录了一直到 20 世纪对荷兰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前下跪鞠躬，与所谓的中国没有自由、平等以及皇帝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至高无上地位的说法之间，可以建立起某种等式。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当中国皇帝被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君主没有丝毫不同的时候，在华欧美人才不再会受到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普遍蔑视。觐见——这个被北大西洋民族国家的代表们视为中国皇帝确立其在国内和国外至高无上地位的场合，就因之成为促进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国家间交往形式的关键性舞台。

的确，直到19世纪初，除了1793年的马嘎尔尼勋爵外，还没有一位欧洲或美国的使节以近似于欧洲普遍采用的方式觐见过中国皇帝（Hevia 1995b: 97 - 102, 170 - 176）。而且，在当时的评论家们看来，马嘎尔尼使团毫无建树，随之而来的不仅不是欧洲人更愿意接受的新交往方式，反而是阿美士德（Amherst）使团访华时所遭受到的更大羞辱，以及律劳卑（Napier）勋爵在广州所经历的“令人悲伤的灾难”^①。通过这些事例，也通过前面所讨论过的翻译手段，叩头、进贡和夷便组成了一簇中国本土词语，把帝国宫廷礼仪与中国人“嫉妒”、“排外”等观念牢牢地联结在一起，也就是说，把帝国宫廷礼仪和清廷拒绝与完全自觉的他者进行公正、公开和平等交往的做法联结在一起^②。中国越来越被看做是一个蔑视财富与商业的专制政权。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那些历史事件只是更进一步地加强了这些看法，任何拒绝叩头的行为都成了反抗中国孤傲无知的英勇精神的象征。

1860年在中国北方进行的战役中，就有一个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的事例。在一次微不足道的事件中，东肯特团一名名叫莫伊斯

① 见埃利斯（Ellis 1817）有关阿美士德使团的记载以及亚当斯（J. Q. Adams 1909 - 10, 43: 305）有关律劳卑的记述。

② 据马地臣（Matheson 1836: 1）等权威人士说，中国的排外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对“用不可理解的神秘将他们自己和一切属于他们的事物掩盖起来——垄断所有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偏好。



(Moyse) 的英国列兵变成了传奇人物。莫伊斯和几名运送军需物资的印度士兵一道，在离新河不远的地方被蒙古骑兵俘虏，并被带到清军指挥官僧格林沁面前。僧格林沁表示，只要他们跪下叩头，就不会伤害他们。印度士兵们跪下了，而莫伊斯却拒绝这样做，宣称宁死也不会使自己的国家蒙羞。结果，他立刻就被砍下了头颅^①。后来，在道伊尔 (Francis Hastings Doyle) 爵士的诗歌中，莫伊斯宁死不跪的事迹得以流芳百世。“东肯特团的列兵”突出强调，即使是一个“贫穷、莽撞、粗鲁、出身卑微、未受过教育”的英国士兵，也会“站在额尔金的地位上”，不给英国种族丢脸。在利用种族把阶级差异打得粉碎之后，这首韵诗明确阐释了莫伊斯英勇的个人行为的重要意义：

啊，荣誉在召唤！——以钢铁般的力量，
他把幻想放到一旁。
让黝黑的印度人跪下哀哭吧，
英国小伙子宁愿死亡！
眼睛中看不到任何畏惧，
男人的双膝不会弯曲。
走向可怕的红色坟墓
他没有片刻的犹豫。^②

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种领导者和普通士兵们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被认为是对付傲慢、排外、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不

① 同时代的叙述见 M'Ghee 1862: 103 - 105。该团团史中再次讲述了这一故事，见 Knight 1935, 3: 501 - 502。

② 见 Knight 1935, 2: 502 - 503。约翰斯顿 (Reginald Johnston [1934] 1985: 205) 后来证实，这首诗歌对中国通商口岸中的英国人身份认同的界定，有着重要意义。毕克思 (Bickers 1993a, 1993b) 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些问题。

讲道理的中国人的唯一办法。就像额尔金勋爵所说的，一个人只有强横，才能坚定地站立（Walrond 1872：349，362 - 363，365）。哪怕是暴露出一丁点儿软弱，也会马上被人利用，并会因之轻易地丢掉夺取到手的任何阵地。

一方面是帝国挺直站立的男性主体的构建，一方面是欧美人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刻画，正是在这两者的结合点上，炮舰外交找到了它的思想意识基础。由此看来，莫伊斯的不屈和额尔金的坚定就不应该被看做是面对东方威胁时表现出来的纯粹逞英雄式的行为。相反，应该认为，它们是欧美人赖以生存的权力的表象与实质之间关系的最佳范例。中国人的力量显示只是显示——纯粹的表演。而英国人则不会虚张声势，也不以暴力进行威胁。他们发布有法可依的最后通牒，以武力作为最后通牒的后盾，并且刺激其他人也使用这样的正直而有原则的行为。这种男性气概具体地体现在英国男人那勇敢而又宁折不弯的身体上。这一帝国形象双脚坚定地站立着，在建立主权平等的过程中，将女性的（意志薄弱、双膝疲软的他者）中国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

再疆界化：将中国解码，1858 年

如果说，鸦片、军事技术、翻译以及与国家主权概念联系着的男性气概，扰乱并最终摧毁了清朝的权力网络的话，那么，它们在做这样的同时，也为铺设另外一种网络、另外一套关系扫清了道路。在中国的这一再疆界化建立起一个新的权力秩序，其中心就是欧美人在中国进行活动或者在中国居住的权利。就北大西洋民族国家的一般公民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被理解为购买并且拥有房地产的权利、建造住宅的权利以及这些财产受到条约规定的治外法权保护的权力。19 世纪 40 年代签订的最初一批条约规定，欧美人在首先



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中拥有以上权利。后来只有广州还存在问题，不过英法联军1858年占领广州之后，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尽管这些特权为欧美人在中国居住和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手段，但是，将对华关系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这个一直为英国所重视的问题，仍然未能解决，同样的特权也还没有被扩大到北大西洋民族国家的官方代表身上。

驻使问题与帝国主义教程

《天津条约》令人鼓舞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更好地维护未来的和睦”，双方同意在大英女王与中国皇帝之间交换常驻外交代表。条约还进一步规定，女王的外交代表既可以在北京长行居住，也可以随时访问北京。英国使臣在北京时，居住在由英国政府负责管理的建筑物内。既然在华居住和财产受到保护的权利已经确立，或许就没有必要再详细规定住在这些建筑物里的使节们的举止行为了。然而，英国人坚持要加入一项条款，规定不能要求女王的代表“遵行有损一个与中国平等的独立主权国家的全权代表的任何礼节”（*CESM* 347）。额尔金勋爵在评论这一条约规定时，清晰地阐释了“使中国完全平等”的意义。正如额尔金所言，中国政府含蓄地取消了叩头礼节，承认了派驻使节的权利，表明它已经放弃了“（中华）帝国传统政策中一些最为珍贵的原则”。他断言说，这无异于一次“革命”（*CESM* 345）。

额尔金离目标已经不远了。在迫使清政府把欧洲的习惯做法当作“普世的”外交行为规范来接受的同时，他还迫使清廷同意为建立使馆提供场地。这样，就可以通过使馆启动未来的再疆界化行动。额尔金以及其他一些英国在华外交代表们认为，如果不想让条约成为一纸空文，或者如果英国不想再次向中国派出军队的话，这第二项特权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驻北京使馆究竟怎样来继续进行这场革命呢？从当

时的英国外交代表的陈述以及后来驻在使馆的那些人的所作所为（见本书第二部分）来看，似乎可以明确地说，北京使馆绝不仅仅被看做是一个外交机构。更确切地说，鉴于中国官员具有英国人所理解的那些性格，所以使馆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要致力于改变中国人对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中地位的观念。李泰国曾经和参加《天津条约》谈判的清朝钦差大臣的随员进行一次交谈，其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他所使用的语言，和至今仍然支配着英美人对中国传统外交关系问题的解释所使用的语言非常相似。李泰国说：“历史上的封闭排外使中国把自己看做是‘中央之国’，而对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富强国家的无知又使中国人把中国以外的所有民族都视为尚未文明开化的‘蛮夷’。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中国现在应该改正的错误。无论多么不情愿，中国今后都必须要遵从西方国家的惯例，因为她现在的力量太过虚弱，无法拒绝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CESM* 326）

额尔金勋爵的评论或许更为简明。在他看来，问题是欧美代表们不得不“和一些不向理性做任何让步却完全屈从于恐惧的人打交道，这些人甚至对要讨论的问题和他们自己的真正利益都一无所知”（*CESM* 344）。因此，驻北京的使馆就要设法让这些官员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且教他们如何像英国人那样谋取自己的利益。就像额尔金所设想的那样，这一教育工程将按照以下几个方式来展开：首先，英国公使要“与帝国政府的官员们进行直接的交流”，并且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向他们提出建议”；其次，他可以通过表明英国对中国并无“恶意”来缓解两国间的紧张状态，从而消除无知引起的恐惧；再次，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英国代表通过他良好的品行，能够有助于“减少现在影响着军机处的对外国人的各种偏见”（*CESM* 346）。有关北京常驻使馆这三方面有利之处的认识构成了英国使馆的行动方针，像一条金线一样始终贯穿在以后



历届驻华公使的报告之中^①。的确，教育统治集团中的满人和汉人，让他们了解自己最大利益之所在，成了英国驻清朝公使的主要任务之一。即使是经常表现得像一个完全失控的狂暴的野蛮人一样的威妥玛，也把传授这类知识看做是他在华活动主要目标的一部分（Hevia 1995a）。

但是在北京安置一个英国公使并不能自动地解决所有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公使到底要和清政府中的哪个人对话。另一项革命性条款，《天津条约》第五款对此做出了回答。该款规定，中国皇帝同意任命一位“内阁大学士”或政府六部中的一名“尚书”，作为女王代表处理事务时与之打交道的“高级官员”。同时，他们在商办事务时“地位完全平等”（CESM 348）。根据这一条款，清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总理衙门，英国人称之为外交事务衙门。从此以后，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清朝中央政府中有了和自己打交道的机构。随着“完全平等”的实现，额尔金开始着手制定一套新的商业交往方面的法律程序。

上海关税会谈与鸦片贸易合法化

《天津条约》要求签约之后尽快在上海进行关税会谈。在这一会谈于1858年10月初开始之前，额尔金勋爵指示威妥玛试探一下商界对关税修订的看法，然后就启程去了日本，与德川幕府商谈签约事宜^②。额尔金回到中国后，威妥玛告诉他多数英国商人对目前

① 李泰国对中国问题的概括和额尔金对大使馆功能的陈述，成为有关中国的一种常识。一个世纪以后，这种态度还可以在好莱坞1963年根据义和团起义时期围困使馆的历史拍摄的电影《北京55日》中找到；见本书第九章。

② 额尔金勋爵8月17日到达日本江户，26日在那里签订了一个类似《天津条约》的协定。这一协定有英文、日文和荷兰文3个版本，其中荷兰文版本被认为是“正本”。但双方同意在5年之内，日本当局与英国的所有交流都将用英语进行。

的税率表示满意。但是，额尔金坚持要按照条约规定来完成这次会谈。尽管他在通信中并没有明确表明他为什么会认为必须举行这次会谈，但至少应该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次会议能够为英国全权特使创造一个机会，可以在一个与天津那种充满忧虑的气氛——清朝官员在那里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一种强制性力量的存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会见清朝高级官员^①。这样，至少对英国人来说，在另外一个地方举行的关税会谈对条约所确立的完全平等原则是一个很好的检验。第二，它可以向清朝官员们演示主权民族国家之间谈判时相互交换意见的恰当方式，以改造他们的思想。换句话说，这次会谈能够使清朝官员们受到有关这类相互对话方式的教育和培训，尤其是能够帮助他们明白礼仪与外交事务之间的严格区别：礼仪所确立的是国家间的主权平等，而外交事务则是商谈国家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关系^②。第三，额尔金将会利用这个机会扮演训育者的角色，教育清朝官员们到底什么才是他们的利益。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关税会谈的重要性。它所建立的规章制度使得英中两国国民间的各种日常交往活动中那些例行公事般的行政管理，有了实质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就是在诸如船只进港停靠和关税征收程序等一些具体事务上的再疆界化，其中也包括中英双语的关税税则表的订立。由于这些正式关系是在交往活动的实际发展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们就有可能扩展到其他接触地带。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常规性文书工作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再疆界化的一个主要工具，是将中国人和欧美人不断扩大的接触地带细致地进行重新规范的基本方式（见本书第四章）。

① 额尔金记述道，他在会谈中努力使桂良和花沙纳“去除我们在天津的会面可能遗留在他们心中的那些痛苦印象”，见 *CESM* 404。

② 关于欧洲外交活动中礼仪和事务之间关系的更为充分的讨论，见 Hevia 1995b。



实际上，新关税协定的最后一款要求在各个通商口岸建立统一的贸易制度，为此，中国要任命一名高级官员专门监管对外贸易，并要求他选择一名英国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通过这些非常详细具体的再疆界化，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遵从了欧美的标准，一个由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的帝国海关也随之产生^①。

因此，在这儿，在对具体事务再疆界化的层面，看到鸦片问题的重新规范，或许就不会过于惊奇了。正是通过关税协定而不是《天津条约》本约，鸦片贸易被合法化的。在有关“例皆不准通商”商品的第五款中，米谷、豆、硫黄、白铅、铜钱和鸦片等商品的贸易限制被“放宽”。就鸦片而言，禁令的放宽意味着外国商人可在通商口岸公开出售鸦片，但要交纳关税清单上的最高税率，即每担（关税协定第四款规定，每担合133磅）纳银30两。但是，鸦片只能由中国商人作为“中国货物”运入内地^②。表面看来，这一规定似乎解决了鸦片走私问题，而实际上，它只是把产生在通商口岸——享有治外法权的庇护地——的鸦片问题扩散到清帝国的所有自然空间中。现在，鸦片可以在整个帝国较为顺利地扩展去疆界化的进程^③。

① 第一位海关总税务司是何桂清于1859年任命的李泰国。

② CESM 432。中文版本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1249。有意思的是，鸦片在中文版本中被称作“洋药”，即外国药品。

③ 我查阅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的相关部分，但其中好像没有北京中央政府内部有关鸦片问题的争论。俄理范、威妥玛和他们的中国对手于1858年10月12日进行过一次会谈，鸦片是双方会谈的9个议题之一。当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被提出来时，江苏省的官员表示，只要将关税提高，使之足以“阻止增加新的吸食者”，并且由中国商人负责在内地的销售，他们就不会反对鸦片贸易合法化；见CESM 400-402。黄宇和（Wong 1998：415）提出，很可能是何桂清自己把鸦片加入到关税协定之中，以增加税收用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清朝的谈判者们也许想通过在鸦片贸易问题上的让步，换取英国对《天津条约》中清廷最为反感的条款进行修改；见Hsü 1960：71-79。

《天津条约》的签署和上海关税会谈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破坏秩序和重建秩序这一特殊阶段已经结束。相反，在大沽炮台的军事行动之后，英法两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重大的战役，最终在北京城强制性地订立了和约。下一章集中分析对中国皇帝的夏宫圆明园的劫掠和毁坏，以继续考察中国的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借助这些分析，就有可能对欧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东亚的行径的性质做出一些概括性的评论，这些评论对于阐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外国在华活动的模式或许会有所帮助。

第三章

北京，1860年： 劫掠、奖赏金和神圣的报复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役于10月上中旬发生在清朝首都北京及其近郊，清朝皇帝率领着王公大臣们当时已经逃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只留下恭亲王和士气低落的僧格林沁蒙古骑兵的残余部队与联军周旋。当恭亲王苦苦思考如何做出选择之时，额尔金勋爵正在他位于北京北城墙外的西黄寺的大本营里，等待着9月17日在张家湾附近被俘的巴夏礼和那些士兵、外交官和平民的消息。在此同时，法军已于10月7日抵达圆明园大门，并开始了对这一建筑群的劫掠。当天晚些时候，英国军队的部分士兵也到了圆明园。不久之后，北京宣布投降，额尔金勋爵得知了被俘人员的命运，这直接导致他做出了毁掉圆明园的决定。10月18日和19日，英军第一步兵师的4400名官兵焚毁了整个圆明园。圆明园被焚毁以后不几天，《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正式签署生效，欧美对华关系从此发生了彻底改变。

本章将以这些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来探讨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要思考东亚的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

其中一个联系是，有相当数量的英国平民和军人，是在帝国其他地区服务之后来到中国进行活动的。另外一个联系则涉及战争中的抢掠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名词，尤其是 loot（劫掠）一词^①。

Loot 一词是 18 世纪从印地语和梵语中引进英语的，它与英国在印度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②。不论是它的名词形式还是动词形式，都被频繁用来代替一些原有的英语单词，如 pillage（掠夺）、booty（战利品）、spoils（掠夺物）、plunder（抢掠）等。然而，因为这一单词与帝国新词汇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所以严格说来，它并不能和这些单词相互换用。从它与英帝国在印度、东亚以及后来在非洲的各种冒险活动的联系来说，这个单词能够让人产生某种机会感，特别在它被理解为战争“奖赏”——帝国构建事业奖给那些敢于冒险的勇士的奖励——的时候^③。

像额尔金勋爵一样，帝国词典《霍布森—约布森》也发现，loot 一词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开始在中国和印度普遍使用的 [Yule and Burnell (1886) 1994: 519 - 520; Walrond 1872: 215]，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研究也同样重要。正如这个单词的演变所暗示的，虽然 1860 年的事件标志着世界权力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但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变的主要作用者和主要受益者是英帝国。法国、俄国、美国的外交官们和法国军队在这些事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领导者是英国人。不仅如此，英国的动机和其他欧美国家似乎也非常不同。出现这些不同的原因可以到很多方面去寻找，比如领导者的不同个性，各国不同的国家目标，甚至还有欧美各国历史上的仇恨和争斗。然而我们所强调的，是从西方列强在欧洲全

① 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词，姑译为“劫掠”。——译者

② 见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据该词典，第一次使用 loot 的是 1788 年发表的 *Indian Vocabulary*。

③ 在英国招募士兵的布告中，常常宣传勇敢者们获得战争奖赏和奖章的机会到了；见 Farwell 1981: 211。



球性扩张过程中独具特色的历史轨迹中去考察它们在华行动的差异。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圆明园的劫掠，对作为一次“神圣的报复”而将它毁掉的行为（Warland 1872：366），做出另外一种理解。

“劫掠物品太多啦！”——抢掠的欢乐

我想从有关劫掠中国皇帝的夏宫圆明园的各种记载开始进行考察^①。英法军队在到达坐落在西山脚下的这座庞大园林几天以后便开始了劫掠活动，在圆明园中四处进行着近乎野性的、毫无节制的疯狂破坏和盗窃。然而，洗劫圆明园的具体情节只能任凭人们随便加以想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英法联军的首领们并没有向各自的政府提交有关劫掠活动的正式报告，相反的，他们要么否认事实，把首先进行劫掠的罪责归之于对方，要么像英军首领所做的那样，只对事情发生后如何进行控制进行了解释。换句话说，有关真实情况的记载并没有出现在议会文件或者其他官方报告中。有关劫掠情形的某些记载可以在1860~1912年间出版的报纸报道、回忆录、书信集和报章杂志中找到，也有些记载出现在有关1860年战争的第一批著作中，还有一些则存在于私人文件、自传以及事情发生后很久才出版或作者死后才得以出版的传记中。关于这次劫掠的发生情况以及劫掠的始作俑者，这些资料存在着一些不同说法。

在法国一方面，包括孟斗班将军、姆特雷西（Charles de Mutrécy 1862）和瓦林（Paul Varin 1862）的一些说法，都只是简单地说法国人到达圆明园后便设了岗哨，除了一支巡逻小队以外，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正是这支巡逻小队发现了一些珍宝。英军到达以后，马上就成立了一个由军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为拿破仑皇帝和维多利

^① 本节标题中的引文来自 Graham 1901：187。

亚女王挑选“最为贵重的珍宝”。与此同时，法国人也和英国人一起分掉了最先发现的那些珍宝。这些资料都没有提到劫掠活动，即使提到也都归之于英国人。此外，由于法国人的这些描述最先通过电报传到了欧洲，它们在最初一段时间内便在报纸和评论杂志上占据了主导地位^①。

英国方面的资料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在首先出现的记载中，有一份是《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10月20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它强调指出，“(对圆明园的)肆意劫掠”得到了法军司令部的“许可”。这份报纸上还有大本营的一位将军10月12日发布的指令，其中赞扬了英国军队“在部队大肆进行抢掠活动时”保持了克制。分别于1872年和1875年出版的额尔金勋爵和克灵顿将军的私人文件，以及英国自1862年开始出现的各种著述，都支持了《北华捷报》的说法。按照额尔金和克灵顿的说法，当他们到达圆明园南门时，发现抢掠活动早已开始。额尔金补充说，孟斗班将军多次“声明”并许诺说所有东西将在两国军队之间平分。据克灵顿说，他还当场许诺要把两个“玉如意或者权杖”中的一个作为礼物送给维多利亚女王(Walrond 1872: 361; Kollys 1875: 128)。能证实这些记载的还有英国远征军的军需官吴士礼(Garnet Wolseley)的“目击”报告。他在1862年出版的书中说，尽管法军司令部设立了岗哨，但还是发生了失去控制的“抢劫和肆意破坏”[Wolseley (1862) 1972: 224]。40年以后，他又在自

^① 孟斗班将军10月12日的报告发表在12月19日的巴黎《箴言报》(*Moniteur*)上，后来又再次由 *Volontaire au 102e* (1861: 112-113) 和 *Bazancourt* (1861: 273-275) 重印；也见 *Varin* 1862: 235-239, 242; *Mutrécly* 1862: 2: 25。在伦敦，1860年12月20日的《伦敦图片新闻》(*ILN*) 在617页复述了《箴言报》的内容。两天以后，《泰晤士报》全文发表了孟斗班的报告，1861年1月5日的《伦敦图片新闻》也全文发表了孟斗班的报告。似乎直到这年3月，额尔金和克灵顿关于事件的描述才在英国出现，见 *Blackwood's Magazine* 89 (March 1861): 381。



传中补充了更多的细节。他回想起当英国军队到达圆明园门口时，孟斗班将军会见了他们，并且“请求”额尔金勋爵不要进去。吴士礼回忆说：“我当时感到极其可笑，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有一队空着手的法国士兵正在走进去，而另外一队法国士兵则满载着各种各样的劫掠物品走出来。”就在他跟法国将军贾宁（Janin）男爵说话的时候，士兵们把一个又一个的“古玩”交给了贾宁。有个士兵把一个小珐琅瓶塞到吴士礼手里，大声说道：“老兄，这是给你的一件小礼物。”（Wolseley 1994：77 - 78）。这些说法得到了后来被派去负责英军奖赏金委员会（见下一部分）的陆军上校沃克（C. P. B. Walker 1894：211）、牧师莫吉（R. J. L. M'Ghee 1862：205 - 207）以及自称是目击者的一些英国军官后来发表的一些记载的支持^①。

事情的第三种说法来自孟斗班将军的秘书兼翻译德埃里松（Maurice d'Hérrison）。德埃里松在1866年发表的一篇战事记叙中写道，那些负责为法国和英国君主挑选物品的委员们把他们带到法军营地以后，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法国步兵、英国人、没有骑马的骑兵、炮兵、皇家龙骑兵、锡克人、阿拉伯人以及中国苦力都在旁边观看，想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他们。突然，有消息在人群中传开，说附近海淀村的中国村民和一些广东苦力开始攀墙进入圆明园。士兵们便迅速冲入大门，挤走了哨兵，在园中四处散开。”^②

前文提到，出现这些不同记载，原因可以归之于国家间的斗争、名誉问题以及当时和此后有关抢掠圆明园的各种批评。英国人和法国人似乎都认为对方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且如果需要找替罪羊的话，还可以很方便地加罪于中国人。然而，有关劫掠是怎样开始

① 1874年孟斗班在巴黎再次公开宣称自己是无辜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证词；见《泰晤士报》3月12日、13日、14日和18日发表的信件以及本书第五章。

② 事件的这一描述引自德埃里松1886著作第二版1901年巴黎重印本的英文译本；见d'Hérrison 1901：623 - 625。

的争论，使人们忽略了对劫掠本身的注意。士兵们怎样进行劫掠，他们到底拿了些什么，以及园内园外的整个场面气氛，似乎并没有人关心。在洗劫圆明园所招致的阵阵指责的背后，是许多参与劫掠的人所感觉到的全身心的享受和欢乐。

从所有的迹象来看，抢掠的最初阶段就像是一场狂欢中的闹剧。法国士兵们——其中许多人穿着清朝的官服或“精工绣制的女人旗袍”，戴着“做工精细的中式帽子而不是法国军帽”（Wolseley 1994：77）——到处乱跑，把一袋又一袋装满玉器、宝石、青瓷花瓶、牙雕以及欧洲生产的各式钟表倾倒在他们的帐篷里，也有一些士兵试图征用马车或推车来运送劫掠物品。圆明园门外的混乱状况，一点也不亚于园内的情形。《北华捷报》的记者写道，库房货架上的数百匹绸缎被拿走，有些任意地散落在地上，有些则被用来固定马车上堆放的劫掠物品，还有一些被缝在一起做成了法国军营中的帐篷 [*North China Herald (NCH)*, 20 October 1860]。额尔金勋爵在现场视察以后，在他的日记中说，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半的东西被拿走，或者被打碎”，并且对许多物品被随意糟蹋掉而深感失望（Walrond 1872：361 - 362）。目击者们说，他们看到“精美的织物”被毫无目的地撕烂，看到法国人用棍棒把一些东西砸得“粉碎”，并且“肆意毁坏”那些无法带走的东西 [Tulloch 1993：117；Swinhoe 1861：306；Wolseley (1862) 1972：224]。

很快地，英国军队的官兵们也加入进来（Swinhoe 1861：305 - 306）。英国军队的副官长斯蒂芬森（Frederick Stephenson）写信给他的兄弟说：

每一个房间和朝覲大厅……尤其是皇帝的寝宫里，确实都摆放着大量你所能想象得到的各种可爱的小玩意儿。想一想吧，就好像在白金汉宫随便游逛，喜欢什么就可以随意拿什



么……一个个装满用昂贵的白貂皮和紫貂皮镶边的华丽衣袍的箱子，被粗暴地从架子上拖了下来，而那些看不上眼的衣服，则被扔到一边随意踩踏。一些大库房里装满了扇子、清朝官员的帽子和有着不同图案的各种衣服，而在另外一些库房里，一卷卷精工绣制的丝绸一直堆放到屋顶，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所有这些东西都遭到了抢掠，被撕成碎片，地板上到处都是皮袍子、玉石摆设、瓷器、蜜饯以及精美的木雕。（Stephenson 1915: 272 - 273）

面对这种让人感到可怕的场景，塔洛克（A. B. Tulloch）回忆到，他当时感觉就像“一个小男孩在糕点店里突然被告知可以随便拿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他自己的口袋和马身上装满了各种玉器，一些“可能极其罕见的”玉器。在回营的路上，他遇见普罗宾骑兵队的一队锡克骑兵，正唱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歌（Tulloch 1903: 117 - 118）。这些骑兵看来是相信了塔洛克的话，因为皇家工程兵的格雷厄姆（Gerald Graham）少校在他的日记中记道，他随后不久看见一队普罗宾骑兵满载着劫掠物品从园中奔了出来。而这也只不过是川流不息的车队的一部分，这些由中国“苦力”和被格雷厄姆称之为“北京地痞”的人拖着的车上都装满了劫掠物品（Graham 1901: 188）。另一件事例是，一名名叫哈里斯（Harris）的陆军中尉称，他之所以得了个“中国”吉姆的绰号，就是因为大家认为他从圆明园里劫掠的东西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提到自己从皇帝住的房间里拿了一个朱红色的印玺、一个金丝编成的篮子和大量的绸缎。他还从不了解其真实价值的法国士兵手中买到了一些珍珠，另外还弄到几块欧洲生产的价值不菲的旧钟表。这其中有块钟表贴着汉语标签，经威妥玛翻译后，发现这只钟表竟然是马嘎尔尼勋爵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然而，最令哈里斯得意的，是他拿走的两座价值约2.2万英镑的纯金

宝塔 (J. Harris 1912: vii, 111 - 222)。

前面已经论述过英法外交官们在与清政府交往时所持有的道德高调，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怎样解释上面这些记载中所描述的那些不道德的放纵行为呢？对于那种狂欢节般的情景，对于在洗劫圆明园的过程中英国官兵与法国士兵、“野蛮的”帕坦人和锡克人，甚至还有一些中国人之间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情景，我们又怎么加以解释呢？我们能够说劫掠只是一种脱离常规的行为，是一种暂时地偏离文明而进入欧洲人常常加诸于非欧洲人的那种野蛮状态的行为吗？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抢掠只是战争带来的不幸的副作用，是那种情况下能够预期到的行为吗？这些问题似乎非常切中要害，因为人们不会想到，英国指挥官克灵顿将军在他的公务文件中也表示，要不是他采取了某些行动（见下文）的话，他的军队恐怕也会违抗命令，进行劫掠 (Knollys 1875: 226 - 227)。我们对此可能会感到疑惑，这名将军为什么对他的士兵的道德水准这样没有信心呢？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可以部分地在人们对于人类本性和人类行为的普遍性认识中找到。例如，孟斗班将军的助手德埃里松指出，“当用以束缚国家和军队的人为规范”被置之脑后时，剩下的就只有“带有全部野蛮性的人类原始本性，一切都任由不受控制的本能冲动支配了”。这就是说，没有可以被称之为文化的那些东西的管束，欧洲人就变成了原始的野蛮人。在这种情况下，军官们最好“明智一点，有些耐性”，等士兵们疲倦以后自己回来，重新接受“原有的管束” (d'Hérrison 1901: 625 - 626)。英国人的记载似乎证实了德埃里松的看法。在克灵顿的参谋部担任翻译的领事官施文贺认为，对圆明园的洗劫“非常好地证明了在不受法律或公众舆论束缚时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邪恶” (Swinhoe 1861: 306)。吴士礼上校的看法与此不约而同，还补充说“人类本性压倒了由纪律强加的各种常规性约束，结果就使得组织最为精良的军队的道



德败坏到了极点” [Wolseley (1862) 1972: 224 - 225]。

但是，关于劫掠问题的这一普遍性答案（即人类本性），只是有关这次战争的资料中能见到的最为公开的反应。从前一章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应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解释。例如，我们还会记得阿礼国对通商口岸那些破坏诚实人商业活动的不讲道德的外国人的描述。阿礼国所说的这些无法无天的人的行为与进行劫掠的士兵的行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此外，假若把抢掠活动与英国在南亚的军事冒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对于英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来说，要在英国士兵与通商口岸里那些被科布登称为“浪荡子”的人之间找到明显的差别，就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额尔金勋爵本人认为同“低等的”亚洲人接触似乎把英国人性格中最坏的东西引发出来的看法，或者进一步考虑有关印度人和中国人都喜欢劫掠并且都是劫掠专家的普遍看法^①，我们就能够得出结论，这种向人类发展的“原始”状态回归的特殊现象，被认为有一个非常特定的原因，那就是同亚洲和亚洲人的接触。对于与“低等种族”接触会引起“污染”效应的担忧说明，在看到劫掠活动所代表的军纪崩溃现象时，会很容易地带有一种深刻的忧惧感。

从这一方面看，抢掠活动对军队内部秩序的维护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军队秩序是通过军阶制度来确立的，军官与准尉、军士和列兵等“其他军阶”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②。举例来说，吴士礼在讨论劫掠行为时，就颇费心思地试图表明，进行劫掠活动的只是

① 额尔金的看法见 Walrond 1872: 199, 252。关于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描述，见 M'Ghee 1862: 166, 210, 212, 216; J. Harris 1912: 89; Walker 1894: 162, 164。吴士礼后来争辩说，圆明园周围的村民抢的东西比英法两国军队抢到的东西加到一起还要多；见 Wolseldy 1904: 84。

② 有关当时英国军队纪律情况以及军官与士兵间区别问题的考察，见 Farwell 1981。

普通士兵，而不是军官。他认为，士兵只不过是成长中的“男生”而已，对于他们而言，抢掠的机会是“在纪律严厉管制下”的生活中的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情”。另外，劫掠也给士兵们带来了一种欢乐，即使他“并没有抢到什么”，这种欢乐也会长久地存留于士兵的记忆之中。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士兵们都会回想起他们这次辉煌的业绩，把它当作自己的团队故事。这些独具特色的故事，既有别于这些事件的官方版本，也有别于军官餐厅中的那些传述 [Wolseley (1862) 1972: 225 - 227]。换句话说，这些故事构成了有关抢掠的口述历史，一种与外交官和军队当局的报告以及吴士礼等权威目击者的记载所讲述的官方故事截然不同的口述历史。

由此来看，像吴士礼这类看法起着多方面的作用。首先，它缝合了劫掠活动给英帝国在华事业造成的创伤，在对抢掠圆明园一事做出某种解释的同时，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来维持作为整个战争基础的崇高道德立场。其次，吴士礼为那些举止文明的士兵和外交官们不受劫掠的污染找到了合理的根据，并借此重新构建起英国军队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阶级差别。再次，吴士礼的记述明确区分了参与者的不同动机，从而为消息灵通的英国公众舆论对官方文件对这些事件看法的全力支持提出了一种解释。最后，吴士礼用阶级观点处理劫掠问题，从而为英国领导层最终决定用法规来管理抢掠圆明园的行为提供了支持。

从肆意抢掠到奖赏金下的秩序

与法国不同，英国当局在处理抢掠及其对军队秩序和纪律构成的威胁这一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从这些经验中产生出一系列的议会法和军队法，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将盗窃转变为合法的征服成果的程序。到1860年中国战役发生时，这些法规已经深深地积淀在英国士兵的行为中，使得他们的劫掠方式与法国人大相径庭。比方



说，就像德埃里松所记载的那样，英国人“一班一班地来到，就像一组一组的工人。他们带着大袋子，在军士们的指挥下行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军士们竟然随身带着试金石”这一“珠宝商的基本工具”（d'Hérrison 1901：625）。这些英国人在抢掠时似乎仍然以班为单位，把尽可能多的东西运回到驻扎在安定门附近的西黄寺的英国军营。

这种有秩序的抢掠模式可以从英国士兵希望能够分享掠夺物品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大约就在孟斗班将军及其参谋们正在等待劫掠的狂热自然结束之时，克灵顿将军任命沃克上校、安森（Anson）少校、威尔默特（Wilmot）少校和拉姆斯顿（Lumsden）上尉负责奖赏金事宜，并下令将所有的劫掠物品——从法国人手中购买的除外（Tulloch 1903：118；Swinhoe 1861：310）——一律交由他们处理（Knollys 1875：193 - 194）。这些东西将被陈列出来，并立即为“普遍受益”而进行拍卖。希望留下小件物品的军官们可以在10月10日把东西带到奖赏金委员会进行估价，然后由他们自己决定是购买这些东西还是将其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将补充进“已有财富”之中，平均分成三部分进行分配：一部分给军官，另外两部分分别给军士和士兵^①。对抢掠、拍卖和分配奖赏金的这一程序需要进一步加以解释。

英国的奖赏金法

至少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1339 ~ 1413）开始，就有一类复杂的英国法规规定，战争中获得的抢掠物品是君主的合法财产，抢掠物品的一部分可以根据君主的意志奖赏给参与其中的军队（Colombos 1940）。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法

^① 见 WO 147/2：1 - 5。尽管表面看来，所有部队都可以参加拍卖，但奖赏金只在随同总指挥官于10月6日到达战场的部队中分配。

规主要适用于海军的缴获物，但自乔治三世统治时期起，一系列的议会法规制定了处理陆地战争中获取的抢掠物品的程序。

制定奖赏金法所依据的观念是：如果不许诺对抢掠物品进行平均分配，军队就会变成没有纪律约束的乌合之众。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当局将劫掠物品看做是战争胜利的自然成果。在盗窃来的东西本身被转化为私人财产的同时，抢掠物品及其对秩序的威胁也就被转化成了奖赏金，成了正义战争的合法酬劳。根据议会的有关条例，英国军队用以使抢掠物品合法化的程序可以概括如下：

(1) 总指挥官任命奖赏金负责人组织和主持奖赏金委员会，并向军队成员发布命令，要求他们把所有劫掠物品上缴给该委员会。

(2) 委员会编制全部抢掠物品的清单，并在战事结束后组织进行公开拍卖，详细记录每一笔交易，同时编制奖赏名册，标明每一级别的军队成员应得奖赏金的数目。

(3) 所有拍卖记录全部转交给位于切尔西的皇家医院，由该医院进行奖赏金的分配并负责保存这些记录。

(4) 在《伦敦公报》上发表通告，宣布奖赏金的分配情况。

(5) 士兵或其继承人在切尔西提交领取奖赏金的要求，并出示能够证明他们参加过获得这一奖赏金的战役的证据。（这显然是普通士兵领取奖赏金的主要途径。）

(6) 为这类申请制定了表格文书，还制定了能够证明申请者参加过某次战事的相关标准。^①

在 1860 年侵略中国之前，最后一次应用这些程序是在镇压 1857 年印度起义之后。当英国入侵中国时，与那次战争相关的一

^① 见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4 George III (1814): vol. 54, 328 - 351; 1&2 George IV (1821): Vol. 61, 210 - 211; 2&3 William IV (1832): vol. 72, 236 - 259。



些申请还在处理之中。但是，与印度的情况不同的是，克灵顿组织的奖赏金委员会立即就在现场进行拍卖，参加拍卖的就是劫掠者本人，而且拍卖所得的奖赏金在现场就进行了分配。

北京的拍卖

拍卖进行的前一天，各种物品被摆放到西黄寺的大殿中^①。施文贺对那个场面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有深浅各异的白玉和翠玉装饰品、镶嵌着珐琅的古瓶、青铜器、金银塑像和小雕像等；还有大量精美的皮毛，其中许多都非常贵重，像紫貂、海獭、白貂、俄国羊羔皮等；还有一些宫廷服装，其中有两三件明黄色丝绸制成的中国皇帝的朝服，上面用金丝线绣着几条龙，下摆上用绣花丝线刺绣着精美的图案，内层用银色皮毛或者白貂皮镶着边，袖口则装着光滑的紫貂皮。大殿深处堆满了数不清的各色绫罗绸缎，有一些是漂亮的御用黄色，一种根据中国法律只有皇帝陛下本人可以使用的颜色。（Swinhoe 1861：311；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拍卖本身显得很是热闹，关于某位军官“被认为接受了罗斯切尔德（Rothschild）男爵的全权委托”的谣言更是使拍卖气氛达到高潮。竞价很活跃，成交价很高（Swinhoe 1861：311）。随军牧师莫吉记载，翡翠的价格在10~30英镑之间，皮毛的价格在10~50英镑之间。一件皇帝的朝服卖了120英镑。克灵顿将军买了几块翡翠、一个有名的“鞑靼酋长”进贡的一件玉器和一串红宝

^① 这座寺庙最初建于明朝，自达赖喇嘛于清初顺治年间驻锡该寺之后，它就和藏传佛教产生了联系。西黄寺还因为乾隆皇帝为纪念访京期间在那里圆寂的班禅喇嘛而建的白塔而闻名。见 Bredon 1922：224 - 227；Arlington and Lewisohn [1935] 1987：238 - 240。

石项链、还有一件天青石雕品。随着竞价继续进行，有些人的思想开始转向君主和指挥官。普罗宾（Probyn）少校得到的两个瓷釉大花瓶被留了出来，准备送给女王。奖赏金委员会买下了一把“中国皇帝用来向他那柔软的手上倾倒玫瑰水的漂亮金壶”，作为礼物送给了克灵顿将军。当沃克上校和格雷厄姆少校在家信中抱怨他们在竞价大战中无力竞争时，奥尔古德（George Allgood）却兴高采烈地写道，他买下了皇帝本人的玉玺（Allgood 1901：59）^①！另有一些人写道，他们只能给每位家人尤其是女眷买下适当的“礼物”（Spence 1969：76 - 77；Allgood 1901：59；M’Ghee 1862：211）。

但是，军队得到的酬劳并不仅仅是买到合意的物品，还有总计2.6万英镑的奖赏金。在克灵顿、米歇尔（Michel）和内皮尔（Napier）将军放弃他们应得的一份以后，全部奖赏金按以下标准在军官和士兵中进行分配：一等校官每人60英镑；二等校官每人50英镑；随军牧师每人40英镑；中尉军官每人30英镑；少尉每人20英镑；军士每人10英镑；列兵每人5英镑^②。同时，尽管沃

① 关于这次拍卖的其他记载，见 Graham 1901：189；Knollys 1875：193 - 194；M’Ghee 1862：294；Swinhoe 1861：311；Walker 1894：213；Wolseley [1862] 1972：237 - 242。

② 这些数字引自 Knollys 1875：226 - 227 和 ILN, 5 January 1861：7。1861年时，英国士兵每月军饷大约为1英镑，而印度骑兵部队中的骑兵约8卢比。1855年时，印度军队中的英国军官每月薪水如下：上校，1478卢比；中校，1157卢比；少校，929卢比；上尉，563卢比；中尉，365卢比；少尉，311卢比。所有数字都引自 Heathcote 1974：110，128（他还给出这一时期卢比与英镑的汇率大约为10:1）和 Farwell 59 - 60，160。

印度事务部的档案中没有这次战役的奖赏金清单，但有大量在这次战役之前及之后发生在印度的各种战役的清单和申请，尤其是1857 - 1858年间的战役。例如，见 the Deccan Prize Money rolls, dated 31 July 1832, in British Library and India Office Records (hereafter IOR), L/MIL/5/326, 其中可明显看到英国军队和印度军队之间的差别。印度军队处理劫掠物品和给所有级别的人员分配奖赏金的程序，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见 Mason 1974：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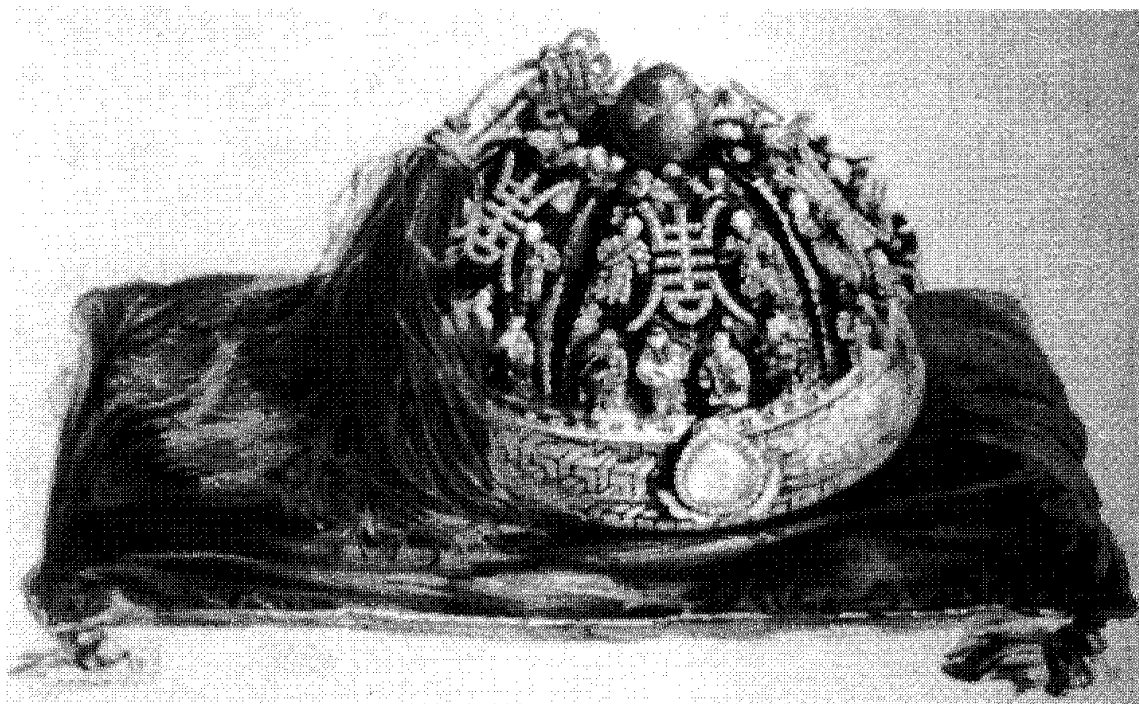
克上校大发牢骚，但他并没有空手而归，作为奖赏金委员会负责人，他得到了350英镑。至于印度部队，尽管它们被排除在这些程序之外，但也没有被要求将在圆明园中抢掠到的物品上缴给委员会（Graham 1901：188）。

随着抢掠所带来的威胁被奖赏金程序有效化解，英国军队现在可以去完成下一个任务了，这就是对中国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进行规训和教育。但是，在转而讨论这一教育工程的实施过程之前，或许还有必要对抢掠、奖赏金和英国的帝国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具体的探讨。

奖赏金和帝国统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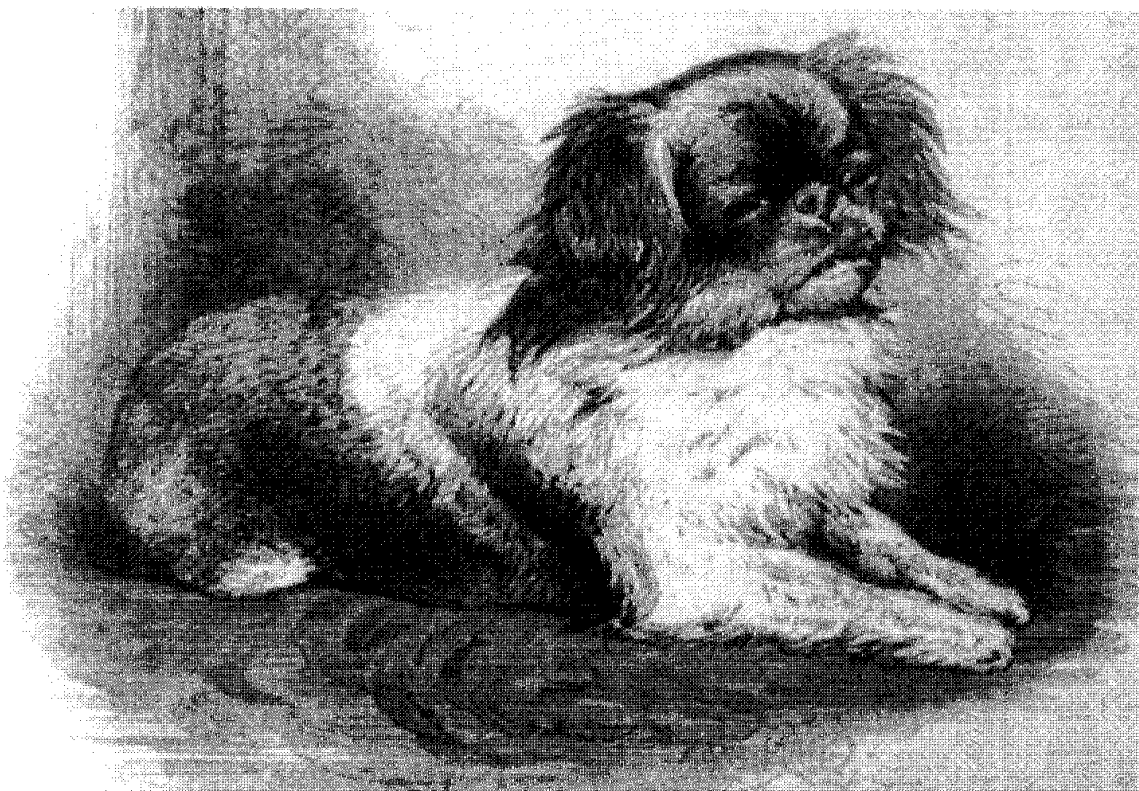
乍看上去，劫掠物品的收缴、拍卖以及分配拍卖所得的整个过程似乎未必有太大的意义，但其重要性在于，这些过程反映并且仿效了正在改变着中国与欧洲列强关系的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进程。就像战争和条约一样，奖赏金程序将中国及其政治秩序纳入到英帝国在亚洲的常规之中。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就起到了破坏清王朝统治权的作用。这一颠覆过程的中心，是对直接与清朝皇帝个人有联系的那些物品的窃取和重新分配。以这种方式被重新分配的物品包括皇帝的朝服和盔甲、如意、御座的垫子、印玺、“中国皇帝的帽子”（图片3）、一道“放置在皇帝御座后面”的雕花屏风、《皇朝礼器图示》一书的一些书页——其中有手绘的皇帝和皇后的朝服图，以及被施文贺认定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黄色丝绸。还有从皇帝私人居室里获取的各种物品，比如一本用玉作封面的小书，据说其中辑录了孔子的格言；一件被荒谬却又充满感情地说成是孔子头骨的西藏法器；还有一只被命名为“璐蒂”（Looty）的北京狮子狗（图片4）^①。除了这些物品，许多欧洲生产的東西也遭到了抢掠，

^① 除了“璐蒂”和“孔子头骨”外，这些物品现在都收藏在英国。



图片 3 中国皇帝的帽子

Holmes, *Naval and Military Trophies and Personal Relics of British Heroes*, 1896.



图片 4 璐蒂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5 June 1861.



有一些可以认定是此前欧洲君王们赠送给清朝皇帝的礼物。这其中有许多机械钟表——据哈里斯说，有座钟表很可能就是马嘎尔尼勋爵赠送给乾隆皇帝的那座，有马嘎尔尼作为乔治三世的礼物带来的大炮（Rennie 1864：166；M'Ghee 1862：210；Swinhoe 1861：331），还有像吴士礼上校得到的“贝提托”（Petitot）那样的美术作品，以及一条由法王路易十四赠送的挂毯。

这些物品中有一些赠送给了维多利亚女王，比如皇帝的帽子、“孔子的格言”、“璐蒂”等。与布雷肯里奇（Carol Breckenridge 1989：203）所描述的从南亚国王们那里抢掠来的王室物品一样，它们和英国君主的其他一些象征物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英帝国扩大的统治权。有些劫掠物品被存放在各支参战部队的军官餐厅中，在这些地方，清朝物品就被作为战利品纳入到部队历史之中，成为帝国战争辉煌胜利的象征，也成为部队与英国君主间物质联系的标志^①。也有些物品被最终落户到一些在支持和维护英帝国方面起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作用的机构中。比方说，那门大炮就又“重新回到”了伍尔维奇兵工厂，回到了它的原产地以及为帝国生产武器的地方^②。路易十四的挂毯先是在帝国的珍宝库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存放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放置在曾经培养出帝国许多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图书馆^③。其他物品最终都进入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的馆藏，其中包

① 女王皇家团和威尔特郡团的军官餐厅分别拥有瓷器和银器战利品。前者见 Davis 1887 - 1906, 5: 132; Haswell 1967: 103; 后者见 Gibson 1969: 86。有关战争荣誉，见 Leslie 1970: 85 - 86。

② 诺里斯（Knollys 1875: 128 - 129）提到，它们后来被归还，但是我在1987年前往那儿时，兵工厂里并没有任何记录。然而，凯斯特伦（Kaestlin 1963: 15）说大炮被收入了园形博物馆的收藏目录，这座博物馆似乎是兵工厂一个独立管理的部分。感谢辛格（Aubrey singer）让我注意到这一资料。

③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Acquisition Records, the Crealock file. 感谢威尔森（Verity Wilson）提供这一资料的来源。

括自我标榜为“非抢掠者”的吴士礼捐赠的景泰蓝冰鉴、皇帝御座的椅垫^①和其他一些物品（图片5）。另有其他一些物品流入了市场，在那里，它们作为带有外国统治者痕迹的独特商品而被重新估定价值（见下文）。随着中国皇帝的宫廷器物和珍宝在异国的这些不同领域里四处流传，它们就被改造为一个新的统治范围内具有丰富意义的物品。它们现在已经大大超越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土局限，成为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统治体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



图片5 御座椅垫的背面

Wolseley Bequest.

① 这两件物品最近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维多利亚时代收藏展上展出过，我2001年7月在伦敦时第一次见到了它们。见本书第九章的进一步讨论。



仿佛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中国皇帝的宫廷器物 and 私人财产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也成为英国人优越于中国皇帝的物质证据。施文贺一针见血地说：“想一想吧，就在皇帝自己帝国首都的大墙下面出售皇帝的财物，而做这事的正是被他蔑视为弱小的蛮夷并声言要将其赶到海里去的那个民族！”（Swinhoe 1861：311 - 312）。克灵顿参谋部的军官奥尔古德对此加以补充，认为羞辱“世界上最妄自尊大的君王”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他写道：“北京被占领的新闻将会在整个亚洲引起震荡，在印度也会产生出令人满意的效果”（Allgood 1901：60）。从这些话来看，奖赏金和战利品绝不仅仅是中国傲慢的君王和清朝官员们受辱的标志。这种处心积虑的羞辱行为，也给其他试图挑战英国强权的国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实物教学课。

拍卖和重新分配这一有秩序的程序也产生了其他一些结果。先回想一下此前有关奖赏金法的讨论。按照它的规定，战争时期获得的所有抢掠物品都属于英国君主，抢掠物品的拍卖应该在另外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在拍卖之后的某个时间才向军队分配其份额。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克灵顿将军决定现场进行拍卖并立即分配拍卖所得的奖赏金。克灵顿在向陆军大臣赫伯特（Sidney Herbert）解释这一决定时称，由于他的士兵看到了法国人“装满了银元和银锭”，所以他才下令进行拍卖，并且分配拍卖所得和其他钱财，这样他的军队就会感到心满意足，再没有理由进行劫掠或者抱怨了（Knollys 1875：192，226 - 227）^①。这样看来，奖赏金程序似乎有着引导和疏通的功能，能够把皇宫财宝所引起的潜在的破坏性欲望，转化为与法律、私有财产和有序商业构成的道德秩序相吻合的

^① 克灵顿后来收到拉塞尔勋爵的回复说，鉴于这种形势，女王同意了他的行动；见 FO 17/362：94a - 95a。

平和感情^①。此外，由于奖赏金是按军阶进行分配，就有着重新规范军队的应有结构、同时又能维持英国部队和印度部队之间等级差别的实际作用。最后这点并非小事，因为远征军的1/3是由南亚人组成的。在这些人中，“非正规的”骑兵团被普遍认为是真正的劫掠专家。这样，奖赏金程序就能够向锡克人和“狂野的”帕坦人展示他们的统治者的纪律规范。由于军队现在能够不受抢掠的污染，应该就十分清楚地上了一课：纪律严明的军队，而不是法国人那样由劫掠者组成的乌合之众，才能完成正义的征服。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印度士兵在1900年表明，他们已经很好地掌握了这一课的内容。

商品化、皇家珍宝和古玩

英国奖赏金法的一系列程序通过拍卖这一市场机制把劫掠物品转变成奖赏金，同时也把一些象征清帝国统治权的東西和皇家的“异域珍宝”变成了商品。法国人的做法也大致相同，不过其方式要更为直接。就法国人来说，商品化过程几乎立即就开始了。回想一下法军指挥官对劫掠行为的看法吧：他们先是任由这股“狂热”自行发展，然后再开始用纪律约束他们的部队。当士兵们似乎有些精疲力竭的时候，孟斗班将军开始尝试一个新奇的策略：寄希望于士兵们的理智。他走在士兵中间，向他们指出，要把拿到的所有东西都带出去非常困难，而且万一清朝军队突然发动袭击，他们该怎么办呢？有谁知道在北京城和海岸之间究竟还有多少中国军队？孟斗班补充说，如果遭到袭击，士兵们就可能会失去所有的东西。据埃德里松说，孟斗班的方法相当奏效，法国士兵们不再进行抢掠，并且丢掉了一些较大较笨重的物品（d'Hérrison 1901：631）。就像

^① 见克灵顿1860年10月12日发布的将军命令，WO 14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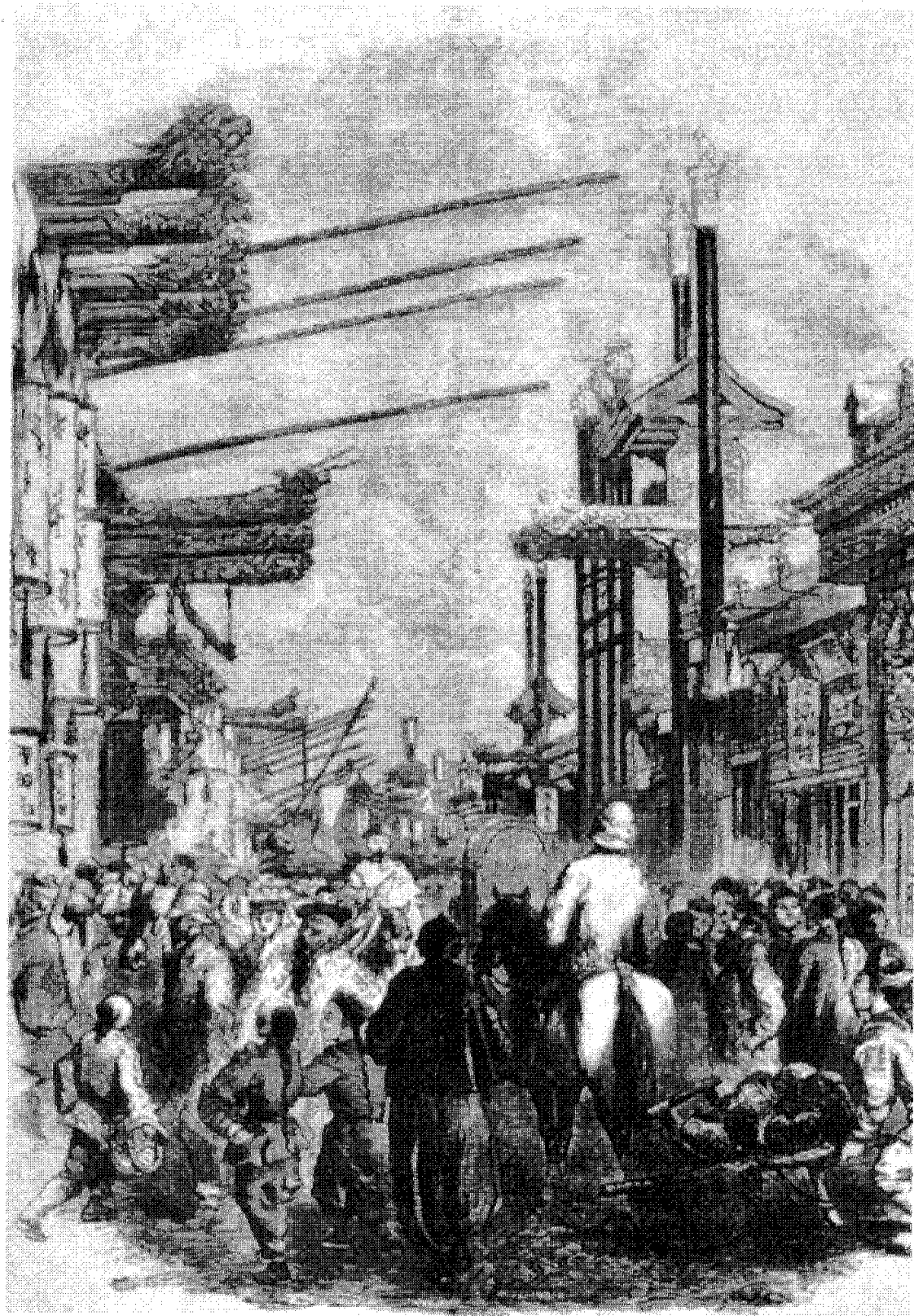
英国方面的资料所表明的，有相当多的士兵甚至更为理智，他们决定将他们的抢掠物品变成现金，把它们卖给英国人，或者卖给英法军队的随军私人商贩们（Graham 1901：190；J. Harris 1912：104，127；Swinhoe 1861：310；Tulloch 1903：120）。对于未能在拍卖中买到称心物品的英国军官和士兵来说，法国市场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货源。所有这些都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或后果。

成为商品的劫掠物品

市场进程将皇家作坊原本生产的专供皇帝及其宫廷使用和消费的东西，转变成了只要有钱人人都可以买卖的物品。换句话说，这些物品进入了一个全球性交换的世界。皇家珍宝从统治者手中转移到商人手中，同时也意味着原本相对稳定的东西突然具有了很大的流动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圆明园的劫掠物品就通过北京城内城外的中国商贩、通商口岸的商人以及伦敦和巴黎的拍卖行，从一个市场流向另一个市场。令一些英国人感到十分好笑的是，几乎在同一时刻，清朝皇帝的臣民们也卷入到这一市场之中。他们或许本人就是劫掠者，或许是从圆明园附近的海淀村村民、从即将离开北京的外国士兵^①、或者是从“北京地痞”的手中购买到劫掠物品^②。然而，无论他们是如何搞到皇帝的珍宝的，人们都会很自然地把中国商贩和北京大规模的艺术品市场——这一市场位于前门外一些像琉璃厂那样的街道上——联系起来。事实上，确实有些英国军官找到了被他们称之为“古玩大街”（图片6）的琉璃厂，并在那里买到了一些和在圆明园中见到的物品差不多相同的东西（M'Ghee 1862：302；Walker 1894：197；*Illustrated London News* [ILN] 16

① Tulloch 1903：121 - 122 提到将丝绸卖给中国商贩。

② 关于中国人的劫掠活动，见 M'Ghee 1862：212；大多数其他英国资料也提到了这一点。



图片 6 北京古玩大街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6 February 1861.



February 1861: 142, 147)。

但是，这些物品很快就离开它们原来所在的地方越来越远了。随着英法军队退出中国北方，一些士兵沿着入侵中国的交通线一路卖掉了他们的劫掠物品。购买者中有通商口岸的欧洲商人，也有天津、上海直至广州等地的中国人^①。当英国人1861年回到北京建立使馆时，英国使馆的医务官芮尼（David Rennie）称，仍然可以从中国商贩手中买到圆明园的物品。他还说，在抢掠事件结束一年以后，香港的一家中文报纸还登出过一则广告，称有圆明园的劫掠物品出售^②。

和芮尼观察到被去疆界化了的清朝宫廷物品还在流入中国市场差不多同一时间，其他一些物品出现在了伦敦、巴黎的拍卖行里。这些物品的第一次出售由菲利普斯拍卖行于1861年4月18日进行。在售出的21件物品中，有一对“精美的东方花瓶”卖出了585英镑的价钱。一个月以后，佳士得拍卖行又卖出了额尔金的秘书、把勋爵的官方文件带回伦敦的罗亨利带来的一些物品。此后，在1861年的6月、7月和12月又相继进行了3次拍卖。6月拍卖的是圆明园的“艺术品与古玩”，这些物品属于费恩骑兵团的一位军官^③；7月拍卖的物品包括中国宫廷服装、“皇帝御座上使用的绣工精美的椅罩”以及“中国皇帝的大国玺”。1862~1866年之间，又相继进行了8次拍卖（见表1和图片7）。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德路欧酒店，1861~1863年间共进行了大约21次有关圆明园劫掠物品的拍卖^④。

① 《伦敦图片新闻》1861年4月13日报道，“一定数量的战利品”已经到了上海和香港，被“中国人自己”买了下来；见 *ILN*, 13 April 1861: 339。

② 关于“艺术品”市场，包括皇帝御座的出售，见 Rennie 1865, 1: 289 - 291, 300 - 302, 313 - 314, 324 - 325。广告一事见 Rennie 1865, 2: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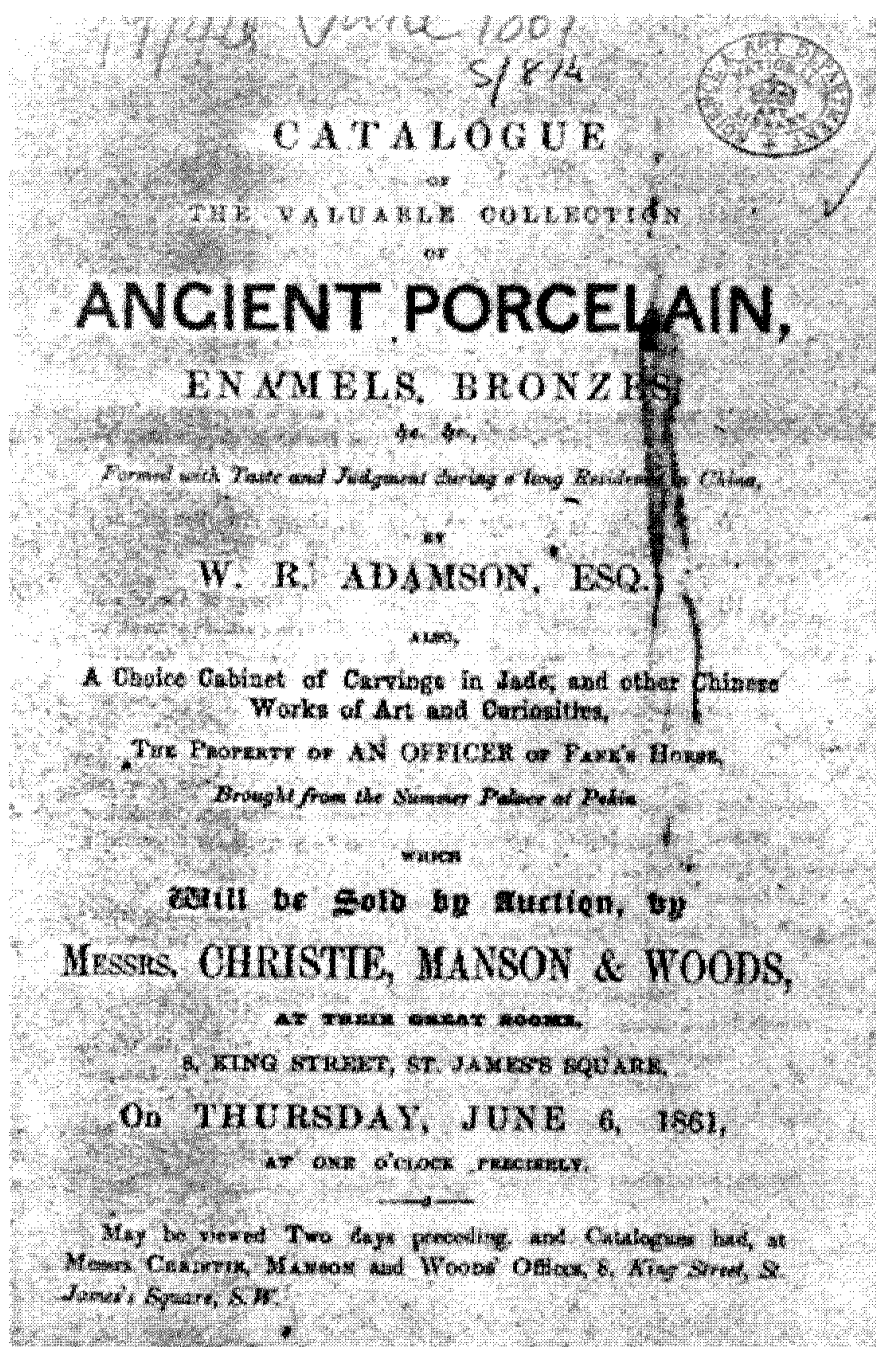
③ 感谢皮尔斯（Nick Pierce）让我看到了这一拍卖目录的封面。

④ 感谢蒂里埃（Regine Thiriez）非常慷慨地提供了有关巴黎拍卖的情况。

表 1 伦敦拍卖的圆明园劫掠物品详单

日期	拍卖行	商品描述及登记号
1861. 3. 18	菲利普斯	据说属于一位军官的 21 件物品,包括以 585 英镑成交的东方古瓶。(AN 23. DD)
1861. 5. 27	佳士得	“一位绅士的财产”;手写的“额尔金勋爵的秘书罗亨利先生”,共 8 件。(AN 23. N)
1861. 6. 12	佳士得	一对“精细的祭祀用器”。“这些是北京冬宫里那座佛塔的模型,取自圆明园”。(AN 23. N)
1861. 7. 5	佳士得	来自军官们的两批物品:一批 8 件;一批 23 件。其中包括“中国皇帝的大国玺”。(AN 23. N)
1861. 12. 12	菲利普斯	来自一位“极具鉴赏力的绅士”的一件物品。(AN 23. ZZ)
1862. 6. 13	佳士得	罗伯特财产,其中一件据说来自圆明园。(AN 23. XX)
1862. 6. 30	佳士得	来自圆明园的 3 件珐琅制品,“一个大香炉……带到英国的最大物品之一……曾是皇帝书房里的炉子”。(AN 23. XX)
1862. 7. 21	佳士得	一位军官带回,124 件,包括一个皇帝御座椅垫和一对“据信为现存最为精美的圆柱状花瓶”。(AN 23. XX)
1862. 12. 1	佳士得	莱米及施密特公司售出的来自国际博览会的物品:两块来自圆明园的地毯。(AN 23. XX)
1864. 7. 25	佳士得	36 件标明来自圆明园的物品;虽未注明但在标为“玉雕等物”的物品中的丝绸和皮毛“可能”是来自同一地方。(AN 23. XX)
1864. 5. 18	佳士得	额尔金物品拍卖。没有一件标明圆明园,但有来自 1862 年展览会上的物品,包括“孔子头骨”以及 1843 年展览会上的物品。(AN 23. XX)
1864. 7. 14	佳士得	共 10 件,包括两块“欧洲手表”。(AN 23. XX)
1866. 6. 28	佳士得	3 件:佛塔、床罩和项链。(AN 23. XX)

说明:该表选自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国家艺术图书馆收藏的拍卖目录。圆括号内的数字是图书馆对每本目录的登记号码。



图片7 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物品目录，1861年2月16日

被陈列和收藏的劫掠物品

欧洲的拍卖市场把清朝宫廷物品引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崭新的展示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包括公开展出和私人收藏。在这方面，孟斗班将军及其部属们收集的大量物品值得特别关注。我们要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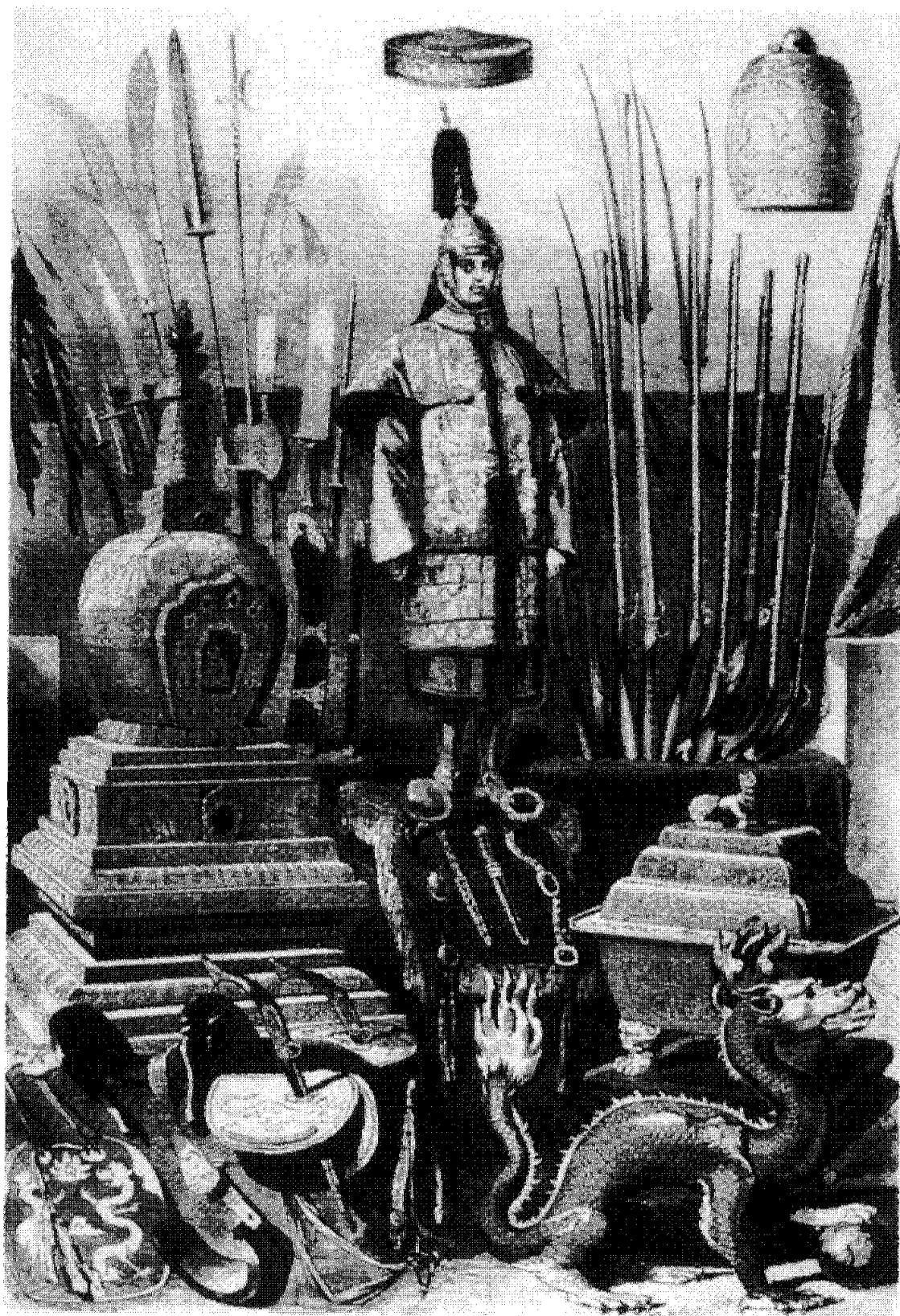
的这些物品是孟斗班作为礼物赠送给拿破仑三世的，后来成了欧也妮皇后位于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宫的东方收藏的一部分^①。然而，在这之前，这些物品先于 1861 年 4 月在杜伊勒利宫进行了公开展出。展示的物品主要是随身的军用品，包括“中国皇帝的战袍”、来复枪、手枪、长刀、短剑、戟和马鞍等。此外还有两个如意或者叫帝国权杖、一座镶着珠宝的镏金佛塔、一个头顶红缨的卫兵雕像、一个带盖的方鼎和一座铜钟。《伦敦图片新闻》（*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登出一幅绘有全部展品的图画（图片 8）。该记者抓住了这些物品自被盗窃之日便开始具有的许多综合性意义，称它们为“战利品”、“神圣的纪念品”和“杜伊勒利宫中国收藏中的古玩”（ILN, 13 April 1861: 334, 339）。1862 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也进行了类似的、但规模较小的展出（Palgrave 1862; Waring 1863）^②。开展之前，人们预计法国皇帝和皇后得到的劫掠物品会和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劫掠物品一道展出，另外还会展出中国皇帝的宝座（*The Queen*, 18 January 1862: 398）。尽管实际上这些物品一件也没有被展示，只展出了一道放在皇帝御座后面的雕花大屏风 and “孔子头骨”（图片 9），但这些公开展示与拍卖市场联合起来，共同为清朝皇帝的物品确定了两个关键性的标示。

第一个标示是“来自中国皇帝的圆明园”。这个标示此后一直伴随这些物品参加各种拍卖和博物馆展示，几乎一直延续到今天^③。就这样，这一表述语就不断地让人们想到英国对傲慢的中国君主和官

① 这些藏品直到现在还在那里，见 Samoyault-Verlet 1994。感谢克吕纳斯（Craig Clunas）使我注意到这一点，同时感谢德罗盖伊（Vincent Droguet）1998 年 6 月让我看他的私人收藏，感谢蒂里埃安排我访问枫丹白露宫。

② 中国物品在这之前也曾在伦敦展出过（Altick 1978），但是这是第一次展出帝王用品。

③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说明牌中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标示。但从那以后，藏品重新进行陈列，所有提到圆明园的地方都消失了。



图片 8 杜伊勒利宫法国劫掠物品展览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3 April 1861.



图片9 “孔子头骨”，左起第二个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and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1863), vol. 3, plate 291.

员的胜利，想到英国对他们那种蔑视所有外国人的过度优越感的羞辱。换句话说，皇帝的物品出现在他的皇宫之外，使他和他的帝国蒙受了永久的污辱。另外，普遍具有的关于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人的观念，更进一步丰富了英国人认为占有中国皇帝物品就是对中国皇帝加以贬抑的那种感觉。正如吴士礼在洗劫圆明园时所说的，也正如《伦敦图片新闻》记者就杜伊勒利宫的展览所说的，皇帝的珍宝现在落到了一些“粗俗人”的手中，受到那些“野蛮人”和“毫无鉴赏能力的外行们”“褻渎的目光”的玷污 [Wolseley (1862) 1972: 234; *ILN*, 13 April 1861: 334, 339]。这样来看，中国皇帝的物品被运送到欧洲，等于使已经因皇宫被洗劫而遭受贬抑的君王



又增加了一层羞辱。或许正是在这儿，在圆明园劫掠物品最初的经历之中，我们能够再次看到羞辱在19世纪欧洲帝国的构建和再生产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古玩、文明和主权者男性主体

赋予这些物品的第二个恰当的名词是古玩。实际上，在有关抢掠的所有记载中都使用了这个词，在拍卖市场和公开展示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它。这一名词本身有着复杂的历史，并不仅仅用于皇帝的珍宝。例如，它曾被用来指称16~17世纪从世界其他地区带入欧洲并在“古玩陈列橱窗”中进行过展示的收藏品（Pomian 1990；Impey 1977；Impey and MacGregor 1985；Ayers 1985）。在这种情况下，古玩一词代表着那些因为“属性不明确”而难以归类的“奇异物品”（Kirshenblatt-Gimblett 1991：392；Breckenridge 1989：199 - 200）。到18世纪末，这一名词被用来剥离库克（Cook）远征队在南太平洋地区搜集到的史前古器物的背景，然后再把它们按照一些主题——这些主题突出地强调收藏者要对之进行公正的科学研究——重新组织起来（Thomas 1994）。至于中国物品，古玩一词曾经被用来指称1842年和1847年在伦敦举办的展示会上陈列的收藏品（Altick 1978：292 - 297）以及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上中国展区的展品。在这些展出中，这一名词似乎意味着奇特和异国情调。

古玩一词的这些意义也许都能用来说明圆明园的劫掠物品，但是下面的事实使得这些意义变得更为重要。圆明园的劫掠物品并不是为出口贸易而生产的，也不是为了某个伦敦展览会而在中国某个通商口岸收集到的，相反的，它们是来自异域的皇家珍宝，因而也就具有金钱价值和收藏价值。尤其是作为纪念品，一种个人记忆的纪念品，其价值要远远超过以前在欧洲出现过的各类中国物品。另一方面，尽管它们的价值看起来可能要高于其他中国物品，但仍然很难把它们十分恰当地归之于某种已知的艺术类别。因此，贴上古

玩的标签，就能把它们与欧洲文明的优雅艺术品区分开来。从好几个方面看，这种区分都非常具有意义。例如，它直接指出了围绕这些物品所建构的意义有着多重性质。这些物品可以同时代表征服和耻辱，也可以代表令人难以置信的金钱价值，它们可以具有很小的意义，也可以什么意义也没有。这些物品的确是奇异的。但是，如果把它们标为古玩意味着某种意义被抹杀了的话，这种做法或许并不会令人感到惊奇，尤其当认识到意义的真正制造者是对华侵略，并且认识到终究会有人努力给这些奇异物品充实进某些内容的时候。要了解其中的种种运作过程，就有必要将视线从这些皇家物品转向它们被发现的地点：圆明园。

在几乎所有有关圆明园的描述性记载中——其中最详细的似乎是法语的记载，那些花园、宫殿和亭子都被看做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这部分是因为许多法国人知道，这一园林中有一部分是由欧洲风格的建筑物、喷泉、花园以及一个迷宫组成的，它们都是由为清朝皇帝服务的法国和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设计的。英法两国军队中没有一个人以前曾经到过北京，或许正是这一知识能够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和英国人一下子就认出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夏宫了。尽管如此，当他们看到这些园林时，仍有一些人完全惊呆了。例如，德埃里松就这样写道：“以金汤玉液作墨，以奇钻异石为笔，骋东方诗人之想象，才能描绘出我们惊奇的双眼所看到的全部辉煌绚丽的美景。”（d'Hérrison 1901：615 - 623）。尽管语言没有这般动人，施文贺同样为所看到的景色震撼不已（Swinhoe 1861：332 - 334）。

然而，也有一些人在进一步观察和思考之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正是古玩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平衡力，使他们没有产生对中国皇帝的敬畏之情。这里的关键性证据还是来自吴士礼，他又一次进行了必要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以确保跨越东西方之间巨大鸿沟的意义不会而出现渗漏。更重要的是，古玩这一概念使得吴士礼能够将清帝国和中国文明放置在低于大英帝国和欧洲的位置上。



吴士礼这种修辞技巧的关键，是把他与圆明园的碰撞构建在普莱特（Mary Louise Pratt）称之为“我是我所审视的一切的君王”的场景之中。普莱特曾用这一观念探讨英国发现文学的结构，尤其是第一次用语言描绘外国景色（大概就是那些从来未被“白人”见到过因而也就是未被任何一个具有重要性的人见到过的地方）的那些场合。她在这类作品中发现了一种观察者地位的形成，这种地位通过将审美语言和现时的意识形态相融合来掌控被观察者（Pratt 1992：205）。当然，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情况显然有所不同。华北平原并不是一片“毫无意义”的景色，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欧洲人到过这里。和英法军队中其他人一样，吴士礼也知道圆明园及其宫殿花园在欧洲极其有名，他也知道英国人以前曾经来过这儿。事实上，他也告诉了他的读者，圆明园就是那个“使英国国王的使节受到侮辱而没有得到惩罚”的地方 [Wolseley (1862) 1972：226]。尽管吴士礼不能够把自己装扮成圆明园的发现者，他却能够做更为精彩的事：就像此前没有任何欧洲人能够见到圆明园一样来审视圆明园。

吴士礼通过一个简单的蔑视行动，便使自己成为一位先行者。他再现有关叩头的历史，径直走进朝觐大殿，直接站立在那把“曾经有多少王公贵族和傲慢君主的使节在它面前按照中国宫廷习惯礼仪奴隶般地谦恭跪拜”的皇帝宝座前面^①。当他在宝座前转过身来时，无疑就已经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审视者地位，他成了他所审视的一切的君王。例如，成为君王的吴士礼能够承认，朝觐大殿的整体效果比他“预先想象的”要好一些，大殿里的每件东西都是同类物品中的“珍品”。但是，同时他又说“总的来看没有什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中国的建筑师“似乎永远不会”把各部分组合成一个超越各部分总和的统一体。吴士礼评论说：“不

^① 这一引文及以下两段中所有引文均引自 Wolseley [1862] 1972：232 - 237。

管是园艺设计还是房屋建筑，中国人对所有东西都竭力进行装饰，却失去了壮丽的景观和宏伟的效果。他们追求奇异而忽略了优雅。中国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们渴求装饰，天生喜好细部的润色，因而无法创作出像欧洲建筑师那样雄伟壮丽的作品，使人一看到就能激起强烈的敬畏感和钦佩感。”

这种“追求奇异”，这种对装饰的热衷所制造出来的不是皇家的庄严，而是对微型事物的某种沉溺，从而导致了又一层失败。就像把一些“缩小了的的山岳和乡村景色”集中到一个狭小空间的克里莫尼人工洞室一样，圆明园（以及“帝国其他所有装饰华丽的场所”）的“每一处旮旯角落里都塞满了小河、池塘、桥梁、矮树和假山”。这种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圆明园“更像是一个站在玩具小房前面的小女孩的设计，而不是成人的作品”。

在论述了中国的建筑和景观设计具有女性和孩童的特色之后，紧接着便是对第三种失败的非难。吴士礼断言说，如果中国现有的建筑是不成熟的，那么它过去的建筑就是虚无的。跟其他一些现在已经死去的伟大文明不同，中国没能像埃及、尼尼微、底比斯、孟斐斯，甚至“已被遗忘很久了南美种族”那样，创造出具有持久性意义的纪念物。因此，参观过圆明园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失望：“那里缺乏宏伟的气势，无论有多少精致的园艺和精美的装饰，都无法弥补这一点。”

吴士礼在把圆明园女性化、孩童化的同时对之加以贬低，就将中国置于一种道德话语和一个体系之中。这种道德话语和体系把中国定义为一个不成熟的文明，一个缺乏任何优越之处和持久意义的文明。以这样一种框架来分析，皇帝和他的宫殿、财产便造就了一个缺失和失败的中国，一个非常需要英国进行“社会干预和物质干预”（Pratt 1992：205）的中国。换句话说，吴士礼为英国在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的教育工程制造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理由。

因此，劫掠圆明园和把圆明园的物质实体改造为古玩的那个混



乱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去疆界化机制。吴士礼在皇帝宝座前的不敬行为以及他对皇帝珍宝价值的贬抑，是这一机制的重要内容。通过这些行动降低了清帝国的地位，破坏了清帝国的秩序，从而使清帝国有可能以一种全新的身份，作为一名英国老师的落后学生而被再疆界化。随之而来的辅导课程便是惩罚和规训，只有在惩罚和规训完成之后，真正的学习过程才能够开始。

一次神圣的报复行动

吴士礼以圆明园为场地所进行的话语调动，有效地建立起英国人在此后半个世纪内所努力维护的支配地位。这一地位的核心是这样的观念：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英帝国和英国人都要优于中国和中国的领导者。在整个世界贬抑所有的中国事物，实质上也是对英国人长期以来归之于中国人本身的那种态度的一种仿效。反过来，这种“受尊敬的”优越地位要得以维持，就要把任何反抗行动，哪怕是最温和的反抗，看做是对通过战争和条约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的严重威胁。由于中国人出于恐惧而表现出了以前不可想象的一定程度的屈从，后来几十年里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证明英国人这种态度的错误。但使得中国屈从的原因，正是用以贬抑中国的过度暴力和虚伪道德。要说明英国野蛮和伪善的这一结合，再没有比毁坏圆明园更好的例子了。而如果没有吴士礼如此自觉地占据了被拔高的主权者男性主体的地位，圆明园的毁坏也是很难想象的。

如前所述，导致做出毁掉圆明园决定的，是巴夏礼和罗亨利（额尔金勋爵的秘书）及其随从在据说打着休战旗的情形下在通州被逮捕的事件。额尔金勋爵和他的随员们把他们被拘捕扣留的事件看做是对“国家间法律”和战争行为规则的侵犯，把它看做是中国人典型的背信弃义行为，认为怡亲王和僧格林沁个人应当为这一

事件负责。至于英国人在这次战役中拘留天津知府石赞清一事或者 1858 年绑架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事与巴夏礼及其随从被拘一事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任何人曾经提到过，似乎也从来没有任何人曾经想到过。也没有任何人曾经认真想过，中国军队有可能不理解休战旗的意义。然而，尽管英国人执意不去考虑巴夏礼被捕一事的各种背景，但巴夏礼等被俘者所遭受的待遇却把整个事件提高到一个几乎不能再高的高度。在额尔金勋爵给恭亲王的信件中，以及在之后不久发表的官方通信及各种记述中，这些被俘者的身体所受到的对待，在活着的和死去的人身体上看到的那些“侮辱和虐待”的痕迹，被认为是一种暴行——这种暴行已经侵越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正常界限^①。

不止一种记载记录了当被俘者 10 月 14 日以后陆续返回英国军营时所引起的震惊。莫吉牧师的反应最为典型：“我从未见过比这更让人怜悯的情景了……他们几乎不能走路，拖着双腿向前挪动。他们的手以一种痛苦的姿势放在胸前，这还能叫手吗，都已经被扭曲得变了形状，有的手腕上的伤口已经溃烂，有的手上被绳索捆绑造成的肿胀还没有消下去，有的手就像鸟爪子一样蜷曲着，看上去好像已经坏死萎缩了”（M'Ghee 1862：252）。

人们很快就从这些幸存者的叙述中了解到，除了一名法国列兵以外，他们都是印度骑兵，大都来自费恩马队。人们还了解到，他们身体的畸残状况是由于手脚被浸湿的绳子紧紧捆在一起而造成的。这些被俘者们就这样被捆绑着，任凭风吹日晒雨淋，而且长时间内得不到食物和水。由于四肢的血液循环被截断，肌肉肿胀溃烂，伤口化脓，生满了蛆。这些幸存者的证言全部或部分地发表在英国议会文件或者战争记载里，它们表明所有的死者都是由于这种虐待的结果。唯一正面的记述是关于死者之一、列兵菲

^① 引用语句及有关野蛮的说法引自 Lord Elgin to Prince Gong, CRAC 217。



普斯的英雄行为的。根据布戈尔·辛格（Bughel Sing）和汗·辛格（Khan Sing）的证词，菲普斯是他们那伙人中最后死去的一名欧洲人，“一直到被捕后第14天死去以前，他都千方百计地鼓励着锡克人”。就像东肯特团的列兵莫伊斯一样，菲普斯以一种勇敢精神面对死亡，这种勇敢精神就是“身处绝境”的英国士兵的标志^①。

幸存者的可怜状况和菲普斯的英雄故事所引发的情绪，又因死者尸体的惨状而进一步加强。据施文贺记述，当装在棺材里的死者被运回时，尸体旁的纸片上用汉字写着他们名字的音译。这也许是唯一的一件好事了，因为尸体本身“已经腐烂，没有一具是清晰可辨的，只是通过破碎的衣服”才分辨出了几个人。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各个军营，士兵们的情绪开始恶化（Swinhoe 1861：320 - 321；M'Ghee 1862：254）。罗亨利回忆说“这些尸体的样子……激起了普遍的愤怒”[Loch (1869) 1900：160]，而据施文贺说，愤怒达到了“可怕的程度”（Swinhoe 1861：323）。在给法国外交部长图弗纳尔（Thouvenel）的一封信中，葛罗男爵总结了英法军营中的情绪：“您完全可以想象出联军军营中那种极度的愤怒和激动，我们需要尽可能地保持慎重和冷静，以阻止可怕的报复行为损害我们的事业。有人想烧掉北京，让每一名清朝官员都受皮肉之苦。”^②

如果考虑到死者尸体所激起的普遍愤怒和复仇欲望，考虑到被俘者之死成为随后发生的毁掉圆明园的重要理由^③，人们也许就会

① 引文引自 Hope Grant to Secretary of State of War, 22 October 1860, WO 32/8237。印度士兵证词的副本见 CRAC 197 - 198, Loch [1869] 1900：161 - 165。

② 葛罗的话引自 Costin 1937：333；也见 Varin 1862：248 - 252；Bazancourt 1861：279。

③ 相关反应见 M'Ghee 1862：221 - 256；Swinhoe 1861：303 - 304, 319 - 326；Wolseley [1862] 1972：258 - 270；Loch [1869] 1900：102 - 148, 157 - 165。

预见到，死者的尸体将会起到团结整个远征军致力于共同目标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尤其是通过英法军队官兵一起参加的安葬仪式。另外，大多数人或许都会同意巴夏礼的看法，他在10月27日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那些战俘受到的对待实在太残忍了，必须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他又补充说，困难在于“进行什么样的惩罚”（Lane-Poole 1902：251）。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意见。

例如，格雷厄姆少校在他的日记中就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进入北京，去“洗劫皇宫”（Graham 1901：191）。而其他一些人，特别是两国军队的指挥官们则在思考，应该将某种形式的惩罚印记或者看得见的惩罚标志留在北京，甚至可以考虑毁掉皇宫（紫禁城）。在讨论过程中，远征军的文职官员和军事指挥官们再三考虑了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他们可以要求恭亲王交出对这一“重大”罪行负有责任的人，但是真正的罪犯——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却会逍遥法外。他们也可以要求额外得到一份赔款，但这种惩罚似乎太轻了。他们还可以给北京留下烙印，但这座城市已经投降，而且有许多消息来源都表明，它的居民们是无辜的。

在权衡这些选择时，葛罗男爵似乎认为条约的签署是应当优先考虑的因素，因此应该避免任何妨碍这一目标迅速实现的事情，例如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此外，英法军队的将领们还担心天气的突然变化，因为两支军队都不准备在中国北方过冬，所以他们希望尽快采取行动，然后撤回到沿海地区。同样一个“实际的”考虑是，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Ignatiev）将军担心额尔金的唯一目的是“尽可能地使中国政府和官员们在中国人民面前受到羞辱”，他警告说，在公开羞辱基础上取得的和平不仅不利于英国，而且也不利于在华的所有其他列强（J. Evans 1987：98 - 101）。

然而，额尔金只是部分地受到这些考虑的影响。他在10月25



日发给拉塞尔勋爵的急件中，从帝国合乎逻辑的需要以及英国与中国和亚洲交往历史这两个方面，为自己最终决定毁掉圆明园进行了辩护。前者要求采取行动，以保障未来的安全；而后者考虑的依据则如前所述，是英国对那些揭示中国统治者心智思想的关键词语的翻译。在对中国统治者的这些看法的背后，是有关东方、东方人、东方专制的一系列刻板观念，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什么行动才是有效行动的认识。例如，额尔金就告诉拉塞尔说，如果他不把虐待被俘者的问题“当作需要进行严厉报复的重大罪行”来处理的话，已经很低下的“中国现有道德标准”将会变得更为低下。而反过来，如果希望这种报复行动能够起到应有效果，就必须能够留下一个持久性的印记，这一印记要比条约本身中的契约性规定更具束缚力。换句话说，他试图在中国统治者心中留下一个象征物，一个他们将会永远铭记并从中接受教训，同时也能对他们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的象征物^①。

在额尔金看来，将圆明园夷为平地恰好是可以收到预期效果的行动。就像他对拉塞尔所说的，他有“理由相信……这一行动对中国和中国皇帝产生的影响，要比远离此地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巨大”。这是因为圆明园是皇帝最喜爱的住处，因此把它毁掉就是“对皇帝的傲慢和感情的打击”。同时，这里也是一些被俘者被关押并受到虐待的地方，毁掉它或许会使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得到一定的补偿。此外，圆明园已经遭到了彻底的洗劫，因此，毁掉它不会造成许多有价值物品的破坏。最后，由于它是皇帝和皇室的私有财产，它的毁坏也就不是针对无辜的中国人民的惩罚（CRAC 213 - 215）。额尔金总结说：“军队去到那儿不是为了进行抢劫，而是要

① 他一度曾想让清政府在天津为死者建一座纪念碑，让中国的最高级官员们参加它的落成仪式。上面的铭牌上要用英、法、中三种文字镌刻上“留给后人的教训”。不知什么原因，他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见 J. Evans 1987: 97 - 98; CRAC 214。

通过一个神圣的报复行动，记下我们对一项重大罪行所感到的憎恶与愤慨”（引自 Swinhoe 1861：329）。当他的军队执行他的命令时，额尔金勋爵在公共场所张贴出一份中文公告，向中国人解释毁掉皇帝的宫殿园林的确切原因 [Woseley (1862) 1972：281]。

“一片倾毁的废墟”

“到 10 月 19 日晚上，圆明园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它四周，自然的面貌改变了，只剩下一些熏黑了的断壁残垣和一堆堆燃烧过的木头；说明这里曾经是皇家宫殿。在许多地方，建筑物旁边易燃的松树也和这些建筑物一道被焚毁，留下那些烧焦了的树干标记着这些建筑物的遗址。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些园林时，它们还让我们想起神话故事中描写的仙境，而到 10 月 19 日我们从这里开拔时，留下来的却是一片倾毁的废墟。” [Woseley (1862) 1972：280]。这一段文字最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军队 10 月 18 日和 19 日行动的成果。然而，由于这段文字十分简单明了，所以没有提到这次事件中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一行动的规模以及那些参与者们怎样对他们自己和别人来为额尔金勋爵的决定辩护。首先，毁掉圆明园的军队有米歇尔将军的整个第一步兵师，该师由 4 个英国团和来自印度的第 15 旁遮普团组成，共有 143 名军官和 4372 名士兵。参与这一行动的还有皇家工兵部队的大约 300 名官兵（W. Porter 1889，1：514 - 515）和几小队骑兵。

这些数字看上去似乎很大，但他们的活动场地也是格外广阔。英国人和法国人所说的夏宫，实际上是一个集湖泊、楼台亭阁、山水风景、花园林地和处理政事的宫殿大堂于一体的建筑群。它最大的部分由 3 个簇拥在一起的独立园林组成，它们是常常会和整个园林搞混的圆明园以及长春园和绮春园。它们的南面和西面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园林，包括万寿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新”夏宫的颐和园的中心。此外，长春园的东北区坐落着由意大利和法国传教



士设计的兼具中国风格和洛可可风格的宫殿和喷泉^①。这些园林加在一起，总共占地约857英亩^②。此外，尽管许多记述都指明毁掉的是圆明园，但实际被焚毁的建筑物很可能超出了这三座主要园林。例如，沃克上校10月19日的日记中就提到，他所指挥的骑兵毁坏的建筑物就一直延伸到香山脚下，或许还包括位于那里的一些军营和庙宇（Walker 1894：217）。其他的记载也提到，与这些园林毗邻的村庄也被烧毁（Swinhoe 1861：336；M'Ghee 1862：283 - 284；NCH，7 November 1860）。

有些记载不仅描述了毁坏圆明园的规模和程度，也观察到了参与者对这一行动产生的各种反应。戈登（Charles Gordon）在谈到“我们所焚毁的宫殿的华丽和壮观”时，又一次使用了对早先劫掠活动的那些概括，称之为汪达尔人式的野蛮破坏，是“一个严重败坏军队道德的行为”^③。施文贺走近园林时被火焰“噼啪作响的声音”惊呆了，为这些无可替代的事物被毁掉而感到深深的不安（Swinhoe 1861：330）。然而，当他看到红色的火焰映照在士兵们的脸上，使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群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洋洋得意的魔鬼的时候，他同样感到震惊。很多参与者都记录下了施文贺所提到的这种欢乐感，并且往往把这种欢乐感和满足感联系在一起。例如，吴士礼就认为，这种“哥特式的野蛮行为”使“我们的复仇毫无疑问地得以完成”，而且切切实实地吓倒了清朝当局 [Wolseley (1862) 1972：279]。有人甚至认为英国人做得还不够。沃克上校

① 建筑工作开始于康熙年间（1662~1722年），一直持续到他的孙子乾隆皇帝在位期间（1736~1795年）。乾隆几次南巡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又让人仿建了许多杭州、苏州的著名风景和园林；见 Barmé 1996：118 - 121。圆明园的历史也见 Malone 1934。

② 某些建筑和景观的地图、图画和计算机复原图见 Barmé 1996。

③ 引文摘自他给母亲的信；见 Hope 1885：14；W. Porter 1889，1：514 - 515；Boulger 1897：46；Spence 1969：74 - 75。

在一则日记中表示，希望能烧掉所有的官府衙门，烧掉一位有名的清朝官员的宅邸，烧掉北京的鞑靼城以及城中心的皇宫。此外，他对英国没有办法将大钟寺因之得名的那座大钟搬走而深感遗憾，因为在沃克看来，它应该属于威斯敏斯特的钟楼（Walker 1894：218 - 219）。

记载还表明，第一师不仅焚毁了圆明园，它还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抢掠，当时的有关当局和后来的一些评论普遍忽略了这一点。例如，有报告说第 15 旁遮普团就得到了大量金子，其中一名军官据称弄到了 9000 英镑^①。

不过，这些记载在不惜笔墨地描述第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同时，对被毁坏的园林的富丽堂皇，也表示出了近乎于崇敬的惊叹。这一惊叹之情，通过对圆明园的美丽和宽阔的描述而流露出来。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吴士礼本人，在看到毁坏圆明园的场景时，无不感到“一阵伤感”（M'Ghee 1862：287），或者“对如此辉煌的古代建筑被摧毁而感到痛苦”（克灵顿语，引自 Knollys 1875：205）。仅此一点，可能就足以激起人们的欲望，要在火焰吞噬掉它的历史、品位、美丽和工艺之前，把这一景象铭记下来，哪怕只是用语言铭记下来也好。或许有些人心里明白，不在意被中国官员们描绘为野蛮人，是一回事；但行为真的像汪达尔人或哥特人那样野蛮，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无论如何，这些不安并没有阻止某些观察者试图用观光旅游性的语言来捕捉各种景色。例如，吴士礼实际上也会把从某个建筑物上看到的景色描写为“引人入胜”，而施文贺则能发现万寿园周围地区“令人愉悦的葱郁”，并且赞叹在一座小山顶上看到的景色

^① Swinhoe 1861：331. 法威尔（Farwell 1989：32）在他的印度军队史中论证说，普罗宾和费恩骑兵队即后来的第 11 和 19 孟加拉枪骑兵队的财富就来源于中国的劫掠物品。



“美极了”。在圆明园被毁一个星期以后，格雷厄姆少校和米歇尔将军在香山的白塔顶端饱览美丽景色，而沃克上校好像是在同一地方（当时大火还在燃烧）对这一景色大加赞赏，说他“没见过比这更美妙的田园风光”^①。无疑地，这是对前面讨论过的那种“我是我所审视的一切的君王”的主体地位的变异，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怎么会有人能够透过大火和烟雾看到任何东西。

这些矛盾之处以及某些情况下对毁掉圆明园做出的似乎不可能做出的反应，还伴随着其他一些特别的声明。例如，在感叹园林之美的赞歌之外，也能听到否认与蔑视的声音。有人就提醒人们说，法国人进入圆明园地区要比英国人早多了，他们放火烧了大门附近的几座朝觐大殿，同时还大肆进行抢掠，“那些房子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了”（Woseley [1862] 1972: 279 - 280）。罗亨利后来不仅否认额尔金勋爵曾经想过要焚毁紫禁城^②，而且声称并没有什么具有艺术价值或者学术价值的东西被烧掉，因为清朝宫廷根本没有把任何珍贵物品放在圆明园 [Loch (1869) 1900: 168]。

坚持说圆明园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已经被毁坏，英国人就能想当然地把他们自己的抢掠看做是“抢救”（M'Ghee 1862: 286），来为其破坏行为寻找理由。如果他们自己对这样的理由也有所怀疑的话，还有其他一些自我安慰的办法。当莫吉牧师看到英国士兵放火烧毁圆明园中一处又一处楼台亭阁时，他的意志一时之间变得有些软弱。在这种时候，他就会想到被俘者被残害的尸体，所有的愧疚感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最会捕捉这种时刻的，或许是施文贺领事了。当看到大火翻卷成“荒诞奇异的五彩花饰”，“在皇家宫殿宏

① 吴士礼的引文见 Woseley [1862] 1972: 283；他的描述在 282 ~ 287 页。也见 Swinhoe 1861: 332 - 336；Graham 1901: 196；Walker 1894: 217 - 218。格雷厄姆和沃克提到的或许是碧云寺；见 Bredon 1931: 322 - 323。

② 额尔金曾经和克灵顿讨论过这种可能性，准备在必要时毁掉北京的宫殿；见 WO 8239。

伟的大门口做着最后的盘旋”的时候，当看到黑色的烟柱冲向天空，红色的火焰“嘶叫着，噼噼啪啪地响着，仿佛在庆祝它们带来的毁灭”的时候，施文贺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愉悦”和“内在的满足”：打击终于来临，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Swinhoe 1861：334 - 337）。

施文贺似乎在暗示，英国还能送给中国政府和北京居民比这更为有力的信息吗？如果还有人英国人实现自己目标的认真精神和坚强决心仍然表示怀疑的话，那么，证据就图画般地展现在那儿，在那笼罩天空的浓烟和燃烧物的余烬之中。它们悬浮在圆明园上空，遮蔽住太阳，使整个大地一片阴暗，然后又慢慢地随风飘散，像雪花一样洒落在北京城中 [Loch (1869) 1900：170]。如果北京居民能感受到英国这一严厉得令人生畏的正义的话，那么“这一罪行那些背信弃义而又残忍的制造者和教唆者们”的感受就会更为深刻（Swinhoe 1861：337）。圆明园被破坏后的凄凉景象，能够让皇帝和他的官员们感觉到“他们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M’Ghee 1862：288）。吴士礼强调说，这是可以打击“清朝官员性格中的致命弱点”——傲慢的唯一办法 [Wolseley (1862) 1972：281]。

因此，英国方面的所有记载最后无一例外地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它们把疑虑撇在一边，忘掉或贬低被他们所毁掉的美丽景色，却发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们被迫犯下的那些罪行的真正制造者。对于那些心中可能还怀有不安的人，莫吉牧师已经为他们赦罪了。他写道，这些园林“一点残余”也没有留下，“干得很好”（M’Ghee 1862：288 - 289）。不会有任何道歉，也不会有任何悔恨，给未来开创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先例。

最重要的课业：条约签署仪式

圆明园被毁掉以后，就可以着手解决这次军事远征的主要目



的——批准《天津条约》了。条约签署仪式于1860年10月24日在北京城内举行，并且与欧美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使用的程序相一致。但是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从额尔金勋爵及其助手们明确地知道可以在北京举行签约仪式的那一刻起，直接对中国统治者进行再一次羞辱和教育的机会就出现了。这些行为的实施结束了这一时期的再疆界化，不过这一过程并不是民族国家统治权的表达，而是与之相对的帝国统治权的表达，它开启了清朝政权——尽管不是整个清帝国——的殖民化进程。

选 址

10月21日，巴夏礼、罗亨利和皇家龙骑兵的一小队士兵通过安定门进入北京城内，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举行条约签署仪式。他们沿着狭窄的街道来到城中心，在前门和天安门之间发现了一处比较开阔的地方。巴夏礼认定这里的建筑是清政府的“主要公共部门”，然后找到了礼部大堂，大堂大门上用中文写着“礼部”的字样^①。巴夏礼和罗亨利决定，这里是举行签约仪式的最佳场所。如果考虑到各种展示力量的宏大场面，考虑到英国领导者认为力量的表演在东方特别具有效力的话，那么巴夏礼能够找到并确认礼部大堂，就不仅仅是有点幸运而已。

作为语言学家，巴夏礼对清朝宫廷的语言和实践的微妙之处颇有领会。像其他英国人一样，他把这些微妙之处理解为力量和权威的表象或象征。事实上，他在职业生涯中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试图打破这些表面的东西，迫使清朝官员“面对真实”。现在巴夏礼终于有机会通过实例来说明表象和真实力量之间的区别，并且要在对中国官员而言充满象征性意义的地方来进行这种演示。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在巴夏礼和罗亨利为额尔金勋爵及其随员们在北京城内寻

^① 见 Swinhoe (1861: 346)，只有这一资料提到了这一点。

找下榻之处时，无疑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一次，他们似乎决心要在北京即刻解决“入城问题”——广州城的情形再也不能发生了。在发现远处一些大房子的屋顶并进行了询问以后，巴夏礼表示他们找到了奸诈的怡亲王的王府。他们在这座优雅的北京宅邸的房间和庭院中转了转，一致认为这里就是使团的理想驻节地 [Loch (1869) 1900: 172 - 172]。

在寻找房子的路上，巴夏礼和罗亨利遇到了一些清朝官员。他们感到这是进行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教育训导的大好机会，尤其是在签署条约的重要关头。在这些官员中，他们认出了刑部尚书。巴夏礼“让这群人大吃一惊”地用汉语讲话，在这群官员面前用“最严厉的言词谴责”了刑部尚书对他们使用的那些野蛮手段。当刑部尚书“仓促离去”的时候，巴夏礼警告他说：“一个人如果利用敌人的不幸对他进行人身污辱的话，他就丧失了每一个文明国家的尊重，应当被驱逐出正直人的社会。”据罗亨利说，剩下的那些人有些“开窍”，并且表现出了善意 [Loch (1869) 1900: 173 - 174]。

这两件事情——为某些规训教育活动选择合适的地点和即兴地当众羞辱一名中国官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两件事情都利用英国人自以为是地认定为“中国人性格”的某个特定方面而大做文章。第一件事情打击的是中国礼仪所谓的虚空无用，要用真正力量的展示来取而代之。第二件事情让傲慢却又虚弱的清朝官员去面对道德上的坚韧与勇敢，而当这两者与物质力量的明智运用结合起来时，就会制造出顺从。有关中国人性格的这种看法非常普遍。按照莫吉牧师的说法：“必须用相应的方式对付亚洲人的傲慢和过分的自信，如果你出于错误的礼貌向他做出很小的让步，他就会以为你是害怕和无能……你不得不再次去征服他，或者不去惹他” (M'Ghee 1862: 309)。当然，这是炮舰外交的又一个逻辑依据和辩护理由。

也可以把这些看法理解为欧美人某种根深蒂固的中国知识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中国人极其在意周围的人对他们的看法。就像一



代又一代欧美人通过阅读巴夏礼和满大人（或者英国语言学家与耆英）一类故事所了解到的，一个恰到好处的侮辱就能够使中国人“丢掉面子”——这个对中国人来说似乎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后面将会对这种“中国人性格”进行更为充分的讨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确实要把这一时期看做是英国人开始发现“面子”问题的时期，那就一定要记住当时的环境。保住面子和丢掉面子的现象是在征服、占领和蓄意羞辱的形势下发生的，在此后进行的活动中，这一点始终都是贯穿英国人精心设计的表演的重要特征。

准备工作

现在既然已经为签约仪式选好了恰当的场所，额尔金勋爵的助手们就该着手做必要的准备了。比方说，进行签约的房间的布置，一定要能够表明签约双方的“平等”。另外还要确定程序，审查各种文件和全权证书，而且因为有传言说礼部大堂里埋放了地雷，还必须仔细检查整座房子。当吴士礼上校和一些皇家工兵检查大堂的时候，额尔金勋爵手下高明的语言学家巴夏礼和威妥玛开始安排“各项礼节”（Swinhoe 1861：344；Wolseley 1904：84），其中包括大堂中座位的安排。

像北京的其他大堂一样，礼部大堂也是长方形的，其上首和靠里的部分位于较长的后墙，大门则面向南方。根据礼仪手册，如果参加典礼的人中有外国使节，外国使节及其随行人员就被安排在大堂东侧就座，而清朝官员则位于他们对面，在大堂西侧依次排列。大堂内侧中央安放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皇帝的谕旨和外国使节的国书^①。不知道巴夏礼和威妥玛是否了解这一具体规定，他们把桌椅并排放置在大堂内的上首，额尔金勋爵与恭亲王将坐在这里签约，双方都面对大门，也就是南门。此外，他们似乎保留了清朝的大堂次

^① 见《大清通礼》的翻译，见 Hevia 1996：478。

序，把额尔金勋爵安排在东侧，恭亲王在西侧。但是，由于现存的记载都将英方参加者的位置说成“上位”，它们很可能把这样的座次安排解释为对清帝国某种权力形式的盗借 [Loch (1869) 1900: 178; Knollys 1894: 92; Swinhoe 1861: 346]。

进入北京

或许是由于炸弹的威胁和人们普遍担心有人可能会制造其他的破坏活动，英国领导者们决定让陆军第二师指挥官内皮尔将军在安定门到礼部大堂沿路安设卫兵。10月24日，星期三，午后不久，英国使节进入了北京。罗亨利详细描述了这一场面，而《伦敦图片新闻》则根据他的描述创作（和再创作）了一幅全景速写图^①：“[额尔金勋爵]……坐在一个由16名身穿皇家深红色制服的中国人抬着的国轿上，护卫着他的是600名士兵和100名军官。一队骑兵在前面开路，后面是步兵，获准出席仪式的军官们紧随其后。他们后面是总司令部的参谋人员，接着是总司令和他的私人参谋。在克灵顿爵士大约30码后面是额尔金勋爵，他那匹装着马鞍的坐骑跟在他的轿子后面，使节的两侧走着使团的其他成员。队伍的最后是一个步兵小分队” [Loch (1869) 1900: 177,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②

当这支队伍走进礼部大门时，排列在前庭的军乐队奏起了“天佑女王”。额尔金走下轿子，恭亲王走上前来向他表示问候。

签约仪式

额尔金勋爵和恭亲王进入大堂后在各自位置上落座，然后互换

① *ILN*, 5 January 1861: 20-21; Cameron 1970: 357; Hibbert 1970 第270页后的插图。

② 或许由巴夏礼和威妥玛选择了这顶“国轿”。从速写图看，它好像是一顶四周封闭的轿子。见 *ILN*, 5 January 1861: 20-21; 也见比钦著作 (Beeching 1975) 第192-193页之间名为“1860年额尔金勋爵正式进入北京”的插图。



国书并进行审阅。双方都出示了授权他们可以代表各自君主签署条约的文件。对恭亲王而言，这意味着他得到了皇帝的允许，可以在文件上盖下帝国的印玺。在仔细审查并接受了对方被授予全权的文件之后，双方签订了《北京条约》，并相互交换了《天津条约》。按照正常的国与国关系，这样做已经足够了，但根据各种记载，英国还向清政府提出了其他几项要求。英方要求恭亲王签署一份《天津条约》已经完全生效并已经加盖国玺的声明，以表明皇帝接受了条约中的所有条款。提出这一要求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下一个要求：要求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公布条约。由巴夏礼和威妥玛于11月7日翻译完成的条约译文，印刷以后立即在北京张贴了出来 [Loch (1869) 1900: 178 - 179]。

签约仪式结束后，英方决定用一种非同寻常的新技术来留住这一时刻。远征军到达大沽以后就一直随军的贝亚托 (Felice Beato) 是一名意大利摄影师，他这时架起了被克灵顿将军称为“魔鬼似的机器”。这架机器的出现似乎吓坏了恭亲王，他看到这一装置——克灵顿说它像座迫击炮——以后，“神情恐惧，面如死灰”，额尔金勋爵连忙向他保证不会有任何危险 (Knollys 1874: 192)。然而，让英国人也让后人深感不幸的是，由于礼部大堂中的光线不足，贝亚托的照片未能拍摄出来^①。在这之后，额尔金勋爵起身告辞。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恭亲王一直把他送到大堂前的台阶上 [Loch (1869) 1900: 179]，可以说是实行了《天津条约》第五款中规定的“完全平等”^②。

这样，大英帝国和中华帝国之间在交往形式问题上的斗争终于宣告结束。这一斗争自1793年英国第一次派出使节开始，中经阿美士德勋爵和律劳卑勋爵命运多舛的使命，到英国第三次侵略中国

① 关于贝亚托及其摄影，见 D. Harris 1999。

② Mayers [1877] 1966: 12。条约第三款、第七款中提到了交往中的平等地位，只是没有“完全”一词。

时达到了顶点。对中英关系这段历史肯定十分清楚的罗亨利，显然认为完全有理由把《北京条约》的签订和《天津条约》的批准看做是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他写道：“就这样，这一事件令人愉快地结束了。无论是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它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把4亿人引进了国际大家庭”[Loch (1869) 1900: 180]。

不过，尽管英军领导层认为这些事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即使不是蔑视也是嘲笑他们被迫与之打交道的清朝官员的潜在倾向。例如，施文贺领事就说恭亲王“看上去像具僵尸”，并注意到他在仪式举行过程中“胆怯的、阴郁的样子”和“没好气的”回答，而他的随从们则“穿得又脏又差”（Swinhoe 1861: 348）。莫吉牧师也提到了恭亲王“阴郁的尊严”，并厌恶地注意到他那群仆从们“非常不整洁”（M'Ghee 1862: 309）。如果说清朝官员的外表让在场的英国人感到某种程度的反感，那么礼部大堂本身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如施文贺所说，这个地方“有着北京成千上万的其他公共建筑共有的长久失修和腐朽的痕迹，从没有天花板的屋顶上悬垂下来的帷幔质地粗劣而且已经褪了颜色”（Swinhoe 1861: 348）。但是对清朝官员和整个仪式最敞露心扉的不屑表示或许来自格雷厄姆少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旁遮普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会见厅，那些中国人看上去就像是一群老太太，只是前额没有头发而已”（Graham 1901: 195）。

对清朝官员和官府建筑做出这类刻画并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但是它们确实指出了这场斗争一个意料之外的成果。中国并不符合一个关于东方的支配性想象：东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然而，即使英国的领导者当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也并未把它作为一个问题记录下来。更为重要的是为了不远的将来，检验一下清朝领导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额尔金的训育。签约仪式结束几天以后，额尔金在他强占的新住处怡亲王府邸中，会见了恭亲王，并且进行了一次令



人满意的会谈。会议结束时，贝亚托给恭亲王照了相。这一次光线充足。从拍出来的照片上看，恭亲王脸上的表情即使不能说是阴郁，也带有某种程度的惶恐。但这也许是那架“魔鬼似的机器”对他仍有些作用，因为额尔金勋爵几天以后进行回访时，就发现恭亲王变得坦诚直率，几乎没有任何一点额尔金认为其他清朝官员在跟外国人讲话时所普遍怀有的那种恐惧感。额尔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迹象，但他还是想在离开北京前再进行一次教训，给他的使命写上最后的一笔。

1860年11月8日，额尔金勋爵的弟弟、驻华公使普鲁斯抵达北京。额尔金立刻安排他与恭亲王会见。在会见时，额尔金不仅将火炬传递给了弟弟，而且是通过一种能让恭亲王理解为正规外交程序的方式来完成了这一传递。会见开始以后，额尔金让巴夏礼解释说，“在英国，代表君主的那个人……地位总是要高于其他所有人”，现在既然额尔金的在华任务已经完成，普鲁斯就将占据这一位置。因此，额尔金要在这一时刻让出他坐着的上位。接着，他站起来，跟他弟弟交换了座位，从而确立普鲁斯为清朝政府今后将与之交涉的那个主权者男性主体。

第二天，恭亲王来到英国使馆，额尔金让普鲁斯接待了他。恭亲王现在显然已经熟悉了这种“普世的”外交形式，与英国驻华公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长谈^①。额尔金对自己的帝国杰作十分满意，于当天离开北京返回英国。

伦敦的演出

在帝国的中心，战争结束和条约签署的消息连同相关的图画出现在1月的《伦敦图片新闻》上。1861年1月19日发行的一期报纸，提供了关于英帝国战胜清帝国的或许最为简明的报道。报纸头版刊登了一幅素描，上面画着一大群中国人在观看墙上贴着的

^① 本段及前一段引自 Walrond 1872: 370 - 371。

“北京的条约”（图片 10）。据该报报道，北京全城贴满了条约的抄写本，“成群的惊异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国家这样屈尊俯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后不久，结束了工作的额尔金勋爵带着“最诚挚的尊敬与友善”与恭亲王道别。在他看来，亲王已经克服了“他的忧郁心情，显得十分愉快，展示了他性格中可以教育的和驯顺的一面（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图片 10 北京居民阅读条约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9 January 1861.

就在这则有关中国报道的下面，是一条来自印度的消息。那是一篇有关生产新的印度硬币的通告。随着印度 1857 年叛乱之后“东印度公司权威的终结”，这一举措显得十分必要。新硬币刻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字样和女王的头像（*ILN*, 19 January 1861: 63 - 64）。现在，大英帝国支配下的世界和平已经从南亚次大陆延伸到了中国的东海岸，而大英帝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牢固。

第二部分

在中国重建疆界，1861~1900年

导 语

1860年的和议为在清代中国建立新秩序提供了一个示意性框架。西方列强的代表们再也不必居住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地方，也不必再需要完全通过省级官员或者其他中间人来与清廷进行交涉了。欧美外交官驻节北京这样一种被认为是和清朝与其邻国的“朝贡”关系互相独立并且完全不同的制度，为西方外交官们在中国统治者与他们在欧洲、北美的政府之间建立起直接而畅通的联系提供了机会。另外，这样的联系现在是通过一个全新的清朝机构——总理衙门来进行的。很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这样一个开端，英国驻华使节保留了特命全权公使的头衔，目的是要使清政府明白，英国公使和额尔金一样，无须与英国政府咨商便可以当场做出决定。

然而，欧美这种权力的取得是建立在一个奇特的假定之上的：主权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武力强行取得的，其结果对双方都会有利。无论如何，英国官员们相信，只要有了“平等”，清朝精英阶层就会出现，并且会在英国善意的教导下，开始采用外国经验来使清王朝变得强大。他们将会学会如何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算

计，并且会按国际强权政治的规则行事。在此后的 40 多年中，英国外交官所提出的政策和倡议，都是以这些想象中的中国精英分子们的预期行动为前提的。与此同时，英国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如果想要改造中国的统治阶级，他们不仅需要对中国内地进行考察，绘制出它的地图，而且需要研究中国那庞大的帝国档案。

第二部分探讨的是欧美在中国的帝国教程和知识生产。第六章把中国发生的事件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全球权力关系在不断变动，由技术和工业发展引发的去疆界化开创了欧美帝国扩张的新时代，并且最终导致了几乎整个非洲和大部分印度洋地区的殖民化。不过，在此之前，第五章先要探讨新的中国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再疆界化手段的新应用，然后再通过考察清政府按照欧美民族国家模式改造自身的各项活动，来审视这些再疆界化机制的效果^①。

^① 对清朝改革活动更全面的研究，见 Hsu 1990：295 - 386；Wakeman 1975。

第四章

构建新秩序

英国维持其在亚洲的统治地位，不只是简单地依靠对领土的控制或者技术手段，还依靠关于帝国统治下各民族各方面知识的不断积累（Thomas Richards 1992：28）。这一信息帝国的生产者是一些实地工作的人，他们观察当地人民，测量绘制有关地域的地图，对本土制度进行解码，生产出新的知识体。通过这些“调研步骤”（Cohn 1996：5 - 11；Anderson 1983：163 - 185）以及信息加工、比照、分类和存储的一系列例行工作，殖民者建立起了一个帝国档案，一个能够把帝国领地变为殖民领地——用来掠夺其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可以管理的政治实体——的帝国档案^①。对管理者的档案活动进行补充的，是一些同样参与实用知识生产的辅助性机构。在东方，这些机构包括皇家亚细亚文会的各个分会以及一些出版社，它们出版的书刊包含了对当地风土人情以及各种器物的文字描述和视觉记录。

情报一旦被收集起来，就不仅仅存储在当地，而且要从英帝国

^① 有关印度信息收集工作的研究，见 Bayly 1996。有关 19 世纪信息时代的概括性论述，见 Headrick 2000。

的边缘传送到帝国中心的档案储存库，譬如外交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皇家地理学会以及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在这些地方，信息要么被检索出来立即付诸使用，要么被分类存储以备将来查询^①。这些今天看来似乎司空见惯的程序，在19世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殖民地和帝国边缘地区进行的级联式的文书工作，确实生产出了许多全新的研究对象，供人们进行分析、分类和比较。

在北京和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这一生产过程的影响相当深远：它生产出一个新的“中国”。换句话说，欧美人1900年所思考的和所要对之发挥作用的中国，已经不是额尔金勋爵1860年曾经思考过的那个中国了。中国并不仅仅是内部发生了变化，而且通过19世纪下半叶不断进行的文书工作，对于19世纪末的外国观察者们来说，中国这一名称所代表的已经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客观“事实”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官僚机构对信息的日常收集、处理和存储怎么能够产生出一个新的中国？这些问题值得进行详细探讨，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在直到20世纪以后的时期内，欧美人在如何影响中国和中国人这一问题上的一些本质性变化。

从文书工作到帝国档案

除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特例以外（Guha [1981] 1996；Cohn 1987, 1996；Bayly 1996），制造和维持英帝国的实际的官僚工作——文书工作，而不是官僚政治理论或者官僚结构——几乎没有得到学者的关注。但是，正如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文书的传移”是我们这个世界中“基本权力的来源”。那么，为什么帝国的文书工作很少有人研究呢？在拉图尔看来，它之所以“没有

^① 关于英国外交部信息分类形式的讨论，见 Ward and Gooch 1923, : 590 - 591。



受到注意”，主要是因为“人们忽略了它的物质性”（Latour 1990: 55）。在研究17世纪以来欧洲在全球的扩张时，拉图尔发现欧洲探险家和殖民机构保存的记录提供了可供分析的对象，他指的是不同的民族、地方、器物以及商品等。此外，纸上的迹痕——图片、文本、数字和符号——被添加到他者的物质世界中，沿着欧洲的通讯网络传播，最终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联结到各个收藏中心。在这些中心，实地工作者的铭写符号让那些一直十分遥远的模糊事物清晰地展现在规划和管理人员眼前^①。

拉图尔将这些传播着的铭写符号称为“不变的流动体”，这一名称抓住了对产生于帝国网络的这一知识论客体的两个关键性理解。铭写符号是不可改变的，首先是因为它们在传播过程中不会改变其特性，也不会退化，其次是因为它们能产生视觉的一致性。也就是说，铭写符号能够看得见，可以解读，而且还可以调整其大小，使之能和二维平面上同样构建的其他事物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例子有墨卡托投影地图、包含人口统计数据的图表、商业报告以及有关博物学和人类行为的各种记录。由于现实世界中真实的主体和客体被转换到一个平面上，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放大或者缩小，现在就能够通过有限的几种再现方式——英语描述性语句、统计数据、图表及地图——来操控这些铭写符号，使它们在视觉上相互一致。一旦按照适当的比例把图片、数字和描述安排到同一个平面上，这些不变的东西就能变成可以流动的事物。遥远的东西能在纸上被传送到其他地方，在那里，它们又能让一个人拿在手中，浏览、复制，以很小的花费在帝国网络中传移。随着16世纪以来帝国技术的发展，已经有可能获取此时此地的一些事例，并把它们那些有用的方面传移到彼时彼地。在它们到达的地方或者收藏点，人

^① 在网络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拉图尔参考了 Deleuze and Guattari 1983。进一步的讨论见 Latour 1993。

们就可以根据不断积累起来的信息来规划工作，分派人力。同时，信息的积累也使得权威聚合在那些收藏有许多不变的流动体的地方（Latour 1990：26 - 35，55）。

然而，欧洲档案中不变的流动体的收藏，本身并不能充分地解释小规模铭写活动如何能够导致大规模的统治。这些收藏要在帝国计划和殖民计划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让政策的制定者们能够很容易地使用它们。视觉一致性使得这些收藏可以被加以概括，相互参照，并且进一步缩小规模。把文书归档形成卷宗，还生产出有关卷宗的文件〔拉图尔所谓的级联（Latour 1990：40）〕——索引、目录、书目、书目的书目，从而把卷帙浩繁的文书的规模变小，并且从中得到“更为可靠的事实”。这样，就能通过越来越少的人来控制处理更多的信息。拉图尔把进行这种概括的地方称为“计算中心”（Latour 1990：59）。在这里，制图师、商人、工程师、司法人员和政府雇员们对各种铭写符号进行叠置、再传移、再组合和进一步概括，然后再把它们存储起来以备将来使用。拉图尔执著地追踪和分析这些铭写过程，表现出一些极有意义的特色。首先，拉图尔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理解官僚机制的值得欢迎的方向，它使我们从黑格尔（Hegel）和韦伯（Weber）的“理性化心智”转向文档本身。同样重要的是，他拒绝把精神从物质中分离出去，从而使他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文档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现象”，一个隐藏在那些被强迫提取出铭写符号的人们背后的现象（Latour 1990：60）。

拉图尔的研究把认知过程重新定义为物质性实践，引导人们去注意档案中认知对象的装配性，并且表明知识论和档案的结合将产生出一个新权威。这一研究与最近有关殖民主义的批评性学术观点在某些方面相互吻合，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或许就足够了。斯匹瓦克（Gayatri Spivak 1985）在讨论英国在印度的行政管理时，也对西方档案的知识论地位提出怀疑。她不仅对英国收集印度信息的活动感



兴趣，也关注印度再疆界化的各种方式。她考察了英国的铭写活动是怎样通过一些实际手段将印度殖民化和改变印度的——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对 1861 年以后的中国十分重要的同样一个过程。

为了在次大陆上有效地发挥作用，英国不得不用一个外来的编码网络来覆盖整个印度，以便收集可以作为信息进行处理并用来管理印度本土的东西。例如，英国行政当局想征收农业税，就把复杂的土地使用权转变成私有财产权，然后运用一套司法体系来强制实行这种私有财产权（Cohn 1987：463 - 482；Mani 1985）。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人不仅为了进行计算而对土地登记造册，而且还制造出一个新的印度现实。拉图尔指出的“彻头彻尾的新现象”，实际上是铭写—档案工程的精妙产品，而不是先前的“外国”现实未经变化的再现。支持这类对印度现实的解读——或者更正确地说是“误读”——的，是这样—一个虚构：东印度公司机构的再现机制（即它们对印度的解码）与被再现的事物之间完全相互吻合。斯皮瓦克论证说，把殖民当局的虚构误读为印度的现实，生产出一系列“真实效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印度”这一名称本身了（Spivak 1985，特别是 129 页）。

如果把拉图尔和斯皮瓦克关于帝国档案的知识论地位的评论，理解为对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过程以及对亚洲和非洲进行解码和重建秩序的过程的评论的话，它们就表明，在这些过程中使用的机构连同它们生产的产品，与欧洲人自 17 世纪以来冒险侵入的人文环境和物质环境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实际的吻合。它们也表明，可以通过虚构两者已经吻合得相当密切，或者虚构编码程序的真实效果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描述并构建出了一个“停滞”的亚洲和一个“原始”的非洲，来使档案工程中的这种脱节被忽略。托马斯·理查兹（Thomas Richards）认为，各种各样的“真实效果”哺育并产生出一个帝国的虚幻想象，把帝国档案设想为知识与国家之间的界面。然后，这一虚幻想象又把信息搜集（有关其他民族的百科

全书式的知识) 与英国的世界领先地位联系在一起。理查兹论证说, 由于被理解为一个界面, “与其说档案是一种特殊机构, 不如说是一个代表帝国疆域内各种知识的完整的知识论综合体” (Richards 1992: 14)。

正是这一知识论综合体, 这个有着不变的流动体、有着能够产生并传递信息的网络、有着它创造出来的一系列为异域的他者编目分类的特定名称、有着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同化他者的能力的知识论综合体, 对于理解 1860 年以后强加给中国的新秩序的性质,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 拉图尔、斯皮瓦克和理查兹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综合体, 从而将注意力从真实物体和再现物之间的关系, 从殖民历史的道德矛盾, 转向那些物质性活动——人口普查、地图测绘、民族志和博物学的撰写以及这些形态各异的铭写载体的收集和编目。帝国的知识论综合体的运作, 就是通过这些活动才得以进行的。

在考察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官和小说家们那些看上去似乎完全不同类型的各种活动——从对殖民地人民的直接管理直到帝国边缘那些不太正式的手段——的时候, 对英帝国档案的这种理解似乎特别有用。用另外一种方式说, 当重心转向知识论问题——当然也应该包括翻译问题在内——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不必依靠诸如完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这样一些定量的范畴^①, 就可以把英国在华行动和它在非洲、东南亚、印度和中亚的活动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同时, 就像欧洲发动的殖民化过程中那些比较著名的例证一样, 以知识论为重心让我们注意到, 中国也有其文书传移者, 他们也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收藏, 收藏那些可与虚构故事相媲美的事实, 并且以整个知识的幻想来支撑这些铭写符号的

^① 半殖民地是自孙中山开始在中国使用的一个术语, 非正式帝国是英国通常使用的术语; 最近的例子见 Atkins 1995; Bickers 1999。



收藏。英国对中国真实的“误读”，不仅产生出一个像中国一样的特定名称——“黄祸”以及傅满洲等虚构的人物（见本书第九章），还推动了英俄两国完全无视清朝在中亚的存在和利益的大博弈的开展。同样有意义的是，每一个这类特定名称的具体特性，都可以被理解为英帝国档案的解码机制和秩序重建机制作用的结果。

将中国解码与实用知识的积累

要理解英国在华代理人所使用的解码程序，就应该提醒我们自己，这一过程的参与者没有一个是完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过受聘于明清宫廷的天主教传教士^①，通过在中国东部沿海有限几个口岸做生意的商人（参见 Morse 1926 - 29），通过派到北京宫廷的外交使团成员（Hevia 1995a: 1 - 22），欧洲已经积累起了相当数量的中国知识。到19世纪，这类知识便被一些以18世纪末库克远航太平洋的方法为模式的更为科学的形式所取代。据马绍尔（Marshall）和威廉斯（Williams）研究，“测量法、统计学、温度测计、动植物标本、或者严密的规划等精确的经验知识”这时已经被认为要比研究亚洲和欧洲社会之间的异同更有价值（Marshall and Williams 1982: 70, 83；有关中国的内容见 45 - 61, 78 - 98）。

到19世纪30年代时，在商用辞书和皇家学会的出版物中，已经牢固地确立了生产实用的经验知识的倾向。在中国，数量越来越多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成为英国人努力将知识纳入到一个新的经验主义范畴的先驱。这些人从19世纪20年代

^① 见 Jensen 1997，尤其是有关传教士在把重要的汉语文本翻译成欧洲语言中的作用的研究。如果没有耶稣会士对中国知识的贡献，就很难想象人们会把那件物品认作“孔子的头骨”。

起，就在广州的中国教师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他们编写语法书、字音表和字典，并且把《圣经》译成汉语，把清朝法典译成英文。此外，他们还出版了一份月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它的编辑者们仿效皇家亚细亚文会在孟加拉出版的刊物的模式，试图通过广泛吸取汉语资料的方式，用更为精确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形态，来取代此前那些中国记载生产出的因为不够科学而受到怀疑的知识。尽管他们并不期望发现可以和西方的艺术、科学或《圣经》相抗衡的中文资料，但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中国巨大的可资利用的文字传统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切入点，可以通过它来理解这个世界上现存最古老帝国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①。这样，另一种档案，即有关中国的异域档案，就可以成为传教士知识论工程中一种极有价值的工具。这样的主张一直贯穿在整个19世纪，成为所有追随这些先驱者的人们所遵循的一项基本组织原则。

不过，当《中国丛报》1832年刚开始创办时，它的编辑们构思的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受到清政府政策的阻碍。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改变了这一局面。随着西方势力以“国际”法为坚强基础出现在通商口岸内外，收集和组织中国信息的新的的大好时机来到了。将中国解码的活动集中在英国驻北京使馆、帝国海关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东方学会和皇家亚细亚文会在北京和各通商口岸建立的分会等处。这些机构可以被看做信息收集的区域中心，它们按照各自的功能进行着专门的文书工作。使馆收集资料，就清政府适应国际关系“规范”的能力做出报告。帝国海关将中国的度量衡和货币解码，并且编制各通商口岸的欧美贸易的统计数字。和在其他地

^①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1 (May 1832): 1-5. 《中国丛报》在1832~1851年间出版，它刊载的文章涵盖清帝国的地理、中国人文历史和博物学、语言文学、贸易商业、对外关系以及信仰等。此外，这份月刊还经常刊发一些文章讨论中国人的性格行为，讨论鸦片贸易以及鸦片消费的影响等。



方一样，英国国民也在中国制造出不变的流动体，并且发明了许多更有效地为中國信息编制索引的方法。

外交使团和新的中国知识

知识生产的最重要处所之一是驻北京使馆本身。在这里，额尔金勋爵的语言学家威妥玛爵士和其他人一起对中国资料进行研究，进行着一项知识论工程，使人们对此前中国与其邻国的外交活动和贸易交换产生了新的理解。威妥玛是参与1861年创建使馆的人之一，于1871年起担任驻华公使，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883年退休。在中国期间，他建立起一个相当规模的图书馆，收藏有汉文、满文和蒙古文的图书883种4304卷，其中有一些很可能是在劫掠圆明园过程中搜集到的^①。这些图书不仅是威妥玛同清朝官员进行谈判时极其有用的工具，也是他在中国和英国进行培训工作时的重要助手，同时也为汉语图书的其他收藏树立了一个样板。威妥玛从外交使团退休后，接受了剑桥大学第一任汉语教授的位置，他的图书则成了剑桥大学远东图书收藏的基础。

威妥玛把他的藏书分成8部分：（1）经典和哲学；（2）历史、传记、律法；（3）地理、旅游；（4）诗歌、小说、戏剧；（5）词典、工具书；（6）杂类，包括一些基督教布道书的中译本；（7）宗教、科学；（8）满文、蒙古文图书。他的藏书包括了所有重要的礼仪书；对这类典籍和其他经典文献的许多注疏训诂；各种不同版本的《礼部则例》和《大清通礼》；还有一些字典——汉文、满文、蒙古文字典；按分类、韵部、部首组织的各种语词检索书；清朝所有重要的百科全书式的图书；《清会典》和《清会典事例》；完整的历朝历史；《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各种历史考证著作；清

^① 波蒂埃（Pauthier 1861：366）称，威妥玛在劫掠中挑选了许多经典书籍运送回大英博物馆。感谢查耶特（Ann Chayet）让我注意到了这篇文章。

宫收藏的地理类图书和有关中亚的记述，其中包括乾隆皇帝的西藏、土耳其斯坦及俄国方面的专家，也就是马戛尔尼勋爵 1793 年访华时感到很投契的那位“鞑靼”官员松筠（Cranmer-Byng 1963：162 - 163）撰写的《新疆事略》^①；中国经典和有关中亚诸国情形的《异域录》的满文译本；清朝宫廷中的杰出人物的传记、回忆录和著作；北京历史；清帝国边疆地区的地名辞典；甚至还有西方科学和数学的翻译著作^②。

实际上，威妥玛的图书确实是非同寻常的收藏。翟理思（Herbert Giles）称其为“一个综合性的图书馆，非常适合一般学生的需要”（Giles 1898：vi-vii）。另外，19世纪90年代初担任清朝驻英国公使的薛福成在看到剑桥大学的藏书之后说，这些图书不仅“引人注目”，而且其中有很多罕见的珍本，特别是由于19世纪中期太平军在长江流域毁坏了一些著名的图书收藏（Chien 1993：77），加上英国远征军在圆明园进行的破坏，使这些图书的价值显得更为珍贵。

除了他的图书以外，威妥玛还通过其他方式加速了信息搜集的进程。例如，他为汉语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编纂语法书和字音表，用来为英国培养精通汉语的新骨干。这些被称为“学生一译员”的人学习中国官场上使用的北方话，钻研清帝国的交际方式，研究使馆和总理衙门之间的交涉，初步熟悉当地的文化。课程包括为每一名学生配备一位中国教师，辅导他们练习口语，并在课堂上学习文字材料。在这方面，学习的课程有威妥玛自己编写的外交汉语教科书《自迩集》——用威妥玛的拼音法（见下文）标注为罗马拼音 *Tzu-érh Chi*^③、《京报》以及《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一

① 一般认为《新疆事略》的作者为徐松，由松筠奏进给乾隆皇帝。——译者

② 在后来许多年里，形形色色的捐赠者为威妥玛的藏书增加了许多新资料。

③ 原稿以《闻见自迩集》为名于1867年在伦敦出版，其缩印本后来由一家新的中国知识的重要出版者上海别发印字房再版。



类小说和历史书。^① 培训完成以后，这些精通汉语的人就被派往中国各地的英国外交机构，在那里，他们利用所学到的语言技能来执行政策，撰写有用的、能够提供各种信息的报告。

艺术史与市场

在这些新形式的知识与训练出现的同时，也衍生出一些分析对象，它们把知识、市场、历史和作为生产和收藏场所的使馆联结在一起，将进行解码操作的网络延伸到其他方向。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有关 1860 年圆明园劫掠物品一类物品的新知识的生产。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北京和 1860 年以后新开辟的通商口岸中生活的欧美人社群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高质量的古玩珍宝。如前所述，使馆医师芮尼曾报告说，几乎在英国使馆 1861 年在北京开馆的同时，当地市场上就出现了圆明园的珍宝，另外还有一些商贩和王公贵族带着一些精美物品来到使馆门前出卖。与珍宝古玩的这样一种接触似乎激发起了使馆人员的兴趣，在以后 30 多年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发表了文章，通过魔力般的正面的知识生产，将中国物品从古玩转变为精美艺术品^②。使馆官员们撰写了好几部这一类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卜士礼 (Stephen W. Bushell) 的作品。

卜士礼 1868 ~ 1900 年间在英国驻北京使馆担任医师，在这期

① 有关使馆的日常工作和培训计划的研究极少，我在这里引用的是少数几种第一手记载中的一种：《一名学生翻译》(A Student Interpreter 1885: 58 - 103)，这一章的题目为“教师和传授”。

② 这些论著包括朱利昂 (Stanislas Julien) 的《中国陶瓷制造历史》(1856, 《陶录》的翻译本); 萨特尔 (Octave Du Sartel) 的《中国瓷器》(1881), 帕莱奥洛 (Georges Paleologue) 的《中国艺术》(1887), 夏德 (Friedrich Hirth) 的《古代陶瓷》(1888); 贺璧理 (Alfred Hippisley) 的《中国瓷器目录》(1890, 为美国国家博物馆所作), 加兰迪迪尔 (Ernest Grandidier) 的《中国陶瓷器》(1894), 戈兰德 (W. G. Golland) 的《中国瓷器》(1898)。

间，他收集中国艺术品，并且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艺术品尤其是瓷器的论著。通过研究在北京所见到的瓷器以及对《陶说》一书的翻译^①，卜士礼图文并茂地解释了中国瓷器的生产过程、不同时期生产的不同瓷器品种、生产地点和不同朝代瓷器的特有形制风格。他还描述了可以更精确地确定生产时间的瓷器类型，列出了 105 种中文资料的书目，并且提供了瓷器底部的中文纪年的翻译。卜士礼的工作使得人们能够辨别出先前有关中国瓷器著述中的错误，挑选出某个时代最好的瓷器，同时根据中国资料和中国鉴赏家的口味对瓷器进行评价，给不同的瓷器类型附上英文名词或中文名词的翻译 [如 Bushell 1899, (1904) 1924, 1908; Bushell and Laffan (1904) 1907]。有史以来第一次，收藏者和拍卖行能够在比较坚实的基础上确定自己藏品的真实性。卜士礼一举改变了市场，因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把握来辨别赝品，使真品的价值得以实现。在 1897 ~ 1904 年间，卜士礼的分类法成为包括沃特和摩根收藏、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大英博物馆在内的一些公共收藏和私人收藏的标准。

在卜士礼及其使馆同事们为中国艺术品建构相关分类的同时，这类物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京和通商口岸的市场上。到 19 世纪 90 年代，或许在比这更早的时候，皇宫里的太监们开始从宫中带出一些珍宝到这些市场上出卖 [Simpson (1907) 1970: 384]，一些中国商人也像喝周末午茶一样准时地来到北京各国使馆门前出卖他们的物品。由于中国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使生活日益艰辛，收藏者被迫卖掉他们的珍宝，这就使得各种交易市场的货源源源不断。

此外，外国的艺术品商人也开始出现在北京和一些主要通商口岸，他们购买艺术品似乎请教过使馆里的专家们。当他们买到一些

^① 卜士礼于 1891 年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并在其他出版物当中使用了这一资料，但该书一直到他死后才于 1910 年出版；见 Bushell 1977。



有价值的藏品时，欧洲和美国市场上就会出现一些新门类的物品。这类物品出口的数量相当大，以至于斯基德摩尔（Eliza Skidmore）在1899年第七次到中国的时候说，游客们最好不要指望在中国市场上找到有价值的古董了，因为最好的东西都在伦敦、巴黎、德累斯顿、柏林、魏玛、纽约和巴尔的摩出售，而不是在北京（Skidmore 1900: 197, 200）。

在此同时，随着中国市场的这些变化把中国艺术品与欧洲和北美的城市联系在一起，在这同样一些地方流通着的圆明园劫掠物品似乎也改变了欧美鉴赏家对中国物品的态度^①。这方面一个有记录的事例来自美国收藏者比肖普（Heber Bishop）。根据他请卜士礼为他的一部有关玉石的论著撰写的前言中所说，比肖普是在见到一件来自圆明园的乾隆时代的雕花玉器后开始对收集玉器产生兴趣的。后来，他在欧洲见到了这件玉器，就把它和其他几件器物一起买了下来。他把欧洲市场的有关器物购买净尽以后，又来到了北京，在那儿遇到了卜士礼，并且买了不少器物，其中包括古董商们应宫廷太监要求为慈禧太后庆贺诞辰而购买的一大批玉器^②。比肖普的故事不仅可以作为对中国艺术品产生新兴趣的最初事例，也表明了新知识在19世纪末是如何与市场 and 欲求结合起来的。

这种变化的发生，与东亚、欧洲和北美洲等地新出现的一些有关中国艺术品知识的生产场所和流通场所有关，也与中国的去疆界化为那些投机性的收藏者们提供了大量机会有关。这些新场所新机会不仅包括公共博物馆和国际博览会的常规展览，也包括私人收藏

① 提出这一论点的是库克斯（Anna Cocks 1980）和皮尔斯（Nick Pearce）。尽管皮尔斯这方面的著作还没发表，但他最近一次在亚洲学者国际会议（1998）演讲时，再次提出这一观点。

② 见 Bishop 1900: xiii。斯基德摩尔（Skidmore 1900: 198 - 199）也提到这个故事，但没有谈及比肖普的名字。后来，这一故事似乎具有了某种传奇的色彩；见 Morrill 1926: 136 - 137。

的展出。比如在英国，伯林顿商行的艺术品俱乐部于 1878 年展出了中国瓷器，其后又在 1895 年和 1896 年举行了大规模的展览^①。

就这样，到 19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艺术品从北京和通商口岸流向欧洲及北美艺术品市场的渠道形成了；有关各种中国艺术品尤其是瓷器的标准化知识体系也建立起来了；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器物的权威人士和展示中国器物的场所也出现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发展，当收藏者与鉴赏家们在查阅新出现的书面资料的时候，或者利用各种机会参观中国艺术品的时候，已经不再把中国器物说成古玩玩了。

不过，在此同时，他们却可能像斯基德摩尔一样，幻想着自己如何才能得到这一类东西。比肖普几乎将北京市场上的玉器购买一空的行为，在 19 世纪末只是个别情况。斯基德摩尔相信还有数百件甚至数千件一流的艺术品仍然留在北京收藏者的手中，他们没有将这些物品拿到市场上来，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要卖掉它们。她论证说，只有“一些大的政治动荡、改朝换代或者对外战争造成对皇宫的又一次洗劫”，才有可能迫使这些收藏者回到市场上来 (Skidmore 1900: 196)。斯基德摩尔似乎很是期盼的那类事件在她写下这些话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这就是义和团起义，以及缔约列强作为报复而施加的严厉惩罚。

信息的标准化

随着各种各样的分类和编目活动扩充了帝国档案中国部分的内容，增加了政府、私人机构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在信息的组织方面也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其中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出现了许多用罗

^① 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 1878: 34, 36; 也见 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 1895, 1896。后两次展览得到芒克豪斯 (Cosmo Monkhouse) 的资助。芒克豪斯有关中国瓷器的著作由卜士礼作序。



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拼写方案。在这个问题上，以威妥玛为代表的外交使团又一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实际上，威妥玛至今最为出名的就是他在汉字拼音方面的成就——他在19世纪70年代为了将汉字注音标准化而设计的一个方案。此前的各种方案不仅杂乱无章，而且有些方案还试图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许多方言的不同发音表示出来。相反的，威妥玛拼音法是以清朝宫廷和官场使用的语言，即在西方被称为官话的中国北方的四声发音为基础编制的。后来经过翟理思修正，威妥玛—翟理思拼音法就成了整个英帝国和美国的标准，对于提高有关中国的不同形式信息的视觉一致性起了很大的作用。汉字拼音的规则统一使人们能够把字典、书目和传记词典结合起来，相互参照阅读^①。

拼音方式的标准化转而推动了其他一些将数据系统化的工作。举例来说，直到19世纪70年代，都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来翻译中国政府机构的名称和清朝官员的官职。英国驻北京使馆的梅辉立(William F. Mayers)编著出版了《中国政府》[Mayers (1877) 1970]一书，以消除这方面的混乱现象，促进翻译的一致性。该书以“预先考虑到中国政治机构的每一个细节并做出了规定”的《清会典》为依据，内容包括清朝政府每一级别的机构和官职名称的汉字及英文翻译^②。附录中还有英国使馆与总理衙门之间官方信件的形式，各种不同文件的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以及能在清朝文献资料中找到的欧洲人名衔的汉译。

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梅辉立还与德呢克(N. B. Dennys)、查理·金(Charles King)合作，编写了一本名为《中日商埠志》[Mayers et al. (1867) 1977]的指南。该书引人注目之处不仅在

① 近来，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已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的罗马化注音法——汉语拼音。

② 《清会典》是有关制度、官衔、法典的标准官方手册，每位清朝皇帝在位期间都进行编撰修订，不清楚梅辉立依据的是哪朝版本。

于它提供了商贸事务的具体细节，而且在于它也为普通旅行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通商口岸条目中除了有来自欧洲和北美的轮船时刻表，还有膳宿信息、食品价格、可以买到古董、古币以及“‘古玩艺术品’一类商品”的购物地、风景名胜、当地历史、城市地图、港口所在区域的地质、地理情况、货币、进出口统计数字和当地地名的汉字。实际上，这部书兼具商业字典、帝国海关统计表和旅游者指南的功能。它还包括一篇长达 26 页的有关中国的非语言学类著作的书目，其中包括英文的历史、游记、日记和 17 世纪以来的中文著作的英译本，或许可以说是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最早的综合性目录之一。

该书还用相当一部分篇幅记录北京的情况，提供了把 1860 年与 1900 年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作者首先展示了英法联军 1860 年占领清朝首都的路线，所依据的资料与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使用的相同。在追寻额尔金勋爵和英法远征军的足迹的时候，他们指出了大沽、天津、杨村、河西务、张家湾和通州等战场。至于北京，作者利用了一幅由俄国和法国的测绘人员在 1861 年和 1866 年间测绘完成的城市地图，也参考了此前一些有关中国的著作中的记录，以及 1861 年使馆建立以来出现的一些评述文章。这幅北京地图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把一个通过测绘技术制造出来的新真实覆盖到这个城市之上，而且还为北京的自然结构建立了基本的命名系统。他们看到北京城存在着三个分别被城墙包围着的部分，就把北面部分命名为“鞑靼”城，嵌套在它中间的部分是皇城或者“紫禁城”，而把南面的部分称为“汉人”城。这些名称被固定了下来。紫禁城、鞑靼城和汉人城不仅一直到 20 世纪都被欧美游客用来指称北京的主要区域，这些名称还形象地将有关中国的某些刻板的老调表现出来，尤其是那种似乎要使中国人和他们的统治者游离于世界进程之外并且带给他们错误的优越感的深拒固闭和孤立排外 [Mayers et al. (1867) 1977: 464 - 537]。因此，梅辉立、德呢克和查理·



金所做的努力，可能就代表着拉图尔在把不同的因素集聚起来进行结合、重组、概括，并在这一过程中制造出一个能有效地转变或者替代旧知识体的全新知识体的工程中，所看到的那种视觉一致性。

此外，一些担任领事的研究者还对他们前辈们的工作进行了更新和扩充。例如，白挨底（G. M. H. Playfair）对梅辉立的《中国政府》进行了修订，并于1897年出版了第三版。他在修订中采用了威妥玛拼音法，从而使这本书“符合了同一类有关中国的工具书的规范”[Mayers (1897) 1970: iv, ix]。白挨底对于视觉一致性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于1879年出版的《中国城镇》（1910年出版第二版）。这是一本地理词典，内容包括这些城镇的经纬度、它们在不同朝代的不同中文名称、它们的汉字以及相互参照。所有这些都用了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编了索引。白挨底这本书在毕瓯（Biot）此前的法语著作的基础上，还增添了《皇家亚细亚文会北中国分会报》上有关文章中的大量新地名。

还有一些领事在退出领事工作之后，利用他们所受到的语言训练和在中国工作时积累的经验，开始进行写作和教学。道格思（Robert Douglas）1858~1865年间在中国工作，之后返回英国，在伦敦国王学院教授汉语。从1892年起，他在大英图书馆任东方藏书及印本图书的保管人，并且参与编写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版的中国部分。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于1869~1871年间在北京担任学生一译员，后来在几个领事馆工作，一直到1895年退休。回到英国后，他在利物浦的学院和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教授中文。道格思和庄延龄都写过有关中国方面的书，在许多地方引用了前面讨论过的新资料^①，还把许多中国著作翻译成了英语。例如，庄延龄曾翻译了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的信件，一份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欧美人理解传统中国对外关系非常重要的文本

^① 可见 Douglas 1894，该书大量利用了《京报》的原始资料；也见 Parker 1901。

(Parker 1886; Hevia 1995b: 232, 238)。

进行这类活动的，还有根据 1860 年条约建立的一些新机构，帝国海关在这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设在上海的海关造册处统计编制通商口岸的贸易往来报告，一般有年报和十年报告。帝国海关创制了由其代理人填写此类信息的各种报表，并且还印制邮票，供它的分支机构——重新组建的帝国邮政局使用。

文法与历史

帝国海关的工作人员在改进海关本身所建立的关系网络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经发表过一本有关中国瓷器的著作的海关人员夏德 (Friedrich Hirth)，就编写过有关中文文书写作和帝国海关中文手续的教科书，通过报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指导，同时让他们接触刚刚出现的一些把中国市场和全球网络联结起来的新词汇^①。1909 年，曾经在各地海关担任过税务司并在北京海关学堂担任指导的邓罗 (C. H. Brewitt-Taylor)，对夏德教科书进行增补，编辑出版了第二版。海关人员还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历史和中西关系的颇具影响的著作。

美国人马士 (Hosea B. Morse) 1874 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就加入了帝国海关，他的经历表明了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制度性结构是怎样有效地生产出中国 1860 年以后的有意义的历史的。马士发表了许多有关欧美势力所创建的中国经济部门的文章，这些广为流传的文章后来概括在他所著的《中朝制度考》(Morse 1908) 一书中。该书把地图、统计表、海关文件与历史叙述结合在一起。马士还研究了中国的公行 (Morse 1909)、中国的货币及度量衡 [Morse (1905) 1907]。最后这部有关货币和度量衡的著作理清了地区间

^① 见 Hirth 1885 - 88。夏德是德国人，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中国研究方面的教授，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关于夏德，可参见 Fairbank et al. 1995。



的差异，为后来的“改革”——其中许多方面都是由中国人自己推行的——提供了基础。

离开帝国海关以后，马士将注意力转向另一类概括性工作，即中英关系的编年史。在名为《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1635 - 1834）》（Morse 1926 - 1929）的多卷本著作中，他利用东印度公司伦敦办公室中的大量手写对开本档案，将其内容缩减为便于阅读的五卷印刷本。第二部多卷本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orse 1910 - 18）对外交部档案、议会文件和回忆录进行了梳理，编写出与前书相同的概括性著作和小开本图书。为马士作传的费正清说，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创建了一个尽量准确一致的编年史”。事实上，马士的编年史成为一个国际标准，甚至冷战时代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反帝国主义历史学家也认为它是不可或缺的资料（Fairbank, Coolidge, and Smith 1995: 224, 226）。

作为这类生产知识和更好地把知识组织起来的许多工作的补充，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记述的出版物在鸦片战争之后也迅速增加。有些出版物最初是在上海皇家亚细亚文会——它有一个藏有很多有关中国的新旧图书的图书馆^①——召开的会议上所做的口头报告，最后被收入到该协会会报中。高第（Henri Cordier）曾经于1876年做过一个索引，明确了这类早期解码工作的范围。《皇家亚细亚文会北中国分会报》在《中国丛报》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大的扩充，充分利用了欧洲人现在可以深入了解清帝国的土地、人口和机构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在这一杂志出版的前20年里，它的文章包括中国法律、中国东部沿海的航海和气象观测、桑蚕和鸟类博物学、棉花和蔗糖生产、地质和矿藏情况、音乐、医疗和药品、地理（通

^① 它收藏有中文资料以及在华欧美人当时尚在写作中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其目录可见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以下简称 JNCBRAS）29（1894），30（1895），其目录单行本于1909年和1921年出版。

常是在中国内地旅行的第一手游记)、历史和传记、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古代碑刻的翻译以及中国人举止风俗的情况等诸多方面 (Cordier 1876)。在这些个人研究项目之外, 还有一些更为雄心勃勃的集体研究计划, 比如由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77 - 1912) 领导的有多位研究人员参加的地质勘察项目。随着中国档案规模的增大, 高第本人也热心于编制索引的工作, 最终编写出两套五卷本的有关西方人对中国和东南亚著述的书目。此外, 也有一些作者对他们以前的著述进行了修订和更新。

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就是为中国事物构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参考体系, 并且通过统一的术语和对中国名称与概念的标准化拼音而提高了这一体系的可读性。这些知识场效应使得人们可以在单部作品中进行统一的索引, 也可以对不同作者的作品进行相互参照, 还可以把越来越多的中文术语统一到一个既定的认知客体之中。到 19 世纪最后 10 年, 新知识与视觉一致性已经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 一个越来越多的讲英语和读英语的读者可以接近的中国, 一个由地图、统计数字和各种图表组织起来的中国, 一个填补了帝国档案分类系统中的空白——中国部的中国, 一个大大扩展了英国对中国的想象空间的中国。

现在既然有了一套统一的表示人们、地方和事物恰当名称的符号, 那么, 越来越多的远离中国的人们也就可以搜集到“真实”的信息, 并且可以对远东问题加以评论了。换句话说, 他们可以跟随明恩溥 (Arthur Smith) 进入中国乡村, 和他一道在《中国人的性格》(Arthur Smith 1894) 一书中思考中国的基本要素^①。他们也可以在韦尔斯·史密斯 (D. Warres Smith 1900) 描写当地情况和各种机构, 研究帝国海关的商业收入时, 和他一起来到欧洲人

^① 这一段中提到的作者的全部作品, 见参考书目。除了几个例外, 这些作品都出版于 1885 ~ 1900 年之间。



在中国通商口岸中的居住地。他们也能通过荣赫鹏 (Francis Younghusband [1910] 1985)^① 和柯乐洪 (A. R. Colquhoun 1900) 的第一手资料, 加入到中亚大博弈的浪漫历险之中。他们还能够追寻布尔格 (D. C. Boulger 1879, 1885) 和克劳斯 [Alexis Krausse (1899) 1973] ——他们对已发表的档案工程的各种概括性成果进行分析, 以揭露俄国在东亚的阴谋诡计, 并对中华帝国的状况做出评估——一类通过写作参加大博弈的人, 共同去思考远东问题。

远离中国的人们现在能够综合各种各样的信息, 并且能够像美国陆军部副官长办公室的无名作者们在 1900 年所做的那样, 编写出《中国手册》一类的东西。《中国手册》是义和团起义时为美国远征军准备的资料, 其中引用了上面提到过的许多作者的论著, 以及《1900 年香港指南》、《中国编年史与指南》、《1900 年政治家年鉴》、英国议会关于中国的文件、金奈尔 (James Ginnell) 关于中国铁路发展的报告^②和一些学术性杂志。这本有 90 页的小册子的内容包括有关人口和铁路的统计数字、码头和港口设施的描述以及中国北方重要城市之间的距离和它们的经纬度。书中还有有关清朝新式军队的条目, 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译自俄国的一份情报报告。另外, 书中还有北京和天津的地图以及从大沽到北京的路线图, 这份路线图中还详细标示出北河、以海边为起点的新铁路以及通往北京的大路和河道上的重要地点。这份路线图以美国的水文地理图为基础, 同时参考了贝勒 (Bretschneider) 的华北地图和“其他权威资料”, 比如英国人和法国人 1858 ~ 1860 年在这一地区进行战斗时

① 荣赫鹏不仅撰写有关中亚地缘政治的著作, 他还于 1904 年率领一支英军进入西藏, 原因是担心俄国提前进入该地区; 这次战役的记载见他的《印度与西藏》(Younghusband [1910] 1985)。

② 金奈尔的身份是中国铁路公司的地区工程师, 他 1898 年的报告是提交给伦敦的英中有限公司的; 见 U. S. War Department, Adjutant General's Office 1900: 26。

所绘制的地图^①。确切地讲，《中国手册》就是前面讨论过的不变的流动体和概括性知识（拉图尔所谓的级联）的集合。就这本书来说，副官长办公室有能力调动构成《中国手册》的各个离散元素，从而使得陆军部那些洞察一切的眼睛能够从远离现场的地方进行计划和部署行动，并且把行动所需要的信息传递到操作人员手中。

就这样，经过接近半个世纪专心致志的工作，欧美人现在已经可以将中国把握在他们的手掌上，仔细地审视它，声称已经理解了它，并且对其采取行动。一个异邦的帝国被解码、分类、概括，结果就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它。至于他们手中的中国究竟是哪种类型的中国，将在本书第五章末尾进行更加详细的探讨，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探讨这些活动在重塑中国以使之符合帝国的全球性规划方面，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后果。

在中国重建秩序

生产有关中国的新知识的能力，并非仅仅是以上讨论的各种铭写活动所具有的功能。与这个知识论综合体的一部分相关联的，还有那些强加给清朝政府并一直在改造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外来机构。这些机构包括传教组织、商业企业和外交团体等，它们主要在两方面发挥其功能：一方面，它们提供了安全稳定的渠道，使得通过各种力量产生的信息可以沿这些渠道流动；另一方面，通过复制较早的通商口岸和新开辟领地中的那些结构，它们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进中国，有选择地在某些地点重建秩序，并且把由此产生的建构与全球网络联结起来。

^① 这些水文测量图分别标有1870、1871、1872和1873年，前两幅是根据1858年法国的勘测，后两幅是根据英国1860年的勘测。这些图见U. S. Navy Hydrographic Office 1919: 102，与类似的中国东部沿海海图放在一起。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坡）戴维斯图书馆的凯斯勒（Ridley Kessler）和哈佛地图图书馆的考珀（David Cobb）。



如前所述，帝国海关是这一重建秩序过程中最为显明的例子。帝国海关最初创建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在清朝当时正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况下（Fairbank 1953），帝国海关确保了进口货物关税的收缴。到海关于19世纪60年代成为清朝政府的正式机构以后，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爵士开始扩展它的影响。帝国海关既是清政府的一部分，又是一个外来的机构。以这样一种独特的地位，帝国海关登录账目、印制标签、设计表格，并编制所有其他记录中外货物使之可以进行交换的小型文书（夏德的培训课就使用它们作为例子）。此外，帝国海关还开辟新的商埠，按照欧洲的航海模式在中国海岸建设灯塔、航标等标识，以“国际”标准指导港口设施的建设，向清政府管辖下的其他地区推广它的记账方式。帝国海关还发挥了教育工具的作用。赫德本人就曾试图利用诸如麦库洛奇（John R. McCulloch）的《字典、实践、理论与商业史和商业航海》（McCulloch 1842）^①这一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向总理衙门的成员们展示现代民族国家的运作过程。帝国海关教育部在这方面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努力，它设置了同文馆这样一所培训精通欧洲语言的中国译员的学校。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的领导下，同文馆翻译了大量有关国际法、政治经济、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作，还翻译了兰斯代尔（Henry Lansdell）的《俄国的中亚》一书^②。帝国海关的造册处通过编制中国和西方贸易的统计报告，把中国整合进19世纪末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之中。这

① 有关使用麦库洛奇一书的情况，见 R. Smith et al. 1991: 150。麦库洛奇 1842 年首次出版他的作品，之后又数次再版。同类型的著作见 MacGregor 1850，该书也是把商业知识和国际贸易的统计概括结合在一起。

② 关于同文馆，见 Biggerstaff 1934 - 35，该书 332 - 333 页有一份翻译著作目录。也见 Su Ching 1985: 159 - 160。关于丁韪良，见 Covell 1978: 170 - 186；Hsu 1960: 125 - 131。对同文馆和丁韪良在翻译工程中作用的批评性评价，见 L. Liu 1999: 142 - 159。

些数字不仅代表了中国新的“对外”商业的规模，而且还使得资本家们能够就进一步向中国市场渗透做出计划。帝国海关还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下，国内和海外的中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的受保护区域内获得成功发展（Hao 1986；Cochran 2001）。到 19 世纪末，帝国海关监管着中国每一个主要沿海城市的通商口岸的运行：向北远至满洲的黑龙江，沿长江一直深入到中国的中心地区，向东南则达到西江以及缅甸和越南边界地区。帝国海关成为中国西方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机构，甚至在清朝于 1911 年灭亡以后，它仍然作为中国海关而继续运行（Fairbank et al. 1995；L. K. Little 1975；Atkins 1995）。

当帝国海关从清政府内部在中国重建秩序的时候，其他一些机构则试图通过通商口岸将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同欧洲和北美联结起来。将教育、医疗使命与布道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传教事业，或许是这一类重建秩序活动中最为著名而且拥有最完整记录的一个。的确，传教士不仅亲身来到通商口岸之外的地区，在那儿开辟新的活动区域，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傅兰雅（John Fryer）、丁韪良和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还在中国政府或他们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译员或官员。其他一些传教士则建立学校，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科学、数学和宗教课程（Cohen 1978）。通过这些人以及各种关联组织，传教士将中国同全球基督教传教活动网络联结在一起。

其他一些组织，比如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同文书会、基督教青年会，当然还有商业银行、贸易商号和前面提到的皇家亚细亚文会，也都以自己的方式重构中国真实，并且把由此产生的新形式与全球网络联系起来。欧洲人——到 19 世纪末，还有被改造过的中国人——都可能会在一生中的某些时刻联结到这些网络上的不同节点上，有时是将中国解码，有时是为中国重建秩序。例如，马士是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协会的成员，他退休后回到英国，加入了皇家亚细亚文会理事会、中国协会委员会、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学会俱乐



部，不时地在这个或那个协会里担任行政职务。

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力量，相互平行或相互交叉的网络被整合在同一个平面上，就像强加于清政府的各项条约一样，对中国真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新建构。在此同时，网络间的联结加速了中国不变的流动体和信息概括的积累。这些网络的节点或集合中心不仅是展示和传播新知识的主要场所，其本身也起到了延伸网络的作用，使得人们可以去想象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全面知识所能逐步取得的成就。但是，从此前对英属印度的讨论中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为知识而知识并不是帝国工程的宗旨，知识如果要具有价值，就必须加以运用，付诸实践，以使世界成为帝国的安全世界。在中国，这就意味着使用新知识进行教育活动，以阻止另一个“亚罗号”事件或者另一场 1860 年那样的战争再次发生。

知识的运用：通过外交讲授课业

在像威妥玛那样饱经历练的英国外交官看来，要想使清朝政府能够做出理智的决定，就必须改变其领导者的精神意识，使他们能清楚地明白国际关系的真实状况并且认识到中国的虚弱。但是，要完成这种启蒙却并非易事，因为，就像威妥玛和其他人所观察到的，清朝贵族和政府官员所痴迷的是权力的影子而非权力的实质，是表面现象而非实实在在的政治现实，是礼仪形式而不是权力的物质性体现（FO 17/748：8-9，77，134）。中国统治者没有能力去区分现象与本质，从而导致他们对未知事物有某种无端的恐惧。他们不是去积极地应对变化，坚定地正视他们的恐惧，而是建造起一堵傲慢自大和顽固无知的高墙。

这些性格被几代英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看做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中心问题，而从马嘎尔尼爵士直到额尔金爵士的英国使节们，也始终直接面对这一被感觉到的问题，并向它发起了挑战。尽管武

力和言辞的说服力似乎造成了某些改变，但问题仍然存在。例如，条约规定时常得不到实施和执行，清政府不愿意在外国真正地设立使馆，朝廷拒绝让欧美外交官觐见皇帝等。中国全面的自我孤立状态可能已经终结，但高耸的城墙并没有倒下。各种障碍似乎仍然存在这一事实使威妥玛认识到，清政府顽固误解现实的程度，足以阻碍清政府建设性地面对中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虚弱。

那么，怎样来改变心智呢？对这个问题，从马嘎尔尼到威妥玛都怀有这样一个共同看法：清廷对英国人的真实性格缺乏清楚的了解。如果他们了解英国人性格的话，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他们的心智就会向新的可能性开放。马嘎尔尼确信他曾促使清廷发生了某些思想上的变化（Hevia 1995b: 218），但没有获准在北京建立使馆则意味着 1793 年的表面成功随着时间渐渐消失了。而现在，随着北京使馆的建立，完成 18 世纪首次提出的任务的大好机会出现了。1860 年的和约为建立起完善的交流提供了必要条件，可以通过这种交流来教育清廷，使他们明白，他们的利益与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①，英国会是一个强有力的盟友。

执行这一教育计划^②的是英国的新型外交官——额尔金爵士所依赖的语言学家。他们现在运用其聪明才智，帮助他们在总理衙门里的同行们从新近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纷争中吸取教训。教学工作在日常的外交事务中进行，同时得到了这些语言学家本身和其他外国人生产中的有关中国的新知识的支持。由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为方便地接触到中国的原始资料，在北京的英国外交代表们就能构建起一个批评性的比较框架，来准确地评估中国的“真实

① 有许多英国人发表过这种看法；见 Kuo 1978: 515 - 516。

② 并不只是外交官们才认为在中国的下一个任务是教育，《布莱克伍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认为，海关的外国税务司就是“向中国统治阶级介绍西方政治、道德和商业思想与实践的潜在工具，也是防止中国再次向欧洲开战的最佳保障”；见 *Blackwood's Magazine* 93 (1863): 59。



状况”，然后再运用其结果来改造清朝官员，给愚昧的清朝贵族和汉族官员讲授有关当前国际世界的课业。

但是，在此同时，北京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要比单纯的中英双边关系复杂得多。在英国人之后不久，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也相继建立起了使馆，对英国利益既构成了威胁也带来了机会。例如，看到中国人在其他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动面前迟疑不决且沾沾自喜时，威妥玛常常会忍耐不住，大惊小怪地提出警告（R. Smith, Fairbank and Bruner 1991: 174, 295, 303, 319）。同时，他还不止一次主动地教导清政府实行保护自己以及中英两国关系的政策。比如在 1866 年，威妥玛写了一篇备忘录送给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在由阿礼国翻译成中文并由威妥玛加写了中文前言以后，这篇名为《新议略论》的备忘录被送到了总理衙门。在文章中，威妥玛要求清政府承认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正视俄国、英国和法国等诸多列强来到清帝国边疆地区的局面。他建议中国开始包括互换外交官在内的改革（Hsü 1960: 156 - 158; R. Smith et al. 1991: 288 - 289）。改革将会使中国变得更为强大，而要抵御俄国人从北方、法国人沿越南边界的入侵，确实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英国将非常乐于帮助清廷完成它所面临的这一艰难过渡。

然而，即使外交活动和谈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教室，这一策略还是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仍然难以把握。英国人还未能够觐见清朝皇帝，而觐见被认为是为教育计划的蓬勃开展而创造适宜环境的关键一步。要实现觐见，英国可以依靠在北京拥有使馆的其他列强的支持，这些国家对修正清政府同欧洲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时的礼仪都极感兴趣，尤其是希望能够把各国元首的国书和信件直接交到清朝皇帝的手中——实现条约中规定的“完全平等”。

不过，在 1861 ~ 1872 年期间，西方外交官却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在位的同治皇帝还只是个孩子。到 1873 年皇帝成年时，外交团看到了解决觐见问题的机会，或许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向清

廷介绍并教授欧洲式觐见礼仪的机会（Rockhill [1905] 1971: 42 - 44; T. Wang 1971）。威妥玛这时已经晋升为英国驻华公使，他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威妥玛在1873年春天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备忘录中提出了觐见问题。威妥玛把这封备忘录描述为一种“教导手段”，说它有助于“教育中国人知道所必须面对的问题”（FO 17/630）。谈判很快就开始了，并且达成了一项协议，用来指导1873年6月29日进行的觐见（FO 17/748 - 750）^①。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的公使们在紫禁城西边一处园林中的紫光阁觐见了皇帝，他们站立着递交了国书，并祝贺皇帝成年。这个外交上的漂亮行动似乎暂时解决了把中国与欧洲分隔开两个多世纪的中心问题。而从外交官们的观点来看，叩头已经从西方列强与清朝的外交关系中消失了，清廷似乎已经承认了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平等。

然而，还有许多问题未获解决。威妥玛在向外交部报告有关谈判的问题时，始终都是从推动英国在华活动的更广的角度来思考这些谈判活动。他的报告中有对大博弈战略中各种需要考虑的因素的剖析，有对本地知识的应用，也有对英国规训活动的反复思考。这些报告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威妥玛能够从他的图书馆中生产出什么样的新型知识。

在威妥玛看来，有一个问题远远要比仅仅觐见皇帝更为重大。如果清政府接受了欧洲形式的外交实践，就是向西方列强和中国公众^②表明，它承认了它在世界中地位的改变，已经不再希望整个世界都接受它的至高地位了。承认这一点，也就使在中国的所有其他外国列强有了在北京保留使馆的理由。威妥玛认为这点特别重要，

① 关于觐见问题的谈判，见 Rockhill [1905] 1971: 41 - 42; Morse 1910 - 18, 2: 266 - 270; T. Wang 1971; Cooley 1981: 86 - 95。

② 让中国公众“知道”清政府做出的让步受到普遍的关注；见 FO17/748, 126; 749, 130; 750, 6 - 7。



因为他确信俄国的政策是设法使外交使团离开北京，“不仅因为它们可以对俄国人进行监视，而且因为它们所具有的推动文明开化的作用会使中国比俄国所期望的更为迅速地发展起来”（FO 17/748，134；也见 14 - 17）。

在有关觐见问题的谈判中，威妥玛利用了大量资料来加强他言辞的雄辩力。他向那些经常和清朝官员接触的人请教，比如赫德、丁韪良和在天津的英国领事密迪乐（Thomas Meadows）等。他还研究了英国对华关系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分别于 1793 年和 1816 年最早来华的两位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爵士和阿美士德爵士的记载（FO 17/748：9，13，339 - 354，376 - 381，433；749：11 - 14，22 - 24）。有关这些交往的大量知识非常重要，因为威妥玛发现清朝官员企图改写历史记录，例如，他们声称马嘎尔尼行过叩头礼（三跪九叩）。威妥玛不仅用自己的资料反驳了他们的说法^①，而且当清朝官员改变态度，认为觐见同治皇帝应当援用马嘎尔尼在乾隆皇帝面前单膝跪下的先例时，他也表示了拒绝。在与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的谈话中，威妥玛申言，在现在这个时代，让一国使节在别国元首面前下跪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补充说，提出下跪问题是对外国代表的“侮辱”，“不论是作为公使，还是作为个人”，都是一种侮辱（FO 17/748：345 - 346）。

他还利用了研究古今汉语资料时所学到的知识，其中有些资料还是清政府的官方出版物。由于熟悉这些资料，他不仅可以翻译和注释清朝政府写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件（例如，见 FO17/749：142 - 147），而且还创作了一种看起来很像学者论文的新形式的报告。1873 年 6 月 11 日题为“关于觐见谈判中使用的汉语术语的备忘录”，就是这种报告的一个重要例子（FO 17/749：236 - 303）。

^① FO 17/749：16. 在马嘎尔尼特使问题上，对历史记录的重写和重新评价不是单方面的事情。见 Hevia 1995b，chap. 10。

从威妥玛的图书馆到帝国档案

这份有关觐见的备忘录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件，除了其他一些意义之外，它还表明了19世纪后半叶英国战略思想在学术、本土知识、政策制定以及与清朝官员的谈判之间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威妥玛解释说，要在谋略上胜过这些官员，他就需要做这一类的研究性报告。总理衙门的成员们说，外国公使们请求面见皇帝的信件的中译本中使用了“觐”字，据他们解释，“觐”指的是秋天举行的会见，而现在是1873年春天，所以清朝官员们想推迟谈判，以符合在秋天面见皇帝的请求。然而，威妥玛的研究表明，他们的这种解释要么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揭穿的托词，要么就说明清朝官员对他们自己的历史资料极其无知。

威妥玛查遍了他收藏的有关觐见和宫廷礼仪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这位英国公使重新构建了“觐”字的历史。他广征博引，进行注释，还在书页边缘写上汉字。同时，他还通过使用道光朝（1821~1850）的资料和清朝学者阮元（1764~1849）的著作，将整个问题放置到了当时的情境之中。

在结论中，威妥玛论述说，把“觐”字的意义限定为秋季朝见皇帝的活动，尤其是使用距今相当遥远的周代（约公元前5世纪）的值得怀疑的资料，是一个错误。更何况根据更为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的记载，“觐”字从来没有被用以指称在一年的某个时间举行的朝见活动，而是指皇帝与他的官员之间的朝会。

比这一结论本身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它所象征的意义。它表明一名训练有素的代理人，可以游走于中国本土居民和最高层次的政治权威之中，精通中国统治阶级所珍视的重要的文化和历史，并且能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做出许多具有重要策略意义的举动。而对于清朝当局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规避英帝国档案，教育和规训似乎也就是要切断受教者的逃



学之路。

驻节北京的许多年中，威妥玛在许多场合多次重复这些做法，不断地通过一些外交事件推动清朝迈入现代世界。例如，在觐见皇帝两年以后，英国翻译官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在云南被当地百姓杀害^①。马嘉理被派往云南，是去迎接一个从缅甸来的英国探路队，据说这一探路队试图开辟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商贸路线。这又是一个涉及大博弈的阴谋。然而，在威妥玛看来，中心问题是《天津条约》规定的外国公民的自由通行权受到侵犯，而且他确信中国官员参与了这一暴行。由于“外国对华交往的前车之鉴”告诉威妥玛，真正的罪犯可能永远也不会受到审判（*China No. 3, 1877 [CC77]: 51*），所以他决定把这一事件用作一次教育机会^②。在向恭亲王和总理衙门施加了强大压力之后，威妥玛呈送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清政府为这一事件负责，否则，他将把英国使馆从北京撤至山东省北部沿海的芝罘（烟台）。结果，威妥玛和清朝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李鸿章于1876年9月13日签订了《烟台条约》[Mayers (1877) 1966: 44 - 48; CC77, 64 - 67]。

《烟台条约》的前两部分分别涉及云南事件和官方交往事宜，其宗旨仍然是要教育清廷学习恰当的外交方式^③。总理衙门要向皇帝呈递奏折，全面说明云南事件的经过并承认违反了条约规定，但出奏之前须交威妥玛审阅以确保其准确性。然后，皇帝要颁布一道

① 关于马嘉理事件及随后进行的谈判，见 Cooley 1981: 116 - 135; Morse 1910 - 18, 2: 297 - 305; Hsü 1990: 304 - 305。

② 与觐见问题一样，威妥玛将谈判纪要用急件送至伦敦的外交部。见 *China NO. 1, 1876*（以下称 CC76）和 CC77。关于威妥玛给英国外交大臣德尔比勋爵的总结报告，见 CC77 51 - 58, 111 - 147。

③ 其他条款处理一些突出问题，包括通商事务、增加鸦片税、增开新口岸和划定外国租界界址、外国商品只在进入口岸缴税等。不过，这些规定都放在《烟台条约》的最后一部分。

谕旨，重申条约权利并下令发布告示申明这些权利。这一告示要在全国各地张贴，并由英国派员在当地官员保护下查看告示张贴情形。告示在发布之前，要经威妥玛审查，以确定向地方官员和中国百姓都传达了正确的课业（CC77：85 - 88，93，96，102，104 - 106）。另外，清廷还要派出一个使团，携带“国书”前往英国道歉。使团出发之前，要将国书文本送交威妥玛审阅（CC77：90 - 91）。

这样一些做法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以后的“协议”开创了先例，比如1901年有关义和团的最后议定书。此外，这些做法还把“完全平等”这一特别概念提到了非常显眼的地位，由英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员付诸实践。一名英国公使声称无须得到来自其政府的指示就可以直接干涉清政府事务，这同一名公使还坚持要批准清廷给他的君主的通信。这些做法不仅仅是对清朝主权的破坏，实际上是用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来对待清朝，中国皇帝好像成了英国“间接”统治下的“土著”王公了。

《烟台条约》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帝国的主权，而且还要求总理衙门与各国驻北京公使就外国官员与清政府官员之间来往的礼节进行会商，会商内容包括在中国以及在外国首都应当遵守的礼节。这一条款中含蓄地表示，清廷现在应当完成《天津条约》的规定，在国外设立常驻使馆。事实上，前往英国道歉的使团要做的就是这件事。

最后，有一项非同寻常的规定被补充在条约末尾一项单独的条款中。英国人取得了派员进入清朝的中亚地区“探访”通过西藏进入印度的道路的权利。旅行路线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可以通过甘肃和青海进入西藏，也可以通过四川进入西藏。总理衙门负责为这些人进行各项安排，颁发护照，并将英国计划通知驻在西藏的清朝官员。就这样，大博弈走出了想象性推测和秘密联络的范畴，演变成成为英国对华关系的一个正式部分。



学习课程，通过考试

觐见问题和云南事件的解决，可以被看做英国在 19 世纪中国的再疆界化活动的高潮点。1877 年，中国在伦敦设立了使馆，表明这些英国课业取得了圆满成功。1877 年 1 月，郭嵩焘携带着由同文馆翻译的马顿斯（Charles de Martens）的《外交指南》（中文名《星轺指掌》），带领清朝道歉使团抵达伦敦^①。2 月 8 日，郭嵩焘及其随从人员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正式觐见中，将皇帝的道歉信呈交给维多利亚女王。威妥玛和 3 名来自驻北京大使馆的参赞有雅芝（A. R. Hewlett）、禧在明（W. C. Hillier）和马嘎尔尼勋爵的后人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一起，参加了这次觐见。参加觐见的还有外交大臣德尔比（Derby）勋爵、宫廷大臣卡那封（Caernarvon）伯爵和典礼官弗兰西斯·西摩（Francis Seymour）爵士。

然而，后来知道，在正式接见之前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似乎是由于读了马顿斯的书，清朝官员想确认一下觐见女王时要鞠躬三次的礼节。据副使刘锡鸿说，中国使团在觐见前一天曾就此咨询过威妥玛，但他说对这一礼节并不清楚。然后他们又询问了典礼官西摩，他也表示不太了解。刘锡鸿猜想英国人是要考查他们，看他们是否能正确地行使礼节，因为欧洲外交官们熟悉这样的礼节毕竟已经 100 多年了，而且他们 1873 年觐见同治皇帝时采用的就是这同一种礼节。

如果威妥玛的确是要考查清朝外交使团的话，那么看到他的学生表现得十分得体，他一定会非常满意。在三次鞠躬以后，郭嵩焘使节率领随从人员来到维多利亚女王面前，用汉语朗读了清廷的信

^① 下面的记叙引自刘锡鸿和张德彝的日记，其翻译见 Frodsham 1974: 118 - 121, 155 - 157。

件。他读完之后，马格里大声地用英语读了这封信的英文翻译。然后，郭嵩焘将信件呈递给女王，女王把它交给了德尔比勋爵。

通过这些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礼仪动作，清朝君主从英国人想象的至尊无上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被改造成为一个向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帝国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致敬的东方君主。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在巴黎、柏林、西班牙、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建立了使馆。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清朝官员、知识分子和商人借鉴新翻译的国际法和通商口岸中的各种活动，开始推动制度改革，以废除条约中那些越来越被理解为侵犯“国家主权”的条款^①。看来，终于使中国完全平等了。

规训与西方化

觐见维多利亚女王所代表的清朝对外关系的变化，只是这个王朝极不情愿地接受的众多变化中的一个。在其他方面，英国的课业似乎还产生了另外一种作用：它们激励了清朝精英阶层中的一些人，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和英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他们在镇压反清起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等重要官员、沿海省份的一些中级官员以及通商口岸的观察家们，都断定欧洲向中国提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认为，对于中央政府官员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掌握国际法和外交活动中那些复杂精细的要领，而对于清朝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资源转向获取欧洲列强用以羞辱清朝的那些强大武器（Kuo 1978：496 - 497；Hao and Wang 1980：156 - 172）。

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之后，李鸿章和一小部分志趣相投的官

^① 要求废除的具体条约规定包括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和协定关税，见 Hao and Wang 1980：194 - 197。



员率先致力于技术改造和倡导技术教育，借此来改造清朝的陆军和海军。尽管经常受到清朝上层其他有权势的人的反对（Kuo 1978: 529 - 531; Hao and Wang 1980: 172 - 188）^①，也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的协调一致的计划，更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完成他们的计划，但是这批“自强”官员还是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起初，自强派利用赫德管理下的帝国海关的税收岁入（Kuo 1978: 514），得以进行了多项活动。他们从欧洲军火商那儿购置武器；在西方顾问的帮助下，在天津、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南京和福州建造兵工厂，生产轮船和枪炮；建立陆军和海军培训学校，引进外国专家充作教官；派出学生到国外接受科学、数学和工程学方面的培训（J. Rawlinson 1967; Biggerstaff 1961; Kuo 1978: 520 - 525, 537 - 542; Hao and Wang 1980: 170; K. Liu and Smith 1980: 248 - 250, 257 - 258, 266 - 268）。在福州和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了与丁韪良指导下的北京同文馆相似的翻译馆，后来扩展成了工程学校（Kuo 1978: 525 - 529, 531 - 537）。这些机构与欧美传教士所从事的世俗教育事业进行接触和合作，从中获益匪浅（Cohen 1978: 576 - 580）。

对这些努力的第一次重要检验是 1884 ~ 1885 年的中法战争，结果是胜负参半。清朝陆军在越南边界和台湾抵挡住了法国的进攻，但法国海军破坏了福州的造船厂（J. Rawlinson 1967: 109 - 128）。在此之后，清政府更为积极地推动技术的发展，建立了海军衙门，并且通过外国贷款来筹集经费，同时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让它们上缴税收（K. Liu and Smith 1980: 254 - 255）。但是财

① 这些冲突也包括争夺皇位的派别争斗以及慈禧太后为确保任何一派都不会过于强大以致威胁其地位面进行的努力；例如，见郭廷以著作中有关恭亲王的部分（Kuo 1978: 505 - 506）。

政短绌一直影响着教育改革和技术改造，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也阻碍甚至损害了各项活动的进行。此外，自强派还发现很难建立一个制度性结构，以充分利用和奖励那些受过新技术训练的人。无论如何，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外国的情报收集者们还是对清政府的努力大加赞赏。在中日战争前夕，有些专家还认为中国领先于日本，甚至预计如果两国开战，中国将取得胜利^①。由此看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的课业不仅教给清政府如何得当地与强大的欧美民族国家进行交往，而且还教给它怎样将自己变得同它们一样强大。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坚持认为清政府的利益同它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坚持认为清朝的西方化将会使双方得利，这看上去好像形成了好几代英国外交官所梦想的那种同盟关系。然而，如果说这些发展表明英国教程的温和一面取得了成功的话，那么那些全球性力量的去疆界化作用在同等程度上也在损害着这些表面上的成就。

^① 见 K. Liu and Smith 1980: 245 - 269, 也见该书所引用的资料, 其中包括美国和英国军事观察家们的评估。

第五章

欧洲全球霸权时代的清帝国

清朝的“自强”活动并非全部都是英国教育的结果，它们也是清朝为应对帝国内部变化所提出的诸多挑战而进行的努力的一部分。满族人于1644年利用中国内部战争和明朝权力崩溃的机会，在中国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满族上层努力恢复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创造一种能让他们这些异族征服者的统治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最初几位清朝皇帝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到18世纪初，他们就巩固了对明帝国全部领土的统治。但是满族人的野心并不只限于中国本土，自17世纪末以来，清朝皇帝一直力图使自己成为整个东亚的最高统治者。到18世纪中期时，满族人已经控制了蒙古和大部分中亚地区，并且成为藏传佛教主要教派（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领袖的格鲁巴教派）的唯一保护者。结果，清朝成为欧亚大陆东部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帝国。为了完成这一巨大的任务，清朝领导者们除了进行征服外，也采用了他们所擅长的和那些承认他们在中国本土和帝国新疆界内至高无上地位的统治者们结盟的政治手段^①。

^① 关于清朝在18世纪的统治，见 Hevia 1995b: 29 - 56; Crossley 1999; Elliott 2001; Millward 1998; E. Rawski 1998; Zito 1997。

然而，到了 19 世纪初，帝国和它的联盟之间出现了一些关系紧张迹象。中国空前的人口增长给它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带来很大的压力，财政危机和糟糕的管理在中亚的被征服人民中造成的动荡也表明清朝的势力正在衰落。中国国内的起义将清朝的虚弱进一步凸显出来。19 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中亚许多地方爆发的武装反抗表明，满族人的军事力量可能已经衰落。最终，太平天国起义被清朝的汉族官员招募和训练的汉族军队镇压下去，满族统治家族和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之间达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和解。汉族官员支持了清朝权力的中兴，而作为回报，汉族官员在政府体系的许多层面上主导着国家的财政活动。不过，即使在这种虚弱的状态下，清朝也没有放弃建立更大帝国的努力。在 19 世纪 70 年代，在欧洲全球霸权的时代，清朝军队收复了位于中亚的领土，巩固了后来成为中国民族国家边疆的那些地区。

清朝统治权所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应当放置在影响中国和中亚权力关系的动态变化之中。而反过来，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史无前例的海外扩张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常常被称为“新帝国主义”的这一扩张造成了几乎整个非洲、太平洋地区和亚洲许多地区的殖民化，对中国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英国作为欧美在华利益主要代言者的地位受到了这些新进展的挑战，向清廷提出的要求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就西方列强而言，它们对和睦通商条约一类帝国教程的兴趣变小了，相反，这些新帝国主义者希望在势力范围、领土、铁路、金融和其他许多方面得到排他性的特许权。英国外交官和商人把这些变化看做是对英国在华独特地位及其地区霸权的一种威胁。尽管他们也担心法国和德国等竞争者，但是对英国在整个亚洲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俄国。

本章将考察与新帝国主义及其对清帝国影响有关的几个问题。我在这里并不想进行全面的分析，而是要进一步展开本研究前几部分中已经论述过的那些主题，包括清朝与其他列强关系的变化，欧



美人对中国主权和中国人特性和状况的理解，以及英国人不断变化着的关于俄国对英帝国威胁的估价。在每一个问题中，我都要探讨在中国进行的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欧美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以及由于欧美在华活动和知识生产的聚合和分离而产生出的种种虚幻想象。下面各节将依次考察这些问题，首先要讨论的是欧洲经济变化及其全球性意义。

新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清代中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于 1914 年爆发前的几十年里，占地球表面大约 1/4 的领土上的统治权被重新分配，英国增加了 400 万平方英里左右的殖民领土，而法国增加了大约 350 万平方英里。此外，新的殖民国家也登上舞台。德国攫取了 100 多万平方英里土地，意大利和比利时各自得到将近 100 万平方英里土地，而美国和日本分别获得大约 10 万平方英里土地（Hobsbawm 1989：59）。

这一新帝国主义以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新方式从根本上重构了全球的权力和权威关系，这些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帝国列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意识形态中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是斯宾塞式的适者生存观念。这一观念以一种简单的公式与帝国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只有那些能够征服他者的民族才能继续生存，而那些不能满足现代世界严酷要求的民族最终将会消失。正如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 1898 年所说的，这个世界已经被划分为两部分：“活着的”国家和“垂死的”国家^①。支持这一残酷历史观的是有关种族差异的新理论。这些理论在科学的支持下，很自然地成为欧美种族优越论和白人至上论的支

^① 引自 Kennedy 1987：195。见兰格 [Langer (1935) 1965：85 - 96] 关于生物理论转用于政治的讨论，这一讨论现在仍然有用。

柱 (Gould 1981)。这一意识形态结构的第三根支柱是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观点 (Adas 1989: 199 - 236, 292 - 342)。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现在都要用技术复杂性这一标准来进行衡量, 并且被相应的分出等级。

而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这种特权地位相联系着的, 是欧洲国民经济中正在发生着的转变——从商业—农业经济转向以大规模生产、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和城市化为基础的经济运动。然而, 正如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强调指出的, 这一发展过程充满了矛盾。一方面, 1860 ~ 1900 年这段时间是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时期, 其间只是有过几次短暂的繁荣。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领导者都放弃了政府不加干涉的贸易自由主义, 为工业化的部门建立起贸易保护壁垒。另一方面, 在一些重大技术变革的驱动下, 这一时期的经济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到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时, 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此外, 欧洲一些较小国家的工业增长也表明, 英国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挑战。不过, 英国还保持着并且在实际上扩大了它对全球金融、保险和航运的控制, 伦敦仍然是全球金融体系无可争议的中心 (Kennedy 1987: 194 - 249; Hobsbawm 1989: 34 - 66)。

那么, 帝国的探险和殖民形式的强权是怎样适应快速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动荡这一矛盾混合体的呢? 与帝国扩张联系着的经济变革模式, 至少由 4 个因素构成。第一个也可能是最明显的一个因素, 是全球性经济在 19 世纪的出现。这一经济的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机制将世界上非常偏远的地区也整合进它各种形式的活动之中。与这些过程一起出现的, 是交通网络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展。资本、商品和人员沿着这一交通网络, 在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流动。

另一方面, 扩张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单线的过程。相反, 它受到国家建构内部和欧洲列强之间在获取欧洲以外的资源和市场中的



各种斗争和矛盾的驱动。其结果便是殖民化——扩张的一个辅助性工具。殖民化的作用者既可以是民主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专制的民族国家。然而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如何，当它们努力保护自己领土上的工业企业和商业贸易时，当它们努力为本国产品开辟海外市场时，当它们努力为本国企业提供获取工业原材料的特权时（大量未被开发的原材料可以在欧洲和北美以外找到），当它们努力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开辟新的殖民地的时候，这些国家便成了殖民帝国，那些世袭的统治者则成了皇帝。

第二个重要的发展与第一个因素有着明显的密切联系，这就是在技术变革、公司资本主义和扩张的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出现的协同关系。这种关系或许在欧洲列强之间在交通、运输和军备等方面的竞赛中得到最好的体现。这里的关键是被麦克内尔（William McNeill 1982: 262 - 306; Headrick 1981）认定为第一批现代军事工业联合体——私人军火制造商与国家政府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体——的出现。在工业化的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变革意味着向职业化军队的困难转变，意味着武器采购业的大发展，这就要求把大量的公共开支用于购买那些前所未闻的军事“必需品”。这些发展变化也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巨大扩张，尤其是在调动和控制资源及人口的能力方面。

第三方面的发展是为了确保那些为支持和实现全球帝国而建立起来的商业、行政和军事机构的安全而采取的一些必要方法或手段。以英国为例，这方面的战略性思考包括保护现有领地不被其他帝国国家侵入，也包括扩张新的领地来建立缓冲区。这样一个战略重心，可以用来解释英国与俄国进行大博弈时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大博弈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要保护印度边界地区以及印度与英伦诸岛之间的交通线。而到苏伊士运河于19世纪60年代开通后，这种防御心理又推动着英国在运河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在从直布罗陀海峡直到埃及以远的地区攫取到许多战略要地。此外，随

着蒸汽动力在19世纪80年代占据了统治地位，就要有煤的供应和交通沿线的加煤站，这些地点也需要得到控制和保护。

由于陷入到这一海上交通和运输网络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些全球性发展的影响。而且，至少从竞争的欧美民族国家的观点来看，也有充分的理由把中国卷进来。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而且据说都是些勤劳和有所渴求的人，因此一些人便把中国想象成解决周期性经济问题的最终出路。横跨欧美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已经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利润缩减，如果整个中国能够向自由贸易开放的话，仅仅依靠中国的消费者就能够吸收掉世界工业的所有过剩产品。由此来看，更加深入地向中国内地渗透，还需要用更多的动机来加以论证和进行鼓励吗？

当通商口岸体系沿着中国海岸线以及长江一类内陆水路被一个个地复制出来的时候，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就与全球商业网络联系在一起了。这些网络同时也把异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引进到中国，而这些力量无论在哪儿着陆，都会给当地带来动荡。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在1820~1860年间的政治经济扩张所产生的相对稳定的去疆界化进程，让位于一个由资本主义商业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循环以及欧洲列强间的竞争引起的日益不稳定的进程。这些变化给中国旧式的农业—商业经济和新式的通商口岸经济带来了新的压力。这样，尽管中国正在更加稳固地融入英帝国市场，尽管英国对华政策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都与印度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些相反的力量——其他列强对清朝领土的侵犯、英俄在亚洲的竞争——仍然会损害英国的外交努力。

如同1842年第一个条约签订时的情形一样，1860年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将中国再疆界化的同时，也开启了通向又一次去疆界化浪潮的大门。欧美人在租界内以及和中国市场的接触点上所拥有的特权，不断引来形形色色的自由市场鼓吹者，其中有许多人发现，治外法权为那些在中国以外很可能是非法的行为提



供了一个很容易钻的空子。与 1860 年以前一样，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威妥玛和李鸿章 1876 年签署的《烟台条约》就是一个适用的例子。我们还记得，这一条约解决了马嘉理事件并要求清朝派出道歉使团前往伦敦。条约的其他部分涉及处理与英国在华贸易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但是，英国商号成功地阻止了对条约的批准，因为条约没有废除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地方性关税（厘金），而大多数商人认为厘金违反了现有条约。另外，条约也未能提供足够的保证来防止中国官员进行反对外国的活动。在他们看来，条约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推动对中国的商业渗透 [Pelcovits (1948) 1969: 125 - 130]。况且，反对这一条约的人不仅仅来自商界。英属印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华鸦片贸易来维持其收支平衡，因而反对增加鸦片税的条款。同时，很可能是由于威妥玛就在几年以前曾经对法国代办的一项类似举措表示过反对，在华其他列强对威妥玛在谈判《烟台条约》时的单方面行动也颇为不安。

这样，到 19 世纪 70 年代末，为对付不驯服的清朝而建立起来的联合阵线好像开始瓦解。同时，各民族国家争夺市场和领土的斗争也促使各国领导者开始考虑建立经济活动保护区的问题。如果考虑到西方对于清朝统治权的看法的话，那么，瓜分——也就是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条约特权而将中国东部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外国控制区——幻象的出现，就是可以想象得到和合乎情理的了。

中国统治权的现状和中国的状况

1860 年，为了使中国完全平等，英国曾经希望清朝君主能够放弃那种认为中国皇帝的地位高于世界上其他君主的愚蠢想法。叩头是这一问题的关键点，它现在既然已经从清帝国与欧美民族国家的交往中被强行去除，那么要求至高地位的主张也应当随之消失

了。但是北京使馆建立以后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举例来说，1873年的觐见就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同治皇帝1875年去世，小皇帝光绪即位。这样，就再次失去了可以对话的君主，因而也就没有了充分实现例行的国家间交往的机会。

外交使团的另一些人认为，尽管1873年的觐见是值得欢迎的，但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却并不明显。我们记得，那次觐见的地点是紫光阁，正是那些眼光敏锐的汉学家们认定为清朝皇帝以前接见藩属国贡使的地方。多数观察家认为，如果要想让觐见发挥作用，就应该把现在觐见的地点和过去皇帝接见贡使的地方明确分开。甚至连光绪皇帝为了顺从欧洲人的要求而做的许多努力，比如选择新的觐见地点（紫禁城东门内的文华殿）以及皇帝站着亲手接受外国使节的信件等，最终还是被认为没有完全表达出许多公使所要求的那种平等 [Rockhill (1905) 1971: 45 - 48; Ball 1893: 46 - 47]。在这些公使能够在紫禁城的某个中央大殿以欧洲方式受到皇帝接见之前，任何其他形式的觐见都会被在北京的外交观察家们理解为中国皇帝拥有全球统治权的主张仍然残存、尚未解决的象征。换一种方式说，清朝方面稍微带有一点优越感和排外情绪的举动，或者看上去像要继续维持一个专门为满汉统治权保留的、不受全球帝国秩序影响的领地的做法，都会遭到欧洲外交官的耻笑。

关于对立的统治权观念的持续斗争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这也反映了当时困扰清朝统治区域的另外一些混乱形势。可以肯定，这一问题与清朝皇权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岌岌可危的地位有着某些直接关系。不仅权力更为分散，更为非中心化，而且清朝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力也严重削弱了。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的政治格局中，权力不断地从中央向地方下移。就像对国内外商品征收厘金所表明的，地方可以对中央政府几乎无法控制的商品征税。张之洞、刘坤一和李鸿章等有势力的封疆大吏表面上效忠朝廷，实际上却建



立起地区性权力基地，形成了对中央权威的挑战^①。

这样一种非中心化的倾向在外国列强中间也十分明显。威妥玛退休到剑桥大学担任教授后的第二年，英国在欧美对华政治活动中的支配地位突然宣告结束。1884年，法国单方面与清帝国发生了战争，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或者扩大条约特权，而是为了在清朝南部边界攫取领土。尽管清朝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实际上却被迫接受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与法国的危机导致了恭亲王下台，与恭亲王有关联的几名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也被革职或者降级（Eastman 1967）。无论是好是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一直与威妥玛打交道的清朝领导人都已经离去。10年以后，中日战争爆发。尽管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过去要好，但结果却是更为惨重的失败。日本攫取了台湾，朝鲜也宣布“独立”并且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清朝军事力量显见的虚弱和满汉领导人试图将其军队西方化的诸多努力的明显失败，为列强新一轮咄咄逼人的军事—政治渗透打开了大门。

在真切地濒临瓜分边缘的情况下，清朝被迫把位于山东省的长期租借地让予英国和德国，把位于辽东半岛的长期租借地让予俄国，把位于福建沿海的长期租借地让予法国。看起来，列强好像更愿意进行单方面活动以获取作为立足点的领土。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出于其亚洲地缘政治考虑试图把清朝吸纳为同盟国的目标出现了某种紊乱。事实上，1895年以后，英国的行动就已经无异于其他掠夺者，在清朝和英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想法在强权政治面前黯然失色。中国现在是亚洲病夫（图片11），已经有“有识之士”认为，可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俄国沙皇登上北京的皇位

^① 离心力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高级官员的忠诚，是否已经建立起半独立性的权力基地，是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有关讨论可见 Wakeman 1975: 163-168, 263; K. Liu 1978: 477-482。

并且调动起一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军队 [例如, Krausse (1899) 1973; Colquhoun 1900]。



图片 11 “俄国熊威胁中国”

Leslie's Weekly, 6 April 1901.

清朝权威由于国家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动相结合，造成了空前的危机。英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野心勃勃的再疆界化活动，进一步加重了这一危机。通商口岸深入到中国内地，每个通商口岸都为外国人提供治外法权，这就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传教士和领事置身于仍然身受太平天国起义——中国历史上最消耗人



力物力的内部战争——的后果影响着民众中间。同以前一样，现有的关系网络被破坏了，新的网络产生了，冲突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当西方人吵闹着要求得到条约赋予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时，地方上的中国人对这群不请自来的客人的意图既感到愤恨又充满了疑虑。

从19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反西方^①以及反对基督教传教的活动就开始酝酿，有时会突然爆发为暴力冲突，比如天津发生的杀害法国传教士的事件（1870）。一般情况下，这类冲突总是会导致在北京的外交交涉 [*China* No. 3, 1891 (CC91); *China* No. 1, 1892 (CC92), 公使们的正式抗议见 86 - 92]。另一方面，在观察家们看来，这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对中国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甲午战争以后，参与大博弈的稽洛尔（Valentine Chirol）对于“在北京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丝一毫要从最近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的迹象，甚至连理解这些教训的能力也没有表现出来”，感到十分惊讶。他总结说，“愚昧无知加上同等数量的傲慢和无助，这样一种绝望的情景”是“几乎想象不到的”（Chirol 1896: 9）。当年年轻的光绪皇帝1898年的改革活动被宫廷政变所挫败、年迈的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的时候，清朝或许已经真正无可救药的感觉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验证。

到19世纪末，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看来，中国的情形自1860年以来似乎没有多少变化。这个王朝仍然生活在威妥玛所谓的“虚幻世界”里。影子仍然显得比实体更为重要；与认为清廷及其官僚们并没有什么优越之处的清醒认识相比较，自我尊大和自我孤立的态度要更为普遍。无论是军队的失败，还是主权的丧失，还是俄国的蚕食，似乎都没有激发清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障自己的生

① 我使用反西方一词而不使用反外或排外，是因为民众的愤恨显然是针对欧美人而不是其他外国人的，而且这种愤恨有着明显的原因。

存。有兴趣的观察家们在北京、伦敦、巴黎和其他一些首都看到了将要发生某些事情的大量迹象，都在等待着使整座大厦倾覆的最后一击。正如斯基德摩尔（Skidmore 1990：1 - 12）所说，清朝是一个“堕落的帝国”，那里的一切不是已经死亡就是还在昏睡之中。这条龙就像许多人常说的那样，睡着了，睡得是那样死，对西方列强每天都在发出的唤醒呼喊丝毫无动于衷。

清朝的中亚

然而，对清朝的这种令人沮丧的评价，需要进行修正^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外国人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发生在帝国东部沿海一带的历史事件的影响。在 19 世纪下半叶以及其后，主要是根据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达到西方列强所强加的标准来做出判断。这样一些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尤其是对于那些醉心于“现代化”的后帝国主义观察家们来说更是这样。然而，还应当看到，即使我们能够为现代下一个定义的话，清朝所接触的那些帝国构建也没有一个完全是现代的。总的来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距似乎是在商业和军事技术领域，而并不一定表现在帝国的组织和统治方法上。英国人和清朝统治者在思维和方法上最为接近的领域，是他们与中亚的关系。或许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种相近性，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复杂的政治机制。正是这些机制的作用，才使得清朝在一些观察者看来似乎正在适应变革，而在另一些观察家看来则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自 17 世纪晚期以来，清朝在中亚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要确保任何领袖或集团都没有能力去组织军事联盟来颠覆清朝在该地区的

^① 本节的研究主要借助于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1978a, 1978b, 1978c）和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 1998）的著作。



霸权。清朝领导层最为担心的是蒙古的那些汗国。这些汗国的领袖们宣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并且与藏传佛教格鲁巴派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可能会成为蒙古统一的集结点。除了这个蒙—藏联盟外，还有一些小汗国分散在丝绸之路沿线和中亚一带。它们的领袖不仅借助与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存在所谓亲缘关系来建立权威，而且与虔诚的伊斯兰圣徒也有联系。与蒙古的汗国不同，这些穆斯林集团并没有被清朝看做是对其统治的帝国的直接威胁。相反的，问题在于能否在帝国统治区的西部边境建立起一些独立的王国，从而使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在17世纪70年代和18世纪50年代通过一系列艰苦征战才获得的土地被分而治之（Perdue 1996； Millward 1998： 27 - 32； Barfield 1989： 277 - 294）。

当然，清朝上层也明白，他们并不能把西部领土当作中国本部来处理。在中国本部，他们保留了明朝的官僚机构，同时通过一个秘密的宫廷奏报系统来加以监控，最后还设立了一个与之平行的称作军机处的监察机构。为了控制中亚，清朝创建了一个新的治理机构——理藩院。理藩院始建于1638年，用来管理归顺清朝的东蒙古汗国。后来，该部门负责管理整个中亚和俄国的事务（Mancall 1971）。它训练精通这些地区语言的人才，并创建了有关被监管地区人民的重要信息的帝国档案（Chia 1992）。这一信息体系包括字典和语法书，同时对中亚历史、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地理以及重要人物的谱系进行了研究。

与英国在印度一样，清朝也使用了大量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以阻止能够挑战其统治权的事物出现。这些手段包括授予忠顺的汗以贵族头衔和给予经济补贴（即间接统治），建立缓冲国，资助一些宗教组织，以及将忠顺的汗的军队收编进自己的军队中。在蒙古，满族人组建了7个大的汗国和几个较小的汗国（Fletcher 1978a： 48 - 58）。像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一样，各个蒙古部落被限

制在指定的草原牧场生活，而汗本人则与满族统治家族有着各种个人关系，并且承认这一家族的领导者——皇帝为大汗。作为这一分而治之策略的补充，清朝还保护格鲁巴派以及各个汗国的僧侣。在整个 19 世纪中，发愿做僧侣的蒙古人上升到成年男性的 40% 到 60% 之间。大量男性人口进入寺院，而汉族商人又控制了蒙古的经济，蒙古对清朝的威胁就这样被化解掉了。

然而，在更西边的地区，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 18 世纪末征服了甘肃以远地区并且在西藏建立起保护关系之后，清朝在被重新命名为新疆的广阔土地上建立起某种形式的间接统治，部分由陕甘总督、部分由驻在某些特定城市的将军进行管理。新疆由两大盆地组成，一些高大的山脉环绕在两大盆地四周，并且把它们分割开来。北边是阿尔泰山脉，中间是天山山脉，南面是昆仑山脉。北面一个盆地被称作准噶尔盆地，向西通向俄国中部南边的草原地带。这片广袤的草原延伸到蒙古，为游牧的牧羊人和蒙古骑兵一类马队提供牧场。伊犁河和伊犁城位于阿尔泰山脉西边，而穿过伊犁城南面的木扎提山口，就可以进入第二个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在突厥语中称为阿尔提沙尔（Altishahr），是传说中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丝绸之路的两条大道环绕着盆地本身——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点缀着一些绿洲城市，北面有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南面则有敦煌、叶尔羌、和田。叶尔羌与和田又可以通过喀喇昆仑山脉的一些山口，在商业上与拉达克和印度河盆地联系起来。这里也就是被称作西北边疆和旁遮普的英属印度区域，包括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在内。丝绸之路的两条大道在塔里木盆地以西相交的地方，是喀什噶尔的商业中心。从那里可以穿过帕米尔山脉的山口，通向费尔干纳山谷和浩罕、塔什干、撒马尔罕以及更西边的布哈拉等商旅城市（Fletcher 1978a: 58 - 59）。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地形地貌中特别重要的地方，在于有很多河谷和山口将清朝中亚地区与俄帝国和英帝国连接起来：



北部的伊犁地区、丝绸之路穿过帕米尔山脉的山口以及喀喇昆仑山口。这就是在中亚进行的大博弈的地理情形，它为商业和政治交流提供了通道，也为利用中亚商路来保护和扩张帝国的想象提供了可能。山脉本身就是反叛者、军阀以及抢劫旅行商队的土匪团伙绝佳的藏身之处。在清朝于 1644 年建立以前的 200 多年里，一些帝国和小王国旋起旋灭，而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或者山民也竞相争夺各个河谷上那些以农业—商业为基础的政权的控制权（Lattimore 1940；Barfield 1989）。尽管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没有能够从总体上改变政治力量不断转换更迭的模式，它们还是为这一混合体增加了新的因素，一些改变了权力和权威建构方式的因素。不管是汗、埃米尔还是转轮圣王，统治者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宗教社群，为它们传播教义创造条件，促进宗教经典的研究和复制，并且保护和资助那些圣址（如山脉、神殿等）。

在塔里木盆地的伊斯兰社群中，还有其他一些力量在发挥着作用。除了清真寺和学校里的宗教组织以外，苏菲兄弟会（*tarikats*）和圣族（*khojas*）也在社群中担任领导角色，监管包括圣人坟墓在内的圣址的保护工作。苏菲兄弟会和圣族也可能成为新疆地区反抗清朝运动的核心。举例来说，清朝在 18 世纪征服西塔里木盆地时，被称为和卓木的以不儿罕·阿丁为首领的纳赫什班迪兄弟会的阿法其部，就被放逐到了浩罕。大约在 1820 ~ 1870 年，不儿罕·阿丁的几代子孙，或者单独地或者联合其他势力，发动了几次反对清朝的圣战，要求收回这一地区。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朝每年都要给浩罕银钱，以控制这支力量。浩罕人为了得到在喀什噶尔的贸易特权，在最终达到他们的直接目的之前，似乎一直都在进行讨价还价（Fletcher 1978a: 74 - 76, 87 - 90; 1978b: 360 - 375, 385 - 395; Millward 1998: 25 - 36）。有段时间，清朝试图做出让步以达成一个协议来安抚浩罕。这个协议中的商贸条款，就像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1978b: 375 - 385）指出的，包括有许多和 1842 年中国同

英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相同的内容。然而，这样一些让步既没有能够阻止阿法其的圣战，也没有能够消弭浩罕人的野心，对塔里木盆地的入侵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70年代。如果不是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这一地区的形势还会随着清朝投入资源的时多时少而继续振荡。

第一个变化是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东部中国发生的叛乱——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Kuhn 1978；K. Liu 1978）。清朝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十几年的时间，才恢复了秩序。结果，维持清朝对帝国其他地区控制的资源，或者像在新疆那样，应对正在进行着的阿法其圣战挑战的资源就受到了限制。此外，其他一些对满—汉统治心怀不满的集团也起而反抗。在云南和陕西、甘肃地区，揭竿而起的包括长期以来就对清王朝不满的中国穆斯林（K. Liu and Smith 1980：212 - 221）。到19世纪60年代，清朝在所有这些地方的势力都受到严重的破坏，需要进行重大努力才能恢复清朝的控制。

改变这一地区政治态势的第二个因素，是英、俄势力在与新疆接壤地区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中亚各汗国势力的衰落。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北京就有传言说英国可能会拉拢阿法其人（Fletcher 1978b：387）。无论这一传言是否真实，英国人一段时间以来确实一直在向该地区派出搜集情报的探险队。在19世纪40年代的锡克战争和英国占领旁遮普以后，这类活动进一步增加^①。这些探险队不仅考察了可以展开英国同新疆贸易的各条路线，还发现了已经在这一地区牢固建立起来并且还在不断扩张的俄国势力。

俄国对中亚和清朝控制的新疆地区的兴趣，只是沙俄帝国从16世纪中期开始的向亚洲扩张的一部分（Clubb 1971：9 - 29）。俄国于17世纪与清朝订立了商业协定和边界协定，并且获准在北京

① 见 Hopkirk 1992，该书讨论了很多这类探险活动。英国也训练了一些被称为“学者”的印度人，来进行这些调查活动；见 Hopkirk 1992：329 - 332。



设立教堂，其传教活动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以后（Fletcher 1978c: 318 - 319, 324）。清朝与俄国的关系和它与欧洲列强的关系不同，是通过管理中亚事务的理藩院来处理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俄国政府谋求获取更多的贸易特权，其结果便是 1851 年的《伊犁条约》。这一条约将伊犁和位于蒙古的塔尔巴哈台开放通商，并在伊犁设俄国领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驻北京的代表表面上充当清朝与英、法冲突的调停人，从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1860 年的《北京条约》把清帝国的整个北部和西部边境地区置于俄国的商业和政治的影响之下。最后，清朝又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割让给了俄国。后一片土地上有俄国争夺的重点目标、太平洋上的不冻港——符拉迪沃斯托克（Fletcher 1978c: 329 - 350）。

面对英国和俄国在清帝国边界进行的这些扩张活动，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扩张活动，清朝在汉族精英们的有力支持下，决心要保住新疆。但在 19 世纪 60 年代，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阿法其圣战在布素鲁汗和他的将军阿古柏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在 1867 年开始的一系列战斗中，阿古柏征服了塔里木盆地的许多地方，并篡夺了汗位，建立了自己的汗国。在新疆不再受清朝控制的情况下，俄国人借口保护边境，防止穆斯林袭击，迅速出兵占领了伊犁城（K. Liu and Smith 1980: 221 - 225）。为了阻挡俄国继续侵入，英印政府开始与阿古柏谈判。到 1872 年，这位新汗得到了俄国和英国的承认，并且与它们签订了一些商业条约（Hsü 1990: 318 - 319）。由于清朝还没有从太平天国起义和还在华中地区东部进行着的捻军起义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英国人和俄国人似乎判定清朝在中亚的存在已经结束。

但是清朝领导层中仍然有人不愿意放弃新疆。然而，镇压甘肃的穆斯林叛乱和重新征服新疆要用 10 年的时间（1867 ~ 1877 年），还要向外国贷款来从财政上支持这一行动。这是一项重大外交政策

的思考，是对清朝中亚的再概念化。清廷任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命令他在这两个省恢复秩序。1868年，左宗棠发动了一场有计划有步骤的五年战役。在克虏伯野战炮的帮助下，这一战役以攻陷最后一个穆斯林据点肃州（今甘肃酒泉——编者注）而告结束。随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了新疆。

然而，就在他开始新疆战役之前，日本军队侵占台湾，从而引发了一场把军事资源用在何处的政策辩论：是用于海防以对付多个国家的海上威胁，还是用于重新征服中亚。辩论双方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充分理由。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的观点主要围绕四个关键点：北京接近海岸因而容易受到攻击；在新疆取得胜利的耗费和不确定性；西部地区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未来为保住新疆而对付西部和南部敌对邻国（俄国和英国）的花费。他们还论证说，以海防为中心并不是要放弃清朝那些伟大皇帝们征服得来的土地，而只是当前形势下的一个谨慎之举。塞防派以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和左宗棠为首。他们反击说，西北边疆不仅对于北京的防卫至关重要，而且列强对朝廷最大的直接威胁不是欧洲国家从东部海上的侵入，而是俄国在西部和北部边疆的扩张。在辩论中，他们很像他们的英国老师，也把俄国同其他西方列强区分开来，认为后者在亚洲的野心主要在商业方面，而俄国野心的本质是攫取领土，尤其是1860年条约签订以来更是如此（Hsü 1965b, 1990: 319 - 321）。此外，尽管在辩论中没有充分地表达清楚，但就像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 1998）所说，塞防派（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人）对新疆的关注反映出对帝国西部地区认识方面的一些微妙变化。直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汉族士人还把西部看做是缺乏文明的荒野，而清朝政府把这一地区当作被革职官员流放地的做法更加强了这种看法（Waley-Cohen 1991）。但是现在，可能是由于清廷鼓励汉人向西部移民以减轻人口压力的政策，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一些中国官员开始将新疆看做是中国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建议将它改变为一个行省（Millward



1998: 245 - 251)。

最后，尽管清廷没有放弃发展海军，但是关于新疆战略重要性以及俄国威胁的论点取得了胜利。同时，使用了一种新方式来获取用以支持新疆战役的巨额资金，这就是向汇丰银行贷款，而汇丰银行则在通商口岸发行债券以筹集这笔资金^①。到 1877 年，新疆被重新收回，阿古柏也死了。1884 年，清廷根据左宗棠的建议在新疆设省，像其他行省一样设立民政系统，并把首府设在准噶尔的乌鲁木齐。不过，新疆混乱局面遗留下来的问题中还有一个没有解决：俄国人仍然占领着伊犁。

1878 年，清廷派出一个以满族人崇厚为首的使团前往圣彼得堡。崇厚具有丰富的行政和外交经验，曾在总理衙门任职。作为主管天津贸易的官员，他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与几个欧洲小国进行过条约谈判。在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被杀之后，他率领道歉使团去过法国。另外，他还参加了威妥玛商定的 1873 年的觐见。然而，他对新疆和伊犁地区地理知识的了解显然十分有限。随后在俄国进行的谈判中，崇厚收回了伊犁，但代价是将比伊犁面积更大的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其中包括战略要地木扎提山口，而且清朝还要赔款 500 万卢布。有关条约内容的消息传到北京时，舆论一片哗然。而当崇厚在没有得到朝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签订条约并返回中国时，局面变得更为激烈。在左宗棠率领下，一大批清朝官员强烈要求清廷拒绝这一条约，即使这意味着与俄国开战 (Hsü 1965a)。

在双方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清廷派遣驻英法公使曾纪泽 (大政治家曾国藩的儿子) 率领第二个使团前往俄国。曾纪泽在得到英国外交部保证给予非官方支持的情况下，抵达圣彼得堡，决心收回失去的土地。经过 6 个月的谈判，终于在 1881 年 2 月签订了

^① 赫德说他投资 10 万两银购买这一债券，见 Fairbank, Bruner 和 Matheson 1975, 1: 251 - 252。

《圣彼得堡条约》。条约将伊犁还给清朝，但要向俄国赔款 900 万卢布。曾纪泽的这次外交胜利，无论是在清朝官员看来还是在外国观察家们看来，都是清朝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这一点，在 4 年以后的中法战争中多少得到了证实。尽管清朝失去了福州兵工厂和造船厂，但它的军队仍然有能力在越南边界打败法军，并且在浙江和台湾击退了法军的进攻（Hummel 1943：48，246，527）。

清朝成功收回新疆，在伊犁问题上机敏地对付俄国，以及清军在抗击法国入侵时的出色表现，都说明清朝还远远没有落到垂死的地步。既然如此，我们可能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对清朝的评价却如此苛刻？的确，中国在 1894 ~ 1895 年被日本击败是舆论转而对清朝不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很多观察者看来，中国战败只不过验证了关于中国人变革其自身能力的那些已知知识而已。进一步说，这些评价的基础是种族划分的模式和种族类型的理论，这些模式和理论一直主导着关于中国人性格和中国状况的思维。

中国知识、种族话语和中国人特性

如前一章所讨论的，欧美人在 19 世纪末已经积累了有关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大量信息。通过许多各有特色的工程，构成清帝国的广阔领土已经向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比较语文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深察的眼睛开放了。从这些资料的集合中，产生出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建立在对地方档案的阅读以及对中国城市、乡镇和村庄的亲身经验基础上的中国。然而，如果认为这一中国知识体产生在一个只涉及中国和西方的环境之中，可能就会造成某种误导。在对中国的新理解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从明恩溥那样的传教士到斯基德摩尔一类的旅行作家，许多观察家都利用了在其他殖民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方法和技术来组织“数据”，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之间进行比较，通常是在种族类型学



基础上进行比较。这样一类有关中国的新文献就可以部分地被理解为在工业化的欧洲和北美十分普遍的种族话语和文明话语的一部分。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主要是因为有关中国人的知识能够发挥实际的作用，尤其是当这些知识和人们认定这个种族所具有的那些整齐划一的性格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正是这类知识的实际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决定了欧美人对 1900 年事件的反应，决定了对犯下反文明罪行的中国人的惩罚方式，并且最终决定了义和团起义后的最后解决方案的形态。

出于这一理由，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在中国国内外流行的欧美人的种族观念。种族一词在西方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发展历史，对之进行全面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不过，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种族概念在 19 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变化。到 1860 年左右，种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一直被用来标示那些具有同一血统或者同一祖先的族群。在某个特定民族对历史进行回顾性重建时，常常会使用这种意义上的种族概念。与此同时，不同种族所具有的某些独特的特征——即造成不同族群的那些不同的面貌体征——通常被解释为不同环境或者不同气候的结果。

种族的这一定义在 19 世纪下半叶被置换了。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在西方社会的广泛传播，种族一词开始用来代表某个族群——被认为是用类似生物学的术语界定的特定的、严格限制的人群的一部分——所有人共同具有的重要生物特征。正如迈尔斯 (Robert Miles) 在其关于种族概念的研究中所说：“科学旨在表明，每个‘种族’的生物特征决定了每个人群的心理能力和社会能力，按照这些能力就可以给这些人群划分出等级。” (Miles 1989: 31 - 32; Stocking 1968)。这样，种族就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术语了，它还是一种组织方式和评价方式，并最终成为一个影响世界所有人的指导性概念。当种族与欧洲扩张结合在一起时，这个概念就为为什么白种人统治非洲人、印度人和亚洲人（而不是相反）找到了理

由和解释，从而证明他们的统治是正当的。换句话说，有关种族的科学提供了一个使“白人至上”自然化和正常化的理论框架。

这些发展的结果至今还具有深远的意义，并且继续影响着各民族之间的全球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欧洲扩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那些被欧美殖民国家征服的非欧洲民族来说，是一场大灾难。中国人，尤其是居住在东部沿海一带的中国人，也不是一个例外。西方人在通商口岸的特权所依据的基础就是白人种族优越论，它将中国人构建成为一个完全种族化了的他者。到 19 世纪 90 年代，尽管中国人自身也存在着语言和文化差异，但已经被看做是一个具有统一特性的单一族群了。

此外，人们对这些特性已经有了了解。也就是说，像有关中国其他领域的知识生产一样，中国人本身也已经被分析过了。结果，他们被按照一个普世的衡量标准放到某个位置上。这个标准最简单的形式是以肤色排列的等级次序，即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或者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和黑色人种。这一等级次序又得到其他一些同样简单化的图式的强化。例如，人脑的体积可能与文明程度有着某种关联关系，较大的人脑意味着较高、较先进的文明，较小的人脑意味着较落后的文明，而更小的人脑则意味着野蛮。另一个等级次序形式是重演论，认为“低等”族群的成年人的进化程度只相当于高等族群中更为年轻的一代。照此推论，成年黑种人只能相当于高加索人种的儿童，而蒙古人种的成年人只能相当于高加索人种的青少年（Gould 1981: 40, 114 - 116）。然后，主要人种下的亚群又被赋予一些具体特征，以支持这些粗略的概括。

这些等级次序中和我们有直接关系的是，蒙古人种总是被放置在“最先进”与“最落后”民族之间一个虚构的中间点上。这样一个中间位置似乎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赋予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那些特性往往具有某种混合性质。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讨论的 1840 年以来的中国研究潮流中，也包括对中国人特性的大量分析。其中有



的研究利用了一些较早的概念，这些概念就像迈尔斯（Miles 1989: 33）指出的那样，即使在被纳入种族话语中以后也没有消失，一直相对稳定地代表着中国人的特性。但是，随着有关中国人特性的资料的积累，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是许多相互矛盾着的特性的结合体^①。“中国人的性格和状态”^②包括“灵活的不灵活性”，愚昧无知而又能够故意让人误解，诚实而又伴随着狡猾、机巧和神秘莫测^③。最为矛盾的是，中国人勤劳，能令人难以置信地长时间工作而不知疲倦，但中国却是一个停滞的、沉睡的、明显衰退中的国家。的确，中国人性格中的两极对立使得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这方面文献的霍尔（Ronald Hall）认为，有关中国人性格的结论性著作至今尚未出现，部分地是由于这方面的权威研究似乎相互进行了否定^④。

尽管如此，中国种族的行为特征中这些被记录下来并且被大量亲身经历所验证了的矛盾性，仍然可以用来解释中西关系中的问题以及中国人发展停滞的现象。中国人的能量或者被封冻了，或者被导向歧途，像威妥玛所说的那样，进入到了那些表象与真实或者影子与实质之间的区别被混淆了的领域。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孤立与停滞所造成的这种特殊发展状况，又使得许多人发现了中国人的一种主要性格，这就是中国人的“面子”观念。

-
- ① 基厄南在其有关西方帝国主义的研究（Kiernan 1986: 159 - 164, 170 - 174）中指出，这种奇特的矛盾使得中国人成为有色种族中最优秀的种族和“黄祸”。
- ② 这一短语引自谢卫楼（D. Z. Sheffield）1900年9月27日给史密斯（Judson Smith）的一封信，传教士常用它作为鼓吹对中国人采取更严厉措施的理由；引自 M. Young 1968: 188; Miller 1974: 274。
- ③ 这些老调得到许多中国人性格的观察家们所确认。见 A. Smith 1894（引文出自该书）；Ball 1893: 91 - 103。它们也已经被纳入19世纪末的百科全书计划之中，例如可见 Ridpath 1893, vol. 7。
- ④ 对于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们的权威评述中那些相互矛盾之处，霍尔 [Hall (1931) 1966] 聪明地把它们同时列举出来，以供对照。

无论怎样强调这一“发现”及其重要性，或许都不为过。面子观念不仅在制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在华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一直作为一种因果关系因素或者解释性因素影响研究中国的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对于我们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有关面子问题的分析是帝国档案中国部的知识论综合体的产品之一。面子问题确实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在19世纪末出现的，是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著作中渗流出来的。作为当时研究中国人行为最具影响的专家之一，明恩溥把面子定义为“既是理论也是中国实践的组成部分”，一个“真实”（应和威妥玛的话）在其中远不如“表象”重要的部分。他解释道：“如果能保住表象，真实就可以整个放弃。这就是在中国不绝于耳的神秘的‘面子’的本质。蒲柏（Pope）的诗句可以作为中国的民族格言：‘演好你的戏，一切荣誉都在那里’。要注意，不是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而是要好好演出，要尽力去传达某事或者某物表面的东西，而不必在意真实究竟是什么”。明恩溥还补充说，中国人做事总是离不开得到面子、保住面子或者丢掉面子的过程。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不得不表现得“专横粗暴”、“勃然大怒”或者使用“辱骂甚至诅咒性的语言”。这样一类行为的重要性，是要向观看他“正在演出”的这出“戏剧”的“看客们”表明，他“明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到底应该怎样做”。如果演砸了，就要下台或者“丢面子”^①。这里的用语很重要，因为在明恩溥对面子的理解中，中国人就是将整个世界当成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就是一

① 引自 A. Brown 1904: 37-38。明恩溥 1894 年的书的第一章就恰到好处地取名为“面子”。黑福德（Hayford 1985: 153）指出这本书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被广泛阅读，麦克拉斯（Mackerras 1989: 51）认为这本书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还在继续发挥影响。明恩溥仿效当时的人类学，特别是它广为流行的通俗形式，利用假设的生理特征来建立种族等级次序。有关明恩溥对鲁迅影响的讨论见 L. Liu 1995。有关当时的通俗人类学及其在美国社会的传播见 Rydell 1984。



切，真实并不重要。

这种“中国人特性”被描述为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准确再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以无可置疑的形态传递给了我们。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面子是否曾经是（或者现在仍然是）中国人实践活动中一个实际的组织范畴，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它在西方有关中国人的话语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①。明恩溥一类传教士的中国知识，把面子构建为种族他者的独有属性，否认西方人自己也关注面子或者表面现象，或者否认他们的话语活动实际上可能也在制造面子问题。西方人把中国建立在这样的构架中（实际上是让他们的分析对象为有关面子的错误观念负责），就可以用这一知识来操控在华活动了。此外，就像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的，面子也可以用来为欧美人针对中国人或中国采取的一系列暴力行为和仪式化的行为辩护，理由是对中国人的面子一定要针锋相对，羞辱他们，让他们丢掉面子。

于是，到19世纪末时，就出现了一门非常重要的有关中国人的“社会学”，它融入更为广阔的种族话语中，并且充实进中国特有的具体要素。之前，在从马戛尔尼勋爵到额尔金勋爵的历届英国使节们的思想里，在甚至威妥玛一类怀疑论者在19世纪下半叶都能够向前推进的规训计划中，都可以看到一种与中国人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的乐观态度。但是这种有关中国人的社会学知识的出现，使得这一乐观态度实际上已经崩溃。现在几乎没有英国人会相信，可以教导清朝统治者沿着一条建设性的改革道路前进，使中国作为一个心甘情愿的伙伴被整合进一个英国人主导的亚洲之中。相反，和其他许多在华外国人一样，英国人认为清廷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它仍然排外、孤傲，与列强全球政治的现实相疏离。在中国国内及国外，远东问题不仅仍然没有解决，反而由于许多新的国家和

^① 对于被翻译成“face”的多种汉语表达方式的语言学分析，见 Kipnis 1995。

利益集团的参与，变得比40年前更为复杂。何况，无论清朝取得多大成功，学会多少课程，似乎也无助于解决远东问题中那些和俄国在这一地区野心有关的内容。

博弈的状况

英国在西亚的努力暂时制止了俄国的挺进，也阻止了俄国在地中海或者波斯湾获取不冻港的企图。这些成功也使得俄国的力量转而东移，移向东亚、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Fletcher 1978c: 335 - 337）。为这一扩张开路的，不仅有俄国的军队，还有其铁路线。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的铁路建设从克拉斯诺沃茨克的里海港口开始，在塔什干—撒马尔罕地区会合。这条铁路沿着阿富汗——它本身就有一条铁路线穿过开伯尔山口进入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界，最后到达费尔干纳地区的安集延。这一扩张的结果是俄国于1873年征服了浩罕，在西起阿塞拜疆东到帕米尔和费尔干纳地区的西南亚巩固了沙俄帝国。另一条俄国铁路线穿过西伯利亚向东推进，于19世纪90年代到达贝加尔湖。1896年与清朝签订修筑穿越满洲的铁路的条约后，俄国铁路于1905年延伸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Hopkirk 1992: 438, 502; Clubb 1971: 119, 123）。正是这些俄国的铁路建设特别引起英国的关注。一位参与大博弈的人曾说，这些事件有力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政治的重心”（Michie 1893b: 635）。蛮力似乎也有能力改变大博弈的规则，那些迄今一直建立在阴谋、情报和欺诈基础上的规则。

有人甚至认为俄国的铁路力量可以和英国的海军优势相抗衡。要控制幅员辽阔而又有着众多山脉的亚洲，关键因素可能就是能够穿越荒野地带运送大批军队的铁路。这一类的可能性使人们开始想象，英国在亚洲的哪些利益将面临灾难（例如 Krausse 1900b: 196 - 217）。1894年俄国和法国的结盟更进一步加重了英



国人的担忧^①，因为当这一结盟的影响投射到东方时，人们认为英国在华利益将会受到铁路建设带来的严重威胁。法国占领了东南亚的许多地区，也就有可能将铁路推进到中国南部，而俄国进入满洲，构成了从北方进行侵略中国的威胁。夹在这两个列强之间的，正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主要地区——长江流域 [Langer (1935) 1965: 390 - 393; L. K. Young 1970: 40]。这一威胁确实是非常明显，甚至连因写作有关海权论的著作而闻名的美国海军军官马汉 (Alfred Thayer Mahan)，也对俄国横跨亚洲的铁路表示担心。他在 1899 年和 1900 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俄国是一个天生的扩张体，其野心是吞没整个亚洲，只能通过一个强大的陆基力量把它包围起来，才有可能遏制这一扩张。既然这样，就只有从苏伊士运河一直延伸到中国东部的英帝国，才是完成这一任务最理想的力量。但是马汉和他的英国同行一样，对英国是否具有充分的资源和意志表示怀疑 (Mahan 1899 - 1900, 1900)。

恰恰是这样一种地缘政治的想象引起了恐慌，这一恐慌超过了通常那种以种族为基础的恐俄症。这种恐俄症长期以来一直把沙皇描绘成一位东方暴君，而把他的哥萨克军队描绘成愚昧、残忍的野蛮人，只会像匈奴人一样进行抢掠。和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观点相反，英国许多研究东方问题的著名作家尽管也承认种族的重要性，但是认为现代俄国的扩张主义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的历史现象。它的危险性在于俄国人的目的在各个时期的一致性，以及为实现其帝国目标而不惜使用所有手段的坚定意志。在克劳斯 [Krausse (1899) 1973] 和柯乐洪 (Colquhoun 1898, 1900) 一类作家看来，当英国的决策者们悠然自得的时候，需要引起警惕的正是俄国人的耐心和谨慎。

沿着这一思路走到尽头，就是关于英帝国灭亡的梦魇般的幻

① 关于导致这次结盟的政治阴谋的分析，见 Langer [1935]。

象，这一幻象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集中在英国人早先有关中国的著述中。在19世纪90年代被重新发现并被“现实主义”的恐俄者们经常引用的英国作家中，有19世纪中叶担任英国驻华领事并且写过几本有关中国的著作的密迪乐。密迪乐在其中一本书中预言，如果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不被制止的话，那么不仅沙皇将会成为中国的君主，还会得到把所有欧洲国家赶出亚洲去的人力资源。这种论点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更进一步的支持，因为这时很多人认为俄国人更多的是亚洲人而不是欧洲人，因而与中国人有着很自然的亲密关系。因此，对英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强行打入俄国和中国之间，以确保它们之间的可怕联盟永远不能实现（Boulger 1900：533；Colquhoun 1898：350 - 351）。

这一类俄国威胁论的观点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公开出现在英国和印度的出版物上。俄国的每一次推进，它从中国得到的每一次让步，俄法之间可能会对英国不利的每一次勾结的迹象，都会引起新的恐慌（Hopkirk 1992：418 - 425）。俄国的进展也促使一些从事这类写作的重要作家由陆路穿越欧亚大陆，亲自进行考察。当他们返回伦敦以后，就俄国对英国利益的威胁以及对清帝国继续存在的威胁，发出严重的警告^①。这类警告也可以在英国殖民官员的言论中发现。柯曾（Curzon）勋爵甚至在1898年出任印度总督之前，就表示了对俄国扩张的担忧，并且驳斥了认为这一不可避免的潮流难以遏制的观点^②。

然而，伦敦政治领袖们头脑中的想法与此完全不同。当然，历届内阁中都有人担心俄国人，但到19世纪末的时候，另一种观点

① 见 Michie 1864, 1893a, 1893b。后两篇是他为《布莱克伍德》杂志写的文章。也见 Colquhoun 1898；Chirol 1896。

② Curzon 1967；Gillard 1977：172。也见 Goldman 1905 中斯韦坦汉（Swettenham）、卢加德（Lugard）夫人、豪尔迪奇（Holdich）和稽洛尔（Chirol）的文章，他们描绘出一幅俄国在整个亚洲和赤道地区对英帝国构成威胁的可怕图景。



占了上风。沙皇帝国确实十分强大，但它还不是一个工业和技术的巨人。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意味着俄国不容易突破英国在亚洲南部边缘对它的遏制。另外，俄国力量转向东方（如西伯利亚和满洲），也就削弱了它对其他地区的压力，尤其是印度北部边境地区（L. K. Young, 1970: 41 - 42）。为什么不能通过一个限定“势力范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喜欢使用的词——的协议，来鼓励俄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远东去呢？只要任何一个现存的协议不会被否定，只要中国保持其领土的完整，在远东被明确界定并被明确划定界线的俄国力量就能给英国带来好处 [Langer (1935) 1965: 468 - 469]。英国政府于 1898 年提出了这一想法，向俄国人论证说，两国在中国的对立立场实际上只会造成两败俱伤，而如果双方能达成某种谅解，就会使双方在各自认为最重要的中国地理区域里更加有所作为。结果，英国和俄国于 1899 年达成了类似协议的东西。双方通过相互交换照会的方式表示，英国同意不在长城以北寻求铁路特许权，而俄国也就长江流域做出了同样的保证 [Krausse (1899) 1973: 387 - 388]。然而，这一协议一点也没有平息人们对英国政府面对俄国挑衅表现出的无能所进行的批评。

伦敦反俄战线中那些较为直率的成员中，包括以研究远东问题为业的克劳斯。19 世纪 90 年代，他出版了好几本有关远东问题的著作，包括《衰落的中国》[Krausse (1900a) 1973] 和《俄国在亚洲》[Krausse (1899) 1973]。当义和团起义爆发的时候，他这两本书都出了新版本，他还签约撰写了《中国危机故事》(Krausse 1900b)。克劳斯在最后一本书中指出，1899 年的铁路协定已经被违反，在给予一家比利时财团修筑京汉铁路的特许权中，俄国拥有大部分股份 (Krausse 1900b: 143)。

像其他的现实主义的恐俄者一样，克劳斯强调了俄国目标的连续性以及如果沙皇成为中国君主会对英国构成的威胁。但他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他发现英国政府努力在中亚建立“缓冲国”和促进

中国“门户开放”的政策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克劳斯对大博弈战略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还要求人们清楚地看到英国力量的有限性。这就意味着，面对俄国不可避免的胜利，既不能撤退，也不能沮丧，而要务实地认识到英国需要盟友遏制俄国的前进。在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遏制苏俄帝国之前半个世纪，克劳斯就主张采取遏制政策以赢得必要时间，让俄帝国的内部矛盾造成它自己的崩溃 [Krausse (1899) 1973: 319 - 322]。

克劳斯还煞费苦心地将俄国的亚洲政策同英国政策进行了一番比较，发现后者似乎缺乏前者所具有的果断性和目标意识。当然，他说的或许是英国那些反对帝国的人。在他用来进行对比的诸多方面中，有一个是俄国人喜欢在亚洲使用惩罚性力量，惩罚过程中动辄就会屠杀成千上万的人。然而，克劳斯并没有将这类行为看做是俄国野蛮主义，反而认为它是一种精心计划的政策。无论在俄国人还是亚洲人看来，这一政策都是对付亚洲人心智的有效工具。作为下一章所要讨论的某些观点的铺垫，或许有必要引用克劳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论述：

俄国人指出，英国关于惩罚性远征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在亚洲退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你要给亚洲人留下印象，你就要采取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对待他们。亚洲人残忍、贪婪、无情。他们根本不懂仁慈，对他们施以仁慈毫无用处。如果必须要进入一个亚洲国家并且给它的人民树立一个榜样的话，那么退缩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愚蠢。因为退缩会被理解成失败，一支征服军的撤出会被认为是不能够继续留下来的表示。然而，英国却不断地重复这样的退缩政策，而每重复一次，它的利益就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当然，并不只是克劳斯一人有这种种族主义观念，而且从说话



方式上看，这段话也不会令人感到特别震惊。但必须记住，这段话不仅仅是为使用武力进行的辩护，与之一脉相承的，是种族分类的“科学”和殖民环境中产生的新知识所制造出来的统一的东方人特性。当1900年中国冲突爆发时，正是这个统一的亚洲人形象成为欧美人授课的对象。不过，这一次授课的重心不是要劝诱中国人成为合作者，而是帝国教程中硬的一面。用美国赴华救援远征军总司令查飞（Adna Chaffee）将军的话说，要在中国恢复和维持秩序，就需要进行“直接而且持续的”惩罚^①。在欧洲全球霸权和帝国竞争的时代，对不顺从的他者的惩罚从来就不曾间断过。

^① 引自 Hunt 1979: 529; 也见 A. Smith 1901c: 869。

第三部分

使中国完全平等

进

导 语

在殖民世界建立秩序的整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它不停顿地敲击着有节奏的旋律，使土著的社会形式解体，并毫无保留地打碎了经济、服饰习俗和外部生活的关联体系。而一旦土著人决定亲自来创造历史时，他们将会诉诸这同样的暴力，潮水般冲进那些禁区之中。

——弗兰茨·法农 (Frantz Fanon), [1963] 1966 年

1900年，中国北方的农民们运用欧美对华侵略所运用的同一种暴力，潮水般冲进传教站、具有在华通行权的铁路以及北京使馆区等“禁区”之中。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只是同时发生的普通民众要求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其生活破坏的诸多斗争中的一次。多种力量和多个事件的因缘际会，引发了这次起义。这其中包括清王朝政治上的虚弱无能、华北民众所面对的社会经济大混乱、西方公司（特别是矿山和铁路公司，人们认为它们在中国乡村的活动干扰了天地的自然循环）的经济扩张、干旱和坏收成、

列强间的竞争以及西方人和中国人在许多问题上的冲突等。和其他起义一样，这次起义并未获得重大成功，但它迫使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重新思考西方在华事业的性质。

对于列强驻华代表们来说，这次起义尽管是一次巨大震动，但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可以利用它来一劳永逸地改变清朝有关帝国统治权的观念，利用它来给清廷及其臣民一个深刻的教训，让他们知道反抗欧美在华势力的严重后果。对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来说，这次起义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表明了清王朝的腐朽，其中部分人更从中看到了君主制的腐朽。到1900年以后，在那些最了解情况的中国人看来，问题已经不是清王朝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而是它到底还能存在多久了。对于生活在华北平原上的普通中国民众来说，这次起义意味着列强对直隶省——清朝首都北京所在的省份——长达一年之久的占领，意味着大规模屠杀、集体性惩罚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而对传教团体来说，这次起义表明它们传播文明的使命可能存在着一些难以逾越的边界。

这一部分的三章将考察列强在中国北方的惩罚行动和长达一年的占领，以及义和团起义本身的影响。而义和团起义中的那些事件，将不在讨论之列。义和团起义的历史、中国教民和欧美传教士被杀害的情形、北京使馆区的围困和解救以及这一事件最后的解决，已经被叙述过许多次了。最近，周锡瑞（Esherick 1987）和柯文（Cohen 1997）充分利用了现在在中国可资利用的大量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及欧美档案资料，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论述。他们的著作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我的兴趣与他们多少有些不同。我试图进行探讨的，是19世纪后半期欧洲和美国的全球性扩张所引起的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过程的影响。因此，我的主题还是前面两部分所讨论的那些问题：战争和技术变革的关系、知识生产和帝国教程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帝国想象（如大博弈与有关民族或种族命运的虚幻想象）



之间的关系。我想通过对义和团起义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论述，考察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与西方扩张的诸多内在矛盾之间的复杂互动。就像本书最后一章所表明的那样，直到现在，西方扩张过程中这些内在矛盾所产生的影响都还没有消失，还在塑造着现在。

1900 年的那些事件至今仍在回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对这些事件报道的大规模扩展，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美国和中国本身对中国历史的接受和理解。到 1900 年，已经出现了全新的信息处理机制来开发这一新闻事件，其规模之大，在 1860 年是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扩展着的交通运输系统将中国东海岸与世界联结起来，轮船与铁路网络在两三周之内就能把记者们送到现场。穿越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底电缆，使记者们能够通过电报迅速地与欧洲及北美取得联系。新的印刷技术，尤其是能提供插图的新印刷技术，可以以极快的速度，将中国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包装起来，传播出去。这种信息处理和传播的形式，使得信息本身也成为一场演出，让广大范围内的观众都能够间接地参与到事件之中。而由于新信息如此之多，读者对事件的反应也难以完全预料得到。

这些新技术以及将它们综合起来的联系网络，使人们能够非常迅捷地利用那些爆炸性新闻。在使馆被解救前三天，“几内亚黄金”的广告^①（图片 12）出现在 1900 年 8 月 11 日出版的一期《伦敦图片新闻》上（*ILN* 17.3199, 1900: 213）。它的部分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与殖民联系着的大量事物——商品作物（这个例子中是烟草）、海上帝国、本土劳工、本土军队以及对起义的镇压——是怎样把帝国的资本主义和“反叛的”非欧洲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在美国，也有在商业广告中利用历史事件的同类事例。在

① “几内亚黄金”是英国奥格登烟草公司发行的香烟品牌。图片右下角的文字是：“如果没有‘几内亚黄金’，即使是英勇善战的锡克人和廓尔喀人，也不能把义和团装到箱子里。”——译者



图片 12 “几内亚黄金” 的广告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1 August 1900.

几则这样的广告中，运用了说明在华活动和军事行动情况的地图，包括从大沽到北京一路情形的绘画，而在一个印刷公司的广告里，一则商业广告直接地被插入到地图上。但是，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几内亚黄金和美国地图的广告，它们的主要意义都在于这样的事实：这类广告毕竟是出现了，人们运用丰富的殖民想象和殖民知识制造出此地与彼地、民族和帝国相互联系着的感觉，从而轻而易举地把中国事件包裹进大众媒体和商业广告之中。

除了这个初步成长起来的印刷资本主义网络以外，中国事件本身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加以利用的戏剧性内容。有关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传教士被杀害的报道，不仅是能够激起人们强烈感情的大新闻，还会使人回想起殖民世界发生过的其他针对白人的暴行。此外，京津之间的电报线于7月被切断后，与北京使馆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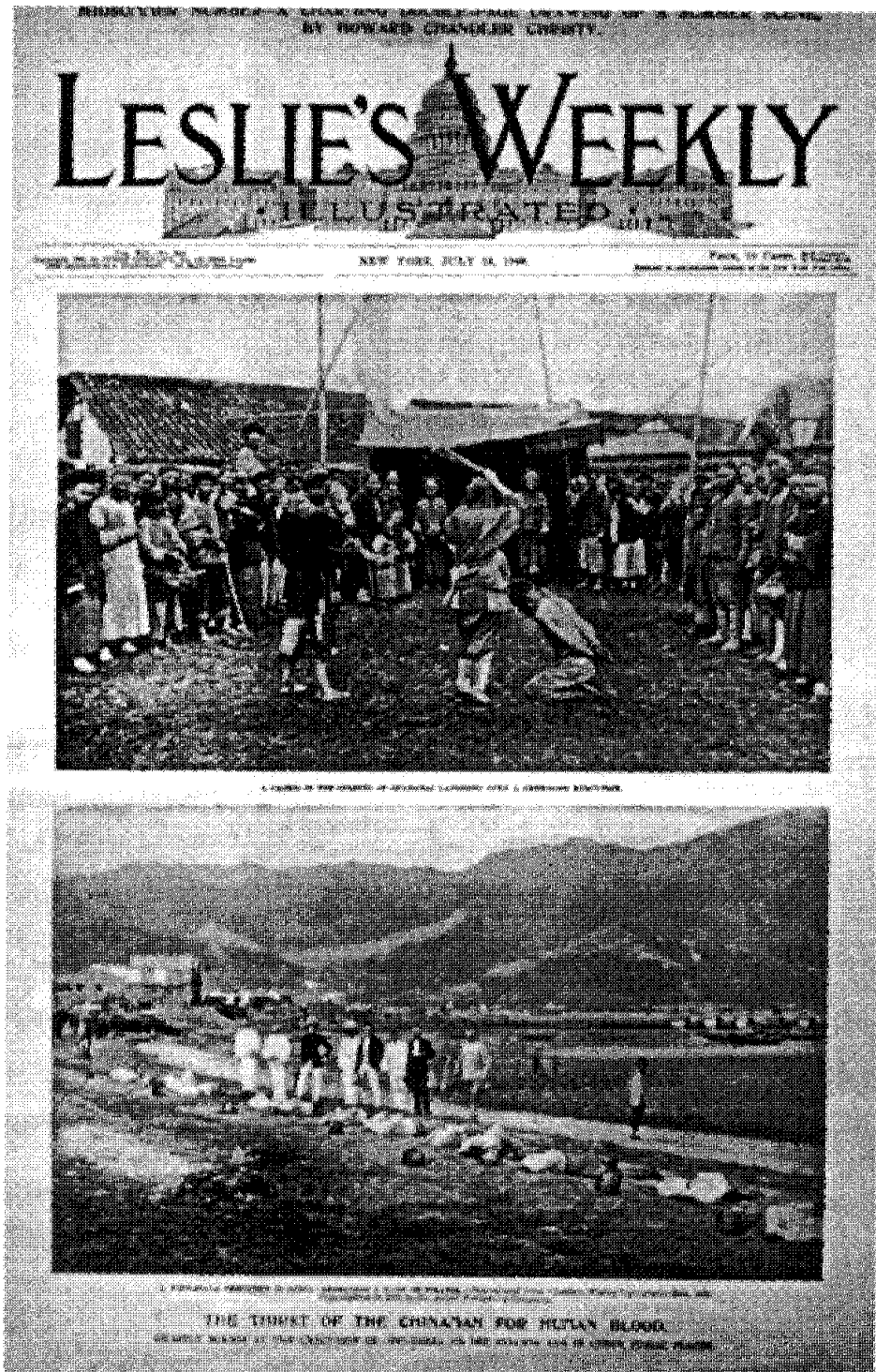
暂时中断。这种形势立即使英国人想到南部非洲的事件，布尔人的军队在那儿围困了金伯利、雷迪史密斯和马弗京（Pakenham 1979）。就在与北京使馆联系中断前几个星期，马弗京才刚刚得到解救。这样，由于几百名在华传教士和使馆人员的命运不能确定，人们对东方的野蛮行为进行着充分的猜测和想象，从而使得解救使馆的远征具有某种史诗般的色彩。一些报纸凭借它们自己的档案，提醒它们的读者注意东方的野蛮性，并且预先提出了以后惩罚义和团的多种方式（图片 13）。

来自中国北部的新闻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媒体环境。自联军在大沽口登陆那一刻起，新闻记者们就开始了工作。他们关于战争情况的报道，包括对抢劫活动和联军士兵凶残行为的生动描画，不但发表在他们各自的报纸上，而且还被通商口岸的报纸和欧洲北美的评论杂志所转载。此外，有关 1860 年事件的记载——包括德埃里松的记载——又重新发表，也有人迅速地对这两次战争进行了对比（Read 1900）^①。尽管这些报道并没有多少夸张之处，但仍能让读者感觉到劫掠活动的广度、范围以及暴力的规模。然而，在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也许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义和团起义的发生及其直接后果^②。

1899 年夏末和秋季，长时间的干旱和饥馑使华北平原的农民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受到影响的有直隶、山东和山西东部的许多地方。随着形势不断恶化，农民和城镇民众开始思考土地上的神灵们抛弃他们不管的原因。除了灾害性天气所引起的社会大动荡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是人为制造的，尤其是欧美传教士以及规模不大却善于表达的基督教教徒团体的力量在乡村

① 再版的出版物包括罗亨利 [Loch (1869), 1900] 关于 1860 年事件的记载；而奥尔古德 (Allgood 1901) 的日记则是第一次发表。

② 对义和团起义最全而最简明的回顾，见 Cohen 1997: 14 - 56。



图片 13 “嗜血的中国佬”

Leslie's Weekly, 21 July 1900.

地区的不断增长。持续的干旱加剧了不同社群之间的紧张，最终导致一场反基督教和反西方的民众运动在中国北部地区爆发（Esherick



1987)。1898年和1899年就发生过义和团组织攻击基督教徒和一些传教站的事件，但当时它还只是一个地方性运动，主要在山东省西部地区进行活动。

1899年秋天，有关义和团活动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外国报纸上。这年12月，英国传教士卜克斯（S. M. Brooks）在义和团活动的地区被杀害。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爵士在次年1月初发回英国的一份电报中，认定一个叫做“义和拳”的“秘密会社”是混乱的主要制造者（Cohen 1997：44）。此后不久，各国驻华使馆的公使们就向清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对这些活动表示遗憾，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在此后几个月中，随着有关义和团活动的报告越来越多，外国公使们认为清朝政府未采取措施来控制局面，并为此提出抗议。5月中旬，义和团在直隶的活动迅猛发展，集中在北京南面通往保定的铁路沿线一带。高洛村的天主教堂被毁坏，30多个教徒家庭全家被杀。为了制止这种暴力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清政府派出军队前去镇压，但义和团杀死了为首的军官。紧接着，京保铁路和京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清廷内部分裂成亲义和团派和反义和团派，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首鼠两端，不知所措。到5月底，部分地是在外国军队抵达直隶的报告刺激下，反对西方的浪潮日益高涨，清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镇压这一运动的可能性。6月初，义和团杀死了几名欧洲人，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义和团活动规模更加扩大，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月中旬，各国使馆向海滨发出了进行援助的请求。6月13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Edward Seymour）率领一支主要由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多国部队出发，试图去保护各国使馆。几天之后，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这支远征军受到了清朝军队和义和团的阻击，在遭受了重大伤亡之后，退回到天津。使馆与海滨的联系也在这时中断。

在此期间，在几天之内分别发生了两个突发事件，日本使馆书

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ts von Kettler）男爵在冒险离开使馆区的时候被清军士兵杀害。6月20日，清军和义和团向使馆区开火，围困就此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4日。1900年7月16日，伦敦《每日邮报》曾经发表了一份驻上海特别通讯记者的电报，报告说使馆区已经被占领，所有外国人全部被屠杀^①。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立即开始着手组织悼念活动^②。

在这份虚假报告7月份到达欧洲和北美之前，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日本和美国就已经开始组织军队，派往中国。它的目标是解救被围困的外交团^③，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中国这种公开侵犯“文明”和“国际法”的行为进行惩罚。与德皇威廉（Wilhelm）关系密切的德国将军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伯爵，负责指挥这次国际救援行动^④。这些入侵的军队沿着英法军队1860年走过的同一条路线前往北京。所有记载都表明，战斗是非常残酷的。天津的许多地方被毁，进军路线上的许多村庄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瓦德西9月底抵达中国的时候，形容从海边到北京的一路是“疮痍满目”（Waldersee 1924: 216）。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可以肯定，至少有几千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害。8月14日，在两周多的实际战斗之后，联军夺取了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使馆。

接着，西方列强开始对被美国报纸称为“黄色恐怖”[见 *Leslie's Weekly* (LW) 28 July 1900, 25 August 1900] 的行为实施报复。许多

① 发表这一故事的还有 *The Graphic* (7 July 1900)。

② 部分原因是由于公布了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 Conger）的一份电报，称使馆被围困但未被占领，使《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告的准确性受到怀疑，圣保罗大教堂的悼念活动才未能举行。见 Fleming 1959: 134 - 137。

③ 从使馆被解救后不久直到最近，围困使馆的故事被讲述了许多遍；例如，见 Fleming 1959; Hoe 2000。

④ 瓦德西直到使馆被解救以后很久才抵达中国，他到中国后，已经很难维持对所有部队的指挥权力。



支惩罚性远征军被派到北京的腹地去，在北京的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公开处决所谓的义和团的场面，整个北京和直隶的许多地区都遭到了劫掠。不必说，斯基德摩尔（Skidmore 1900）关于这场动乱将造成大量中国艺术品流向市场的预言最终成为事实。但是，义和团“大动乱”远远不只是打开了艺术品市场的闸门，它还重新改造了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其范围和惩罚力度都远远超过了此前强加给清王朝的任何条约。实际上，当最后的协议生效以后，清朝的统治形态已经不再存在，留给中国的是一个极其衰弱的政治体制。在政治上贸易上各种限制的重压之下，在需要支付给各个国家大量赔款的拖累下，这个政治体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再获新生的任何能力。

第六章

恐怖统治：北京及 周围地区的惩罚与报复

使馆被解救以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发动了另一场战争，一场以中国主权和文明的“象征”为目标的象征战^①。在1856~1860年的冲突中，中国百姓似乎还比较通情达理，没有与不遵守约章的清廷站到一起。而现在的情形与那时不同了，敢于冒犯西方的人似乎第一次包括了每一个中国人。因此，象征战并未局限于北京。在传教士遭到杀害的保定和太原，欧洲和美国的军队炸毁了城墙城门，破坏了寺院庙宇。在北京以外进行的这些报复行动，与联军进行的那些劫掠、强奸和杀戮行为很不一样，它们并不是无目的的侵略活动，而是刻意要颠覆和压倒被认为有错咎的中国信仰。在他们看来，被一个传教士称为“黄色罪恶”，而被另一个传教士称为“阴影笼罩整个世界的可怕灾难”（Coltman 1901；Reid 1901, 1902）的义和团起义，就是由许多中国信仰直接造成的。因此，胜利者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报复，他们还希望让中

① 对使馆被解救后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历史事件的研究很少，但亨特（Hunt 1979）考察了美国占领的有关问题。



国人能够从中接受教训，使得未来不再发生类似的灾难。

当然，象征战所具有的这两方面——报复和规训，与英国军队在1860年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焚烧圆明园和《天津条约》特别强调形式的签署仪式非常相似。两者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参加在华军事行动的外国军队的数量和多样性方面，而且表现在1900年的各种报复行为已经能够在过去几十年中制造出来的“中国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西方人已经知道中国人能够理解什么，中国人具有什么样的性格，西方人还有着在非洲和亚洲数十年殖民统治中培育出来的毫不含糊的西方文明优越感。此外，联军行动的目标——至少是某些行动的目标——是要把中国人纳入到基督教“因果报应”的道德世界之中，并且给中国及其人民留下一个不被遗忘的“标记”。如果要让清廷尊重国际法，如果要让各个基督教会和被破坏的地区重新建立起来，这样的行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这些有组织暴力的影响也扩大到中国和中国人以外，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各种各样的惩罚行动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出现在欧美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以及画报上。就画报来说，它们所登载的不仅有绘画和用照片做成的雕版印刷品，也有照片本身。1860年时照相机已经出现，而到1900年时已经非常普遍了。这时的摄影师们已经掌握了一整套全新的摄影技术，包括柯达生产的能重装胶卷的照相机以及民用和军用的专业摄影师们所使用的全套设备。电影摄影机也已经出现，人们还能够从气球上拍摄照片。摄影技术的使用增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报道角度，远远超出了贝亚托1860年记录性报道的水平。得益于照相机的使用，1900年的军事行动把惩罚行为转变为一种权力的表演，一个欧洲观众也能够观看的宏大场景。因此，我们应当明白，尽管本书没有把所有照片都翻印出来，它也能够活生生地描绘出下述历史中出现的全部主题。

无序惩罚和有序惩罚

一个被围困在北京使馆的欧洲人翟兰斯（Lancelot Giles），在使馆被解救的当天，即 1900 年 8 月 14 日，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下了他被联军解救后的快乐：

我们终于获救了!!!!!! 那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握不完的手！锡克士兵们拍着你的后背！满身污垢的士兵们相互拥抱！……

那天下午我和一群清除城墙上敌人的士兵们一起来到了前门。一些中国士兵从前门下面的大院里跑出来，向我们开枪。他们被击中。在前门上安放了两挺马克辛机枪，对着匆忙地穿过内宫大院的人流。另外还有 50 到 70 支来复枪也对准着他们……杀人无数。每天都有一帮帮的人出去劫掠，抢所有能抢的东西。我也抢来一些好东西。你先别着急，等着我，相信我。我现在不能再多写了，因为已经激动得快要疯了，甚至都不能在桌子边上坐下来了。（Giles 1970：177 - 178）

翟兰斯所说的疯狂，以及他所参与的杀戮和劫掠，在其他许多资料中都有记载。当士兵和非军事人员把他们的枪口转向逃亡的北京市民时，大批的掠夺者们突袭了这座城市。

然而，甚至就在这种似乎随意进行的发泄快乐的暴力将目标指向中国人的身体和财物时，外交使团和军队首领们正在计划进行一场有计划的惩罚，其性质与他们对中国人精神心理的理解密切关联。换句话说，这种惩罚计划的目的是要使中国的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丢失面子。就中国君主来说，屈辱从联军攻进紫禁城就开始了。我们关于面子问题的专家明恩溥注意到，西方的大炮轰开了前门正中那



个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的的大门。明恩溥补充说，和“不堪一击的中国高墙”具有同等意义的事物，就是西方的大炮（A. Smith 1900: 498）。

外国人不仅侵入到紫禁城内许多宫院和大殿，他们还这样羞辱中国皇帝：坐到皇帝的御座上拍照（图片 14），进入皇帝和皇后的私人房间，在先农坛和天坛分别驻扎美国和英国军队，在天坛打曲



AMBASSADEUR DE FRANCE ET SA SUITE SUR LE TRÔNE DE LA MAISON IMPÉRIALE DE CHINE

<p>ABONNEMENTS AVEC PRIME France: 100 francs par an, 10 francs par trimestre. SANS PRIME France: 80 francs par an, 8 francs par trimestre. Adresser tous les communications au Directeur M. F. LEVY, Directeur 122, rue de Valenciennes, 122 Bureaux de Vente et d'Abonnements: 1, rue de Valenciennes, 1 PARIS</p>	<p>SOMMAIRE Mort de l'empereur de Chine, par M. de la Roche. Le Palais Impérial de Pékin, par M. de la Roche. Le Palais Impérial de Pékin, par M. de la Roche. Le Palais Impérial de Pékin, par M. de la Roche. Le Palais Impérial de Pékin, par M. de la Roche. Le Palais Impérial de Pékin, par M. de la Roche. Le Palais Impérial de Pékin, par M. de la Roche. Le Palais Impérial de Pékin, par M. de la Roche.</p>
---	--

图片 14 乾清宫御座上的法国公使毕盛及其随员

L'Univers Illustré, 21 December 1900.

棍球（图片 15），在天坛为身着全套军服的第 16 孟加拉枪骑兵部队拍照（图片 16），在天坛大门口驻扎“皮肤黝黑的”锡克卫兵——一名对种族问题显然十分敏感的观察家认为这是对中国皇帝恰到好处的羞辱^①。此外，英国人还取下紫禁城内清廷祭祀祖先的大殿中的牌匾，送到大英博物馆（A. Smith 1901b, 2: 548; S. Smith 1901: 133; Broomhall 1901: 12）。法国和德国也不落后，盗取了北京观象台的天文仪器，运到了巴黎和柏林（Conger 1909: 177; Fleming 1959: 252）。这些国家还夺取了总理衙门里有关各自国家使馆的文件，一位观察家把这一行为称为对清朝皇帝的彻底“羞辱”（S. Smith 1901: 138）。直到和约签订以前，这些文件一直被作为抵押品被列强所占有。



图片 15 英国军官和印度士兵在天坛打曲棍球

^① 例如丁韪良（Martin 1900: 138）和斯蒂尔（Steel 1985: 63, 65）都提到在天坛院子里打曲棍球和马球。至于把“黑皮肤的”锡克卫兵看做是对中国皇帝的一种羞辱，见 S. Smith 1901: 132; A. Smith 1900: 498。



图片 16 全身军装的第 16 孟加拉枪骑兵在天坛祈年殿

其他一些羞辱性的行为直接指向整个中国百姓。例如，英国人在北京高大的城墙上炸开一个大洞——一名幽默的人给它起名为“大英国门”——目的是要把铁路通到天坛（图片 17），这条铁路的修筑还包括对一个中国墓地的刻意亵渎^①。所有列强对焚毁佛教书籍似乎都很热心，部分是因为它们相信“佛教迷信”可能是义和团起义的基础（Lynch 1901：146 - 147）。因为在欧洲人的认识中，城墙和城门是一个中国城市最骄傲的象征，所以，毁掉它们，就像在天津和有传教士被杀害的城市里所做的那样，被看做是集体性羞辱的恰当形式^②。

① 见 Conger 1909：187；A. Brown 1904：197。斯蒂尔（Steel 1985：88）把为了修筑铁路而炸开的这个城墙豁口叫作“大英国门”，沃恩（Vaughan 1902：149）听说这条铁路会一直建到使馆区。

② 见 A. Smith 1901b，2：522；S. Smith 1901：130；Martin 1900：138。有关天津的情形，见 A. Brown 1904：197。在基督教传教士被杀害的城镇，也有着同样的行为。

在日常生活更为世俗的层次上，美国军队在其占领区内用剪掉辫子来惩罚那些犯有轻罪的中国人 [U. 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RG395, 943, 25 September 1900]。此外，清朝的宫殿以及满族贵族和其他北京富人的家被抢，东西被翻了个底朝天，有些地方被霸占为占领军的住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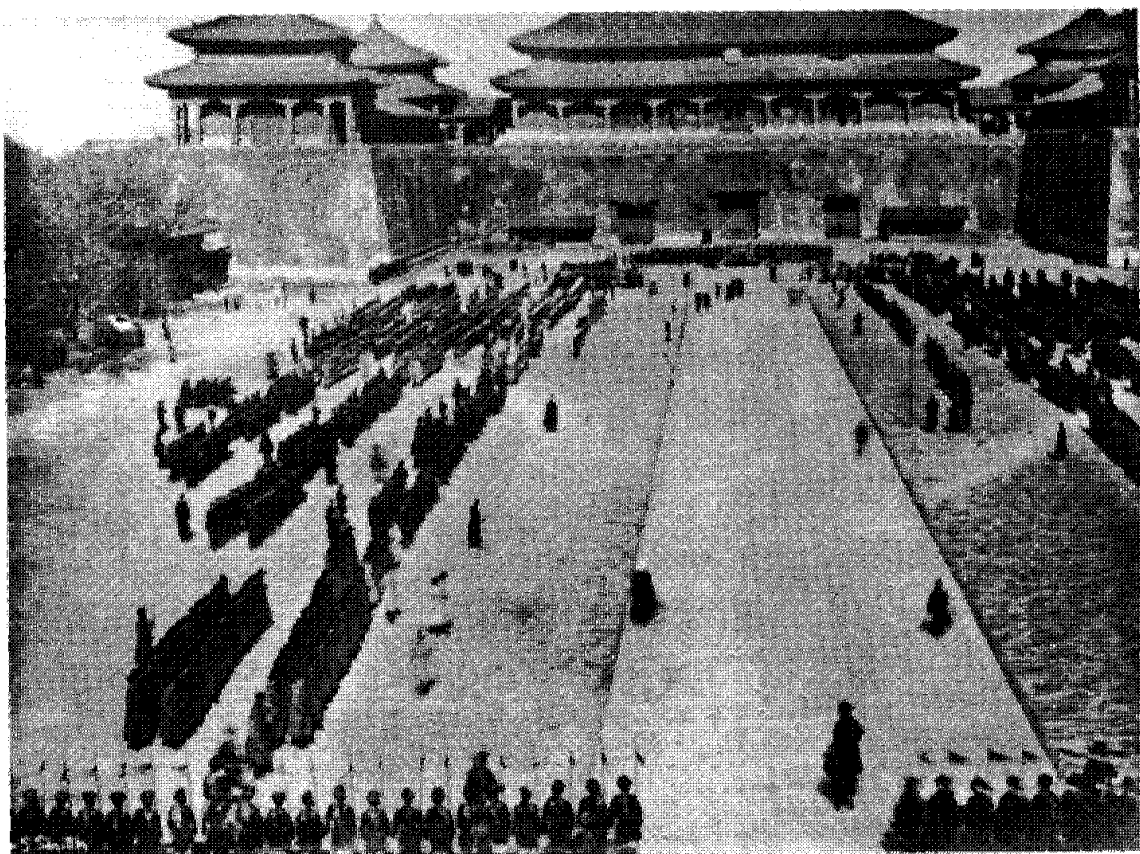
图片 17 北京外城墙上的“大英国门”

列强军队在完全控制了北京以后，马上就在通向紫禁城——他们认为这是皇帝的御用禁地——的南北大道上举行了游行和阅兵式^①。在这个禁地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或许发生在1901年

^① 康格夫人 (Conger 1909: 195) 提到各国军队“竞相进行大阅兵”。瓦德西元帅1901年1月1日抵达时曾举行过一次阅兵，庆祝德皇生日时也进行过另外一次阅兵式。见 Steel 1985: 80, 83。威尔逊 (J. Wilson 1912, 2: 534 - 535) 记述过美国于1900年10月3日进行的一次阅兵，这次阅兵穿过中央大道，在“古城狂欢夜”的曲调中进行。



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际。2月2日，英国人在紫禁城午门内举行了一个悼念仪式。在午门中央门道附近摆放着一个圣坛（图片18），上面覆盖着一面英国国旗，来自各支占领军的部队参加了这一追悼仪式（Conger 1909：195 - 196；Steel 1985：86）^①。悼念仪式的照片是从可以俯瞰城门前院的高墙上拍摄的，在这种地方进行拍摄，在以往想都不敢想。在中国皇帝的御用禁地安放英国君主的象征，并且用照片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表明列强有意要彻底铲除有关清朝是天下君主的任何现实的或是想象的断言。通过把皇帝的世俗领地“祛魅”并覆盖上新的意义体系的做法，来把所谓的天子赶下圣坛。



图片18 在北京紫禁城午门举行的维多利亚追悼活动

^① 这一悼念仪式的程序单见 NARA, RG395, 906, box 4。

惩罚的这样两个方面——对中国人身体和财物的疯狂侵犯，以及对在中国人看来具有特殊意义的事物有意地进行亵渎和重新铭写——就构成了一个惩罚体系，这一体系被描写为完全正当的，并且可以向任何可能提出质疑的人证明其正当性。这些惩罚活动在那些执行者和见证者中间，也产生了预想不到的种种反应：从胜利者的洋洋得意，到失望和幻灭；从严惩中国人的坚定决心，到对中国人所受苦难的同情和内疚。引起这些反应并且使之呈现出各种不同面貌的，是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信念：有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对基督教道德的不同要求，有国际法与各个民族国家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还有许多欧美人对中国人既爱又恨的感情。从亵渎清朝皇宫紫禁城开始，这些差异就表现了出来。

惩罚开演了：“撕碎神秘的面纱”

在当时人的记载中，通常被西方人称作北京宫殿群的紫禁城极其神秘，是中国人的“至圣之地”，是整个中国“最神圣”的地方（本段标题和本句引号中的词句均引自 Carter 1917: 203）。在这些记载里，紫禁城被描写为阴暗的、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宫殿群。与此同时，这一宫城的居住者皇帝及其宫廷，始终都没有感觉到它的不足，因为按照被普遍误解的说法，此前从来没有“白人”进入过这一地方^①。一生中积聚了许多“第一白人”荣誉的兰道尔（Henry Savage Landor），从俄军司令利涅维奇（Linievitch）将军那儿听说，他将会是“能够声称进入这里的第一个英国人——实际上应该是进入这里的第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第9步兵团M连的列兵克里什唐（William Crishton）在给他母亲的信中，也写

^① 一个例外似乎是里卡尔坦（James Ricalton 1901: 309），他还记得1795年的荷兰特使。



有类似的话^①。因此，对于一个白人来说，穿过它的城墙、打开它的大门、迈进紫禁城，就是把他所代表的种族和国家，置于一个据称禁止其他种族和国家进入的地方的正中央。这种行为还能突出地表明，侵犯和亵渎是对于中国皇帝的恰当惩罚。此外，白人进入紫禁城将会让理性的光芒照亮它的秘密和神秘，而且随着这一消息的传播，会使中国人明白，他们高筑城墙式的排外主义是一个错误。

对紫禁城侵入、教训和亵渎的过程开始于1900年8月18日。这一天，美国的大炮炸开了通向太和殿的大门。但是，美军司令查飞将军在征求了其他联军指挥官们的意见之后，停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且撤出了他的军队。对于他的这一决定，外交团的多数人表示非常失望。但几天之后，他们就成功地扭转了事态的发展。

关于在非真正占领的情况下进入紫禁城，赞成者和反对者的意见主要依据外交官们对于中国思想观念的认知上。美国陆军准将达格特（A. S. Daggett）记下了这一论争的各种意见：

有人认为，如果不进入紫禁城的话，中国人将会认为是神灵进行了干预，保护着那些神圣的通道，使它们不会因万恶的外国人的践踏而受到玷污。因此，为了打碎中国人的迷信并且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联军的支配之下，最好是占领紫禁城，至少是进入该城。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白人从来没有进入过紫禁城，尽管外国人进不去该城的说法是一种迷信，但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情感之中，打破这一迷信并将之碾碎，将会摧毁中国人的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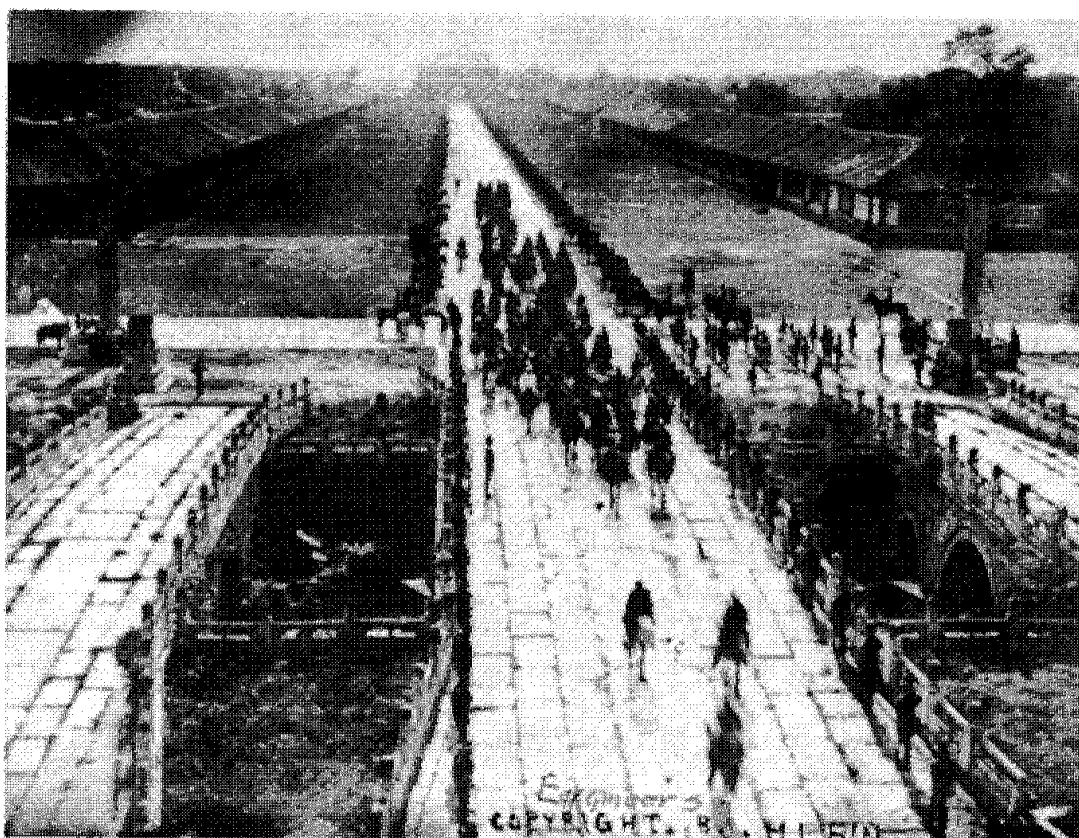
^① 据1906年版的《名人录》，兰道尔拥有许多第一白人的称谓。引文见 Landor 1901, 2: 361 及 211, 365, 382。也见 A. Brown 1904: 197; Broomhall 1901: 12; Conger 1909: 169; Lynch 1901: 156; Steel 1985: 25; Daggett 1903: 103; Butler 1933: 77。克里什唐的信见 USMHI, Spanish-American War Era Veterans Survey,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9th Infantry。

神，使之难以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们可能会因此失去和列强进行和谈的能力，也不能够支付赔款，中国也可能被瓜分。第一种观点占了上风，联军最终决定不占领紫禁城，但联军的一个纵队应该行军穿过从南门到北门的大道。^①

在取得一致意见后，胜利游行式于 8 月 28 日举行，来自 8 个国家的部队以及外交团参加了这一仪式^②。来自 8 国的部队行进在通向紫禁城的中央大道上，特别穿过了被认为只有皇帝才能通过的中间门道。摄影师拍摄了它们行进中的照片，一些照相机就安放在天安门和午门城楼上位于中间门道上面的位置，从而可以拍摄到角度非常中立的照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拍摄到了只有皇帝及其宫廷才能看到的画面（图片 19）。还有一些照片是从地面上拍摄的，画面上行进中的纵队正沿着中心线走向下一座宫殿（图片 20）。与第 16 孟加拉枪骑兵部队在天坛拍摄的全副武装的照片一样，紫禁城的照片也是以纪实的形式记录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对英国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为了强调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游行完成后，英国炮兵鸣放了 21 响礼炮。斯坦利·史密斯（Stanley Smith）将军解释说：“对深拒固闭的中国最深处的圣地的武装占领，现在彻底完成了。联军以这样的方式，补上了对北京进行惩罚的最后一笔。（Stanley Smith 1901：140）

① Daggett 1903：106. 该书是我发现的有关这一问题完整观点的唯一记载，其他资料只记述了进入紫禁城的一般性理由。见 Carter 1917：202；Butler 1933：77。兰道尔（Landor 1901，2：358）写道，在对紫禁城的攻击停止后，“拖着发辮的好事者”四处说外国人不准继续进行侵犯了。要维持西方“威严”并且“给中国一个教训”，就必须做出举行胜利游行的决定。

② 走在前面的是俄国的 800 名士兵，其后依次是日本，800 人；英国（印度军队），400 人；美国，400 人；法国，400 人；德国，250 人；奥地利，60 人；意大利，60 人（U. S. War Department 1901：500）。



图片 19 参加胜利游行式的部队进入天安门



图片 20 参加胜利游行式的美国部队，紫禁城太和殿前院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1901).

无论是要表达一种快乐、一种羞辱，还是要表达一种褻渎，在胜利游行式的背后，都有着对于在中国人看来充满神秘力量的类似于非洲物神崇拜一类事物的认识。正如达格特的记载和其他一些资料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一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耿耿于怀的，就是要利用这一史无前例的机会来战胜中国人的“迷信”。但就像达格特所指出的，攻击中国人的信仰，让他们大丢面子，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危险。如果把中国的君主政权贬黜过低，它也许会突然崩溃。因此，人们担心朝廷可能会由于遭到“蛮夷”的褻渎而大伤元气，以至有可能找不到与之进行谈判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如果那样的话，由谁来保障赔款的支付呢？又由谁来签署中外和约呢？由谁来负责恢复秩序？要保护欧美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是不是就只有把中国瓜分掉才能够做到呢？这样的一些问题，萦绕在华外国人中间。当中国神秘的面纱被撕开以后，当人们发现紫禁城的秘密比任何想象都更加令人惊异的时候，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龙、灰尘和幻灭：在紫禁城内

尽管可以肯定这并不是欧洲人第一次进入到紫禁城内，但很可能这是那些称自己为“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人第一次进入到这座宫城之内。换句话说，在西方列强进入紫禁城这一问题上，并不缺少“历史的自觉”。自从 1861 年建立起各国使馆以来，没有一个欧美的外交官曾经获准进入这一宫殿群中区的朝覲大殿，更不用说进入两侧和大殿后面的皇家私人区域了。一些人承认，他们很渴望能进入这一“禁地”（Conger 1909: 169; Mrs. A. Little 1901: 502）。现在，整个宫殿群都可以随意穿行，它的秘密最终要公之于世了 [Simpson (1907) 1970: 316 - 317]。

那么，这些侵入者们在紫禁城内究竟发现了什么呢？许多记载一开始都提到，里面的中国人很少，只有几百名太监。这些太监或



是“垂头丧气、非常悲伤”的样子，或是“一脸麻木”，充满了“仇恨和蔑视”。但似乎没有多少人对宫殿里的人感兴趣，最吸引他们注意的是那些房屋和房屋中的物品。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 1906：169）看到了皇室的辉煌壮丽，而记者林奇（George Lynch）则沉醉于它“最具皇家性的豪华外表下的败坏和腐朽”。其他人的感触并不那么强烈。林奇承认，宫中“到处都覆盖着灰尘、脏物和腐朽的东西”（1901：157，161）。庭院里长满了杂草，宫中的地毯上有厚厚的一层尘土，那些宫殿看上去也并不十分壮观。就像瓦德西伯爵后来所补充说的，这些宫殿处于一种“极其令人吃惊的状态”，这种状态让他得出结论说，一个能够容忍这种腐坏状态的君主不可能拥有巨大的财富^①。巴特勒（Smedley Butler）后来回想起皇宫里并没有人们预想中的东方式豪华时说：“房间里摆满了看上去并不舒适的家具，见不到什么金银珠宝，只有一些金色柱子。有人用刺刀尖探查这些金色柱子，结果发现它们只是敷贴了一层薄薄的金箔。我们转出北门以后，对满足于在这些发霉的、陈旧的宫殿中生活的中国统治者，心中充满了轻蔑。”（Butler 1933：77 - 78）另外有人看到房间里摆满了欧洲制造的机械玩具、钟表和音乐盒，但没有多少明显有价值的东方物品。印度军队的沃恩（H. B. Vaughan）先是回忆说，一个英国将军看到中国人“造了许多龙，一刻不停地看着它们”，很为中国人竟然没有因此变疯而感到吃惊。然后他又写道，他“原来预想的东西可是要好多了”（Vaughan 1902：141 - 143）。据林奇说，幻灭和扫兴大大减低了冒犯这一“至圣之地”的兴奋（Lynch 1901：156；Landor 1901，2：378 - 379）。

这些宫殿似乎在此之前已经被玷污了。

对于那些有思想的人来说，清朝宫殿的状况提出了最迫切的

^① Walderssee 1924：224. 瓦德西于10月23日第一次参观了紫禁城。

问题。美军团长狄克曼（J. T. Dickman）从总体上对“展示”非常失望，并且从中看到了联军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如他所说，“这一地方的辉煌早已逝去，那些蠢人们现在甚至都不去清扫其祖宗遗留下来的大量艺术品。在这座神圣宫殿的心脏中泛滥着的污秽和腐朽是显示这个天朝上国现状恰当好处的标记”（NARA, RG395, 913, no. 33）。这似乎还十分不够，与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是皇帝本身不在的事实，他和皇太后在联军炮轰北京的时候就逃跑了。比如丁韪良就把它视为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在看他来，现在既然白人进入了这一神圣地方，就像有些鸟类在巢窝被人强行侵入后就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窝里一样，他们也不会愿意回来了（Martin 1900: 139）。

不过，眼前见到的中华帝国的腐坏问题可以留待他日去解决，而且那是外交官们的事。这些宫殿虽然腐坏，但仍然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欢乐。当军官和外交官们在那些私密的房间中穿行时，他们那些“宽大”的口袋或布袋里装满了“纪念品”^①。当他们在皇宫的后花园里散步，走过那些给他们送上茶点和“亨特利和帕尔默饼”^②的算不上正常人的太监们身边时，许多人可能会惦记着仍然在这座静静宫城各个房屋里面藏着的大量财富。

“劫掠的狂欢”

如果说，皇宫的实际状况击碎了关于东方充满财富的幻想的话，那么，清朝皇宫和北京居民家中的物品则不那么令人失望。在使馆被解救以后，八国联军、外交官和传教士几乎立刻就开始进行

① 例如，可见 the Shanghai Mercury, 1967: 108; Lynch 1901: 159 - 160; Landor 1901, 2: 379。

② 见 Daggett 1903: 108; Landor 1901, 2: 380; Lynch 1901: 158，他还提到干果和水果蜜饯。



劫掠（Allen 1901：231）。《悉尼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用“劫掠的狂欢”来描绘争先恐后疯狂抢掠的场景（引自 Nicholls 1986：111），丁韪良则谈到了“在劫掠物品中间”呈现的狂乱（Martin 1900：134）。这些描述表明 1900 年对北京的劫掠与 40 年前洗劫圆明园的情形很相似，外国军队和在北京的欧美平民都卷入了抢劫的狂热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野蛮的劫掠狂欢。有许多记载一致认为，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于这场疯狂的抢劫之外。有报告称，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夫人就曾率领一队人进行劫掠。她那些“价值连城的财宝”已经装满了 87 箱，而她还惊叫“还没有开始装箱呢”（Sharf and Harrington 2000：222 - 223；Fleming 1959：243；Pearl 1967：151；Hoe 2000：196）。甚至那些曾经极力抵制诱惑的人最终也被迫屈服了。与丁韪良一样在使馆围困中幸存下来的波莉·史密斯（Polly Condit Smith）回忆到，当有人要给她一件黑貂皮外衣时，她拒绝了。但此后不久，她就接受了一个镶嵌着珍珠的乌龟壳手镯。对此，她解释说，如果再像拒绝外衣那样表示拒绝，她的神经实在忍受不了 [Hooker (1910) 1987：189 - 190]。

发生在北京的第二次劫掠的最初阶段虽然与 1860 年的大抢掠相类似，但也有着某些不同之处。首先，没有人像吴士礼在 1860 年那样，站出来谈劫掠只是低等军衔的士兵的行为，与军官无关，从而心安理得地容忍了劫掠活动。其次，1860 年的劫掠物品展出时附有“来自中国皇帝的圆明园”一类的标注，而 1900 年的劫掠物品展出时本身并没有附有这类相应的标识。考虑到在华欧美外交官与军人们自称是在伸张正义，特别是他们一再宣扬的对“未开化的”、“野蛮的”义和团攻击基督教传教士和无防御的外国使馆的行为进行所谓“正义的惩罚”，这种对劫掠物品不加标注的做法多少有些令人吃惊。人们本来可能会以为，一些博物馆展示其收藏的 1900 年义和团事件期间取自故宫或者北京的藏品时，会有某些相关介绍。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那以后，只有很少的物品在伦

敦展出时带有这类标注^①。和19世纪60年代拍卖劫掠物品不同的是，1900年从北京劫掠的物品并没有在伦敦和巴黎的拍卖行进行过拍卖。这种现象或许并不难理解。首先，正如斯基德摩尔（Skidmore 1900）此前一年所指出的，欧洲有现成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在这一市场上，拍卖行和博物馆已经开始采用卜士礼和其他专家们的新术语了。其次，1900年的劫掠在中国、美国和西欧都引起了公开的辩论，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问题。下文将详细论述个中原因，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由于围绕抢劫展开的争论，许多报道或者局限在有关劫掠的讨论上，或者致力于论证劫掠的正当性，而没有像1860年那样对劫掠物品进行大肆宣传。

无论如何，仍然有可能搜集到足够的材料，对这两次劫掠事件进行比较。比如可以从自然地理学方面考虑。1860年的劫掠基本上限制在圆明园及其周边地区，而在1900年，劫掠范围包括了整个北京、颐和园，甚至直隶省内的每一个城镇。从海滨进军北京路线上的天津和通州，几乎被洗劫一空。另外，1860年的劫掠只持续了两三天，而1900年的劫掠开始于7月底攻占天津以后，直到10月，北京的劫掠仍在进行。在清朝都城以外，随着惩罚性远征逐步发展到直隶各地，劫掠持续的时间更长。

同时，也有某些与1860年劫掠相同的地方。像以前一样，士兵们在寻找金银财宝时毁坏了许多东西（Walderssee 1924: 221; Seagrave 1992: 367）。面对他们的肆虐，仍然留在北京城内的中国人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他们挂出粗制滥造的日本、英国、法国或美国旗帜，希望能使自己幸免于难。也有人贴出用欧洲文字写的字条，或者请士兵写些字条，大意是他们家已经被掠夺过了。还有这

^① 我在英国只发现有两处提到了1900年劫掠物品的买卖。《天朝》（*CE*, 6 March 1901）提到一个英国士兵通过史蒂文斯商行出售了一些物品。史蒂文斯商行1913年出售了一件中国鼓，据称是第39步兵团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从北京缴获的。见 *National Art Library auction house catalogues*, 23. ZZ。



样的情形，有些人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便弄些标记，表明此处财产已经被某个欧洲人所占有^①。但据辛博森（Bertram Simpson）说，房主即使贴了表明他们已被洗劫的告示或者悬挂着侵略者的旗帜，“嘲笑着的抢劫者”常常还是会把它们扯下，毫不手软地进行劫掠^②。

在北京，这种自发性的抢劫持续了好几天。在这期间，日本军队似乎更清楚孰轻孰重，抢先占领了清朝户部，劫走了户部银库的银子。但到了8月底，联军的一些指挥官试图采取认真的措施来对劫掠活动进行控制或者管理。他们大都担心，如果不恢复一定程度的秩序，就难以在中国市场上买到维持对北京较长时间占领所必需的食品和燃料（NARA, RG395, 944, 12 September 1900; G. Barrow 1942: 64）。像以往一样，又是英国军队通过建立奖赏金分配委员会的方式，率先将劫掠秩序化。与1860年的英军司令克灵顿将军一样，英军司令盖斯利（Gaselee）将军在给国防部的报告中解释说，他被迫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是为了“在这场特殊战争中道德败坏的情况下”维持军队的“满足与士气”（Stewart 1908: 241 - 242）。与此同时，他又声称他“不了解在德里、勒克瑙和1860年在北京建立奖赏金的规则”^③。尽管盖斯利很

① Simpson [1907] 1970: 326, 339, 341 - 346, 349; Stewart 1908: 238 - 239; Lynch 1901: 162 - 163; S. Smith 1901: 128; Steel 1985: 55; Vaughn 1902: 120 - 121; NARA, RG395, 934, 25 September 1900. 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制造国旗和贴在门上的告示，收取为数不小的费用。

② 据 Seagrave (1992: 366) 记载，一个做翻译的学生把出示这类标识的中国人称为“奴颜婢膝的孬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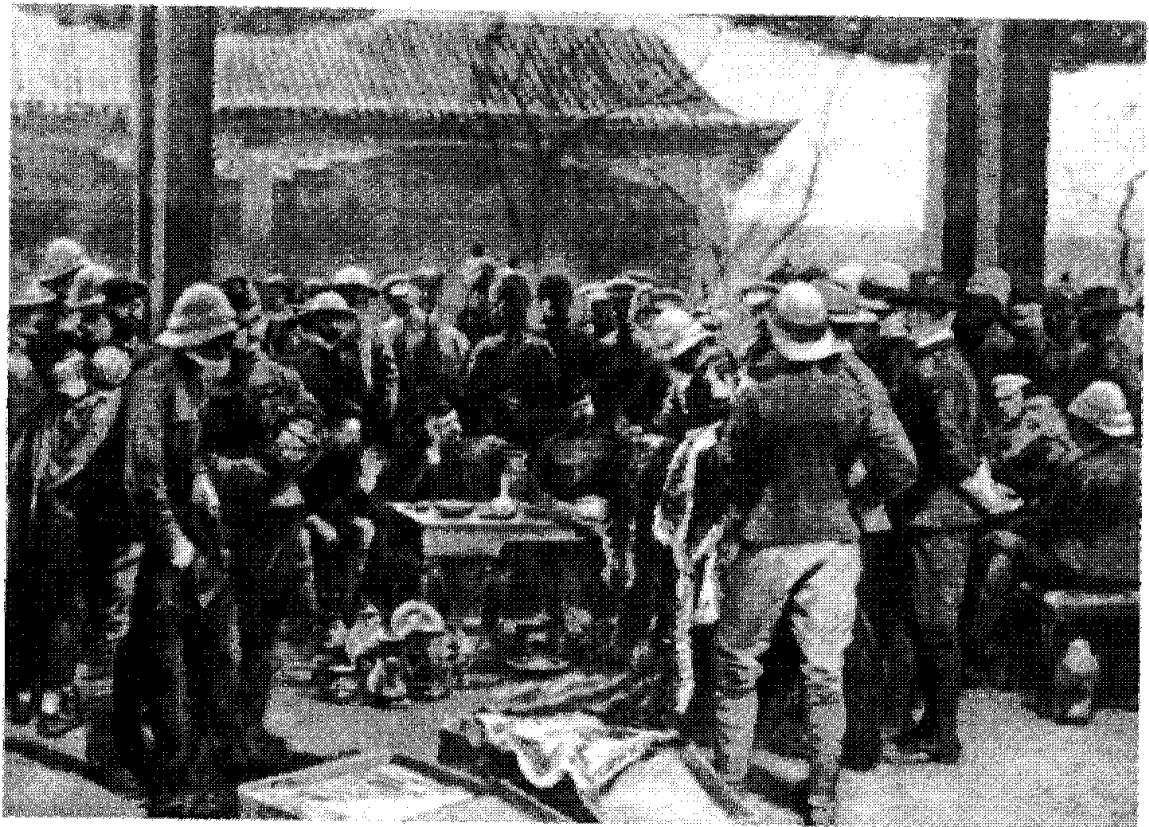
③ 参见第四章关于奖赏金委员会规则的讨论。据英国国防部1903年的报告（WO 33, 6338），调查者发现，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只有很少几次在军事行动中实际分配奖赏的事例。这一结果使他们得出了奖赏金“已经过时”的结论，分配奖赏金的行为已经逐渐被停止，并且被对辛苦作战的官兵进行现金奖励的做法所取代。这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盖斯利表示不清楚以前分配奖赏金方式的原因。

可能真的并不十分清楚以前使用过的那些规则，但他对半个世纪前英国军队在印度和中国的有关活动，对于军事法规和陆军管理条例中有关劫掠的那些含混不清的规定^①，至少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为他相当顺利地就组织起了一个奖赏金委员会，负责根据军衔和种族发放奖赏金。一般印度士兵得到的份额少于同等军阶的英国士兵，而印度军官则不论军衔高低，一律按英国准尉的标准发放（WO 28, 302: 28 - 29）。

奖赏金本身通过官方授权的“搜查队”收缴劫掠物品，并在英国使馆里公开拍卖而筹集起来。《黑与白》（*Black & White*）和《图片》（*The Graphic*）等有插图的伦敦报纸都发表了有关这些拍卖的图片（图片 21）^②。到 8 月 22 日，拍卖掠夺物品似乎已经成为日常事务，其他国家的军队也知道了有关拍卖的消息。与 1860 年时一样，拍卖进行得十分活跃。至少在最初几天，许多英国将军和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都参加了交易。此外还有包括印度部队的本土

① 国防部《军事法规手册》（1884 年第一版）中有一章的标题为“战争中的习惯做法”，其中称科学或艺术物品的缴获“不符合”有关剥夺敌方战争资源的“公认规定”，“只能作为一种报复手段而被认为具有正当性”。然而，该书的编者们的也认为军官们应该试图制止掠夺行为，并且说明了处理劫掠物品的方式，这些方式与奖赏金法规中的有关规定基本相同。编者们的同时指出，编辑这些规定只是为了方便军官们使用，并不具有官方的权威性。见 U. K. War Office 1887, 311 - 313。这是第二版。该书 1893 年第三版和 1899 年第四版的有关内容与这里引用的部分完全相同。陆军的有关规定较为明确一些。《女王陛下发布的陆军管理条例和命令》（*Queen's Regulations and Orders for the Army*, 1868: vol. 2, 186）禁止劫掠行为，并且明确规定，军官们有责任制止劫掠，没有提到奖赏金问题。比较而言，《国王发布的陆军管理条例和命令》（*King's Regulations and Orders for the Army*, 1901: 50）中有一部分提到战利品，特别指出它是国王的财产，应按国会的立法来处理。

② 早在 1900 年 10 月 20 日，《黑与白》就引人注目地刊登出一张在英国使馆进行拍卖的照片，标题称出售的物品是“在被人遗弃的房屋中发现的”。同一期报纸还有一幅画，描述的是挥舞着斧头的士兵在“北京抢掠一个清朝官员的家”（第 644 页）。图片 21 的这幅画见 *The Graphic*, 15 December 1900: 885。



图片 21 在英国使馆进行的拍卖

The Graphic, 15 December 1900.

士兵在内的英国军队每一支团队的士兵，有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士兵，有使馆成员，甚至还有中国商人（Lynch 1900：177 - 180）。荷兰外交官欧登科（William Oudendyk）在其自传中，提供了有关这些拍卖活动为数不多的详细记载。他描写了在英国使馆中窦纳乐的寓所前进行拍卖的情景：

外面的砖地上摆放着许多中国物品，有丝绸、皮毛，也有黑木家具和古老的青铜器。使馆的所有人员——其中，窦纳乐夫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和其他许多英国人一群群地围在这些珍贵物品四周，把它们拿在手中仔细鉴赏，讨论着它们的年代和价值。到处是欢乐的气氛。一名军士依次把玩着每一件物品。人们踊跃地出价，而价格并不算高，很明显是供过于求。

一名军官在一本登记簿上记下数目，这些收入将会成为他的团队的奖赏金。在拍卖进行的时候，一名军官率领几名印度士兵把两匹中国马车赶了进来，车上满载着又一批要拍卖的中国贵重物品。这样，人们的出价就更低了。（Oudendyk 1939: 107 - 108；也见 Hoe 2000: 374）

尽管买家比 1860 年时要多得多，但就像欧登科所说的，出价并不算高，许多贵重物品，特别是皮毛的卖价，只有几美元^①。

即使如此，斯图尔特（Norman Stewart）将军还是觉得外国在华侨民和使馆人员出的价钱可能更为合算，他把他们称为“行家”（Stewart 1908: 256）。其他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上海、香港的古董商——据说其中有人身受欧洲拍卖行和艺术商们的委托——和美国商人纷纷前来参加拍卖 [*Celestial Empire (CE)*, 19 November 1900: 617; Wadersee 1924: 231]。有份报告表明，印度总督柯曾给在英国驻华使馆的熙利尔（Guy Hillier）寄来 1000 英镑，用以“购买古董”（Pearl 1967: 151）。另外，随着后续部队陆续来到中国，这些人员也有机会获取贵重的中国古董。正如斯基德摩尔所预见的，人们好像“从地球的尽头”赶来，加入到劫掠之中（Skidmore 1900: 196）。到 10 月中旬，拍卖活动已经进行了将近两个月，除星期天以外，每天都有交易，筹集到的奖赏金超过 5 万美元（*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18 October 1900）。

最后，这笔基金的数目达到 33 万美元，分配时每份为 27 美元，按以下标准分配：中将指挥官 10 份，少将级军官 8 份，校级军官 7 份，上尉 6 份，中尉、少尉 5 份，准尉和印度军官 4

① 与林奇和欧登科的记载相反，泰平（Gartside-Tipping）则抱怨价格太高。见 NAM, 6902/3, no. 2: 22。同时，白克豪司（Edmond Backhouse）认为 1900 到 1901 年的皮毛市场特别兴旺。见 Lo 1976, 1: 201。



份，英国军士3份，印度军士2份，英国士兵2份，印度士兵1份^①。就像窦纳乐爵士后来所说的那样，奖赏金的分配有章可循、公平合理（*CE*, 22 April 1901: 4）。这种分配奖赏金的做法还能把英国军队与参加远征的其他国家的军队——从“粗鲁”的俄国人到“严谨”的美国人^②——区别开来，这一好处在1860年时就已经表现出来。此外，像以前一样，它通过军阶等级制度重新加强了军队，使之避免了劫掠活动可能带来的道德混乱，同时又维持了白种英国人与印度本土士兵之间的明显差别。最后一点差别是种族的差别，但英国人认为它并不具有轻蔑的意义。是的，自从英国在殖民地印度建立起等级秩序以来，这种差别已经成为极其自然的事。几乎全部由印度部队中的本土人部队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已经从1860年费恩骑兵和普罗宾骑兵那样的野蛮劫掠者转变为“印度的军事种族”，在帝国建立秩序的过程中占据了恰当的位置（*Farwell* 1989: 179 - 190）。印度本土军官不能分配到与同一级别的英国军官同等的份额，与其说是等级秩序的表现，不如说是一种表明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的手段。

无论别人是否完全理解这一英国“制度”的全部重要性，这一制度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巴黎周报《图片报》（*L'illustration*）的记者称它为“系统的程序”（*L'illustration*, 12 January 1901: 19），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则认为，和其他军队相比，这一做法还是“科学的”，因为从整体上看（日本军队可能是一个例外，见下），其他军队根本没有任何章法（*A. Smith* 1900: 497）。到1900年10月，仍然有报告说每天都有马车运送来自北京的劫掠物品。这些报告涉及到

① *NCH*, 24 April 1901: 784. 我于1995年在印度部目录下发现了一份有关1900年中国奖赏金清单的目录，但档案管理人员未能找到该资料。感谢吴芳思（*Frances Wood*）为此进行的努力。

② 这是瓦德西关于各国特点的概括，他曾经讨论了不同国家的劫掠模式，见 *Walderssee* 1924: 219。

的往往都是俄国军队。即使是有些记载中认为确实不受诱惑的美国军队，也卷入到劫掠之中。格罗夫（Leslie Grove）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禁止抢劫的条令根本不起作用，那些违犯命令的人不仅不受惩罚，反而得到了许多好东西。” [U. S. Army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USMHI), Grove Correspondence, 22 August 1900]

事实上，直到1900年9月21日，美军司令查飞将军才开始采取措施。为了对付美军公然违犯美国陆军战时常规条例的行为^①，查飞仿效英国，命令收缴所有劫夺物品进行拍卖。但他并未将拍卖收入用作奖赏金，而是抹去了所有的劫掠痕迹。他的军官把“缴获财物”拍卖掉以后，将所得款项转入了一个“公共的非军事基金”，用于支付次年美军占领北京的部分费用^②。少数几件有记载的归还劫掠物品的事例中，有一件就是运用了这种在查飞看来非常得体的处置方式。查飞将军于5月将一只银汤匙归还给了清朝参加和约谈判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这只银汤匙是1896年李鸿章访问尼亚加拉大瀑布时所接受的一件纪念品^③。

与这些处理劫掠物品的官方措施同时出现的，是“随时随地进行的”和“异常活跃的”街头市场（CE, 19 November 1900: 617）。和1860年一样，这种经营活动是法国士兵率先进行的。辛博森回忆

① 据威尔逊（J. Wilson 1901: 389），这一常规条例是利伯尔（Francis Lieber）教授1863年编写的第100条常规条例。

② 有关查飞决定的资料见NARA, RG203, entry 4, pp. 54-56；查飞1901年3月8日的信见RG395, 898, “Letters Sent, 1900-1901”；以及财政部的*Ledgers of Emergency Fund Account, 1898-1909*。该书中有有关中国解救行动的资料表明，劫掠物品在华盛顿转化成“在华缴获物品拍卖所得款项，查飞将军特别款第36号”。

③ NARA, RG395, 898, no. 554, 1901年5月16日。据《泰晤士报》驻北京的通讯员莫理循（G. E. Morrison）的说法，中国海关的一名俄国人柯乐德（Victor von Grot）购买了“价值数万两银子”的古董，要把它们归还给清朝皇帝和皇太后。见Lo 1976, 1: 174-175。法国政府也拒绝接受福里（Frey）将军赠送的物品。见*L'Illustration*, 29 December 1900: 406。



说，由于风闻军官们很快就要没收所有劫掠物品，士兵们宁愿非常便宜地把这些东西卖出去。这样，当他们回到法国兵营的时候，口袋和上衣里就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了。与此同时，英国士兵则不顾禁令，公然在其兵营内出卖东西，而印度部队的士兵则把北京街头当成了商店 [Simpson (1907) 1970: 372, 374 - 375, 415 - 416]。随着中国商人和西方传教士也来进行交易，生意显然非常红火。一些买主甚至写信给他们的妻子，报告自己的好运气^①。

当士兵和外国非军事人员在北京四处买卖掠夺物品时，军官们则开始着手为他们的国家和部队总部收集战利品。英国人收集了一些缴获的欧制枪械，运送到伦敦、爱丁堡、锡德尼和都柏林 (IOR, L/MIL/7/16765, P. 11)。威尔士亲王四世的廓尔喀人步枪队抢走了一口寺庙大钟和中国长城上的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后来被刻上“中国·1900”的字样，砌在该团队在印度的大本营的墙上 (R. MacDonnell and Macauley 1940: 228)。义和团和清朝官军的各式旗帜是另一类受到欢迎的战利品。美国军队就将中国武器的样品、义和团的旗帜以及一尊中国战神关帝的塑像运送回国，放在西点军校刚建成的战利品陈列室中^②。此外，参战的第9和第14步兵团在自己的徽记中加进了黄龙，并分别使用“满洲人”和“金龙”作为各自的新绰号^③。

① 斯图尔特 (Stewart 1908: 257) 提到了中国人开的商店。钱伯林 (Wilber Chamberlin 1903: 101 - 102) 告诉他的妻子，他从传教士手中买到了中国东西。格罗夫从中国人那儿买了些很令他满意的东西，见 USMHI, Grove Correspondence, October 11, 1900。

② NARA, RG395, 944, Circular 4, 24 September 1900. 钱伯林 (Chamberlain 1903: 119) 提到了战神，麦克法兰 (McFarland 1929: 41) 书中也有被列为战神的的东西，其中还有其他的义和团战利品。还可见 Leonard 1944，其中将与义和团有关的物品归在一起。

③ 见 www.perso.hol.fr/~nguiffen/manchu.html and www.25thida.com/14thin.html, 2002年2月16日登录。

以这样的和其他的一些方式，圆明园劫掠物品所具有的那些意义就非常轻松地在 1900 年劫掠物品上重新表现出来。这些意义可以代表军队秩序的重新建构（就英国和美国军队来说），同时也强调了有纪律的军队与无纪律的军队的差别。它们还可以被用来代表羞辱，代表趣味，代表鉴赏力，代表文明对野蛮的胜利，代表军事战利品的收藏，代表一支部队的“传统”。然而，尽管 1860 年的劫掠物品和 1900 年的劫掠物品所代表的意义具有普遍性，但也还有着一些明显差异。

对 1900 年的劫掠物品，可以认为它有着使中国人“丢掉面子”的意义。此外，在某些劫掠者中间，对劫掠怀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例如，日本军队的军官对中国的艺术和文物特别感兴趣，他们甚至向士兵发布指南，指导他们如何鉴别劫掠物品的价值，包括哪些物品可以送给日本皇室，哪些物品适合于博物馆和学校，哪些物品可以作为军事战利品（Sand 2000: 654）。在现场的记者林奇很不以为然地说，“在拿到一只中国茶杯或茶碟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摆出一副懂行的样子，查看标在底部的标识，然后摇摇头”（Lynch 1901: 170）。大家所要找的，是皇朝年代的标识。人们已经从卜士礼等人的著作中知道，这些标识能够提供物品的可靠性，并且能够表明其价值。尽管林奇不了解这些标识的意义，但有些人有机会看到在北京使馆中创作出来的有关中国艺术品的大量著作，他们确实是“行家”。《伦敦每日快报》（*London Daily Express*）的一位记者曾经看到过使馆人员“在这场称得上是狩猎的活动中对猎物紧追不舍”。他说，“和解救他们的人相比，他们有着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他们熟悉地方情形，知道值钱的东西在哪儿。他们就像进入了自己的‘地下室’一样”（*CE*, 14 January 1901: 55 - 56）。实际上，这一报道完全可以补充说，这些行家们跟随着窦纳乐夫人，径直奔向清朝王公贵族的府第^①。

^① 一些个人记载表明了这一点，霍（Hoe 2000: 316）提到了醇王府；西格雷伍（Seagrave 1992: 367）提到了端王住所。



格罗夫在一个社交场合向他的妻子解释说，李佳白（Gilbert Reid）牧师夫妇送给他一些他们从礼王府拿到的小物件（USMHI, Grove Correspondence, 9 September 1900）。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美国使馆参赞司快尔（Herbert Squiers）于1901年9月离开北京时，据说携带了好几火车车厢的中国艺术品^①。

一方面是人们更加认识到中国物品的价值，一方面便是一些花样翻新的劫掠方式。或许最有争议的劫掠涉及基督教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像李佳白夫妇一样，参与了北京及其近郊地区的劫掠活动。有些报道说传教士抢占了北京王公富人的府第，出卖其中的物品（Simpson [1907] 1970: 374; Steel 1985: 56; Martin 1900: 135）。据称，从8月底开始，英国女传教士乔治亚娜·史密斯（Georgina Smith）就一直在廉价出售她收集的那些“美不胜收的宝物”（Hoe 2000: 322）。

与这类假借为贫穷的中国教徒募集善款的名义进行的“受灾物品大贱卖”同时进行的，是到有教会受到攻击或者遭到破坏的乡村地区去进行惩罚性远征。由美国传教士发起的这类活动，起初得到美国军队的合作。第一次远征似乎发生在9月20日。这一天，传教士梅威良（William Ament）和满乐道（Robert Coltman）跟随第6骑兵团的一队士兵来到北京城外的一个村庄。梅威良指认了义和团活动的一些迹象，向一些中国教徒了解情况以后，批准他们去抢劫村中几户人家的财产。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福赛斯（Forsyth）上尉对此表示反对，坚持要返还这些财产，否则他将立即返回北京（NARA, RG395, 913, no. 19）。类似的一些事件引起美军指挥部里一些级别较高的军官们的不安，怀疑自己正在被传教士们所利用

^① 这一报道见 *New York Times*, 3 September 1901; 引自 Seagrave 1992: 368。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北京的劫掠物品有什么特殊，《天朝》（CE 19 November 1900: 617）中有一则材料认为，多数物品可以在任何一个比较好的古董店里买到。关于这些记载，值得注意的不是作者对劫掠物品品质的批判，而是已经有了可以利用的有关标准和市场知识。

(U. S. War Department 1901: 512)。

传教士进行这类行动并没有合法的依据，而且他们的行为也的确近乎于敲诈勒索，但这并不能阻止传教士们。他们不想失去军队的保护，因此试图使用其他办法。传教士们通过美国使馆谋求支持，要求派兵陪伴他们去寻找所谓的证据。然而，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都春圃 (E. G. Tewksbury) 牧师进入到一个村庄以后，立即就开始收敛金银。由于没有任何程序来确定这些村民个人所应负的责任，吉内 (P. W. Guiney) 中尉要求都春圃立即对搜敛到的东西做出说明。但这位传教士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声称他会向美国公使馆提出报告。吉内将此事报告给了副官长，似乎在这以后，美国军队便再也没有派兵护送过传教士^①。

与传教士在乡村地区的这类行为相一致的，是旨在对某些村庄进行集体惩罚的惩罚性远征。毁坏财产、勒索钱财和劫掠是这些远征行动的重要内容。军队每到一个村庄，都会留下一片混乱。一些四处流窜的土匪团伙乘乱而起，这些团伙成员中，有些人是残存的义和团民，有些人是这一地区持续 6 个月的战争所造成的流民。据报告，12 月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几伙中国人打着联军中某外国军队的旗帜“强征贡赋，劫掠村庄”^②。其他一些记载称，外国联军中的逃兵也进行着类似的活动^③。在其中一个事例中，据称美国士兵是主要的抢劫团伙 (Walderssee 1924: 262 - 263)。此类事例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件涉及两个美国士兵，他们用枪逼着几个中国人

① NARA, RG395, 涉及到都春圃的通信见 906, box 1 和 box2 和 943。这件事以后，都春圃确实向使馆的康格送交了报告，内容却是进一步评估了教会的财产损失，并且要求在这一村庄修建新的教堂，另拨土地给教会使用。

② NARA, RG395, 898, 472, 命令福赛斯上尉追击这些团伙的文件的日期为 1900 年 12 月 17 日。也见 RG 395, 968, reports dated December 17, 1900 and 19 January 1901。

③ 见 WO 32, 6417, 格列森 (Grieson) 上校的工作日记报告说有一伙 60 多人的锡克族逃兵在乡村进行抢劫，见 1 月 10 日日记，也见 NARA, RG395, 968, 18 April 1901。



协助他们抢劫天津郊外的一个村庄，在装车时被法国巡逻兵当场抓获。由于有被胁迫的中国人的供词做证据，这两个美军士兵被判有罪，极不光彩地被赶出军队，并且在阿尔卡特莱兹被判处 21 年徒刑（NARA, RG395, 944, 5; 906, box 4）。

像这样富有想象力的事件尽管属于特例，但也不是孤立的。虽然无法弄清究竟有多少盗窃和勒索事件未被查出或者未被报道，但后来披露的一件事表明，即使在原本被认为纪律严明的英国人中间，也存在着种种非法行为。1926 年流传着一个有关从北京天坛抢来的金钟的故事。第 16 孟加拉枪骑兵队的军官们声称这两座金钟是“战利品”，并且以献给军官食堂为名，将它们和其他一些劫掠物品一道据为己有。1905 年前后，他们决定将其中一座钟熔化后瓜分，但遭到了其中一人的反对，因为他认为分给他的份额太少（IOR, L/MIL/7/16819）。金钟故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最终被曝光，而在于它告诉我们，在处理劫掠物品的合法渠道之外，人们总会找到转移劫掠物品的其他办法。因此，它可能表明，发生在北京与直隶的劫掠行为的规模非常可观。但这一规模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至今也难以估量，因为除了作为战利品的劫掠物品而外，人们对其他所有劫掠物品的最终下落几乎一无所知。了解到这一点，当在法国、美国或者英国的大博物馆中看到任何一件中国瓷器或者清宫器物的时候，人们的确有理由联想到 1900 年北京的劫掠^①。

粗暴的正义：处死、惩罚性远征和 对保定的惩罚

在 1900 年夏秋，死亡同样地不断降临到中国人和西方人头上。

^① 这特别适用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它似乎接受了司快尔的许多捐赠品；见 Seagrave 1992: 368 - 369。

有各种各样的死亡，也有着和死亡同等数量的对死亡的反应（Cohen 1997：173 - 208）。在这些死亡的人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或许是那 270 名欧美人、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但在大沽到北京间的激烈战斗中，还有数千名中国基督教徒和数百名作战人员及非作战人员被杀死。这些死者中有许多人，死后都没有一个最终的安身之所。按中国人的信仰，这些人成了华北平原上游荡着的孤魂野鬼。还有不可计数的自杀者，那些害怕被强奸的妇女和那些宁愿全家自杀也不愿面对穷凶极恶的外国军队的人。此外，联军还进行了多次诸如翟兰思（Giles 1970）所描写的前门屠杀一类的大规模屠杀活动。

在多数情况下，联军士兵在杀害中国人时并不考虑他们是不是义和团民。美国士兵在一次巡逻中，负责指挥的军官命令中国向导从一个村庄的茅屋房顶上观察前面田野的情况，几乎就在这名向导刚刚爬上房顶的时候，他就被误认为是义和团而遭到一名士兵的枪击（NARA，RG395，913，no. 19，20 September 1900）。查飞将军曾经恰当地概括了这类事情：“完全可以这样说，自从占领北京以后，每杀死一名真正的义和团民，就有 50 名无辜的苦力或农民被杀死，其中不乏妇女和儿童。义和团混迹于普通百姓之中，只有杀死许多人，才有可能杀死一两个义和团民。”（Lynch 1901：84）

查飞的话并没有提到其他记载中所涉及的这些杀戮中某些令人不安的地方。兰道尔记录了发生在美国军营（北京南部的先农坛）中“令人憎恶的残忍行为”。一名被怀疑是义和团密探的人被带到一名军官面前，这名军官让他的下属“怎么高兴就怎么”处置他。据兰道尔记载，这些美国士兵“误解”了军官的意思，对这个倒霉的俘虏一阵拳打脚踢。接着，根据可以被称为国际合作的精神，一名路过的法国士兵击打他的头部，一名日本士兵则“猛踩”这个“穷鬼”。受害人的头被打得变了形，但仍然表现出“令人不可



思议的坚韧生命力”。他的衣服被剥了下来，好让那些士兵寻找据说所有义和团身上都有的符咒。数百名士兵在他身上找寻了将近一个小时，虽然一无所获，但他的痛苦却不时地在这些士兵中引起“一阵阵狂笑”。兰道尔把这样残忍的行为归咎于“误解”，我们对此表示怀疑。我们也不相信兰道尔所说的，大多数美国军官对敌人总是“极其人道”、“极其仁慈”的，对他如此生动叙述的这类事件“非常厌恶”。但是，他也清楚地表明，军官们在这类事件中的沉默被他们的部下们视为一种“鼓励”（Landor 1901, 1: 364 - 365）。至少在一部分军官看来，这些中国人得到这样的处置，是咎由自取。

的确，到9月时，所有中国人似乎都是可以随意杀害的目标。林奇报告说，在德国管区，军官们在审问时都使用严刑拷打，而且审问后立即就由行刑队处死。这样的事情，仅在报告前的一个星期就发生了83起（Lynch 1901: 143 - 144）。尽管难以确定究竟有多少人以这样的方式被处死，但使用行刑队的绝不仅仅限于德国人。在另外的事例中，被怀疑是义和团的人就曾被日本军队砍头或绞死。据斯图尔特将军说，这类当场执行的“正法”，从9月开始一直进行到10月中旬（Stewart 1908: 267, 283）。

有迹象表明，到了10月中旬，这类杀戮对于行刑者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影响。在英帝国军队中的澳大利亚部队服役的一位名叫韦恩（Wynne）的军需官说，行刑队士兵的“心肠越来越硬了”。他把这归咎于他所谓的“东方的教育”。他解释说：“什么时候你能让自己相信中国人不是人，根本不是人，什么时候你才会心安理得”（引自 Nicholls 1986: 104）。韦恩的这些话，让我们注意到英国和美国军队指挥官们不久就开始担忧的一个问题：“东方的教育”给士兵情感带来的明显改变。那些差不多每天都要杀人的士兵们，要想完成他们的工作，就得把中国人视为没有人性的动物。尽管这种情况在针对非白人的殖民侵略中并不罕见，但由于我们对

英国的课业已经谈论过许多，我们就能从中看到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这就是“东方的教育”。似乎韦恩和其他的行刑者们开始模仿中国人性格中一个众所周知的特色：对人类痛苦完全缺乏同情心（A. Smith: 1894: 196 - 197）。如果士兵们不能学好这一课，韦恩告诉我们，就会“受到伤害”。似乎就在韦恩记下这种“中国人性格”在白人中开始令人不安地出现的时候，摆脱这种不安的办法出现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让中国行刑者以中国普遍采用的砍头形式，来处死被怀疑是义和团的人（见下文）。

然而，这种处死方式主要是在北京和北京附近处死个别中国人的时候使用。为了找到更多的被怀疑是义和团的人，联军进入直隶省，进行“惩罚性远征”。这种远征始于使馆解围后不久，一直进行到第二年（最后的一次远征似乎是1901年4月对河西务的远征）。例如，福赛斯上尉率领美国第6骑兵队攻到清朝的猎场南海子，在那里与一伙义和团交战，并焚烧了一个村庄，抢了几家米店和牲口（NARA, RG395, 913, no. 12, 29 August 1900）。德国人两星期后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行动，在北京西南的良乡杀死了大约250名被怀疑是义和团的人^①。

尽管至少对于某些远征来说，仍然还有寻找逃匿的义和团的正当理由，但到了9月中旬，对直隶省的进袭已经成为一种大场面的报复性质的惩罚。各种暴力行为直接针对所有的中国人，与1860年不同，这些中国人不再被认为是无辜的，而应该对围攻使馆、杀死传教士和破坏西方人财产的行为集体负责。这一方向

^① 见李德征、苏位智和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1990），第329～330页；该书利用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和中文资料重现了对直隶的占领。也见《义和团史料》上册（1981），第104、118、122、148、150、196、205 - 206、374、411页；下册，第802～803页。《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986）提供了1896～1911年的大事记，有大量条目涉及联军在乡村地区的行动，特别是1900年10月1日的条目。



本身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也许会使额尔金爵士一类早期外交官们感到厌恶。比方说，类似惩罚性远征的行为有仿效集体负责的中国观念的嫌疑。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恰恰就是因为欧美人厌恶这类中国法律观念，从而导致了治外法权在中国的产生。然而，似乎没有人愿意回顾这段历史，相反，他们倒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更具创造性的集体性惩罚的形式。

在这些形式中，最普遍的是通过攻打义和团举行仪式的神坛来打击义和团的迷信。这类象征战一个最早的例证，是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联合军队于9月16日在颐和园附近的西山进行的惩罚行动。这一行动的目标是八大处，据说那里有大批的义和团。多年以前，英国和美国使馆就在八大处附近修建了避暑公馆，英国公馆位于以第一任英国公使的名字命名的普鲁斯山，美国公馆位于为纪念美国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而命名的蒲安臣山。或许是因为这一点，林奇开玩笑地把整个行动称为“惩罚野营”（Lynch 1901: 214-215）。当这些军队集中到八大处时，他们发现使馆的房子已经被毁坏，表明曾经有义和团在这里活动过，但并没有真正的义和团。英国指挥官巴罗（Barrow）将军以窦纳乐的名义，要求美国部队的指挥官威迩逊（Wilson）将军同意摧毁灵光寺后面的一座瓷制白色佛塔 [Arlington and Lewisohn (1935) 1937: 301]。威迩逊早在1885年就曾经参观过这些庙宇，巴罗的要求令他大吃一惊。在他看来，这样的要求实在是一种“野蛮主义”的表现，因而要求巴罗说明这样做的正当性。威迩逊回忆到：“他的回复更让我感到吃惊，因为他解释说……如果基督徒不毁掉这座著名的中国庙宇，那些曾经毁掉许多基督教教堂的中国人会认为，他们的佛塔所供奉的那些神灵比基督教的神灵更有神力。”接到这一回复后，威迩逊决定退出联合行动，并且告知巴罗，他只能单独进行这样的活动。美国人于第二天早晨撤走，英国人自己毁掉

了佛塔。^①

寺庙并不是联军的目标，不计其数的中国普通百姓和他们的村庄也是攻击的对象。罗兹（C. D. Rhodes）中尉关于发生在杨村附近的一次事件的报告，写得极其生动，读起来就像越南战争的报告一样令人毛骨悚然。一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士兵组成的部队声称有人向他们开枪，于是就惩罚了当地的村民。此后不久，美国第 6 骑兵队的一个连带着一个医生巡逻，进入了这个村庄。他们对受伤的村民进行了治疗，并且记下了村民的叙述。村里的老年人说，根本没有人向任何人开枪。当那些士兵们接近村庄的时候，年轻人都逃到了附近的地里，村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儿童。外国军队开枪打死、用刺刀刺死了 6 个人，然后放火烧毁了几间房子，杀死了至少一名儿童。罗兹认为，这个事件的起因是一名士兵向狗开枪，结果枪声引起了其他士兵的本能反应（NARA, RG395, 913, no. 29）。在天津到北京一线，这类事件到处都在不断地发生。

当联军认定义和团活动来自某个城镇或村庄时，那儿就有可能遭到破坏。9 月 19 日，西山的观音村和十八村被炸毁，杀死了 100 多名所谓的团民。第二天，一支联军袭击了北塘炮台附近的村镇，杀死不少普通百姓。10 月底，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军队在直隶全省到处焚烧村庄，抢劫财物，毁坏庙宇，杀死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有些部队洗劫了离北京不远的清朝皇室的陵墓西陵和东陵，有些部队占领了长城最东端的山海关和秦皇岛，试图最终把秦皇岛改造成能停泊大型舰船的港口（李德征等 1990：331，334，

① J. Wilson 1912, 2: 527 - 530; NARA, RG395, 913, no. 20; U. S. War Department 1901: 509 - 512. 也见李德征等：《八国联军侵华史》（1990），第 330 页。威逊显然不理解象征战的意义，但或许这是因为他不明白惩罚性远征的必要性。威逊没有发觉有成群结伙到处流窜的义和团，也没有看到有传教士受到围困，他看到的是一派“宁静、安定和勤劳”的景象，“就好像这儿未曾有过暴力，也未曾有过战争一样”。



345 - 346, 365, 383)。这些活动的目的似乎是想在中外达成协议之前，使清朝文武衙门不能在直隶省行使权力。然而，其结果却造成了无政府状态，许多地方的治安无人管理，进一步加剧了华北地区的普遍骚乱。联军的恐怖统治一直持续到1900~1901年冬天，到12月，一支法国惩罚远征队在束鹿县毁坏了2000家房屋，在深州一带杀死了1000多人。1901年2月，德国军队在永清、广昌等地杀死了1300多人，并且向地方官员勒索金钱。这些远征一直持续到4月。赤裸裸的杀戮往往伴随着折磨和勒索。在张家口的一次行动中，有100多人被杀死。（李德征等1990：372，376 - 377，385 - 386，390）

远征保定，1900年10月

在惩罚性远征行动中，声势最为浩大的恐怕是对北京东南90英里的保定府城的征讨了。在保定府，有美国和英国教会的11名成人和4名儿童被杀死。对于西方军队的指挥官和传教士来说，这一远征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它代表着那种因果报应以及人们一致认为对付中国人最有效用的象征战。参加这一远征的有两支军队，一支从北京出发，由盖斯利将军指挥，一支从天津出发，由法国的白劳德（Bailloud）将军指挥。整个远征军超过6000名士兵，包括有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部队，还有一伙澳大利亚的工程人员。第6骑兵队队长哈切森（Grote Hutcheson）代表美国，而保定美国教会的成员路崇德（J. W. Lowrie）牧师作为翻译之一参加了远征军。

两支军队于10月20日到达了保定，建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查实传教士死亡的情形。这个委员会主要从中国证人那儿了解到，1900年7月1日，义和团在攻打传教站时杀死了几个人，其中包括毕得经（Pitkin）牧师，他的头被砍下来送到了保定府衙。另外有3名妇女、2名男人和1名儿童在义和团的总部七圣庵被拘押了一段时间，然后被送到城外杀害，草草埋葬在城墙西南角外的坟墓里。委员会还听取了中国内地会的格林（Green）一家和格雷格

(Gregg) 女士的陈述。按照远征军翻译加特雷尔 (T. J. N. Gatrell) 的说法，他们提供的证据“远不足以”将地方官员送上法庭 (Gatrell 1901: 149 - 150)。10月27日，这个国际委员会判定清朝官员合谋进行了这些杀害，并且判决“以中国处死罪犯的惯用方式——斩首”，将布政史廷雍、城守尉奎恒和统带王占魁处死^①。

实际上，在这一处决执行前，被怀疑是义和团民的人和保定城本身已经受到了惩罚。德国士兵围捕了几个人，把他们带到城外，让他们为自己挖好坟墓，接着就将他们处死了 (Nicholls 1986: 90)。委员会在收集到证据以后，盖斯利将军下令，炸毁七圣庵和城隍庙 (NARA, RG395, 913, no. 36)。炸毁七圣庵尚可理解，因为那里曾经关押过被杀害的传教士。但英国指挥官炸毁供奉城市保护神的城隍庙的命令，表明了在英国殖民地对付土著居民反叛时经常使用的一种特殊战争也扩展到了中国，这就是摧毁那些体现着中国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事物。如布朗 (Arthur Brown) 所报告的，联军还炸毁了保定城门的两座门楼和城东南的一段城墙，那些传教士据说就是在这段城墙附近被杀害的 (A. Brown 1904: 210)。在明恩溥看来，通过这些活动，英国人“给这座省城打上了烙印”，昭示着清朝官员们所犯下的罪行 (A. Smith 1901b, 2: 611)。在此后几天里，随着来自天津的军队撤回驻地，又打下了其他一些烙印。联军在撤退时大肆劫掠和焚烧沿途的村庄，一些城市的城墙被炸毁 (Nicholls 1986: 90 - 91)。此后不久，保定的清朝官员被惩处。11月6日，廷雍、奎恒和王占魁被带到城墙西南角附近。“尽可能地接近传教士被杀害的地方，在那儿，在所有外国士兵面前，他们被砍去头颅” (A. Brown, 1904: 209) (图片 22)。

^① 见哈切森队长的记载，载 NARA, RG395, 913, no. 36 以及 U. S. War Department 1901: 461 - 476。也见 A. Brown 1904: 208；李德征等《八国联军侵华史》(1990)，第 366 页。



图片 22 在保定处决一名清朝官员，可看到被毁坏的城墙和寺庙

The Graphic, 5 January 1901.

后来证实，这是唯一一次由列强直接惩处清朝官员的事例，但这并不是这次处死值得注意的唯一理由。仅就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这一事例显然也是联军第一次决定使用“中国”方式来执行死刑。更具体地说，这一方式复制了处死英美传教士时所使用的方方式。这样，使用中国方式来处死清朝官员（后来是那些被怀疑为义和团的人）的决定提出了一种复仇经济，这一经济超越了炸毁儒家和佛教寺庙来摧毁中国人迷信的做法。这次处死以一种未有先例的完全可以按字面理解的把清朝政治权威去疆界化的形式，完成了一个完全等值的交换，这一交换让那些清朝官员们按欧美人的条件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了全部责任^①。这样的交换是在某种框架

^① 作为一种确保清朝官员尽其最大能力保护欧美人不受攻击的手段，这一点是那些在华人员长期鼓吹的主张，前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 1900：2486）这时又再次提出了这一主张。

中完成的，这种框架展现出法官们把一个土著的惩处形式解码、并且把它转而用于惩处土著人的能力。

在保定实施的“正义”树立了一个先例。这些死刑的执行以一种公开示众的形式进行，外国士兵不仅是惩治罪犯的见证人，也能够从个人欣赏的角度观看土著人“野蛮的”特殊习俗。《悉尼晨报》的一位记者借用一名澳大利亚企业家的场面浩大的舞台产品，把这一场面描写为“霍尔特牌的处死方式”，并且补充说，法国人和德国人令人难忘地“指挥”了整个事件：

一大块开阔地，空旷无人，只有士兵把守在每个入口和场地中央的每个台子上。3000名士兵迈着平稳的步伐，在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和隆隆的军鼓声中进入场地，排列在四周。又一阵军号和军鼓声突然响起，进来的是即将被处死的人和刽子手们。主刑的刽子手先向要处死的人鞠躬，然后向观众鞠躬，就像演员就要开始表演一个高难度的技艺一样。他的助手们也做着相同的动作，然后就雕像般地站在那儿……又是一声信号，第一个受刑者被强迫跪下，两名助手牢牢地按着他的肩膀，第三名助手则抓着他的辫子，第四名助手把一把斧子递给刽子手。刽子手小心地把斧子拿在手中，慢慢地举过他的肩膀，然后落下，把锋利的斧刃按在赤裸的脖子上，留下一道红色的印记。一次，两次，然后他用尽全身力气砍了下去。鲜血喷射出来，受刑者的身体抽搐了几下。抓着他辫子的那人猛力一拉，头发离开了身体，一切都结束了。（引自 Nicholls 1986: 90）

没有其他资料记载观众的反应，但从《悉尼晨报》的报道来看，这种处死形式显然击中了一个响亮的音键。毕竟，它和这一时期在英国和北美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再现殖民战争的演出非常相似。



如果是在英格兰曼彻斯特的柏利维尤公园^①，或是在牛仔戏的演出中，或是在国际博览会上，这一类的表演就会把殖民地冲突表现成场面宏大的大众文化。尽管保定事件的参与者们不会把欧洲的公开表演和在中国上演的有关因果报应的活报剧联系起来，但有一点相当清楚：保定事件发生以后，对“犯罪者”的惩处便不再会使士兵们感觉自己变得冷酷无情了，也不再会让他们把自己的行为错误地与野蛮的义和团及其愚昧的统治者们的行为进行任何一种比较了。毕竟，现在的行刑者们已经是土著的中国人，而惩处的形式被看做是针对中国人精神思想的恰当方式。就像瓦德西伯爵在 11 月 3 日致德皇的信中所说，整个保定事件“发挥了具有深远重要意义的道德影响力”（Walderssee 1924: 226）。

从这以后，对被认定是义和团的人进行处死，就通过那些对中国人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来加以表现。在北京一处公开处死的刑场以及天坛院子里，在有大量士兵、传教士、记者和摄影师观看的情况下，处死义和团的演出成为占领北京大场景中一件“丑陋的平常事”。这类处死一直持续到 1901 年（图片 23）。例如，在 3 月初，美国第 9 步兵团 D 连的列兵韦弗尔（Charles Wafer）在给他妈妈和妹妹的信中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在英国兵营里的处死过程。尽管他声称这些处死让他恶心“反胃”^②，但他还是一直看着 7 个人被砍下头颅。另一方面，这些处死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他断定如果美国人在菲律宾进行几次这样的处死的话，那里的游击战争就会结束（USMHI, Spanish-American War Survey, 9th Infantry, Wafer letters dated 5 and 6 March 1901）。列兵韦弗尔可能不能正确地拼写，但他与瓦德西和其他人对刻版的东方精神有着相同的理解。

① 柏利维尤公园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开始上演再现英国帝国战争的戏剧了，见 Mayer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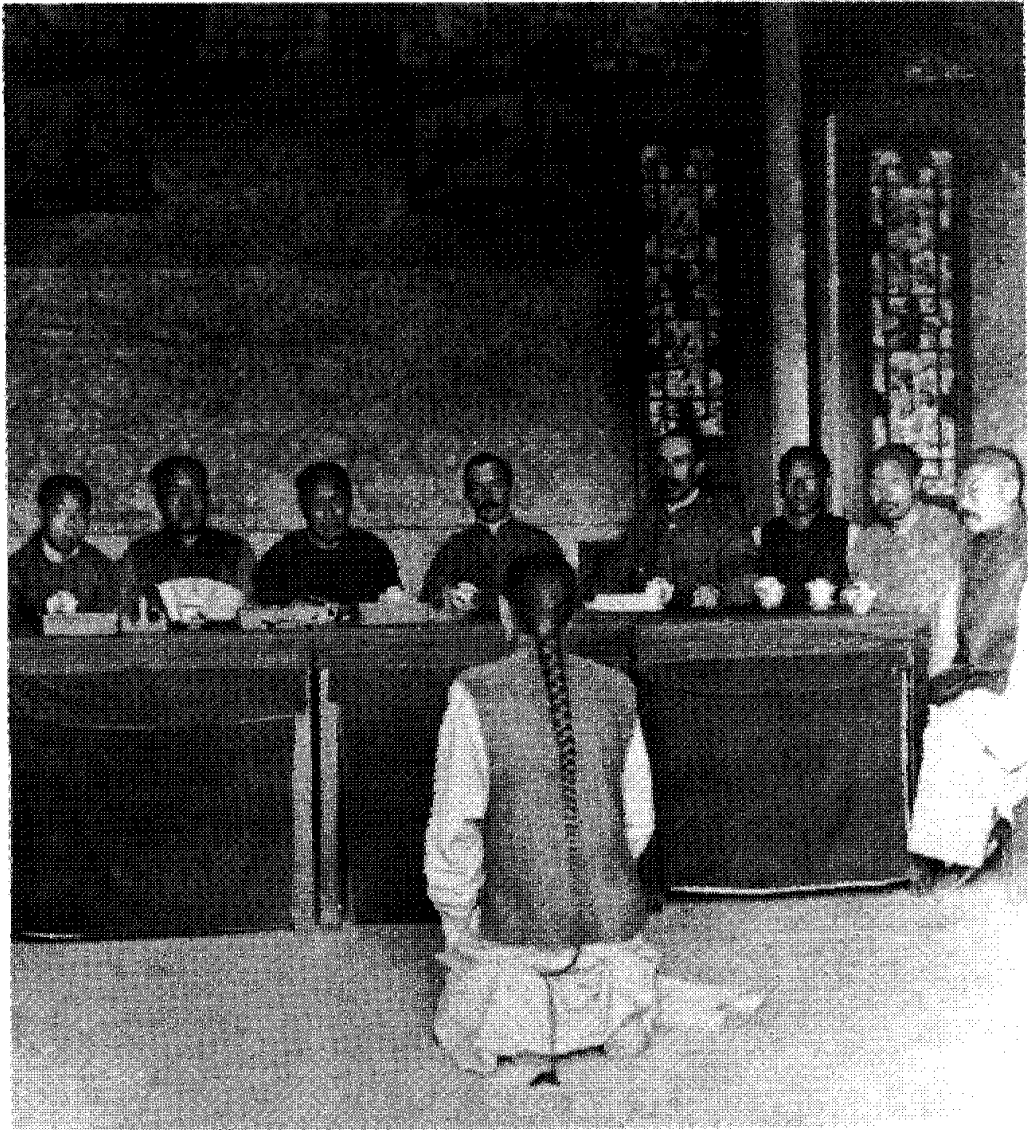
② 韦弗尔的信中将 stomach 错误地拼写为 stumack，所以下文作者说他“可能不能正确地拼写”。——译者



图片 23 有联军士兵观看的公开处决

然而，一种甚至连美国军队中几乎不识字的列兵都能理解的惩处形式的规训力量，或者远不如这一过程本身所象征的东西更有意义。它使得联军进行的惩处行动不被看做是一种不经审判的即决惩处和任意惩处，并且通过一种合理合法的程序——这种程序可以与英国建立奖赏金规则的程序相比较，那一程序保护了善于模仿的士兵们不受中国人性格的污染——把中国再疆界化。一个合法的架构被运转进审判义和团嫌犯的地方，并且让他们被自己的同胞处死（图片 24）^①。在对联军行为开始提出质疑的气氛中，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① 1901年1月，在美国控制区设立了一个中国的刑事法庭，这个法庭有权处死那些被控进行义和团活动、劫掠和强奸行为的人。见 NARA, RG395, 944, no. 3 and 911, General Order 3。



图片 24 审判义和团民，右起第四人为李佳白牧师

文明与野蛮

西方列强 1900 年夏对中国的武装干涉，用了两个根据来说明其正当性。第一个根据是国际法。国际法保护外交使团和驻外使馆，同时也保护侨居他国的外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中国破坏了使馆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毁坏外国财产，使外国人失去生命，理应受到制裁并进行赔偿。这是一些有着严格规定的法规，自 1840

年以来，欧洲列强常常把它们强加给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与这一规范国际行为的世界性法规相比，列强干涉中国的第二个根据并没有那么崇高威严，也没有那样明确的规定，但对于参与帝国和殖民地活动的人来说，其重要性丝毫不比国际法小。这一根据就是传播文明的使命感，就是所谓“白人的责任”。按照这一理念，西方文明的代表者们有责任去教育世界其他地区中那些文明程度不够的居民，并且改变他们的野蛮状态^①。英国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类似文明使命的活动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把这一活动组织成了一项教育工程，在这一工程中，他们教育中国如何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义和团起义不仅使这一工程突然中止，而且表现出中国人天生具有的那种不断再生的和潜在的“野蛮和残暴”。

但是，这类残暴行为的出现尽管多少有些令人吃惊——人们毕竟曾经认为中国人昏睡般地缺乏活力——仍然可以用某种在其他殖民地中曾经使用过的类似方法来对之进行规训。就像克劳斯所指出的，所需要的只是惩罚的意志和实施惩罚的坚定的手。公开处死、破坏庙宇和城墙，以及胜利游行式的意图，都是要给中国人上课，这些课程被认为可以把中国文明从向下沉沦的过程中拖上来。如果列强需要另外一个道德上的认可来说明他们使用武力的正当性的话，它们会在在华传教士中找到现成的盟军。例如，梅威良牧师就认为，“如果你用软弱的手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话，他们就会利用它”（引自 M. Young 1968：191；也见 Miller 1974）。美国圣经会的海格斯（Hykes）牧师对此补充道，差不多可以说，“中国人不懂得力量显示的其他形式”（*Shanghai Mercury*, 1967：79）。他们的看

^① 有关这一论题有大量的资料，赛义德《东方学》的批评目标就是它的普泛性。围绕着欧洲殖民主义和文明话语的联系而进行的历史和历史编纂问题上的深刻讨论，见 Adas 1989；R. Young 1990，1995。批判人类学已经以各种方式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比如 Fabian 1983；Rabinow 1986。



法得到了明恩溥的支持，明恩溥解释说，惩罚只是“基于对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的认识，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东方人会把西方人对于按东方道德不能让步的事情上的让步解释成为严重的软弱，并且东方人非常可能立即利用这种软弱，就像他真的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一样”（Arthur Smith 1901b, 2: 869, 726）。

尽管也有其他一些了解中国人的人重复这一类的评论，通商口岸和欧洲的一些报纸也支持这些看法，但在观察家中间仍然有人对那些诸如处死和劫掠等惩罚性暴力的程度开始表示不安。合唱中不和谐的音调首先出现在私人日记和写给亲人的信里。例如，瓦德西就认为列强的行为根本算不上是基督教文明的展示，并且认为自从三十年战争或者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劫掠性战争以来，还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像这场战争一样（Walderssee 1924: 232）。专门就劫掠而言，斯图尔特将军在战斗日记中记载说，在穿越紫禁城的游行过程中，有关劫掠艺术珍品的事不断地“浮上心头”。尽管他心里想，最好能一直“向前看”，把这类事情留到军官食堂里再来讨论，但很显然，他已经被那些甚至外交使团的妇女也参与劫掠的报告搅得心神不宁了。此外，即使是英国军队有秩序的处理劫掠物品的做法，似乎也没能使他感到多少安慰，而只能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开始憎恨听到‘抢劫物品’这个词了。如果你恰好挑了一件似乎不错的东西，而且你已经付了钱，但立即就有人问你‘你从哪儿抢来的这件东西’？这时候，甚至那些本来很了解你的人好像都会怀疑你的正直了。在这种情形下生活，多少是一种堕落”^①。

斯图尔特感到，包括军官在内的欧美人的正直廉洁品质正受到人们的怀疑。在其他一些资料中，也能看到与此相同的感觉。一些人承认参与了某些可以得到中国物品的活动，但他们私下里对得到这类物品表达了道德上的不安。例如，美军随军牧师格罗夫最初写

^① Stewart, *Service Days*, 252.

信给他的妻子时说，得到珍贵的中国古玩的大好机会到了。然而，随着他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劫掠的范围，了解到美国传教士也参与了劫掠，了解到通过拍卖劫掠物品用作奖赏金而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容忍了劫掠，他就和波莉·史密斯一样，开始产生了道德上的不安，并且决定不再购买英国人拍卖的劫掠物品。他还断定，传教士们参与劫掠将会对他们的事业造成沉重的打击（USMHI, Grove Correspondence, letters of 22 August; 9, 13 September; 11, 16 October 1900）。

格罗夫的直觉是对的。例如，在外国特权和条约权利的堡垒上海，《北华捷报》对来自天津的一些有关战争初期的报告表示了关注。它的编辑们翻出了1860年抢劫行为被“授权”成为“惩罚北京政府”手段的旧事，对现在在天津劫掠的是私人财产而不是政府财产感到非常不安：“如果这类放纵行为……经常发生的话，那么它将动摇现代人对文明世界的认识。如果这些行为是我们非常以为骄傲的西方文明的结果，那么它的文明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军队来这儿是履行它所应尽的职责的。杀戮和抢劫是我们那些野蛮而又残忍的敌人的家常便饭，我们的军队必须要压倒他。但欧洲列强派兵的目的，是消灭这一恶魔而不是去效仿他。如果以所描绘的这种无耻方式对平民进行的抢劫活动不能遭到整个文明世界强烈声讨的话，那么我们还会犯更多的错误。”（NCH, 8 August 1900: 277 - 278;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这里有三点非常重要，它们也是其他一些批评劫掠行为的观点的中心内容。第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劫掠行为给文明带来的问题：如果参与了劫掠，那么还能称得上是文明人么？还能声称西方人优越么？第二点提出了一个与第一点相关联的问题，就是效仿的问题。如果列强原封不动地效仿了野蛮人的行为，它们还能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平吗？最后一点是，劫掠似乎是在毫无廉耻感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不仅与不文明人的行为相类似，而且也将招致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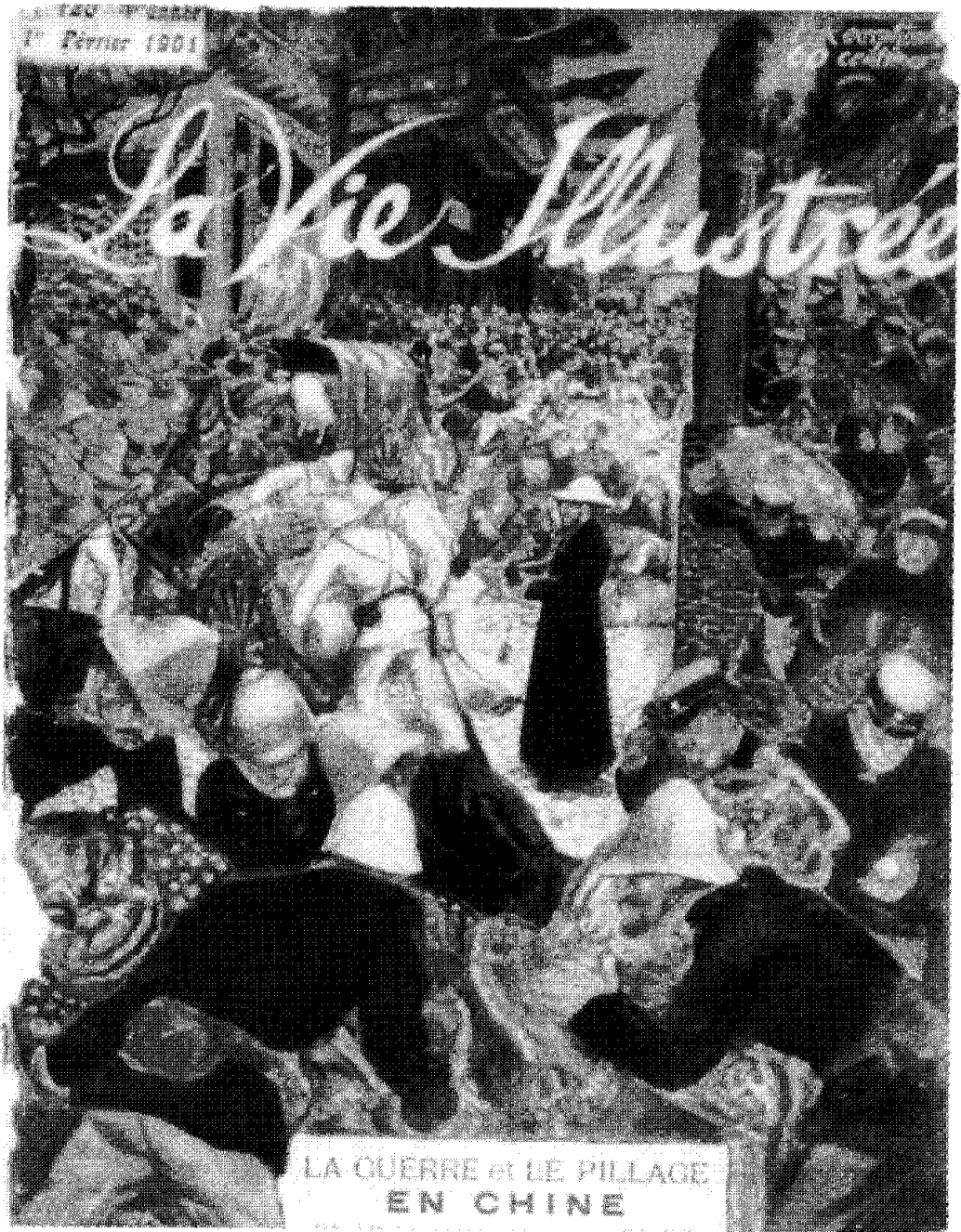


个文明世界的批评。当有关列强在北京再次大肆劫掠的“放纵行为”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这家报纸又补充了新的一点，它把北京的劫掠称之为“丑闻”（*NCH*, 12 September 1900: 542）。

就像《北华捷报》预测的那样，有关列强大肆劫掠的报道传到欧洲和北美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①。《伦敦每日快报》评论说，在中国的使命一旦完成，“文明”就应该“通情达理地表示羞愧”（引自 *CE*, 14 January 1901: 56）。《评论之评论》（*Review of Reviews*, 22, 1900: 52）的一篇社论认为，来自中国的消息是“有思想使欧洲人羞愧地低下头来”。社论针对劫掠、英国使馆内的劫掠物品拍卖以及俄国人在东北的大屠杀，做出结论说：“我们已经将文明的外套抛在一边，我们正在像海盗时代的海盗祖先们一样行动。我们的文明十分肤浅，良心对于人的兽性的制约被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扯得粉碎。”

其他一些报纸、杂志和书籍也表达了和《伦敦每日快报》同样的羞耻感。在法国，《生活画报》（*La Vie Illustrée*, 1 February 1901: 283 - 300）发表了一篇插图文章，批评列强在北京的劫掠行为，文中有关于劫掠物品以及在意大利使馆进行拍卖的插图（图片 25）。还有从清朝祖庙里抢来的守护狮的一幅图片，这座守护狮由福里将军送回法国后，法国政府一时显然不知如何处置，竟又把它送回了中国！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写道，在欧洲人面前放一点点诱惑，就会很容易地使他们“退化到野蛮状态”。他担心“在此后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基督教徒也许会认为劫掠与报复是基督教的美德呢”（Hart 1901a, 1901b: 87 - 89）！劫掠活动也给了中国人以把柄，以其他方式来利用它。据参与“安德伍德”立体摄影环球

^①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要求调查的决议，送交国防部长鲁特（Elhu Root）。见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56th Congress, 2nd Session, vol. 2, 4213, Report no. 2358。



图片 25 北京的劫掠

La Vie Illustrée, 1 February 1901.

之旅的摄影师里卡尔坦（James Ricalton）讲，参加议定和约谈判的清朝代表、声名显赫的李鸿章，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也感到非常费解。李鸿章在翻阅了“摩西十诫”以后，建议“把第八条戒律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Ricalton 1901：233）。李



鸿章的批评非常有分量，因为它拐弯抹角地讽刺了基督教传教士也参与抢掠的事实。

在日本和美国的出版物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义愤。在日本，与有关劫掠的报道同时出现的，还有对高级军官和日本商号合谋参与抢劫的指控，以及对政府试图掩盖这些事实的指责。1901年11月，日本报纸《万朝报》发表了一份各类劫掠物品的详细清单，并且指责说，尽管山口素臣中将发布明确的命令禁止抢劫，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用来掩盖他和下属们的行为而已。据报纸报道：“他们一旦发觉士兵和低级军官进行劫掠，就会指责说这是对军队的污辱，[然后]……他们把劫掠物品运送到管区司令部，在那里把那些特别贵重的东西分给那些高级军官，把其余东西以一种可以维持体面的方式进行处理。例如，一部分劫掠物品被一直扣留到商人们来到北京，然后委托他们进行处理，这样，[军队]就可以保持自己的清白，总是能维持体面。”（5 December 1901）《万朝报》对军队高级官员的大胆攻击一直持续到1902年，最终使得山口将军和第9步兵旅的指挥官真锅斌将军被迫辞职。这是唯一两例对劫掠丑闻做出反应的事例^①。

和日本的反应相比较，美国的主要问题不在军队方面，而是传教士参与劫掠的问题。有关这方面最早报道登载在《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上，署名钱伯林（Wilber Chamberlin）。但使传教士问题上升到轰动程度的，是1900年圣诞前夜刊出的钱伯林对梅威良牧师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梅威良认为劫掠是一种完全正当的行为（引自 M. Young 1968: 191）。梅威良的论证立刻引起了美国向太平洋扩展的主要批评者之一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回应，他在一篇名为《致坐在黑暗中的人》的文章中尖锐地批

^① 引自 Middleton 2001: 14 - 15, 19。在他们辞职以后，两名军官都得到晋升并获日升勋章。

评了传教士的道德，并把它与美国在菲律宾的行为联系起来。马克·吐温尖利刻薄的谴责发表以后，美国公理会方面进行了辩护。李佳白和史密斯都声称传教士的劫掠是一种“高尚道德”，并补充说，美国传教士参与劫掠活动，只是为救助中国基督徒而筹集资金。对此，马克·吐温又做出了回应，非常轻松地将他们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①。尽管在这场论争中多少处于不利地位，传教士领袖们仍然试图影响中国的舆论。明恩溥站在李佳白和史密斯一边，写信给《北华捷报》，为传教士的行为辩护，并批评了马克·吐温的看法（*North China Herald*, 27 March 1901: 602 - 603; 3 April 1901: 660 - 661; 19 June 1901: 1193 - 1194）。

传教士及其批评者们似乎始终局限在论证基督教道德的普遍性方面，而其他一些批评者们则试图通过历史与国际法来进行论述。麦克唐奈尔（John MacDonnell）就是如此。在发表于《现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中，麦克唐奈尔讨论了英国战利品法规的历史，认为这些法规并未起到法规的威慑作用，反而由于它们把通过拍卖劫掠物品得到的奖赏金中较多的部分给了军官们，从而鼓励了普通士兵更多地进行劫掠。他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英国议会的一个有关军队掳获物品处理程序的委员会 1864 年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调查了 1807 年以来分配奖赏金的一些案例，包括拿破仑战争和印度战争在内（*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1864*）。尽管它没有认为劫掠是非法的，但它确实建议应该更加及时地分配掳获物品，在各级士兵中间的分配比例应该更为公平。这一建议是否得到实施不得而知。而对于麦克唐奈尔来说，更重要的是自 1860 年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关于战

^① 马克·吐温与传教士的论争见 Mark Twain 1901a, 1901b; J. Smith 1901; Reid 1901, 1902; Ament 1901a, 1901b。也见 Favier 1901; *Literary Digest* 23. 2 (1901): 36 - 37。



争行为的国际法。

1871年普鲁士击败法国后，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开始职业化，采取了新的编制和新的武器技术，改革军队并提高军官素质^①。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迅猛变革引发了关于建立战争行为的国际标准的讨论，这些讨论的成果就是1898年和1899年的《海牙公约》。1899年的《海牙公约》主要涉及陆地战争问题，其中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抢劫和掠夺私人财产都是非法的（Bevans 1918-30, 1: 260）。1900年侵略中国的所有国家以及清朝政府，都是这一公约的签署国^②。尽管这些新的进展并没有能够阻止在北京发生新的劫掠行为，但它们的确表明，关于战争行为的国际性的重新规范不可避免地要对解释1900年中国事件的方式产生某种影响。

就麦克唐奈尔来说，他的批评极其明确：“《海牙公约》的内容和精神”在中国遭到了践踏。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公约的理论是“尽善尽美的”，那么，错在什么地方呢？麦克唐奈尔直接指向了种族问题。他说，在和“东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一旦出现机会，“旧的暴行就会再次发生”。这些暴行深深植根于英军在印度的行为中，并且得到了将拍卖掳获物品的收入进行分配的法规的认可，从而使得这类暴行不断发生，直到产生出到目前为止最为疯狂的劫掠行为^③。

指出《海牙公约》遭到列强践踏的，并不仅仅是麦克唐奈尔一个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劫掠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例如，

① 在英国，有好几个议会委员会建议改革和重组军队。到19世纪80年代，这方面的改革开始予以实施。

② 就在北京劫掠进行的同时，公约的批准书予以发布。见 *Carnegie Endowment* 1914: 2-4。

③ J. MacDonnell 1901: 444-452, especially 446-450。另见 *Review of Reviews* 22 (1900): 52。

《北华捷报》就明确指出了违背“战争规则和惯例”的一系列行为，其中包括俄国军队的暴行、列强进行的惩罚性远征、盗窃北京天文台的科学仪器，以及“部分英美传教士用劫掠物品进行的慈善活动”（*North China Herald*, 24 April 1901: 784）。与《北华捷报》一样，林奇也对违背《海牙公约》的行为感到不安。另外，他和麦克唐奈尔一样，也对列强军队针对普通中国平民使用暴力提出了疑问。他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日本士兵将被怀疑是义和团的人的集体斩首、强奸妇女、用刺刀挑死儿童、德国人拷打所谓的义和团民，以及在中国许多乡村中发生的集体性自杀事件。林奇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恐惧”才迫使他们这样做。他的结论是，西方人前进的速度出现了错误，“它驱使我们像一群魔鬼附身的猪，猛烈地冲向上帝才知道的深渊”。他说，西方文明“不过是野蛮表面的一层虚饰而已”（Lynch 1901: 303 - 317）。

有的人不愿意把这些野蛮行为描述得太过“令人厌恶”（Lucas 1900: 184），而也有人愿意用这些行为作为现代战争毫无浪漫可言的例子。狄龙（E. J. Dillon 1901）就是这样做的。他的《中国狼与欧洲羊》一文，从对战争的报道转向战争本身。这篇文章依次列举了从7月到9月联军进行的处死、屠杀以及其他所有形式的暴行，有几处引用了《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urger Zeitung*）和《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在10月和11月刊登的有关德军暴行的插图报道。狄龙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在杀害中国人民，同时又使自己的军队道德堕落的时候，我们这个文明的、多少还热爱真理的民族竟然还在喋喋不休地大谈使中国走向文明的光荣任务呢？”

狄龙提出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答复，但他对西方人暴行执著的揭露确实为其他人提供了弹药。中国通密勒（Thomas F. Millard）在《斯克里布内杂志》（*Scribner's Magazine*）上谴责联军不断地进行报复是犯罪。他写道：“列强已经被狂乱的报复情绪



所支配，它们正在嘲弄世界和平。9月、10月和11月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把战争拉回到了‘中世纪’。它将给即将到来的一代，在世界道德环境中留下一个污点。”^①

在如何解释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暴行的讨论中，出现这样一些批评意见相当重要，因为它们表明，无论是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还是欧洲人、美国人或者日本人看待这些事件的方式，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更大的背景涉及有关各国的个人和团体对于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解释以及对其正当性的论证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到，就欧美来说，种族差异的问题，尤其是种族与文明进程之间联系的问题，是支持殖民主义的正面评价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心因素。对列强在中国的行动，无论是抨击还是辩护，都直接或间接地牵涉种族问题。而且，在战争和对北京实行占领的过程中，始终可以听到这一问题的声音。例如，日本士兵就因其总体上例外于东方人而受到称赞。瓦德西伯爵则认为不应该召集德国军队来“与异教种族进行战斗”——这对于士兵的精神状态和纪律都会产生负面作用（Walderssee 1924: 234）。在其他一些事例中，印度部队士兵和其他国家的士兵之间就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这种冲突一度非常严重，致使格里尔森（J. M. Grierson）上校产生了这样的看法，认为人们瞧不起英国，因为在占领军当中，英国“实际上不是白人部队”^②。

然而不论人们如何解释英国军官的这一看法，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回想起帝国时代有关种族的中心问题。如韦恩和瓦德西伯爵所提出的，白种人在与弱小种族接触中会发生变化吗？“东方的教育”是不是只不过是接触产生的种族堕落的另一个名称呢？

① Thomas F. Millard, "Punishment and Revenge in China," *Scribner's Magazine* 29 (1901), 187 - 194.

② 见 WO 32/6413, 6422, 6423, 6425, 6426, and 6427, 格里尔森讨论了涉及印度军队的许多事情。

并且，或者最重要的是，教育工程怎么可能会产生出相反方面的作用呢？这些问题存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国沿海地区，或许，只有结合 19 世纪最后 20 余年对回返原始状态普遍焦虑的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①。

这类焦虑隐藏在中产阶级把文明和野蛮的界线绝对化的观念背后，它不仅担忧“种族”混合的问题，而且担忧与“低等”文明或民族接触，可能会唤醒欧洲人心中蛰伏的欲望或者残存的原始性。这一时期的主流媒体、科学杂志、通俗小说和异见文学中都有大量的类似焦虑（Brantlinger 1988：227 - 254；Gilman 1985；McClintock, 1995：49 - 61；Stoler 1991：72 - 88）。这样，当针对中国人的极端暴力或劫掠北京的现实事件超过人们的理性预期，并与小说的描述相类似的时候，人们就会用小说中的辞藻而不是用文明必然战胜野蛮一类的词语来表现欧美人行为的意义。虽然并没有出现意义的完全倒置，但就暴行和劫掠活动就是种族退化的表现这点来看，1860 年入侵中国时被用来作为合理性根据的欧洲道德优越的理论，就很难再被用来解释 1900 年的事件了。

此外，在使馆人员得到解救以后，惩罚和复仇的疯狂暴力蔓延到整个华北。即使对那些长期负责教化不守规矩的本土民众的人的感情来说，这些暴力也构成了挑战^②。到 1900 年 12 月，这种情况愈发严重，在瓦德西将军指挥下的联军参谋部中任英军代表的格里尔森上校不得不对德军指挥官冈代尔（Gundell）陆军中校解释说，如果德国军队继续像报道中所说那样，“一见到出于自卫而携带武

① 例如，霍布森（Hobson 1901）在讨论沙文主义时就曾指出这一点。引自 Pick 1993：113。

② 在 1901 年春天，格里尔森上校给德国人做如何在东方国家作战的演讲时，就引证了英国在这类事务中 250 年的经验。见 WO 32/6423, letter dated April 2, 1901。



器的中国人就杀掉”，或者对中国官员任意鞭打，剪掉他们的辫子，直隶省就会陷入无秩序的混乱状态（WO 32/6415, diary entries of 20 - 29 December 1900）。换句话说，认为这些行为已经超越了文明和野蛮之间某个界限的感觉，对于参与这些行为的人和对这些行为进行评论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简言之，在西方人的自我知觉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创伤，一个需要区分鉴别也需要进行缝合的创伤。要有效地平息有关文明人中间野蛮行为的问题，只有再次在中国建立起新的秩序才有可能。

第七章

将清朝君主去神圣化， 1900 ~ 1901 年

义和团起义的平定导致了在前所未有规模上对中国的再疆界化，它不仅要建立对外关系的新秩序，而且还要解决文明内部潜藏着野蛮性的矛盾问题。本章和以下一章将探讨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着的行为区。在这些行为区中，欧美帝国的各种力量在中国重新建立起秩序，并且进行了要消除西方的野蛮主义所必须进行的意识形态缝合术。一个行为区在国际关系舞台上。国际法的法律—理性程序被付诸使用，并且通过谈判把一项协议强加给清朝政府。第二个行为区在国际展览文化中，它的各种表现方式把中国制造成一个陈旧和落后的公开展示，供欧美人消费。第三个行为区涉及为给 1900 年事件制造一个明确的意义而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努力。对这类制造来说，关键的是制造一个权威叙事，一个在各种不同地方和场合——包括悼念中国“残暴行为”的“受害者”的正式仪式——传播的叙事（见本书第八章）。在意义制造的每一个领域中，欧美人的暴行和劫掠活动所引起的道德危机都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同对清朝统治者的祛魅过程非常相像，这些暴行和劫掠活动被转移到其他一些不太具有威胁的建构上，从而使它们独一无二的特异性得以消解。取代它们的，是对种族化的（如中国的、亚洲的、



或东方的) 他者的特有行为以及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排外主义的进一步确认。

1901年的再疆界化：《辛丑条约》与新的觐见礼节

1900年秋天，列强驻华公使们发现，他们已经有条件来惩治中国侵犯国际法的行为，并且解决1860年条约签订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列强起草了一个联合照会，其最终形式包括12条要求，这些要求最终都被纳入到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中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306-339]。这一照会于1900年12月22日递交给清政府，第二天，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就提交了他们担任议和全权大臣的文件^①。就这样，议和谈判正式开始^②。

美国代表柔克义 (William Rockhill) 在有关议和谈判的报告中，把列强的目标概括为“四个要点”：(1) 惩处“祸首”和那些实际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惨案和骚乱”的罪犯；(2) 赔偿骚乱所造成的财产损失；(3) 采取措施防止类似暴乱再次发生；(4) 改善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官方和商业”关系 (FRUS 4-5)。

前两点——惩凶和赔偿——把中国政府作为攻击目标，成功地进一步削弱了清帝国的主权。中国政府被迫将一些亲王和官员处

① 见 FRUS 58-60。这一照会是在法国于10月4日、英国和德国于10月23日提出的要求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见 FRUS 26-27。庆亲王和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身份见 FRUS，此事似乎引起了小小的麻烦。

② 有关这一谈判最全面的研究依然是凯利的著作 (Kelly 1963)，该书表明，列强议和代表之间并不总是意见一致。除了谈判代表相互间的怀疑外，也有许多观察家们认为，和老谋深算的清廷打交道，这些代表们还嫌太嫩。见 Lo 1976, 1: 141-202，尤其是163页德拉蒙德 (William Drummond) 的评论。

死、革职，或者给予其他处罚。根据国际交往的任何准则，即使是根据欧洲民族国家对这些准则的理解，这都是一项超乎寻常的要求。这一要求还强迫清政府承认错误，为那些因为反对清廷的义和团政策而被处死的官员们平反。至于赔偿，在赔款数额和执行的苛刻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此后 40 多年的时间中，历届中国政府都要背负重担，需要用全部的海关和常关税收入以及盐税收入来支付这些赔款。

然而，这些束缚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还在于它们只构成了《辛丑条约》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可以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不对称力的角度加以解释的部分。柔克义提到的另外两个要点——未来的安全和关系的改善——表明，惩罚和赔偿只不过是驱使外交官们行动的两个考虑。各国公使们还决心要确保未来任何“反对外国人”的骚乱都将会被阻止在萌芽之中，并且确保外国人，无论是外交官、商人还是传教士，都会得到充分的保护。《辛丑条约》通过让清朝官员个人为反外活动负责和贬抑中国皇帝的方式，实现了这些任务。在主权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范畴内，和欧洲“势力范围”不断出现傀儡统治者的新兴世界相关联，中国皇帝注定要成为已经过时的权力形式的纯粹象征。

正如柔克义所指出的，有多种目的和利益在《辛丑条约》中发挥着作用。有鉴于此，或许应该更为审慎地去研究这一文本。换句话说，不应该只从它表面的文字来考察这个文件。之所以要审慎地对待这一条约，还因为这一条约所要解决的并不仅仅是当时所急需处理的问题，就像柔克义暗示的那样，它还要应对 19 世纪以来清帝国和北大西洋民族国家之间斗争的许多核心问题。由于这一重要性，这里将较为详细地考察这一文件的条款，以梳理其运作体系并揭示其权力机制。

条约的序言以参与缔约的 12 个主权民族国家的全权代表的名字开始。这些国家是：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



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国和中国。在这些代表和国家的名字之后，条约引用了每一条款所依据的授权文件。通过这种做法，条约确立了使条约条款的订立具有合法性和约束力的方法。条约交叉援引列强的要求和中國元首即作为国家统治者的中国皇帝接受这些要求的文件，从而完成了其合法性。例如，序言最后先是举出12月22日提交给“中国政府”的“联合照会”，然后又提及12月27日的上谕，表明清政府接受了这一照会，而上谕全文则被收在条约的附件一中。这样一套程式，在条约的12条条款中重复使用，从而像一份英国官方出版物的说法那样，使联合照会的要求“得到了实施”[Norie (1903) 1995: 499 - 507]。

条约条款的内容实质和顺序都与照会的12条要求相同，但这两个文件并非完全一样，因此，把这两个文件放在一起阅读，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联合照会与条约的显著不同在于，和条约相比较，照会列举了两者存在的条件和环境。换句话说，联合照会提供了它所提出的要求的合理性，并且最终为《辛丑条约》每一条款的正当性提供了论证。照会是通过把这两个文件置于下面这样的环境中而做到这一点的：“在今年5、6、7、8等月间，在中国北部各省发生了严重骚乱，犯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种种穷凶极恶的罪行，触犯了国际公法，违背了人道原则和文明准则。”（FRUS 59；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我之所以在照会这一起始段的有些地方加了着重号，是要强调列强是如何给这场冲突定性的。此外，因为一些传教士后来写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同样夸张的语言，就使我们看到，描述1900年事件的主流框架不仅仅局限于外交团，也是一些大众性团体的看法。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对这场冲突进行这样的定性，对列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尽管它们有权利——按它们自己对这些权利的定义——要求对这场冲突中所受到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赔偿，但它们也想给清朝政府的行为强加上一种道德性裁定。首先要把中

国排除在文明范围之外——义和团不是普通的地方性乱民，这场冲突也不是普通的军事行动。在清廷和中国人民得到列强宽恕并能重新被“国际家庭”所接受之前，清朝政府就会被看做自己把自己置身于正常的国际关系之外。

《辛丑条约》以三种方式来处理从野蛮过渡到文明所需要的仪式。第一，它坚持要求就中国人针对外国人的各种行为进行正式道歉。第二，它规定要惩罚那些最应为这些行为负责的人。第三，它建立起一种新型对华关系，这一关系授权一些新的物质结构和制度结构来维持西方在华势力。同样地，通过使用上面所提到的那套程式，所有这些规定的制订，看上去又像是列强或者具体的条约条款得到了清政府的充分合作和支持。

正式道歉有两种形式。第一款和第三款规定，清政府要由“大清国大皇帝”派出专使，赴“大德国大皇帝”和“大日本国大皇帝”之前，表达皇帝本人和中国国家对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和日本使馆人员杉山彬被“暗杀”的歉意。前往德国的代表团由一位皇室亲王即醇亲王载沣率领，前往日本的代表团由“户部侍郎”那桐率领。附件二和附件九有相关谕旨的译文。

这些条款的内容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要注意清朝专使的姓名和头衔都被写进了条约，这不仅是要使公众知道这些专使，而且是要人们去注意他们的品秩和行政职位。要使人们觉得，为了确保前来道歉的人具有足够高的地位而进行了努力。大概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道歉，才有可能被理解为是真诚的道歉，而不只是为了“面子”或者仅仅是“做表面文章”。这些条款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们把两位外交官的被害定性为暗杀。这一定性除了具有政治含义以外，也含有对使用隐蔽的邪恶手段攻击毫无防备的受害者这种罪行的轻蔑感。换句话说，这种罪行本身就反映出对人道原则和文明准则的轻慢。

在派使节到德国和日本道歉的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表示歉意的



方式，这种致歉方式的目的是要留下一个可视的标记，或者像明恩溥所说的，留下一个不能拭除的烙印，供大家观看。清政府要在克林德男爵被害的地方树立“铭志之碑”。根据附件三，遵照德国皇帝的决定，这座纪念碑要建成横跨克林德被害街道的牌坊，并且一定要新建，不得使用旧材料。除克林德碑外，中国政府还“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塋，建立涤垢雪侮之碑”（附件十）。有关建立这些纪念碑的具体事宜，由各使馆负责。

除建立新纪念碑以外，一座据称被义和团毁坏的旧纪念碑又重新立了起来。这座纪念碑位于俄国人的墓地，纪念“1860年9月18日在手执休战旗的情况下被毫无信义地逮捕并在囚禁中受到不人道对待而去世的”英国士兵、非战斗人员和印度骑兵。我们还记得，这些死者中包括不朽的列兵菲普斯。清廷被要求建立一座新的纪念碑，上面要刻上原先的铭文，并且要注明“原碑于1900年6月被中国人所毁，特立此碑以代之”。[Arlington and Lewisohn (1935) 1987: 237 - 238]

下一章将会对竖立纪念碑一事进行更多的讨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在华英国人来说，1860 ~ 1900 年的历史连续性得到了清楚而“持久”的表达。但另一方面，这一铭文也不是写给那些可能会进行义和团那样的反外活动的普通中国人看的，英国人当然知道没有多少“中国佬”能够读懂英文。因此，这座特别加以注释的纪念碑告诉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可能的观众会从中得到教益——例如此后有可能来到中国的英国人，这座纪念碑会让他们想到他们前辈们所做出的牺牲。

无论如何，中国人能够杀死外国人并且攻打基督教会，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然而这一次，犯罪的人却被指认是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们——各部院衙门的首脑、大学士、各省巡抚等，换句话说，是具有中国最高文职品级的人，士大夫，中国精英中的精英，那些常常被称作满大人的人。因此，这就提供了一个杀一儆

百的机会，让其他人知道反外暴乱的严重后果。同时，它也提供一个与一代代试图阻止欧美在华扩张的满大人们秋后算账的机会。

但这并不是全部，处置这些清朝官员并不像处置帝国边疆地区叛乱部落的首领那样简单。位于惩处名单前列的是三名皇族王公，其中端王载漪和辅国公载澜是清朝第五个皇帝道光的孙子，而庄亲王载勋则是受封这一世袭王位的第九人，是清朝第二个统治者康熙皇帝的后裔^①。习惯上，人们总是把这些贵族和官员称为排外分子，也就是对所有外国人怀有一种几乎非理性的极端仇恨的人^②。这就是说，要通过处决这些王公大臣让人们接受一个活生生的教训，使他们看到了这类“非理性”思想的严重后果。同时，还要让其他人明白，他们的生命可能会取决于是否执行条约规定的维护秩序的任务，那些未能致力于保护外国人利益的人可能会面临被处决的命运。

然而，即使是被驯服了的清廷也不愿意完全屈从于列强的要求，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条约第二款只将载勋定为死刑，并允许自尽，而载漪和载澜则被终生流放到新疆。此外，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被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和刑部左侍郎徐承煜被处死。一些已经死去的官员也被夺去官职，还有数目不明的一些官员将在罪行查实后受到惩办。载于附件四到附件六的上谕确认了这些惩处行为，那些死刑也由清廷派员监

① 所有这三人在恒慕义的著作（Hummel 1943）中都没有单独的传记，但在其他人的传记中曾提到他们。载漪和载澜见第393~394页，载勋见第926页。

② 除上注所引著作外，还可见 Esherick 1987: 306。然而，应该记住，导致危机的正是在华西方列强的侵略性行为，而不是对外国人普遍的和病态的厌恶。这些王公贵族和支持他们的官员们是皇帝的后裔，是帝国统治权的支柱，而打击和贬抑皇帝和帝国统治权的并不是普通的外国人，而是欧美民族国家和帝国的代表们。



督执行。另外，因为“力驳殊悖诸国义法”而被清廷处死的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和袁昶，于1901年2月13日发布上谕予以昭雪（附件七）。

随着区别清政府官员好坏的标准的确立，列强又把惩罚原则扩大到那些发生过排外事件的地区的士子们。在有“诸国人民遇害被虐”的所有城镇，官方举行的科举考试停止5年。受到这道上谕影响的有6个省和东北的将近50个府、州、县（附件八）。其他一些惩罚措施包括两年内禁止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料，以及赔偿海关银4.5亿两（将近清政府岁入的三倍）。有关赔款的规定包括有仔细设计的分期付款方案以及条约签订时各种外国货币的官方汇率（第五款、第六款和附件十一、附件十二）。

在明确地安排好道歉和惩罚的各种方式以后，条约开始着手建立新秩序。首先是外国使馆的安全。在或许是这一条约中最具讽刺性的内容中，列强决定为使馆专用的地区筑起高墙。高墙围绕着的使馆区大为扩展，北至现在的长安街，南至以前的城墙，西至现在的前门东大街，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在附件十四里的地图上，这些街道被标为斯图尔特路（北）、鞑靼城墙（南）、盖斯里路（西）和克林德路（东）。根据条约第七款，在这一使馆区内，中国人被剥夺了“居住权”，而使馆区本身也“可自行防守”。另外，各国还有权在使馆区内“常留军队，分保使馆”。

为了保护使馆区，还在北京到沿海之间建立起畅通无阻的、安全的交通线。大沽炮台被削平（第八款），白河河道进行改善（第十一款），各国军队驻守在包括天津和山海关在内的一些战略要地（第九款）。此外，各国可在秦皇岛驻军并修建港口设施，以向过往的运输货船和军舰提供各种供应。第十一款还规定，改善上海的黄浦江水道，并且提出了使外国大型船只更加顺利地通过这一水道的具体措施（附件十七）。应该补充说，这是条约中与商业问题直接有关的唯一内容。

新秩序的第二方面，是在中国全境张贴谕旨，具体说明对那些犯有“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行的人将要采取的惩罚措施。此外，第十款还规定，地方官员有责任在所属境内保护外国人，保障条约权利的实施。违背谕旨的官员将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换句话说，不能镇压反西方行动的官员很可能会失去其官职。这正是欧洲人在中国极力要求了半个多世纪的惩罚方式。这一条款还把一般民众列为对象，“永远”禁止中国民人参加任何排外结社，“违者皆斩”（附件十五和附件十六所载上谕）。

最后，条约还处理了有关清朝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负责对外事务的机构总理衙门被取消，改为外务部。第十二款规定，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就这样，外国使节们设法使清朝政府保证，它此后最重要的事务就是与签约的11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了^①。把对外关系升格到这样的高度，这在列强自己政府的组织中是难以想见的，它与清政府被迫将其全部海关岁入用于清偿赔款的条约义务，构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匹配。

对清朝主权这种史无前例的赤裸裸侵犯，结束于最后一个侮辱。列强在12月22日的联合照会中曾经指明，要“按照各国指出的方式”来决定清朝朝廷接见外国使节的礼节（FRUS 59 - 60）。这一要求的结果是条约的附件十九，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觐见问题。对许多欧美人来说，这场“中西礼节之间长期而艰苦的战斗”的源起，已经难以追溯 [Rockhill (1905) 1971: 8]。但附件十九因其所具有的历史重要性，仍然值得进行仔细而深入的考察。正是在这里，在国际关系的程式化礼节之中，清朝主权彻底地、决定性地被重新建构。

^① 如果一个外国告诉美国国会，国务院此后要成为美国政府的最高部门，可以想象会引起一阵嘲笑。



《辛丑条约》附件十九：“觐见礼节说帖”

有关“礼节”问题的斗争的解决，按各国使节们的说法，是要强制性地制订一个朝廷礼仪，他们愿意担保，这一礼仪中将不再会有任何中国傲慢自大的表示了。但当他们着手处理觐见问题时，这些外交官们面对着两个问题。中国皇帝不仅完全不符合有关君主的标准观念，甚至都不适合19世纪末在日本和泰国出现的被改造了的“亚洲式”君主的观念^①。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皇帝仍然是一个专制君主——一个古老统治形式的活生生的代表，与之打交道始终非常麻烦。另外，中国还是一个“东方专制政体”，它历史上的主要特色是追求“模糊”而不是“实质”，它与欧洲国家之间一直维持着一种“猜疑的”和“欺诈性的”关系。西方的集体经验——由整整一代的观察家们制造出来的、由使馆记录和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具体体现出来的帝国档案（见本书第四章）——认为，如果没有重大的结构性变革，清朝的专制政体就仍然会恢复到它的自然形态。因此，也许需要在觐见礼节中加进一些通常在其他环境中难以看到的東西。

第二个问题与这个特殊的专制君主现在的实际状况有关。在见识到皇帝宫殿中的真实情况之后，外国公使们了解到，从专制君主应该如何生活的任何一个标准来看，中国皇帝都和传说中东方的骄奢淫逸相去甚远。另外，现今的清朝皇帝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他在1898年改革中那些用意良好的努力引起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使慈禧太后重新掌握了权力，并且最终导致了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因此，不仅一定要恢复皇帝的权力，而且还要对他进行严格

^① 安德森（Anderson 1983: 27）认为，到19世纪末，西方关于君主政体的看法已经成为一种“半标准化”的概念，并且被包括日本和泰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所接受。

的改造。他必须要被再造成为一个君主，一个与其他君主毫无二致的君主。他要完全自觉自愿地去做西方列强想要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说，要像日本的明治皇帝一样，遵循欧美的外交规矩，成为执行条约规定的负责责任的代理人。

当外交官们试图达到这些目标时，他们需要在两个方面之间进行权衡。他们所批准采取的行动已经使中国君主蒙受了耻辱，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把他从封闭排外的高位上拉下来，另一方面还要把他抬高到能够代表其国家主权的君主所应有的地位。然而，抬高中国君主也是一个很难把握得恰到好处的事情。最后形成的觐见礼节说帖似乎把以往受到的侮慢也考虑进去，和中国清算了旧账。出于这一理由，这里把它全文引述，并用黑体字标出了其中一些最有意义的地方^①：

1. 诸国使臣会同或单行觐见大清国大皇帝时，即在大内之乾清宫正殿。

2. 诸国使臣觐见时来往乘轿至景运门（图片 26）外，在景运门换乘椅轿（图片 27）至乾清门阶前，降舆步行至乾清宫大皇帝前，礼成后，诸国大臣一体回馆。

3. 每值使臣呈递勅书或国书时，大皇帝必遣加用黄襻如亲王所乘之绿轿到馆，将使臣迎入大内，礼成后，仍一体送回，来往之时，必派兵队前往使馆迎送。

4. 每值呈递勅书或国书时，其书在使臣手中，必由大内之各中门走进，直到驾前，礼成后，即由已定诸国使臣觐见礼节所议各门而回。

^① MacMurray 1921, 1: 307 - 308; FRUS 338 - 339. 美国于1903年取得一项把《辛丑条约》内容具体化的条约。有关美国外交代表的礼节规定为“在平等基础上接待各国使节，并不损及任一方的威望”（*China White Paper* 1967: 418）。



图片 26 德国公使乘大轿将至乾清宫

Mumm, *Ein Tagebuch in Bildern* (1902).



图片 27 德国公使乘小轿至乾清宫官门

Mumm, *Ein Tagebuch in Bildern* (1902).

5. 使臣所递勅书或国书，皇帝必亲手接收。

6. 如皇帝欲款宴诸国使臣，现已议明，应在大内之殿廷设备，皇帝亦躬亲入座。

7. 总之，无论如何，中国优礼诸国使臣，断不至与彼此两国平行体制有所不同，亦不致有损任一方之威望。^①

很显然，在附件十九中，最重要的考虑是“平等”和“威望”。撇开第七条所使用的怪异句法不说，这些条款至少会让人想到两个问题：它们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以这样的条款把礼节法典化，究竟要从中得到什么？我试图通过考虑这一附件的以下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1）觐见地点（即乾清宫）和外国使节觐见皇帝时所要通过的门；（2）第二条和第三条中两种觐见的明显不同；（3）西方使节乘坐的轿子以及下轿的地点；（4）第四条有关“皇帝必亲手接收勅书或国书”的规定。

觐见宫殿及进宫路线 条约规定的觐见地点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廷三宫的前殿，位于纵贯宫城南北的中轴线上，在外廷三大殿——其中有被西方人看做是中国的朝贡国使节觐见皇帝的宫殿太和殿（Landor 1901, 2: 381 - 382）——的北面。乾清宫所在的内廷是皇帝一家居住的地方，皇帝在过去也在这儿处理日常政务。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宫殿作为觐见地，而单单选择了乾清宫呢？

我们还记得，自从1873年西方使节觐见皇帝的礼节中正式取消了叩头以后，觐见地点就一直被安排在紫禁城内，但不是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各大殿内。在觐见时，各国使节站立在皇帝面前，向皇帝行礼，出示证明其身份的国书，递交各自政府的有关信件，

^① 《辛丑条约》中文本中无“亦不至有损任一方之威望”一句，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1024页——译者。



不过并不是直接交到皇帝手中 [Rockhill (1905) 1971: 41 - 48]。这样的程序尽管被看做是对此前觐见礼节的某种改进，但觐见不在紫禁城内的朝觐大殿中进行，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侮慢。它还表明，尽管在战场上屡遭失败，但清廷仍想维持其天朝上国的地位。

这样看来，乾清宫就有了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它位于中轴线上，而且和太和殿等外廷宫殿相比，它处于内廷。因此，乾清宫就使得列强有可能把自己和中国的那些朝贡国区别开来，同时也就使得列强有可能超越被看做是屈辱的过去。此外，由于乾清宫位于南北中轴线上，有着三个大门——东门一般是朝廷官员进宫时行走，西门一般是武官进宫时行走，外交官员们在某些情况下也走这个大门，而中门只有皇帝才能行走^①，这就为重建秩序提供了一个表达机会。西方外交官们坚持要走的正是中门，特别是当他们携带其国家元首的国书或信件的时候。在觐见时，他们将遵循欧洲外交实践中自18世纪以来就已经成为习惯的既定做法，就是在宫门口、进宫后和外国君主面前鞠躬，在退出时重复同样的礼节^②。

然而，西方列强当时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让中国的外交活动遵循外交礼节方面的“国际”法则。譬如说，列强使节坚持要由皇帝专用的中路——其实，胜利游行式已经冒犯了这条御用道路——进入宫廷，其目的是要把“传统的”帝国活动再疆界化，是要在（威妥玛和其他人仔细研究过的）清朝礼仪形式上写下另外一种觐见礼节。严格地说，这种觐见礼节只是欧洲宫廷礼仪的形式，并没有在国家之间使用的历史。但无论如何，它能起到极其明

① 见 Rockhill [1905] 1971: 44。1873年觐见时，外国使臣走的是西门。由此推测，在1901年以前外国使臣一直都是由西门进人。

② 见本书第二章。柔克义 [Rockhill (1905) 1971] 说，1873年就遵照了这一礼节。为安排《辛丑条约》批准后进行的第一次觐见而达成的一项协议表明，外国使臣要在乾清宫门口鞠躬，然后在进门几步以后鞠躬，最后在皇帝面前鞠躬；见 USMHI, Nial Vass Napier, Co. B, 9th U. S. Infantry, n. d.。

显的作用：它把清朝皇帝放置到与欧洲君主相平等的地位上，这实际上是把与其他一些被同样建构过的君主们纳入到同一个系列之中。这样，有关清朝皇帝妄自尊大的那些形而上学观念都将被新秩序彻底清除。侵占原先只有皇帝可以行走的道路的行为，不仅把皇帝本人改造成为一位法人、一位国家元首，而且成功地把皇帝和他的宫殿“去神圣化”或者使之“祛魅”。

两种觐见 第一条把“外交团”的觐见和单个国家使节的觐见分别予以表述。根据西班牙公使葛络干（B. J. de Cologan）1901年4月致中国全权代表的一封信，列强曾希望把这两种觐见安排在不同地点进行：各国使节会同觐见在太和殿，一国使节单独入觐在乾清宫（FRUS 189）。看上去，这样的要求与前面有关列强希望进入皇宫内廷的论述相互矛盾。另外，参加谈判的中国全权代表坚持要把两种觐见都安排在乾清宫进行，也使得我们前面的论述似乎站不住脚。

然而，各国使节们已经能够运用威妥玛和其他早期汉学家所生产出来的有关清朝活动的大量知识，他们所试图做的，是要把在某些特定时间（比如元旦和皇帝诞辰）举行的宫廷朝会与他们可能会传递国书或其政府信件的特别觐见区别开来。换句话说，外交官们似乎是想通过选择不同级别的觐见宫殿，在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仪式之间建立起某种层次关系。有关那些比较重要的事务、那些关乎主权民族国家间国际关系的重要事务的觐见，他们想在内廷进行；而参加中国人的那些例行朝会，他们想安排在一个他们认为是一般性的地点，一个对他们的目的来说意义不大的地方。此外，列强使节们大概希望通过把“真正”的外交事务搬到皇帝“家”中进行，来表明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在一个共同基础上与帝国君主对话。然而，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在一个共同基础上与清朝君主对话的话，那就背离了这些要求中所暗含着的一种臆断。因为条约是要强迫中国接受有关政治权威的一种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中，



君主的统治权被认为是一元的、唯一的，均衡地分布在一个有界线的地域之内，并且通过君主本人表现出来。

直到那时，这种君主观念一直未被清朝所接受。满族统治权建立的原则，是围绕一个高层中心和一些低层外围组织起来的一个等差有序的体系，皇帝的统治权中也包括有其他藩王的权力^①。从条约当中，可以看到一种操控和规范清朝皇帝——在过去，清朝皇帝一直不愿意为了让欧美人满意而使自己的活动受到限制或束缚——的努力。对于第六条一定要皇帝亲自参加招待外国使节的宴会，也可以做如是解。可以假定，像咸丰皇帝 1860 年、光绪皇帝 1900 年那样逃走的情形，将不可能再次发生。相反的，中国君主会像一个欧洲君主或者一个共和国元首那样，必定出席国家间礼仪的重要场合。

轿子 在有关列强使节所乘轿子的种类式样以及下轿地点的要求当中，将皇帝本人去神圣化并且对其进行规训的过程又被进一步编码。葛络干公使 4 月和 5 月致中国全权大臣的两封信中说，列强认为，各国使节应该被直接送到“皇帝接见他们的宫殿前面”，而且要乘坐“御用颜色”——也就是清朝颜色黄色——的轿子 (FRUS 189, 191)。这些要求遭到中国官员的一致反对，他们指出只有皇帝才能乘坐黄色轿子，而只有皇帝的长辈才能乘轿直接来到宫殿前。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 [FRUS 190 - 192; Rockhill (1905) 1971: 49 - 50]。各国使节们在其寓所乘坐轿子后，不是直接送到乾清宫再下轿，而是像皇帝的父辈们那样，在景运门换乘较小的椅轿前往乾清宫。他们从寓所到景运门乘坐的大轿是加用“黄襟”的绿轿^②。

这场关于轿子的交涉看似一件小事，但让我们对这场斗争的性

① 关于清朝君主的讨论，见 Hevia 1995 b: 123 - 124, 217。

② 见 FRUS 280。轿子与威廉皇帝的兄弟亨利亲王 1899 年访问武汉时乘坐的轿子相似，见马士的讨论，载 Fairbank et al. 1995: 152。

质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就列强来说，在把清帝国权力再造为一个可接受的君主权力的同时，它们又盗用了“未经改造的”清朝皇帝身份的某些特权标志，以防止重新构建的君主重新登上高墙深宫中他那高高在上的宝座。就中国全权大臣来说，他们一方面努力对抗列强在华重建秩序，一方面又试图把列强纳入到清朝帝国统治残存的秩序之中。在这种斗争的氛围中，有关完全平等和不损及威望的表述，似乎也是某种委婉的表述。

递交文件 第五条规定，皇帝要亲手接受有关信件。这里再次涉及不能让西方满意的中国外交礼节。在清代，如同此前一样，外国的国书并不是在觐见时递交给皇帝，而是呈递给礼部官员，由礼部官员加以审查并翻译成中文。欧洲人不喜欢这一礼节，因为它伤害了他们关于主权一体性以及主权由君主体现的观念。各国使节们携带的国书传达的毕竟是由他们本人所代表的君主对他们的任命，另一个同样建构的君主应亲手接受这些文件。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他们自己的主权观念只是单一性的，不具备普世性，而各国使节所一直声称并且用条约来强力维护的正是这种普世性。

总之，对清朝礼节的这些改造构成了一个相当特殊的安排，它一方面在清朝宫廷礼节中铭写上欧洲独有的外交礼仪观念，一方面又保留了只有在清朝宫廷礼节中才能看到的某些内容。另外，觐见说帖又把这一杂合体强加到地点和情景之中。由此看来，像第七条那样谈论什么“完全平等”，只不过是在想象之上堆积想象而已。皇帝就像他身后的傅满洲一样，在欧美人想象中仍然是一个魔鬼，而西方外交官们制造出来的，也不是一个西方君主式的君主，而是一个傀儡般的君主。

或许，最能把这一点表示清楚的，是外交官们自己所做的有关觐见问题的陈述了。柔克义在他的《中国宫廷中的外交觐见》（1905）——他1897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修订版——一文中，公布了有关觐见的新条约，并且附有他在紫禁



城内拍的一些照片，让读者能够看到条约条文中提到的那些宫殿和大门。文中对这些宫殿和大门进行了如下解释：（1）景运门，公使们乘坐“宫轿”的地方；（2）乾清门，公使们换乘“宫轿”的地方；（3）乾清宫，进行外交觐见的地方^①。和柔克义一样，德国外交官施瓦岑施坦因（Mumm von Swarzenstein）1902年发表了一套大致相同的照片（图片26、27），但他的照片拍的是觐见正在进行中的情景。就像条约条文需要附有皇帝的上谕一样，觐见条约本身似乎也不能充分说明问题，需要用这些看得到的证据来表明，在经过长期斗争以后，最终还是让中国皇帝顺从了“文明”国家的“国际”惯例。

然而，这整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全权大臣们为谋求妥协而提出的具体意见。在觐见宫殿问题上，他们提出会同觐见与单独入觐都应在更深的内廷宫殿中进行。在外国使节所乘轿子问题上，这些朝廷官员们在成功地拒绝了使用御用颜色要求的同时，又使各国使节们注意到，乘坐椅轿到乾清宫附近是只有皇帝的父亲和叔伯才拥有的特权。然后他们指出，如果列强能够接受这一形式，那“对各国使节们就是一种格外的优礼”（FRUS 280）。清朝官员们的这样一些做法，很可能是想把列强揽入满族皇族的拼死努力了，也可以说是要和列强结为亲戚和盟友，以对抗越来越仇视朝廷的中国大众。但不管他们怀抱什么意图，对列强的优礼却使得清朝宫廷史无前例地门户大开，任人细观详察。

供大众消费的公开展览

前面一节已经指出，外交官们重新奠定了欧美人在清帝国建立

^① Rockhill [1905] 1971: 49, 51. 英国官方军事史中也有有关觐见的条约，见 Norie [1903] 1995: 507 - 508。

特权的基础。通过《辛丑条约》这一新法规的制定，对外关系在中国的地位被提高了。在受到危害的情况下，这一关系将迅速地得到强大的武力支持。中国大众公开表达其不满被定为非法行为，要受到惩罚。和对日常生活这种前所未有的侵扰同时出现的，是另外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现象：中国本身变成了外国人——无论是在清帝国内部的外国人，还是在清帝国以外的外国人——视觉消费的大景观。我们还会记得穿过紫禁城的胜利游行是如何被理解为在清朝君主政权的中心进行的一次大动作，是对中国皇帝进行的种族、文化、军事和政治羞辱。同时，它还发挥着另外的作用。

有关19世纪国际展览和国际旅游的新近研究认为，作为殖民扩张的结果，欧美文化本身经历了影响到其日常生活许多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尽管在欧洲和北美的不同社会和不同社会阶级中，在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之间，这些变化的结果不尽相同，但在许多活动领域中都能够反映出来^①。首先，也许最重要的，是在人的感觉层次中，视觉功能处于最高地位^②。眼睛是统治者，而触觉等感觉则是视觉在身体上的延伸。新的光学技术进一步巩固了视觉的这种特权地位，摄影、透视图片、博物馆和展览会的展示、新的印刷技术，这一切都让人明白，视觉形象与印刷文字有着相同的重要性。事实上，有些人甚至认为，当视觉形象声称是现实的镜子的时候，它可能比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能向那些不能阅读的人展示这个世界的面貌。

这些新光学技术就像拉图尔的写在纸上的不变的流动体一样，

① 格林哈尔夫 (Greenhalgh 1988)、米切尔 (Mitchell 1988, 1989) 和雷代尔 (Rydell 1984) 讨论了在欧洲和北美发挥作用的诸多社会变化。这些著作大都受到本杰明 (Walter Benjamin 1969) 的批判性分析的影响。关于本杰明对欧美全球化运动造成的社会经济变化更为全面的思考，见 Benjamin 1999。

② 见 D. Lowe 1982; Crary 1988; Jay 1988。这些著作作为新近的一些研究提供了基础，这些研究收入了 Jenks 1995; Devereaux and Hillman 1995。



把一些物体或者它们的复制品从遥远的地方收集到一个新地方，然后按照一个完全不同的相互关系把它们组合起来。正如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 1988, 1989）所论证的，其结果并不是现实世界的表现，而是把这个世界当作展览会来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视觉世界里，观看者被建构成这样一个人：他会认为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像是一个展览会，供他参观，让他做出判断，有时候也会给他带来触觉上的快感。1900~1901年间在北京发挥作用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它表现在两个重要形式之中：旅游和摄影。这两种形式不仅具有全球性意义，而且本身也是再疆界化的机器。

为紫禁城祛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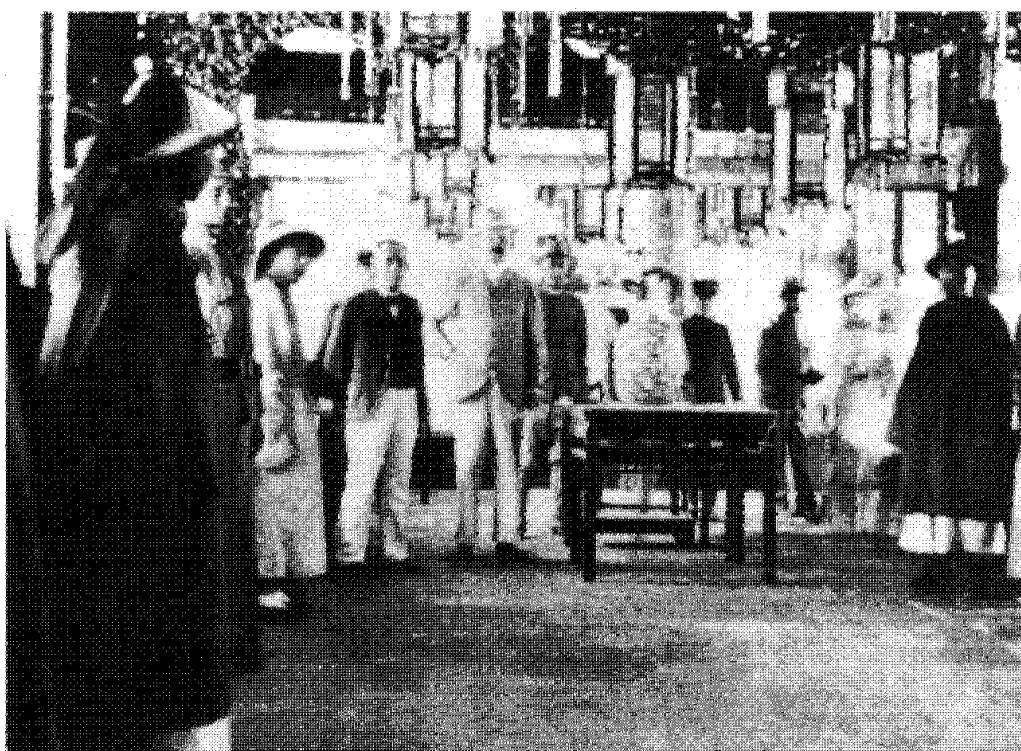
从1900年9月起，紫禁城的宫殿开始向大批参观者开放。由于大多数游客都想沿着胜利游行式的路线进入宫中，控制南门的美国陆军就设法进行了安排（NARA, RG395, 898）。从10月中旬到次年5月，共安排了160次参观活动，每组游客人数6~13人不等，由一个美国军官陪同参观。起初只允许高级外交官和军官们入宫，但在10月份，情况开始出现变化。到这年秋末，来自通商口岸的好奇心的参观者们通过与外交使团的关系，也参与到这一展示中来。

游客们对这些宫殿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美国陆军的狄克曼上校在工作日志中写道，紫禁城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展览”。他的话也暗示出其他人对这里的感受（NARA, RG395, 913, no. 33: 14; Lynch 1901: 157）。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紫禁城，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居住区，都是富有吸引力的视觉展品和触觉展品（图片28、29）。现存为数不多的有关游记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纽约太阳报》记者钱伯林表示，尽管这些宫殿“一派衰败景象”，但仍然会给人带来一些快乐。他接着说：“我坐遍了皇帝和太后坐过的每一个宝座，并且坐到皇帝床上，躺倒在上面。我真正地享用到了地地道道的皇家东西。”有意思的是他的记载所表现出来的感



图片 28 慈禧太后住房外景

Military Order of the Dragon (ca. 1912).



图片 29 游客参观慈禧太后住房内部

Military Order of the Dragon (ca. 1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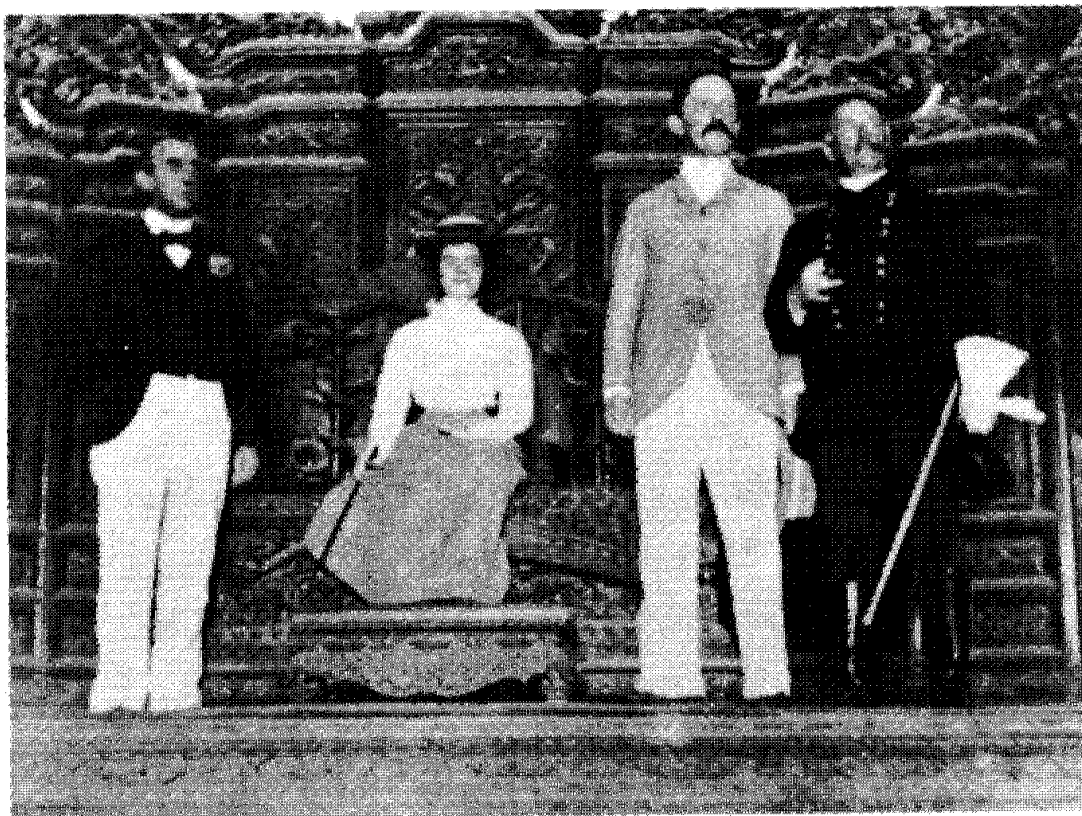


觉变化，一会儿是对“愚昧的中国”的十足蔑视，一会儿又是坐上皇帝“所有的”宝座并在皇帝和太后的床上躺下给他带来的明显快意（Chamberlin 1903：103-104，117）。

钱伯林并不是唯一一个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亲身触及皇家物品和清朝王权标志的人^①，另外，这样一种快乐也并不局限于男性，至少有一张女性坐在乾清宫御座上的照片（图片30）。但是，这类看上去让男人和女人都能感觉到的快乐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看到并且触到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看到和接触到的物品，而且还不会有任何的恐惧，这是快乐感产生的第一个原因。快乐感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能够当着许多人的面坐到中国皇帝的宝座上。与此相类似的一个原因，是能够欢愉地在慈禧太后——那个最应该为未能阻止义和团灾难负责的人，那个批准围攻使馆的人，那个布朗所说的“中国唯一一个男人”的人（Arthur Brown 1904：193）——的私人房间里串来串去。因此，看到和接触到她最私密的东西，既能带来快乐，也能带来击败反文明罪行罪魁祸首的胜利感。同时，由于慈禧太后本人逃得不见人影，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她个人的一种直接惩罚。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尽管有着不准偷窃的严格规定，有着联合维持治安的努力，游客们仍然会窃取一些能放进口袋或藏在衣服里面的物件。一份报告说，为这种偷窃行为辩护的理由是，在紫禁城里走过，不能不带回件纪念品^②。

① 莫理循表示，他曾在胜利游行时坐过皇帝的宝座，见 Seagrave 1992：367。

② Dillon 1901：30。据利特尔夫人（Mrs. A. Little 1901：505）记载，一位游客抱怨太监们离得太近，所以不可能拿到任何东西。那些试图阻止这类行为的努力并未起到作用，查飞将军于12月3日决定关闭宫殿（NARA，RG395，898，no. 428）。有关盗窃及盗窃引发的争执的报告，见 NARA，RG395，906，Box 2（27 October 1900）and Box 3（2 December 1900）and Yamaguchi to Chafee，30 November 1900，RG395，906，Box 3。当宫殿再次开放时，发布了进入紫禁城的新管理规定（RG395，906，Box 4）。然而，到3月又有了发生盗窃的报告（RG395，906，Box 5，5 and 20 March 1901）。



图片 30 御座上的女游客

Military Order of the Dragon (ca. 1912).

这一切或许都不会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在国际展览的历史中，这个时期的世界博览会上对奇异的他者世界的展示涉及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对边界的超越，它使人们能够突破日常生活的障阻，走进一个全然他者的世界。例如，自 1889 年巴黎博览会以后，用同样大小的模型向参观者展示各个殖民地的房屋或历史性建筑，并且伴有穿着土著服装的土著人，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要走进这个他者世界，就需要先把某些怀疑收起来（毕竟，开罗怎么会在巴黎出现）。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它就会提供大量的视觉和触觉快乐，并且为一些超乎寻常的展览形式提供了机会——比如，临时性地把展览会放到中国皇帝的皇宫中进行。

另一方面，如果说，上面讨论的事例表明，有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把世界看做是一个博览会，那么，观看皇宫、进入帝后房间和



占有其中物品的行为，就还有着其他一些意义。游览紫禁城是改造着西方社会的一个更为普遍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通过科学理性在欧美文化各个领域中的传播，正在整个欧洲和北美范围内为人民的日常生活祛魅。

中国的情况是，祛魅在帝国宫殿中进行。像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现在就是欧美人的殖民地，他们在里面自由漫步，不受当地各种限制的约束，当然也不受他们自己的高尚道德的约束。这种祛魅的作用十分深远：它把清朝君主统治中妄想的成分，把中国皇帝作为天子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信念，把皇帝的帝国是天朝上国的信念，转变为某种极平凡极世俗的东西。

或许，这一祛魅过程的一个最好例证，可以在1901年年中游览了紫禁城、颐和园和天坛的布朗牧师的记载中找到。布朗说，在紫禁城内，他和他的同伴“自由漫步”在宽阔的庭院和房屋之中，甚至也可以在皇帝的宫殿中信步徘徊，而“即使是中国的最高官员来到这儿，也要双膝跪地，头低得快要碰到石头路面才行”。布朗与清帝国的短暂交会——他对皇宫的描述在370页的著作中连一页也不到——不仅让人回想起吴士礼1860年在圆明园的评论，而且完全仿效了拒绝向皇帝叩头的主权国家的白人男性外交官。这样，布朗就有能力完成对清朝宫殿的祛魅，把它们改造成一个博览会。离开皇帝的宫殿后，他穿过宫廷大院，走进皇帝和太后的卧室：“皇宫里的房子和院子十分宽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许许多多的美国中等家庭有着比中国皇帝和太后的卧室更为宽敞更为舒适的卧室。这儿的每个房间看上去都毫无生气，不用说，所有东西上面都蒙着一层灰尘。”（Arthur Brown 1904: 197-198）^①

就像攻击那些被认为在中国人看来非常重要的象征一样，布朗

^① 明恩溥（A. Smith 1901b, 2: 529-530）通过强调这些宫殿布局上的“吝啬模式”，也进行着同样的祛魅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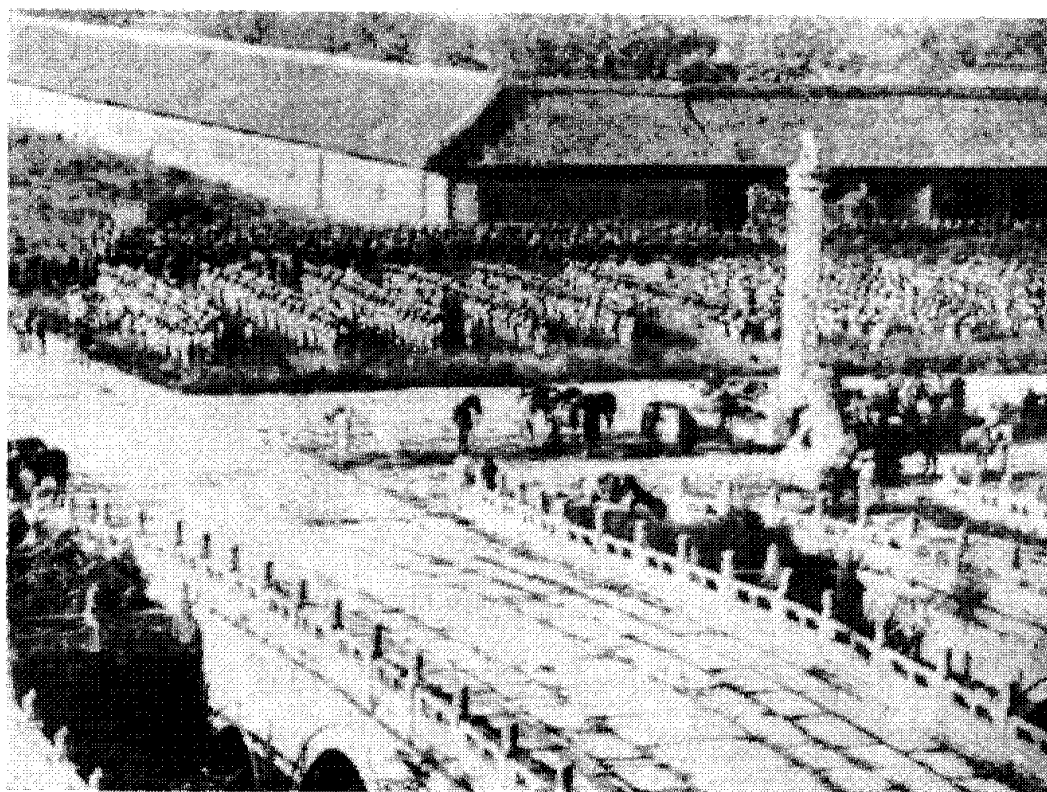
把清朝皇宫与美国中等之家进行比较所例示出来的祛魅过程，打破了中国人关于这些宫殿具有某种力量的说法，也颠覆了在布朗一类游客赋予这些宫殿或者庙宇的意义之外的那些意义。把紫禁城贬抑为一个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不大的平凡事物，有效地把它开拓为殖民地，使之从一个清帝国权力的实施场所转变为一个只不过有着中等财富的无能君主的寓所。

欧美人的身体进入到皇帝的宫殿和私人房间，以及对私密的皇家物品的偷窃，并不是把清朝君主权祛魅的唯一方式。前面对游客坐到王座上所进行的讨论已经告诉我们，另一个实现同样目标的手段是摄影。从联军在大沽登陆开始，摄影者们就出现了，他们记录了攻占天津和进军北京的过程。一到首都，用查飞将军的话来说，他们就开始“记录”对北京的占领^①。在1900~1901年秋冬，主要的军队摄影师奥基夫（Cornelius Francis O’keefe）上尉拍摄了500多张照片^②。他的一张关于胜利游行式的照片，曾经作为展品出现在1904年于圣路易斯举行的路易斯安那展销会上（图片31）。更为重要的是，奥基夫与当时在北京的其他人一样，用照相机记录了图像事物，那些被理解为与清朝君主权密切联系着的实物场所。这些实物包括乾清宫和皇帝的宝座（图片32），《辛丑条约》所规定的以后觐见的地点，慈禧太后的私人居室，太和殿前的庭院和太和殿，以及祈年殿。在这些地方都拍摄了多张照片，送回帝国中心去进行存储、复制，并且与其他媒介相结合。紫禁城就以这样不难操作的方式，被改造成一个恒久不变的流动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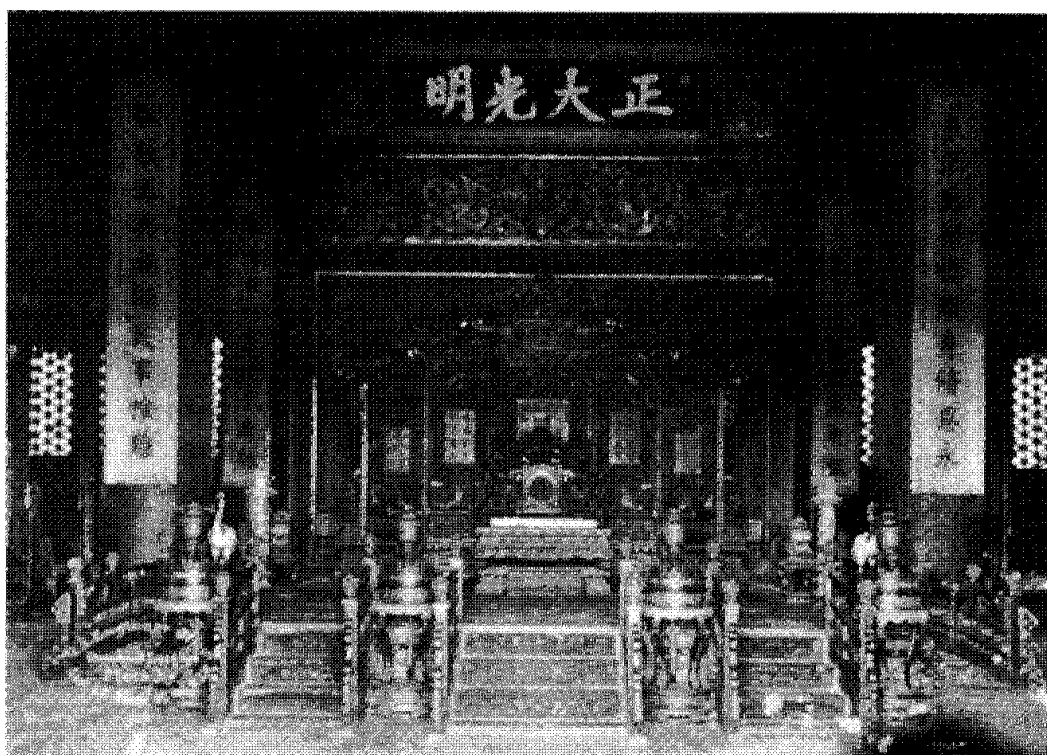
用摄影来祛魅的另一个反映，是在紫禁城发动的一项或许会给

① 法国和德国军队对摄影师的邀请，见 NARA, RG395, 906, box 2, 4 and 5。

② 美西战争爆发时，奥基夫是在科罗拉多州利德威尔工作的一名职业摄影师。他参加了陆军，被派到了菲律宾，在那儿经历了1899~1900年的菲律宾起义。见 Sharf and Harrington 2000: 246 - 247。奥基夫的摄影作品在马里兰州学院公园的美国国家档案馆里可以找到。



图片 31 奥基夫拍摄的胜利游行式，于1904年
圣路易斯展览会上展出



图片 32 奥基夫拍摄的乾清宫御座

人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记录工程。这一工程的成果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两卷本著作，书名为《北京皇宫写真账》，正文包括日文、中文和英文。由伊藤（Ito Chuita）率领、小川（Ogawa Kazuma）担任摄影师的东京大学工程师们完成的这一工程有170张照片，拍摄范围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宫殿建筑。据该书序言称，这样全面地进行拍摄，是因为它要把这座一直“被小心翼翼地公众封闭的”皇宫开放给“建筑学研究”，让人们去分析它和这一地区其他宫殿的“布局、结构和装饰”。由此看来，有关清朝宫殿庙宇的摄影似乎是为一个现在已经被想象为“亚洲文明博物馆”的日本（Okakura Teshin，引自Tanaka 1993：13）提供展品。通过把紫禁城处理成日本已经超越了的过去的研究标本，这些日本工程师们完成了为紫禁城祛魅的工作。

但是，尽管祛魅成为权力在紫禁城内的主要成就，对紫禁城也还存在着一些与钱伯林和布朗轻蔑的态度和简约抽象的描述形成鲜明对照的反应。使馆被围困前曾在使馆区内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萨拉·康格（Sarah Conger 1909）和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妻子利特尔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 1901）关于紫禁城的记载，就充满了喜悦和兴奋。在19世纪90年代，萨拉·康格就非常欣赏陶器和宫廷服装上复杂的象征符号所表现的中国审美观，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她会对紫禁城产生出与众不同的反应。萨拉·康格一点也没有提到灰尘、龙和腐朽，也没有遗憾地认为紫禁城未能展现出帝国的宏伟庄严，相反的，在她看来，紫禁城的“皇家建筑”与总理衙门那些“肮脏、沉闷和单调的房子”完全不同，它们“高大宽敞、装饰豪华”，其结构“复杂而又精美，充满魅力，富有东方美、东方色彩和东方气势”，房间里面还摆放着“高雅的”家具，“贵重的珍宝”和“极其精致的”艺术品^①。在萨拉·康格的这些记载中，

^① 萨拉·康格在信中多次谈到她对中国艺术品不断加深的了解，见 Conger 1909：70，204，260-261，269，311-312。引文载 170-170，189。



尽管也可以找到把世界看作博览会的某些成分，但从中读不出对所见事物任何形式的贬抑或者否定。的确，正是因为萨拉·康格努力地去寻找东方式华美的意义，才使她后来能够对紫禁城做出那样的反应——把这些宫殿和北京城本身视为精美的艺术创作^①。利特尔夫人的记述与此相似，也认为这些宫殿和艺术具有“壮丽华贵”的帝王气象，不像许多欧洲建筑那样有着太过繁琐的装饰（Mrs. A. Little 1901: 504 - 505）。

诚然，她们不加掩饰的想要进入“禁地”的强烈欲望——利特尔夫人回忆说，她曾经有过企图穿上中国服装偷偷溜进宫去的幻想——或许能够说明她们为什么不会贬低皇宫或者不会把皇宫祛魅^②；然而，并不是所有对紫禁城的正面反应都可以用这样的渴望来加以解释，比如维奥（Julian Viaud）的情况就是如此。维奥是法国军队的一名参谋，人们或许更熟悉他的笔名彼埃尔·绿蒂（Pierre Loti）。他创作的《皇城的末日》（1902）一书，可以说是有关解救使馆之战最具个人风格的回忆录。他在这部书中所做的，不仅仅是不去对紫禁城进行祛魅。他赋予这些宫殿以异国情调，把它们放诸于东方化了的幻想世界中，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里都注入了似乎不可遏制的渴望和这些宫殿所刺激出来的想象。绿蒂与钱伯林和布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紫禁城几乎是一座空城，那两位美国人就能够尽兴地对清朝君主统治进行研究，加以评判。而对绿蒂来说，皇帝不在宫中则引起了某种伤感。

由于就驻扎在紫禁城西面湖边的帐篷中，在1900年冬天的几个星期里，绿蒂和一些法国军官可以随意地在这些宫殿中漫步。每天都与紫禁城生活在一起，就像邦吉（Chris Bongie）所说的，使

① 比如可见 Blofeld [1961] 1989; Bredon 1922; Johnston [1934] 1985。

② 见 Conger 1909: 169, Mrs. A. Little 1901: 504。这些文本也提出了性属和东方学的问题，见 L. Lowe 1991 和 Lewis 1996 的有关讨论，这些研究集中于伊斯兰世界的妇女写作和妇女绘画。

绿蒂陷入到一种恐惧之中。他渴望能够接触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帝国，可他所见到的只是空空如也的宫殿和无人居住的房子。东方的中心没有了君主，这些宫殿就变成了由一些乱七八糟的骇人装饰品和令人讨厌的东西构成的幻象。面对这种空荡荡的“异国情调”（Bongie 1991：122），绿蒂为皇帝的屈辱命运及其“可怜的黄色宫城”（Loti 1902：210）写下了一首首挽歌。只有当他穿上帝国的朝服，斜躺在紫禁城内一间放满珍宝的房子的床上，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吸食鸦片的时候，这种忧郁哀愁才会有片刻的歇息。

这样的戏剧性表演不只是加深了绿蒂的黯淡心情，也使他对中国事物产生了新的理解。据他说，他第一次能够去体会和欣赏中国艺术和中国建筑，过去那些“完全盲目的赞慕”变成了“尊重和敬畏”（Loti 1902：150 - 151）。似乎是鸦片解放了绿蒂的心智，使他能够在他本人和属于皇帝的东西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联系，而这样的联系，在他看来，正常情况下只有当中国皇帝本人在场时才有可能建立起来。正是因为鸦片只不过是一个替代品，取代了绿蒂想象的只有当皇帝身处宫殿之中时才会发生的意义生产过程，所以他建立起来的联系很快就消逝了，剩下的是某种渴望，对一个绝对君主身在紫禁城内可能会带来的意义和秩序的渴望。

皇帝不在皇宫之中，使得绿蒂在写作时使用了一种借喻的修辞法。在后来的观察家尤其是那些 1911 年清朝灭亡后访问北京的观察家们有关紫禁城的记述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借喻。绿蒂的《皇城末日》一书通篇充满了由“做一个中国皇帝的美梦”所唤起的怀旧之情，怀念那个想象中的过去，那个与时下这个“虚弱平庸，没有一件东西是神圣的，而未来则充满恐惧”（Loti 1902：190 - 201）的时代截然不同的虚幻过去。无论我们对绿蒂关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这些评价有什么看法，他明确表达出来的渴望都非常具有意义和重要性。它们不仅表明人们对紫禁城还存在着另外一类反应，也表明了人们已经感觉到此时正有一个祛魅的进程在北京



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此外，由于绿蒂建构起殖民话语的反话语，或者说干扰了殖民话语的常规，这也就使得至少在部分西方人看来，“东方”具有生产某种反现代主义的功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反现代主义主题又出现在了許多访问北京的人的作品之中。但是在1900~1901年，几乎没有人会有萨拉·康格、利特尔夫人或者绿蒂那样的耐心，在他们自身和清朝皇帝之间去寻找某些共同点，即使这些共同点完全是想象性的。

然而，在有关（不在宫中的）中国皇帝以及对其统治权祛魅的问题上，纵使大多数人的看法与占支配地位的主张相去不远，最重要的或许还是正在进行着的那些活动的性质。通过“象征战”的手段，清朝君主的符号、场所和象征已经受到强有力的贬抑，清朝皇帝统治权也已经被重新安放进一个“展览性的综合体”（Bennett 1995: 59-88）之中。清朝皇帝统治权各方面的力量在这个综合体中受到了抑制，不再具有任何威胁。这样一个过程，是通过《辛丑条约》——它像觐见条款一样，对清朝皇帝统治权进行再疆界化，并把它纳入欧洲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全球秩序之中——的许多条款来完成的。

新的觐见礼节与清廷的展示

随着《辛丑条约》于1901年9月的签订，对北京的占领宣告结束。与此同时结束的，还有空旷宫殿的展示。第二年，清廷回到北京，有关觐见的新条款开始实施。不久，新礼节的意义就在1902年元旦庆典上表现出来。欧美外交官的觐见地点最初安排在乾清宫，后来改在了颐和园，觐见次数迅速增加。从1902年到清朝1911年灭亡，外交团集体觐见的次数为32次，其中在1902~1904年间进行的就有21次。参加集体觐见的人数最少时为32人，最多时1904年一次多达110人。伴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清朝的

君主权就被纳入到由那些有着所谓“完全平等”主权的皇帝和国家元首们组成的全球性结构之中。

然而，和同一时期外国公使呈递国书或信件的单独觐见相比，大规模觐见的次数就相形见绌了。表2是根据清朝档案和《大清历朝实录》的有关资料制成的^①。如果我们知道欧洲外交团在1873~

表2 1902~1911年间外国公使的会同觐见和单独觐见

	1902	1903	1904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总计
会同觐见	10	6	5	1	2	4	2		2	32
单独觐见										
日本		1	1	3	5	2	5	6	1	24
德国	1	3	4	1	1		6	3	2	21
法国	2	2	1	2	3	1	5	2		18
英国		1	2	4		1	2	5	2	17
美国	5	4	1				2	4	1	17
意大利	1	1	3	1	1	1	2	2	4	16
俄国	2	1	1		1	1	2		2	10
比利时			2	1	1		3	3		10
奥地利			1			1	1	1	2	6
荷兰		1	1			1	2			5
墨西哥			1	1				1	1	4
巴西							3			3
瑞典						1	1			2
西班牙								1		1
葡萄牙							1			1
其他国家										6
每年单独觐见	11	14	18	13	12	9	34	28	15	160
觐见总次数	21	20	23	14	14	13	36	28	17	192

①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交类觐见”第2404、2405盒；“硃批奏折”第376盒，第16~18、22号；第368盒，第12~26号。《大清历朝实录》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宣统元年至三年。在这些资料中，我都没有发现1905年的条目。



1902 年之间获准进行的觐见还不到 10 次的话，那么，表 2 所记载的数字就相当惊人了。然而，这些数字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新秩序建立后最初几年参加过几次觐见的萨拉·康格，曾经谈到过这类活动的宏大规模。根据萨拉·康格和隆沃思（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的记载，清廷似乎清扫了布满灰尘的宫殿，使之显得不那么衰败^①。在这期间，尤其是 1905 年以后，清廷还对其君主体制重新进行了组织，使之能够与欧洲的民族国家形态和君主立宪体制相适应（Ichiko 1980）。从中可以看出，觐见礼节是完成这些目标的一个手段。但其中也可能有着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从一开始，参加会同觐见和单独觐见的就不仅限于外交团成员。参加觐见的人数之多，使得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不禁惊呼：“朝廷也太谦恭了，太后现在不仅要接见公使夫人们，还要接见使馆里的孩子！”（引自 Fairbank 1987：139）。此外，清廷似乎一直很愿意接见来访的高官们和那些与使馆有联系的旅游者们。

或许，我们可以找到清廷这样做的一些动机——其中当然包括安抚列强以获得它们对清朝的支持的谋略，而西方人大批地来到清廷的原因则不那么清晰。可以肯定的是，外交官们希望能使清廷具有世界上其他朝廷同样的特点——或者说，把清廷标准化。但是，在欧洲帝国和中国存在的所谓东方专制政权之间关系的重新塑造方面，也还有着其他一些联系。马嘎尔尼爵士 1793 年觐见中国皇帝时，还曾谈到“欧洲的优雅也未能企及的、体现着亚洲伟大的宁静庄严和壮丽肃穆”（Cranmer-Byng 1963：124），而到了 19 世纪末，所有这些都改变了。就英国来说，1857 年印度起义以后逐渐成形的帝国统治，已经变化为一种“东方化的”杂交体，其中

^① 关于 1902 年以后的觐见，见 Conger 1909：216 - 233，237 - 240，242 - 246，247 - 252，271 - 273，291 - 293，299 - 305，319，352 - 353，367 - 371。也见 Carl 1907：165 - 170。

增加进了壮观的印度藩王宫廷和崭新的帝国权力象征，还有一些旨在给人民大众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们产生敬畏感的公共事件。例如，这一新构建中出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庆典，她众多儿女子孙的婚礼和葬礼。由于英国有着支配性地位，帝国进行的一些公开展示，包括帝国纪念碑和纪念物的建立以及诸如加冕礼和国际博览会一类大规模事件的精心策划和运作，在整个欧洲——甚至在法国这样的共和国里——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在这一全球性的对统治权再疆界化的过程中，清朝宫廷成为一个极其有用的代表，它代表了“东方”的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典型。此外，那些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特权的人，通过在颐和园乘船漫游以及和清朝贵族在宫中或者在重建的使馆中共进午餐，也能够参与到这个典型的生产过程之中。来访的高官权要们可以看到“地道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私人表演。美国总统的女儿爱丽丝·罗斯福（Alice Roosevelt）看到一位宫廷高官在她面前“匍匐跪拜”时，很有些受宠若惊的样子。在她看来，在这个奇妙国度里，慈禧太后随时都可以说“砍掉他的脑袋”，而那人的脑袋随之就会被砍掉（Longworth 1933: 100 - 101）。仿佛就像是為了取悦那些出身高贵的环球旅行家们，一个举办展览的外国政权在拔掉了太后、皇帝、他们的宫殿以及随从们的尖牙利爪以后，把他们改变成了一种活着的博物馆，一个活生生的人种志展览会。

国内课堂：大众媒体对中国问题的概括

“正义的”惩罚、公开的展示、对清朝帝王的祛魅遮蔽了对在华联军所作所为的各种批评，或者使这种批评转移了方向。同样地，在帝国的中心区也在进行着类似的工作。在欧洲和北美，媒体对于前面有关章节所讨论的各种再疆界化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这些报道努力消除人们的各种疑惑，愈合了劫掠和暴行在欧美人自我认知上撕开的伤口。这一过程中至为重要的是媒体的表述，这些表述把文明与野蛮、暴力与正义明确地区别开来。摄影和图画，这些在华记者制造出来的不变的流动体，与文本记载相结合，完成了这一任务。

譬如在美国，在1900年6月到11月之间，《莱斯利周报》(*Leslie's Weekly*)一期又一期的报道和9期封面都用在了中国事件上。这份报纸报道的重心始终是帝国教程中硬的一面——联军特别是美国军队的各种正义行为以及愚昧的中国人的野蛮性。例如，9月1日的报纸报道了进入紫禁城一事，其中包括一套各个宫殿的全景照片，标题为“非常必要的教训”。11月3日的报纸突出了同样的主题，封面上出现的是一群被吓坏了的清朝官员，在宫中“愤怒而又震惊地观看联军褻渎这座圣城”。这样一类的教育课程以一篇报道宣告结束，这个报道展示了一个在3月的公开处决中被砍去头颅的清朝官员的尸体，同时还有一个故事详述了斩首行为的可怕和残忍，并且毫不犹豫地就把进行这种处决的责任完全归之于中国人(*LW*, 18 May 1901: cover, p. 484)。

在其他国家的插图报刊上，这类图文并茂的有关惩罚和羞辱的报道同样是一个重大主题，但最突出的或许还是英国^①。《伦敦图片新闻》、《图片》和《黑与白》等报刊都不加批评地传达着英国在华军政官员的态度和声明，并且把摄影报道和图片报道的重点放到了惩罚、果报以及直接针对清朝君主统治（如紫禁城内私人房间的图片）和中国人民（如劫掠和焚毁村庄）的以象征物为目标

^① 法国的画报周刊《画报》、《生活画报》和《世界画报》都值得注意。总的看来，它们与现在讨论的美国和英国的报纸有着同样的叙事结构。如前所述，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生活画报》关于杀戮的报道（*Vie Illustrée*, 1 February 1901）和《世界画报》有关中国复仇的幻想（*Le Monde Illustré*, 25 August 1900）。

的暴力上^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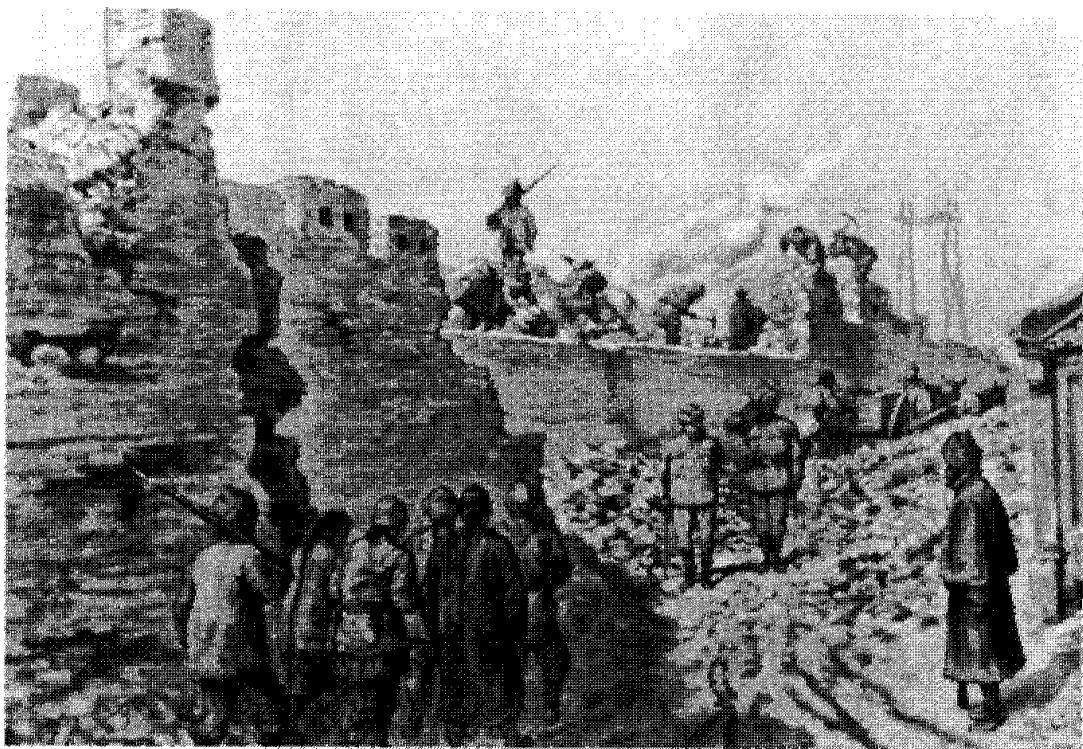
有一些图片描绘了所谓的义和团民被士兵枪杀（图片 33）、被围捕、被囚禁、被严厉的法庭审判以及被处决的场景^②。在另外一些图片中，可以看到所谓的义和团民和盗贼被鞭打或者羞辱，有的人在地下被拖曳着，有的人的辫子被绑在一起^③。除了这些对中国男性身体侵犯的描绘外，还有一些图片表现了对被看做是中国人高度重视的一些东西的攻击，比如被毁坏的天津城墙（图片 34）、在天坛里修筑的新铁路终点，以及被炸毁或者被焚毁以“消灭罪恶根源”的义



图片 33 英国行刑队处决义和团民

The Graphic, 17 November 1900.

-
- ① *ILN*, 11 November 1900, 2 March 1901; *Black & White*, 3 and 17 November 1900.
- ② *ILN*, 27 October 1900, 1 March 1901; 《图片报》(*The Graphic*, 17 November, 8 December 1900, 5 January 1901) 描述了对保定官员的处决; *Black & White*, 23 March 1901.
- ③ *ILN*, 23 April 1901; *Black & White*, 2 March 1901. 《莱斯利周刊》(*LW*, 30 March 1900) 有一幅一名中国人被人揪着发辫的图片。



图片 34 被炸毁的天津城墙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6 April 1901.

和团曾经举行过仪式的寺庙^①。另外，有许多图片描绘了打着义和团旗帜的军队、在紫禁城内摆着各种姿势的军官们，以及从一间喇嘛庙里找来的准备作为战利品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物品（图片 35）^②。

不过，最能表现英帝国阳刚气概中那种妄自尊大的例子，出现在 1901 年 4 月 20 日一期的《伦敦图片新闻》上。该期有幅画画的是一个英国士兵和一个印度士兵站在天坛的圜丘坛上，说明文字称这是与被占领的北京之间的“幽默接触”。被《伦敦图片新闻》称为阿特金斯——吉卜林笔下普通英国士兵的名字——的英国人站在代表“中国天下中心”的圆形石头上，旁边有“一名印度传令兵正在用羡慕的目光看着他”（*ILN*, 20 April 1901: 566）（图片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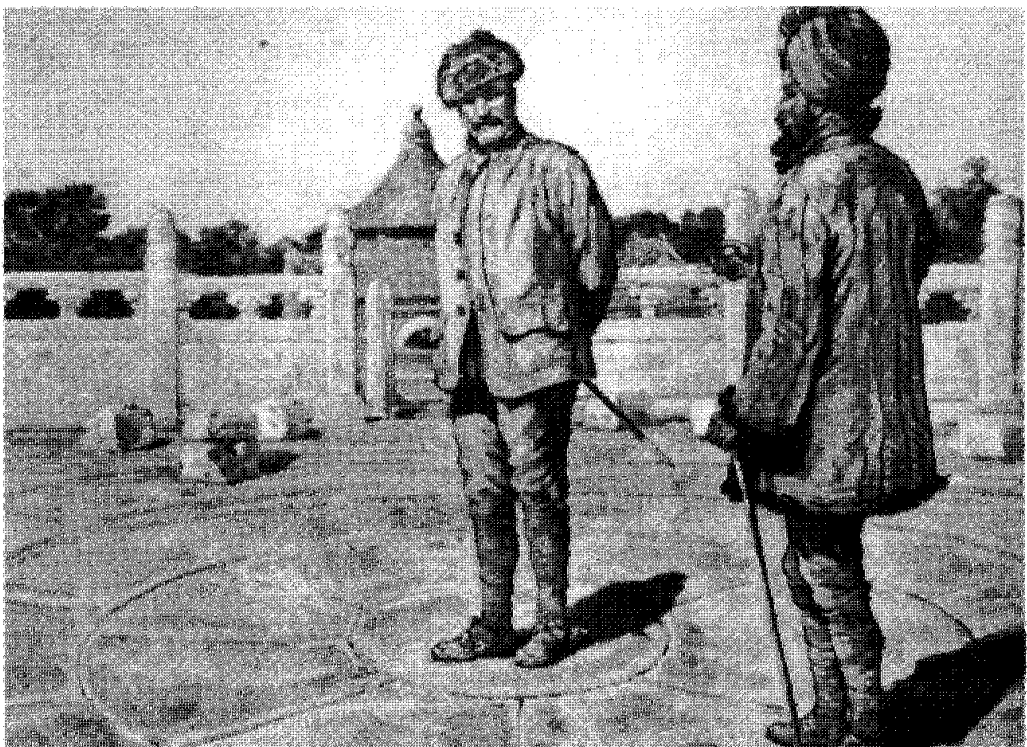
① *ILN*, 6 and 13 April 1901, 17 November 1900; *The Graphic*, 16 February 1901; *Black & White*, 11 November 1900, 28 January 1901.

② *ILN*, 29 December 1900; *The Graphic*, 1 and 8 December 1900.



图片 35 “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29 December 1900.



图片 36 站在中国人天下中心处的英国士兵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20 April 1901.



这种彻头彻尾的殖民表演，在许多方面都让人联想起英国在印度的镇压活动。此后不久，该报又发表了中国皇帝和太后的印玺的照片（*ILN*, 20 July 1901: 89-90）。

有关征服、羞辱、惩罚和象征盗用的这些可视叙述，和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小战争”——1861年以后在帝国及其边界地区每年都或多或少地发生的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起义——的新闻报道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就像现代最重要的一位英国帝国主义的批评者霍布森（John Hobson）所认为的那样，在记录在案的100多次这类事件中（Farwell 1972: 367-371），有关的战争报道都有着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英雄崇拜与煽情的赞美，冒险经历与体育精神：为了直接刺激人们的好斗本能，当代历史就被伪造出这样一些炫人的恶俗色彩。”^①从“野蛮”中国对基督教文明的攻击中，很容易开发出这类有关英帝国战争的报道中的那种男子汉道德气概，把中国也纳入进一个有关正义战争和对罪行的正义惩罚的全球性叙事之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仿佛并不需要一张实实在在的“阿特金斯”站在中国天下中心的照片——一幅画，一幅或许是在《伦敦图片新闻》位于英国的办公室里完成的画，就已经足够了^②。说到底，如果阿特金斯真的来到中国，他又能站到别的什么地方呢？

如果说，这些插图报刊所描述的是一个被征服了的野蛮中国，已经不会令人过分震惊的话，那么，在当时的英国，至少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旨在大肆渲染在华情况的图文兼备的表现形式，强烈地震撼着读者们。前面曾经提到，在北京被占领后的某个时刻，联军改

① 引文出自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个研究》，转引自 Springhall 1986: 49。斯特恩（Stearn 1992）有关于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战地记者的讨论。

② 斯普林霍尔（Springhall 1986: 59-62）讨论了《伦敦图片新闻》的图片的制作过程，其中许多图片是由当地画家在伦敦完成的。一个比较著名的画家是伍德威尔（Richard Caton Woodville），他被认为是《伦敦图片新闻》1900年9月15日一期封面的作者，上面画的是一个正在押送一名义和团囚犯的孟加拉骑兵。

变了处决被认定为义和团的人的方式，授权中国的刽子手将另一些中国人按一定的法律程序公开斩首。这样做，部分是因为出现了对文明人（例如占领者）内部潜藏着的野蛮性的不安，部分是因为斩首被理解为是能够对中国人产生震慑作用的处决方式。尽管拍摄了相当数量的斩首处决的照片，但似乎并没有多少照片得以发表。或许如里卡尔坦在看到两名日本士兵将所谓的义和团民斩首后所解释的那样，这种“残忍的屠杀”太可怕了，不适宜在大众媒体上表现出来（引自 Lucas 1990: 184）。

然而，就像我们在开篇第一章所看到的，这样的感受并没有阻止布莱尔敦游客问讯处出版《处决中国义和团民的珍贵照片》（ca. 1901）。作为本书书名基础的那张照片就是这本售价高达 5 先令（同一出版物上标明一本有插图的布莱尔敦旅游指南的售价仅为 6 便士）的小册子中的 4 张照片中的一张^①。和它们同时发表的还有一个文字说明，带着明显的英国人的道德优越感，叙述了斩首示众在中国的背景情况。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图文并茂的报道中，不一定非要图片本身来说明事实，它们往往被安排为文字所述事实的图解或是例证。布莱尔敦小册子就提供了图片和文字这一关系的许多例子。第一张照片“押往刑场”后面有一整页的论述文字，作者的名字只标示为 R. N.。论述文字开头几句话集中了有关中国和清王朝的陈词滥调，从而确定了整篇文章的风格。据说，这些陈词滥调可以从这张照片中得到证实。中国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国家，它的人民有着“某些优秀品性”（比如他们非常勤劳），但恶劣品性是他们的主流，这些品性使得英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人民存

^① 1994 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刘北汜和徐启宪编的一本书，收集了故宫收藏的许多照片，其中包括布莱尔敦出版物里的两张照片，标题为“英军监杀义和团民”和“义和团民在菜市口刑场被杀”。参见刘北汜、徐启宪《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1994），第 243、245 页。



在”。但是，R. N. 解释说，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因为他们的人数是那样的众多。

在开头这些对中国人的诋毁之后，是一些武断的断言：中国人是一群“不讲信义”的人，他们没有宗教感情和宗教信仰，不讲道德，是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这些品性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中国人“不在文明的范畴之内”。文章接着列举了中国人的其他一些恶劣品性——冷漠无情，对官府天天在大街上公开进行的肉体折磨和处决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和中国公开处决的各种形式的详单。同时，作者还栩栩如生地详细描述了公开处决过程中的种种残忍行为。有关“野蛮性”的这一目录最后评论说，“蒙古人种被公认为感觉迟钝、有勇气、对痛苦不敏感……所以，中国的罪犯几乎感觉不到同样条件下那些更为敏感的种族成员所感觉到的痛苦。”

不用说，这些都是从有关中国人性格的资料中精选出来的第一流的帝国档案知识。上面引用的一段来自道格思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版所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R. N. 原文照抄但没有注明出处^①，但这并不是这个抄袭帝国档案的例子中最有意思的一点。R. N. 把有关“中国佬”自然性格方面的权威性资料照搬过来，并不只是要简单地为这些照片配上一些人种方面的具体情况。在这里，档案的功能不仅仅能在遥远国度的知识和帝国中心之间建立起一个明确的界面，而且还能够确保后者不会被前者所污染。文章没有一字一句提到，英帝国国家的所作所为会不会与这些照片所记录的事情有着某种联系，甚至都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暗示。相反的，文章告诉我们，尽管没有人因为“中国佬对中国佬进行的各

^① 第10版于1874年首次出版，我曾查阅过1878年的斯科里伯纳版，“中国”条目载第5卷626~672页。这里引用的一段载669页。麦克斯（Mackerras 1989: 60）曾引用了这一节中的一些话。《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尽管仍然保留了道格拉斯（Douglas）关于死刑处决的一些描述，但本书引用的这些话被删掉了。

种极其讲究的残酷行为”而感到遗憾，但“欧洲军官在‘处决’现场监刑，阻止了一些不必要的残酷虐待——每个英国人对这样的虐待都会深恶痛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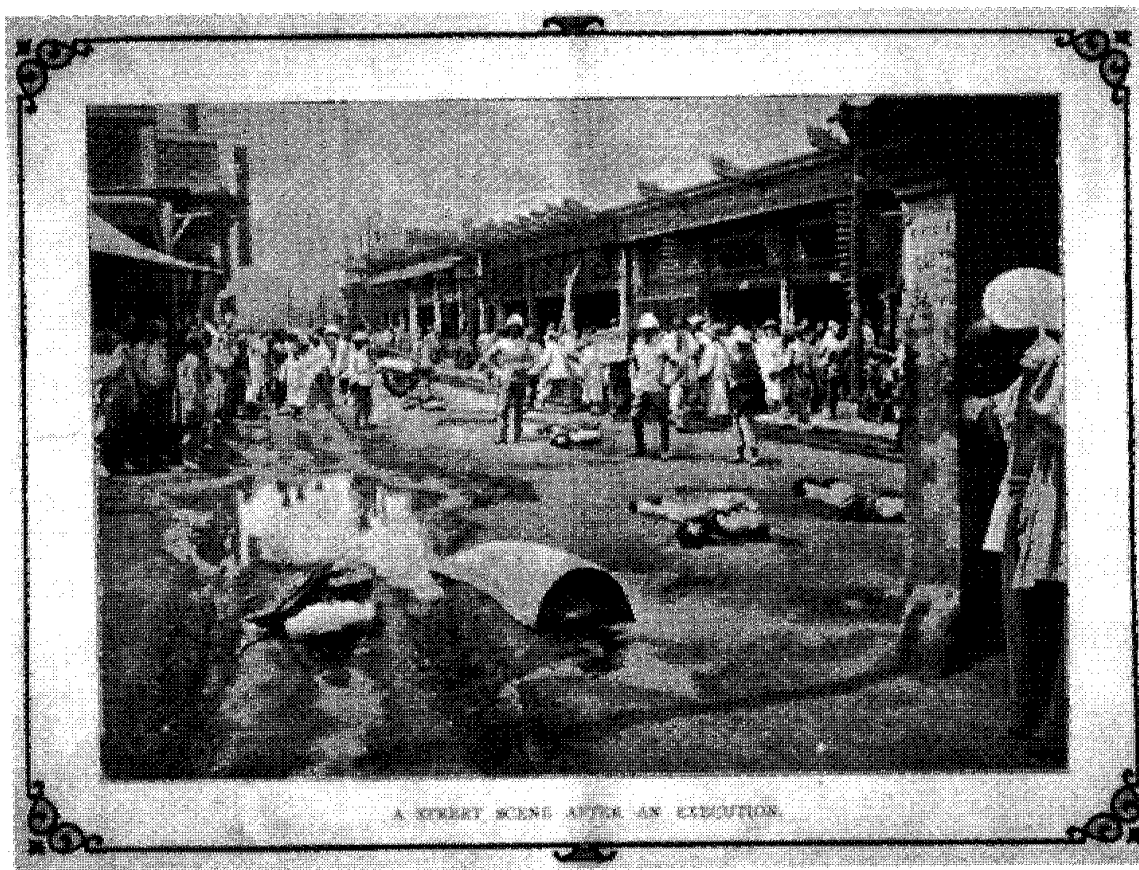
从这种种族优越的立场和这些不着边际的论断出发，文章就能够在进行评论的时候，向读者一次次地申明英国在华行动的正当性。首先，我们被告知“这些罕见的图片尽管令人厌恶，但生动地描述了对义和团的惩罚。对于义和团，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怜悯，即使我们中间那些最仁慈的人也只能说‘他们完全是咎由自取’”。这是因为他们犯下了文章简要描绘的那些“嗜血的”和“魔鬼般的”罪行。另一方面，如果英国的手脚没有被东方问题中有关“国际战略”的考虑（如“外交和官僚作风”）所“捆绑住”的话，这一切本来有可能会被阻止。

这些复杂的国际因素促成了清廷和义和团的勾结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不过，起义一被镇压，中国政府就改变了政策，转而努力讨好联军，开始大肆屠杀义和团，使得北京街道上流满了他们的鲜血。照片中那些血淋淋的场面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然而，R. N. 向读者们保证，在这本小册子中公布这些照片并不是为了利用它们：“看到这些非同寻常的照片，不可能不让人感到痛苦和厌恶。然而，把这些照片公之于众，并不是为了满足那种病态的好奇心，而是为了三重目的：让我们去同情一个不幸的民族，让我们的心中充满对于酷刑的强烈痛恨，让我们对生活在一个正义受到仁慈制约的国度而心生感激。”

把读者的理想社会和帝国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并不是一种罕见现象。在前面讲到的那个时代的那些“小战争”中，这样的做法在插图报刊的报道中反复出现了许多次。此外，鉴于这些照片的内容，它们至少也可以说是消除英国军队在华行动可能引起的疑虑的一个绝对有效的方式。看到文章一方面要人们克制对于这些图片病态的好奇心，一方面又提到人道主义和责任——这是要学着去憎



恶这类残忍行为的白人的负担，并不会让我们感到特别意外。但是，文章所宣称的英国文明的纯洁和站立在“行刑后的街道”（图片37）上的英国军官之间的那种不协调，更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什么 R. N. 或是游客问讯处会对照片中英国军官令人不快的架势视而不见，使得我们把问题集中到了种族化的话语权力和力量上。这类话语不仅完成了把清帝国再疆界化的过程，消除了对在华联军行为的任何疑虑，而且强有力地在中国和中国人民纳入到殖民世界及其各种形式的权力/知识关系之中。



图片 37 行刑后的街道

Unique Photographs of the Execution of Boxers in China (ca. 1901).

第八章

记忆手段：把西方铭记成 受害者和英雄

弗莱明（Peter Fleming）在其 1959 年出版的有关使馆围困历史的著作中，认为义和团起义与波士顿茶党或者加尔各答黑牢一样，是“构成人们头脑中基本知识的基本素材”（Fleming 1959: 9）。这里所谓的基本素材可以被理解为复杂的历史事件被简化了的或是经过节略的版本，这些版本主要是通过删减工作，对过去的真相进行了歪曲。就义和团起义来说，弗莱明希望能讲述一个更为全面的故事，从而恢复历史的整体性。但是，这一历史是怎样成为每个人头脑中的基本素材的？或者说，这些历史事件是怎样被固定化，从而使弗莱明可把它们概括为每个人头脑中的基本素材呢？弗莱明并没有对此提出任何质疑。本章的目的就是要探讨这些问题，去考察 1900 年的历史事件是如何被编辑，又是如何被固定化为弗莱明所注意到的那种形式的。

很显然，这些问题的某些答案要到义和团起义以后西方列强的行为中去找寻。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再疆界化的许多形式，包括清廷礼仪的改变以及中国成为西方瞩目的景观，都起到了阻止西方进一步对清王朝和中国人民施加暴力和进行复仇的作用。然而，在第八



章所讨论的各种活动当中，除摄影和图片出版物以外，重建秩序的主要影响和作用范围都局限在中国。在华劫掠活动和惩罚性远征在西方自我感知中所产生的创伤，还需要在西方进行缝合。本章将考察 1900 年历史事件的意义是如何通过权威性叙事以及种种记忆——这些记忆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国——而被固定下来的。首先，我将考察传教士有关义和团起义作品中的叙事，考察在中国和美国为被害传教士建造的纪念碑中看到的这类叙事。然后，我要考察写给男孩子们读的关于义和团的冒险故事，以及一个参加过解救中国使馆远征军的退伍军人们的组织。在这些事例当中，西方都被建构为一个受害者，而与中国人野蛮行为的斗争则被建构为值得纪念的英雄行为。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激动人心的叙事，这些有关那些为了维护基督教和国际法律秩序而做出牺牲的人的叙事，有效地缓解了人们对伴随文明使命出现的野蛮暴力的种种忧虑。

传教士话语

西方列强公使们能够为 1900 年中国“反人道的犯罪”确定法律责任，但他们所代表的，只是那些被认为相互间在中国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民族国家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尤其在这些叙述形成英国议会文件以及美国国会公报一类官方报告出版的时候，就不可能成为有关事件唯一的权威性叙述。把自己置身于参与解救使馆的那些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是基督教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作家们有条件塑造出一些既与政府的公开报告相一致，同时又与之有着相当差异的历史叙事。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他们不仅补充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有关 1900 年的故事，而且还为义和团起义的民间叙述奠定了基础。直到今天，这些民间叙述中的某些内容仍在流传。

通过不同形式的出版物和举办各种追思仪式，传教士们用受

难、殉道和基督教文明战胜异教野蛮的故事，取代了联军进行劫掠、复仇以及种种残暴行为的记载。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作家们把帝国列强对义和团起义原因的解释固定下来，成为唯一的版本：义和团事件不折不扣地是中国排外主义的结果，它是对那些前来中国无私地献身于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的无辜者的残暴侵犯。由这一解释所产生出来的故事，以及故事情节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基调——中国人的排外主义以及西方对这一排外主义具有牺牲精神的英勇反抗——一起，几乎在占领北京的同时，就出现在了评论杂志、期刊、报纸和传教士出版物上。

在使馆被解救仅仅两个月以后，明恩溥就以《展望》（*The Outlook*）杂志在华特派记者的身份，详细描述了“北京的罪行”，其中包括清廷对义和团的支持，以及对所有与“外国”有关的事物或者“能让人想到外国”的事物进行的破坏（Arthur Smith 1900）。他写道，中国的排外活动不仅蔓延到各国使馆在西山修建的避暑地，而且还波及到外国人的跑马场，外国人的墓地也受到了亵渎。外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城市以后，立即就对这些罪恶行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接着，他详细列举了北京所受到的种种羞辱。到1901年年中，明恩溥（Arthur Smith 1901a, 1901c, 1901d）等人试图影响1900年事件意义的这些最初努力，便进一步发展为了一本本长篇大论的书籍。与这些书籍一起出现的，是在中国许多地方进行的死亡传教士纪念碑奉献仪式。

传教士史书，暴行故事以及传教事业的复兴

无论从哪种标准看，传教士出版物的数量之多，都会令人感到吃惊。仅在1901年一年，就出版了明恩溥两卷本的《中国在动乱中》、卜舛济（F. L. Hawks Potts）牧师的《中国的起义》、艾伦（Roland Allen）牧师的《北京使馆的围困》、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的《中国内地会殉难教士录》和满乐道牧师的《北京



的围困》。1902年和1903年，又出版了凯特勒（Isaac Ketler）的《保定府的悲剧》、何德兰（Isaac Headland）的《中国英烈》、叶守真（E. H. Edwards）的《火与剑在山西》、马蒂尔（A. H. Mateer）的《围困的日子》和麦美德（Luella Miner）的《中国殉道者传》。1904年出版的布朗（Arthur Brown）牧师的《旧中国的新势力》和法思远（Robert Forsyth）的《庚子殉难录》，给最初的这次出版热潮画上了一个句号^①。

这些书籍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明恩溥的著作。前面提到，明恩溥是普遍承认的中国问题权威，他对义和团文献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他那两卷著作的正文有770页，包括96张照片（前一章中曾经讨论过其中某些照片）和5张地图。然而，这部书并不完全是一部私人著作。例如，明恩溥承认，他能够接触到美国公使康格与中国政府之间的通信，而且他与英国使馆似乎也有着很好的联系。这些关系使得他的叙事即使不能完全反映所有列强的行动，也能够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悉事情发生的确切原因。除了能接触到官方记录外，明恩溥与传教士方面的资料也有着密切联系。例如，他能够从谢卫楼夫人的著作中找到有关中国教徒经历的第一手资料，也能够依据其他传教士的记载概要地介绍中国内地的情况。

由于掌握着大量资料，明恩溥就能够用一种反映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的基调来撰写他的著作。与下面将讨论的许多殉道者传不同，这种真实性使得明恩溥著作的风格，和那些批评传教士的激烈作品非常相似。基于这样的原则，他就能够比较公平地既批评帝国主义列强，也批评清廷中的排外分子，既批评中国人的无知和迷信，也批评欧洲占领军的过分行爲，批评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列强不愿意用一种既在中国人“意料之中”又能为他们“理解”的方

^① 有关传教士资料的书目见 Forsythe 1971: 129 - 141。

式来惩罚中国的态度。在此同时，明恩溥也清楚地表明，他仍然是一名传教士。他对被围困的使馆人员和传教士能够幸存的解释丝毫不含糊：这是由于神的干预。

这种现实政治和基督教信仰的奇怪混合反映了在华传教事业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传教士要依赖中国的和外国的世俗权力，来行使其条约权利，而同时他们又试图建立起某种超越这种世俗依赖的道德基础。明恩溥的作品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矛盾，就这一点来看，他或许不是把1900年的意义明确固定下来的最佳作家。与明恩溥不同，和前面讨论过的世俗作家的记述也不一样，撰写殉道者传的传教士们的思想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和撰写1860年战役回忆录的英国人非常相像，这些殉道者传的写作就像是某种联合行动，传教士们在叙述这些事件时，有着政党路线般整齐有力的立场。传教士不是义和团起义的原因，而是义和团起义的无辜受害者。有些传教士并不是一般的英雄——他们是殉道者。这些观点在一种叙事结构中得到表达，这种结构把涉及传教士的事件表现为受难和牺牲的故事，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暴行故事。

例如，麦美德在她的殉道者传中解释说，“接下去的叙述最好不去过多地描述那些血腥屠杀凄惨的细节，但我也不能隐瞒这类残暴行为四处泛滥的事实。感谢上帝，人的性欲没有这样泛滥，使得女人们没有受到落到野蛮人手中本可能受到的苦难”（Miner 1903: 23）。麦美德不去描述暴行的细节，是因为不想去伤害当时人的感情，尽管她暗示没有人受到强奸这一点比大多数人走得更远^①。然而，其他一些人并不赞同这种做法，反而要生动细致地描绘被李佳白牧师称作“地狱里的狂欢”的那些暴行（Reid 1901: 582）。下面是一段有关保定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几名传教士被砍头，他们的尸体被草草埋葬——的典型记载，布朗在这段记载中，描绘了

^① 在如何处理暴行问题上，丁韪良与麦美德的看法一致。见 Martin 1900: 140。



两名美国妇女受到的痛苦折磨：

在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之后，两名年轻女人莫莉尔（Morril）女士和古尔德（Gould）女士的噩运很快就降临了。毕得经先生死后，她们被捉住，衣服被脱得上下身只剩下各一件。呼叫着的人群带着她们斜穿过一条小道，从院子大门来到门东边的大路上。古尔德女士并不是像最初报告所说的那样在被从教堂带走的时候受惊而死，而是走到离教堂几百码的小道和大路的交叉口时才昏了过去。她的双踝被捆在一起，双手也被绑在身子前面，被人抬着走完剩下的路。而莫莉尔女士则始终走着，镇静自若，以她特有的方式，把腰里的一点钱给了一个乞丐，还试着去劝说那些迫害她的人不要做蠢事。抓到了两名毫无防卫能力的女人——其中一人还失去了知觉，让这伙残忍的男人们异常兴奋。他们向西走到河边，然后折向北，过了石桥以后来到了城内离城墙东南角不远的寺庙。

在这些暴行故事的讲述中，某些相同的内容重复地出现：（1）每一个人所遭受的具体折磨；（2）主要的受害人是那些没有防御能力或者“纤弱的”妇女儿童（Reid 1902: 453）；（3）接二连三的死亡；（4）每一例死亡的精确地点以及每一个人的死亡过程（几乎所有事例中的死亡都是被杀头而死）；（5）每个受害人在受难过程中所说的话；（6）大多数受害人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英雄主义；（7）尽可能地指明应当负责的中国人的身份。

然而，把这些内容连缀到一起的时候，也会出现某种适得其反的情况。在有人被杀害的地方，往往很少有人能幸存下来，这就意味着必须依靠那些当地人提供必要的细节，而这些人本身就很可能就参与了对传教士的杀害。此外，这类采访多数都是在事情发生几个月以后才进行的，那些人的讲述因此相互矛盾，各执其辞，同一事

件就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布朗所说的“古尔德女士并不是像最初报告所说的那样受惊而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不一致的记载。有的记载说两名女士被剥掉衣服，光着身子穿过保定的街道；有的记载则与布朗的记载一样，说她们只是被剥去了部分衣服；也有记载说她们的衣服根本就没有被剥去，而是被带到街上以后让一群疯狂的暴徒给撕扯掉的。有一个记载说古尔德女士的头发被绑在棍子上吊了起来，另外一则记载说古尔德女士在被砍头之前，乳房先被人割了下来。这两种说法与其他一些记载都有矛盾之处^①。

无论如何，关键问题是，尽管描写古尔德和莫莉尔之死的这些作者们并没有完全搞清事情的真相，但并没有一个人感到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些故事所根据的资料并不充足。那么我们就可以怀疑，这些暴行故事究竟要讲些什么？如此突出地描述受难、殉道和复活，其目的是什么？大多数的记载要么在暴行故事之后紧接着就叙述这些暴行所受到的惩罚，要么把这些暴行和所受到的惩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由此看来，这些暴行故事的作用，就是为光明重新照亮中国的黑暗铺平道路。利用这些暴行故事的叙述，那些本来可能会被解释为“铁血主义”胜利的各种活动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换句话说，它们具有一种精神方面的作用——它们使复仇行为成为正常的事，使之转化为对“中国野蛮行为”的合理反应，从而有助于清除马克·吐温和狄龙那样的批评家们的影响。然而，把复仇变为正常行为并不是前面提到的基督教元叙事结构中本来就有的东西，而是被追加上去的。由此来看，至少一些有影响的传教士作家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能够其他地方

^① 关于莫莉尔和古尔德遭遇的其他描述，见 R. Forsyth 1904: 24 - 5; Ketter 1902: 387; 美国陆军上尉哈切森的报告，载 NARA RG395, 913, no. 36; Lynch 1901: 204 - 205; *Shanghai Mercury*, 1967: 83; A. Smith 1901b, 2: 611; Conger 1909: 183。



发生，因为被追加的故事——有关暴行的叙述是其组成部分——就是《旧约》中正义与异教主义以及撒旦的野蛮主义进行斗争的故事。

保定的暴行故事尽管能够把中国事件有力地置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道德世界之中，却缺少《圣经》式叙事结构的恢宏气势。在保定故事里，无论是在清朝官员中还是在义和团中，人们都找不到一个撒旦那样的邪恶的化身。在另外一些传教士被杀害的太原事件中，这一不足得到了弥补。太原事件提供了一个彻底魔鬼化的坏人，这就是山西巡抚毓贤。毓贤不仅亲自参与了对传教士的杀害，而且像布朗所说的，他还是那些“不但不去制止，反而教唆煽动那些疯狂暴徒”的清朝官员的缩影（Arthur Brown 1904: 195）。

毓贤在来到山西以前曾担任山东巡抚，有许多记载说他在山东时“正式组织了义和团”（Reid 1902: 451）^①。西方列强认为他参与策划了许多事件，要求将他调离了山东巡抚的职位。1900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据传教士记载，他到山西之后不久，义和团就开始出现了（Robert Forsyth 1904: 32）。到6月底，太原及其附近的教会发生了骚乱，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们聚集到了一起。7月7日，他们被带到了巡抚衙门，名义上是要保护他们。7月9日，在毓贤亲自指挥下，这些传教士被处死，其中许多人是被毓贤的士兵杀死的。几乎所有受害人都被砍下头颅，放在巡抚衙门门外公开示众^②。

关于这一处死事件最引人注目的记载之一，是1900年10月17日《北华捷报》发表的一位“目击者”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毓贤本人被指为一名行凶者：

① 关于毓贤卷入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见 Esherick 1987: 190 - 193, 255 - 270。

② 传教士关于太原暴行的记载，见 Edwards 1903: 64 - 82; R. Forsyth 1904: 32 - 41; A. Smith 1901b, 2: 613 - 615。也见 Stanley Smith 1901: 82 - 88。

第一批传教士被送到太原府后，毓贤下令把他们直接带进他的衙门。他们被领到后院的一个射箭场里，然后就站在那儿，相互之间有几英尺的距离。接着，杀气腾腾的巡抚脱下外面的官服，摘下脖子上的朝珠，跨上一匹为他准备好的马，从一位亲兵手中拿过一把长刀，驱马慢慢跑到场地另一端。他掉转马头，面向受害人，站立在15丈（大约200英尺）开外。然后他开始策马向受害人冲过来，边冲边挥动手中的长刀，一下子就砍下了四五个人头。这时，他的马突然停下，不肯再往前跑，毓贤于是被迫下马。接着，其余那些可怜的传教士们就被在场的义和团和士兵们杀死了。毓贤就是这样向他那些属下们“进行示范”的。^①

在太原事件和保定事件中，传教士受难的具体情节聚集于中国官员的罪行上，提出了一个有力的修辞学问题。惩罚和正义是不是具有相同的意义呢？此外，由于这些暴行故事栩栩如生地描写了犯罪事实，传教士现在就能够回应对他们做出的批评了。我们还记得，到1900年年底，传教士们血腥的复仇欲望以及他们的劫掠行为，在报纸杂志上曾经引起强烈的批评^②。甚至连格罗夫和萨拉·康格（Conger 1909: 175）等传教事业的支持者们，在他们的信中也表达了对传教士态度的忧虑，而赫德发表的文章也有着同样的不安（Hart 1901a, 1901b）。这些暴行故事的复述最起码也能有助于解释，当人们知悉保定和太原的传教士们的命运以后，那些幸存者

① 引自 Stanley Smith 1901: 87。在处死这些传教士以后，毓贤受到山西人的尊崇。在离开山西时，他那双“荣誉之靴”被挂到了城门上。人们还为他立起一块石碑，赞颂他的功绩。见 A. Smith 1901b, 2: 615; Edwards 1903: 139。

② 例如，海格思（Hykes）博士就辩护说，传教士们要求的是正义，而不是复仇；见 *Shanghai Mercury*, 1967: 83。对复仇的指责见 *Literary Digest* 21.2 (1900): 35。



们的情绪为什么会如此愤激。因此，明恩溥这样的人在看到毓贤的残暴行为和太原居民参与了这些暴行的时候，会斩钉截铁地写道，必须要给太原加上一个“不能去除的印记”，必须要毁掉巡抚衙门，这又有什么让人吃惊的呢（Arthur Smith 1901b, 2: 615 - 16）？

但这只是历史叙事的《旧约》一面。还有《新约》的一面，这一面，就传教士目标来说，被证明是两面中更为重要的一面。1901 ~ 1904 年间出版的书籍中，书名中共同的一点是把死去的传教士称作殉道者。这些书籍本身呢，反过来又可能会被当时的世界理解为殉道者传，但是殉道和殉道者传是需要进行解释的概念。殉道者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直要回溯到基督教刚刚兴起的时代。殉道者的意思是，见证耶稣是上帝儿子这一事实并为这一事实作证，并且要在面对迫害和死亡时拒绝宣布背弃自己的信仰。一个殉道者的死，一直都被人刻画为第二次洗礼或者是血的洗礼。早期教会时期，在殉道者的祭日，要在殉道者的墓前——一般位于城外的墓地——举行仪式，来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并且有奇迹伴随着这些殉道者们出现。在罗马天主教会中，殉道是成为圣人的一条道路，并出现了圣人崇拜，在这类崇拜中，信徒们祈求殉道者们代表自己与上帝交通。殉道者的遗物、他们身体的一部分或者他们的衣服，被用来使新的教堂里的圣坛神圣化，并因此成为基督教世界领土扩张的方式。从公元 3 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这也是凯特勒在其《保定府的悲剧》中不断重复的观念（Issac Ketler 1902: 400）^①。

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并不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而是基督新教的教派和思想。研究基督教历史的学者科尔波（Robert Kolb）曾经

① 关于殉道和圣人，见 Eliade 1987, 11: 251, 4: 172 - 174; Hastings 1916, 11: 53; Jackson 1910, 7: 216; Meagher et al., 1979, 2: 2276。也见 Weinrich (1981: 78 - 79, 205 - 206) 对殉道的归纳。Aries (1974: 16 - 17) 讨论了殉道者的葬礼。

指出，路德教从一开始就反对由圣人和殉道者在上帝和人之间代行祈祷的思想。但与此同时，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迫害又导致了新殉道者传的出现，使得人们认为现在也能够出现殉道者。在致力于写作殉道事迹的人当中，至少在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是福克赛（Fexe）的《殉道者录》（1856）。这部 17 世纪的新教书籍，随着传教事业在全球的扩展，又焕发出新的吸引力^①。这部书的确非常著名，所以宝复礼（Frederic Brown）牧师会这样说：“在 1900 年中国教会的历史面前，它也只能退避三舍。”（Frederic Brown 1902: 122）。

新教的殉道者们并不仅仅是鲜活的奇迹，他们召唤着信徒们去表白他们的信仰或者为他们的信仰做见证，他们提供了面对迫害时值得仿效的楷模，或者更谦恭一点说，提供了虔诚的美德，他们证明了基督教上帝关注其人民日常生活每一个方面的信念（Kolb 1987: 148 - 156）。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些基督新教的解说，那些被义和团所杀害的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殉道者了。这些暴行故事让人们看到，他们经受了苦难，为他们的信仰做了见证，他们每个人都度过了虔诚的、堪称典范的生活。尽管人们可能还会认为，殉道也许并不一定要求进行惩罚，但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殉道者们有力地驳斥了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批评。

把传教士建构为殉道者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因为这些著作中还提出了许多证据，表明这些殉道者的鲜血确实成了教会的“种子”。这一点，是通过重述 1901 年及其后在保定、太原以及其他一些传教士被害的地方举行的悼念活动来完成的。这些活动包括重新安葬、圣地的献祭、基督教祭祀活动以及纪念碑奉献仪式等。同时进行的还有“几乎所有基督教教派在几乎所有国家”举行的

^① Kolb 1987: 148. 关于福克赛这本书的出版史，见 Haller 1963: 251 - 253。1856 年美国版有马尔海姆（John Malham）1813 年的序，表示支持这部书的“传布”，因为罗马天主教和迫害并没有消失。



各种活动 (Ketler 1902: 400), 它们成功地把中国纳入到基督教世界并且推动了在华传教事业的大扩展^①。

在保定和太原建立基督教圣址

1901年7月6日, 天低云暗。我们离开北京, 沿京汉路前往保定府, 那座每一名美国基督徒都痛苦地关注着的神圣城市。

——阿瑟·布朗 (Arthur Brown) 1904

1901年秋冬之交, 一批批的传教士回到了他们的同工们被杀害的地方, 举行了神圣的献祭仪式。这一过程可以被理解为惩罚的建构阶段, 是旨在把基督教殉道的记忆永久地铭刻在中国人土地和思想中的一种再疆界化。传教士们2月份就抵达了保定, 来到城墙东南角附近的乱葬岗子。叶守真和其他人将死者的遗骸挖了出来, 放进棺木中, 然后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祭祀活动 (Robert Forsyth 1904: 26)。一个月以后, 包括布朗和明恩溥在内的美国长老会和美国公理会的重要成员, 在德国和法国军官的陪同下, 来到保定, 为把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改葬到新的墓地举行正式的安葬仪式。在3月23日这个“加冕的日子”^②, 安葬仪式在中国官员设在长老会大院里的大棚中举行。参加这一仪式的似乎有在保定远征中被处死的清朝官员的继任者们^③。路崇德写道:

宗教仪式以乐队演奏嘹亮而悲伤的旋律开始。接着, 基利

① 洛佩兹 (Donald Lopez) 鼓励我对殉道这一基督教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 并且提出殉道者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进入基督教世界。在此谨向他表示感谢。

② 这是路崇德使用的表达方式, 引自 Ketler 1902: 394 - 395, 该书也提供了许多有关在保定举行的仪式的照片。

③ 官员名单见 Ketler 1902: 394。

厄 (C. A. Killie) 牧师朗读了《圣经》。人们用英文演唱美丽的赞美诗：“睡主怀中，蒙福无边”。歌词中这最后一个诗节，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贴切。沃里 (John Werry) 牧师作了悼念演讲，他在其中谈到了我们聚在这儿悼念的每一位死者。德国的器乐演奏者们接下去演奏了“坚固的堡垒是我们的上帝”中的两个诗节。美国公理会的谢卫楼牧师领完祈祷以后，路崇德先生向在场的中国人发表了讲话。这些中国人唱起了中文的赞美诗，“我在这儿不过是一个陌生人，天国才是我的家”。美国公理会的明恩溥牧师宣读祝福祈祷。最后，乐队演奏了柔和的曲子，宣告活动结束。

第二天，在安葬 26 具遗骸的美国公理会大院里举行了宗教仪式，晚上又在路崇德家中进行了礼拜。其间，传教士似乎讨论了在保定传教士被处死的地方再建一个墓地的可能性 (Ketler 1902: 395)。

在太原也进行了相类似的活动。这个城市没有像被“加上印记”的保定那样遭到惩罚性远征，却于 1901 年 7 月 18 日接待了一个前来参加追悼仪式的团队。他们举行了安葬仪式，有中国官员献了花圈。在此同时或者晚些时候，在城里为死去的殉道者们立起了石碑，取代了给毓贤立的石碑。此外，曾经关押过被害传教士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上面立起一块纪念碑，旧址被改造成了一座公园。最后，传教士和太原官员于 1901 年 7 月进行了谈判，决定“在山西每一个有外国人被害的地方都举行和太原府一样的安葬仪式，设立墓地并用公费来进行维护，还要立适当的纪念碑”。1901 年 7 月 29 日在忻州、8 月 9 日在太谷、1902 年 11 月 29 日在寿阳都举行了各种宗教仪式^①。

^① 引文引自 Edwards 1903: 132 - 154, 该书还有关于在太原和其他地方进行的各种宗教活动的详细记载。也见 R. Forsyth 1904: 41, 499 - 502。



然而，传教士的记载也清楚地表明，无论是在保定还是在太原，并非只有这样的《新约》故事在发挥作用。换句话说，许多场合都成为进行另外一些类型的重建秩序活动的大好时机。例如，这些宗教活动本身就又一次确认了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的权利。将中国教徒和外国传教士一起进行安葬，以及中国教徒在中国官员、士绅和商人们在场的情况下参加追悼仪式，也都是重建秩序的表现。此外，传教士还希望中国方面能在这些活动中表示忏悔。所有记载都表明，在保定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法思远评论在太原举行的追悼仪式时，简要地描述了传教士们希望中国人应该表现出来的态度：“这一场面与人们一年前看到的场面是多么不同啊！那时，面色惨白的殉道者们默然站立在迫害者面前，而现在，是那些官员们尴尬地默默站立在传教士面前。这一对比太强烈了，一定能让那些有思想的人从中得到反省。”（Robert Forsyth 1904：500）^①

这种积极结果使得许多传教士对未来感到极其乐观。他们的议论从曾经普遍认为的“大灾难”转变为对以往所取得的成功肯定，而且经常使用千禧年的词汇来表达。正如老资格的传教专家丁韪良所说：“义和团点燃的烈火让我们看到了各差会取得的成功，并且证明了基督教在过去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这种宗教兴奋的气氛中，丁韪良认为义和团起义开启了中国完全皈依基督教的道路^②。其他人也都唱起了相同的调子。例如，《传教士使者》（*Missionary Herald*）就认为，在中国留存下来的要超过所失去的。它的编者接着说：“中国对福音的需要比以往更巨大更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历史的教训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动乱停止和平到来之后，这

① 有人认为太原人并没有真正忏悔，并把它归咎于没有对太原进行惩罚性远征。见 Edwards 1903：139。

② Martin 1900：170. 甚至那些可能不如丁韪良那样充满希望的人也认为，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坚定的“爱的事工”绝不可能“一无所获”。见 Conger 1909：167。

个伟大的帝国将为我们敞开一扇比以前更为广阔的机会之门。”
(Forsythe 1971: 78)

这一类的语言让读者们相信，这场灾难将会刺激基督教福音主义在全世界重新振兴，并且将会让中国教会焕发出新的生命。海恩波竟然把中国的这次危机与耶路撒冷的毁灭相提并论，认为就像耶路撒冷毁灭使得犹太教的旧秩序难以继续一样，义和团危机也使得在华传教事业的旧体系难以继续，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自由和无尽的机会”。教会必须唤醒自己，去迎接它的到来（Broomhall 1901: 12）。传教士的记载还引用在保定被杀的毕得经牧师写给他妻子的遗言，进一步加强对基督教复兴的呼唤。毕得经的遗言经由忠实的中国教徒老满（Lao Man）公之于世，由路崇德转达给了毕得经夫人。据这些资料称，毕得经要求告诉他的儿子，“他父亲最后的希望是，当他 25 岁时，到中国来做传教士”^①。

传教士用来进行类比的不仅仅是《圣经》中受难和复活的形象，也有一些传教士引用了新近发生的基督教受难的事例。他们指出，这些事例都为传教事业开启了一个新的更为成功的时代。布朗写道：“那些胆小鬼们说，1857 年印度士兵起义和 1860 年叙利亚惨案使这些国家失去了得到新生的全部希望。事实是在这两个国家里，这些事件都开创了差会发展最为成功的时代。”（Arthur Brown 1904: 28 - 29）。丁韪良（Martin 1900: 175 - 185）和海恩波（Broomhall 1901: 13）也有着相同的看法。

与再生和兴奋相联系着的，还有中国和世界都即将发生巨变的断言。布朗认为，义和团起义表明，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不受欢迎”但“不可避免的觉醒”。这种形势让他反复思考“伟大”和“恐怖”在亚洲的悠久历史：

^① 引自 Ketler 1902: 385 - 386。明恩溥（Arthur Smith 1901b, 2: 618）也提到了毕得经的遗言。



这个伟大的大陆所贡献给这个世界的，难道只是对以往伟大的回忆么？人们绝不可能相信这一点。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人的理智难以阻挡的发展趋势。当我们朝远东望去，就会清楚地看到，那儿的历史演化尚未完成。无论上帝怀抱什么目标，这个目标肯定还没有实现。那里的芸芸众生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还从来没有聆听过上帝启示给人们的那些有关生命和命运的高尚理想。难以相信，英明的上帝会让世界这一巨大部分的发展停滞在现在这样一个尚未完成的阶段。也不能想象，上帝制造并维持了占人类如此巨大比例的人，只是为了达到现在的状态。他一定还有更高的目标。（Arthur Brown 1904: 16 - 17）

“绝不可能”、“难以相信”、“尚未完成”和“不能想象”，当这些词和“芸芸众生”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关键词，它们有助于说明传教事业的正当性，也有助于把传教事业的重心聚焦到义和团起义之后。这些词还以一种自然历史发展的全球性模式，把基督教神学与关于演化和进步的世俗观念联结起来^①。和其他许多传教士一样，布朗认为，拯救中国部分地在于西方化和工业化这些不可抗拒的变革力量。但他也认为，如果没有相应的中国基督教化，这些不可避免的变革就会是不完全的^②。照明恩溥的说法，只有基督教才会使中国人适应西方文明的冲击。他声言，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结合将会“把中国人有关‘天、地、人’的知识整合为一体，并且第一次使之完备，从而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学术带来新鲜的活力”（Authur Smith 1901b, 2: 738）。中国人必将得救，因为基督教传教事业给中国人带来了基督教化的现代性。

① 布朗、明恩溥和其他人都自由地使用了演化、适应和种族等现代语言。关于这些观念在 19 世纪末美国普遍流行的论述，见 Hofstadter 1955, Bannister 1972。

② A. Brown 1904: 116, 127 - 128. 也见 A. Smith 1901b, 2: 736, 他认为只有基督教被证明能够为那些经历着急剧科技变革的文明提供道德基础。

的确，很大程度上借助于《新约》之道的运用，这类由道德推动的现代化很快就出现了。与天主教会勒索大量赔款的做法完全不同，新教传教士作家们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美好计划。此后不久，这些计划就在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牧师的领导下开始付诸实现。李提摩太与清朝政府谈判达成一个协议，其中有项内容是为山西民众的教育提供部分资金。据法思远解释，其目的是要“永远地消除这一可怕悲剧的根源：无知和迷信”（Robert Forsyth 1904：42）^①。只要中国人想赎罪，传教士们似乎愿意把他们仁慈的教育普及到那些不久前曾起来反抗传教士的民众。他们会宽恕中国，并且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和复兴。

关于这些传教士作家们提出的振兴计划，最后还要做一点评论。前面指出，发生惨案的地方都被传教士神圣化为圣地。这类圣地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象征性建构的新体系之中，成为这个体系中记载着基督教牺牲和中国人罪行的物质符号。同时，通过基督教朝圣活动，这类圣地也能够用来灌输对于未来的希望。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在1904年6月20日给她姐姐的信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发现〔保定的〕教会已经重新建立起来，正在积极进行着各项事工。经受了1900年劫难的可怕考验并且幸存下来的中国教徒们，现在成为非常能干的助手。基督教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同情和更多的尊敬。”（Conger 1909：316）

从对果报的大力渲染，到对义和团灾难带给传教事业建设性前景的刻意强调，这种变化明显表现出了某种转折。这一转折，在与哀伤的追悼仪式以及为死者立碑等活动联系起来的时候，就能为在

^① 见明恩溥（A. Smith 1901b，2：736）对天主教的批评。李佳白（Reid 1902：450）谈到过“荒谬的怀疑”和“迷信的恐惧”。哈斯廷斯（Hastings 1916，8：741）认为，新教传教团体拒绝接受金钱赔款，给中国留下良好的印象，使得入教人数在此后10年里增加了一倍。



美国和英国动员招募传教事业的支持者发挥强大的作用。这些活动不仅能为各种世俗力量提供效仿的榜样，也能够推动伊萨克斯 [Harold Isaacs 1958 (1980)] 所称的传教事业黄金时代的到来。根据一个研究，在 20 世纪前 10 年，在华传教士的人数从 2785 人增加到 4175 人 (Hastings 1916, 8: 741)。换句话说，传教士关于受难、救赎和复活的历史叙事，似乎在各差会的母国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它把 1900 年事件解释为无辜受害者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事件，并把这一解释成功地固定了下来。从那时以来，人们在思考西方在华帝国主义时，就很难不联想到中国人无理性和残暴野蛮的形象。

欧伯林拱门的修建和奉献

义和团起义被镇压以后的这股纪念风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境内，举例来说，在美国和英国就出现了纪念中国救援远征和义和团时期被害传教士的纪念碑。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纪念碑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所小学校欧伯林新教学院，用以纪念与这所学校有联系的 18 名美国传教士。此外，这座拱碑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传教士表现为纯粹的受害者，而是更加积极地把他们建构为被残杀的基督教殉道者。

欧伯林纪念碑建成于 1903 年 5 月 14 日，在美国公理会最初提出这一想法大约一年半之后^①。看来，这一想法在 1901 年春粗具雏形时，正是在中国为死亡传教士举行追悼仪式和建立纪念碑的时候。美国公理会的这个决定，除效法了在中国进行的那些活动而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点是决定在欧伯林学院建筑这

① 在欧伯林建立纪念碑的决定一经做出，公理会就开始着手筹集资金，并寻找建筑师进行设计。詹姆斯 (D. Willis James) 捐款 2 万美元，其他人共捐款 720 美元。见 OCA, *Publications and Special Projects (Memorial Arch)*, under subgroup II (RG 41), box4。

一纪念碑的原因。美国公理会的史密斯在给欧伯林学院司库塞弗兰斯（James R. Severance）的信中解释说，选择欧伯林作为最适当的碑址，是“因为有如此多的殉道传教士，或者是在欧伯林接受过教育，或者是直接从欧伯林前往传教地的”（Oberlin College Archives [OCA], Smith to Severance, 24 June 1901）。第二点则与美国公理会企图通过这座纪念碑来表达的意义有关。这座碑不是用来纪念传教士的，甚至也不是用来纪念死亡传教士的，而是像史密斯所说的，是献给基督教殉道者的（OCA, Smith to Severance, 9 August 1902, box 37）。

史密斯坚持以这样的意义来建立欧伯林纪念碑，与前面讨论的新教有关殉道的观念正相一致。我们已经看到，按照种种新教的界定，死于义和团之手的传教士应该被看做是殉道者。这座拱碑本身又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它上面刻着醒目的铭文：“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

这句话会使人认为，欧伯林纪念碑和中国那些纪念碑之间存在着一种效仿关系，它实际上是在美国为福音派基督教提供了一个朝圣地。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那么欧伯林纪念碑就确立了一种主张，这种主张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俄亥俄这座小城的范围。我认为，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进入点，来从总体上考察有关义和团起义记忆的精神意义。

最近一些年来，对纪念碑一类建筑的研究，特别是对纪念一群人而不是个别人的纪念碑的研究有了明显的增加。这类研究中最突出的是战争纪念碑研究，它们通常都把这些纪念碑作为集体记忆的场所来加以考察。强调这一点，就很容易产生功能主义的解说——例如，把这类纪念碑解释为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那样的灾难之后重新整合社会的手段。但是最近一些研究已经开始从许多不同的取向出发，来考察这类纪念碑：作为国家和个人建构的意义聚合和意义分离的场所；作为回忆同时也是塑造或者再塑造记忆的精



心设计；作为国家利益与群体利益或者个人利益可能发生冲突的场所；作为吸引过路人并且逐步向他们展示纪念碑意义的地方。这些解说不仅把纪念碑的建立过程和人们最初对纪念碑的理解去自然化，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也表明，“记忆场所”的意义也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各种改变（Nora 1989）。它们还表明，记忆与经历一样，也是一个复杂的建构，它的形成和维持都是集体性的，并且与物质体密切联系着（M. Evans and Lunn 1997；Gregory 1994；Moriarty 1997；Winter 1995）。

这些研究取向对于探讨欧伯林纪念碑的历史非常有用。比如，纪念碑的建造者们无疑是要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来塑造记忆，也就是，要把死亡传教士表现为殉道者。他们似乎也想让纪念碑起到召唤未来的作用。作为献身基督教和自我牺牲的模范，这些殉道者们能够指引和激发欧伯林学院和全世界其他基督教学院的学生们。此外，这座纪念碑的建筑方式和建筑地点，就是要把过路人吸引到位于中心位置的拱门当中，那里清楚表明了纪念碑的意义。碑址选择在欧伯林校园（现在叫“泰本广场”）边上一个普通人都是可以进入的花园中。中央拱门内侧两面各镶有一块铜制铭牌，只有在真正进到拱门当中时才能看到它们。在标题“被害者”下面，两块铭牌上镌刻着殉道者的名字以及他们殉道的地点和时间。

从落成那一刻起，欧伯林拱碑就不仅起着塑造记忆的作用，而且还是塑造一系列内部关联而又相互交叉着的意义的中心，这些意义进一步强化了这座纪念物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例如，它的奉献式于1903年5月14日举行，正当新校长亨利·金（Henry Churchill King）就职典礼期间。在奉献式之前，教师、学生和来宾们列队穿过这座拱门，走向公理会第一教堂，亨利·金校长就在那儿正式就职。第二天，布法罗的费奇（Frank Fitch）牧师在奉献演讲中，把这座拱门描述为“一座纪念山西殉道者高尚牺牲精神的、永远美丽的纪念碑”。另一位讲演者科宾（Paul Leaton Corbin）补充

说，这座拱门“召唤着一种极其高尚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服务”^①。

尽管这些表达的中心是对传教士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缅怀，但也有由此生发出来的意义。拱门另外一翼上铭刻着“汝等是见证人”的字样，用这句话去激励其他人追寻欧伯林殉道者们的足迹。同时，包括1903年毕业典礼在内，列队通过拱门成了欧伯林毕业典礼活动的法定程序。此外，从190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51年，每年都举行追思山西殉道者的宗教活动。这一活动最初由学院主办，后来改由欧伯林社区主办。

基督教见证的这种物质性具现，把这座拱门、这所学院、欧伯林在山西太谷的差会学校以及太谷殉道者墓地联结成一张编织紧密的、能够记忆意义、再生意义并且重塑意义的网络。这张网络的各部分之间吻合得极其紧密，紧密得使人们对欧伯林在华传教事业中的地位形成了非常一致的看法。当这张网络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不仅能够让人想到在华福音传教事业和教会世俗活动，而且，到20世纪30年代，它还能够成为兄弟情谊和物质进步的理想世界主义的象征。换句话说，这张网络是再疆界化的高级机器。

传教士话语和传教士记忆把死亡传教士建构成殉道者，把有关他们死亡的情形建构成在中国取得成功的标记。有关传教士受害者特性和超凡特性的叙事把中国置于基督教福音主义的全球性进程之中，这一福音主义声言要通过使亚洲和非洲的异教种族皈依基督教而得到救赎。同样重要的是，传教士记忆构建起一张网络，把在中国的传教士墓地和在中国之外的纪念性建筑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在那些欧伯林学院毕业典礼参加者的想象中都可以反复流动的朝圣循环。与这一循环相互平行（偶尔也会彼

^① OCA, Hi-O-Hi, 1904: 117 - 122; OCA, Carl Jacobson, "The Memorial Arch: An Unfinished Stor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orain Journal* (Ohio), 15 August 1964.



此交叉)的是另一张网络,一张英勇反抗野蛮主义的充满阳刚之气的网络。与传教士网络一样,这张网络也制造着它自己形式的记忆。

儿童冒险故事,男子汉气概, 英雄主义记忆

传教士关于义和团起义的写作,如同其他许多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一样,为那些依靠文明与野蛮二元冲突而兴盛起来的叙事结构提供了素材。例如,有关白人受难的故事就以这种形式,复制了在其他曾经对欧洲统治进行过反抗的殖民环境中出现过的那种叙事—纪念碑两者的组合(比如1857年印度起义与在起义中死去的“无辜”英国人的纪念碑)。然而,与19世纪末欧美帝国扩张相适应的并不仅仅是在中国的殉道,还有英勇战胜野蛮主义的故事。与殉道者传一样,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也能够很容易地被吸收到这类故事中来。把义和团事件与西方豪迈的必胜信念组合起来的比较成熟的一类作品,是儿童冒险小说。

英雄故事

19世纪末制造帝国主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是以非洲、中东和亚洲一些有着异国风情的地区为背景的基于历史真实的小说。这些小说的读者是成年人和孩子们。许多青少年历险小说取材于大博弈中的英雄故事和殖民战争,大量的笔墨用来描写年轻小伙子们在世界上“未开化”地区反抗并战胜野蛮主义的斗争(MacKenzie 1992)。很显然,1900年的历史事件提供了大量素材,可以把中国纳入到这类作品中。同时,这些事件恰恰也非常适合这类小说那套刻板的情节结构。

理查兹(Jeffry Richards)在其关于通俗帝国主义和青少年文

学的研究中，注意到这些故事中的主角往往是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故事开始时，这些年轻人就已经失去了父母、财富，或者是被社会所抛弃，在广阔的大世界里一个人独自闯荡。在一连串“特殊使命、历险、战斗、围困、追击、俘获、逃脱和解救”的过程中，男主人公经历了各种考验，证明自己是完美的英雄。与其他类小说的主人公一般都是在生活历练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心智道德不同，这类青少年文学中的男主人公一出场就已经完全成熟了。他们的冒险经历只不过把他们勇敢、爱国、足智多谋、刚强坚毅、对土著人父亲般的慈爱、服务和牺牲等品性展现出来。同时，这些故事也表明，这些品性正是那些反对文明使命的人所缺少的（Richards 1992：90 - 91）。这样，这类文学中的男主人公形象就为白人优越论提供了根据，也为要求统治他者的权利提供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些英雄品性，这些故事往往有着一个能够看出故事发生地的通俗名字。亨蒂（George A. Henty）或许是这类故事最重要的作者，他喜欢在这些个人冒险故事中插入一些由战地记者和战斗参加者撰写的事件的真实记载^①。其他作者经常仿效他的写作模式。亨蒂笔下的少年英雄常常能够遇见帝国的大人物，这一点可以从这样的书名中看出来：《和罗伯兹一起去比勒陀利亚》（1901）、《和克莱夫在印度》（1884）、《和基钦纳在苏丹》（1902）。他写过 6 部以非洲为背景的小说，其中一部的背景是吴士礼 1873 ~ 1874 年攻打阿散蒂人的战斗（*By Sheer Pluck*, 1884）。他还以印度、阿富汗边界地区和缅甸为背景，创作出另外 9 部小说。

亨蒂对义和团文学的贡献是他的《与联军到北京：解救使馆

^① 弗莱明（Fleming 1959：90）认为亨蒂在当时的影响极大，他甚至认为西摩联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军事战略来源于小说家而不是克劳塞维茨。



的故事》(Henty 1904)。他借助于林奇、汤姆森(H. C. Thomson, *China and the Powers*, 1902)和艾伦牧师的记载,巧妙地安排他的主人公雷克斯经历了几乎整个义和团事件。与这类小说的许多主人公一样,雷克斯极其机灵,善于伪装,而且精通汉语,甚至能愚弄中国人,这些本事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信使。他设法加入了西摩联军,他不止一次地进出被围困的使馆区,他参加了天津和大沽炮台的战斗,他还随着第一支解救使馆的部队进入了北京。

其他作者尽管不像亨蒂那样忠实于报刊发表出来的那些具体过程,但也发现义和团起义是他们那些少年主人公们可以大展拳脚的绝佳背景。例如,在美国,颇负盛誉的青少年爱国文学作家布鲁克斯(Elbridge S. Brooks)和斯特拉蒂迈尔(Edward Stratemeyer),就分别创作了《在联军旗帜下:义和团故事》(1901)和《到北京去》(1900)^①。布鲁克斯这部小说是他一套小说的第三部,小说主人公帕尔沃在前两部小说中活跃在古巴、南非和菲律宾。斯特拉蒂迈尔把他这部关于中国的小说收进他的《古老荣耀》系列,这一系列描写了一位年轻的美国陆军中尉的英雄战绩。和亨蒂的著作一样,布鲁克斯和斯特拉蒂迈尔的小说结构都立基于文明与野蛮的截然区分,并且重复着那个时代种族类型学的观点。在这些作品里,中国唯一的好人是那些忠实于其白人主人并对白人主人的仁慈感恩戴德的仆人们。确实,与其他殖民环境里的情况一样,这里唯一思维正常的土著人是那些对欧美人强加的秩序表示欢迎并且偶尔也会主动要求这种强加秩序的人^②。

① 斯特拉蒂迈尔是流浪少年、坚忍小子、汤姆·斯威夫特和南希·德鲁等儿童系列小说的作者。见 *The Legendary Edward Stratemeyer*, <http://www.web-span.com/raven43/pers9.htm>, 2001年6月30日登录。感谢索耶尔(Eve Sawyer)向我介绍了这一网址。

② 理查兹(Jeffrey Richards 1992: 97)在许多英国青少年文学中看到了这一思想,美国作家中也存在这种看法,尽管不那么锋芒毕露。

总起来看，这些作品和其他同类作品就像传教士写的殉道者传一样，对“文明”的伤口进行着缝合。它们用作恶者和受害者这样黑白分明的词汇，把历史事件的意义固定下来，同时又让那些年轻的主人公们有机会表现帝国建造者们积极向上的阳刚气概。此外，亨蒂的作品也还带有现实价值。比如，他的作品有一处写到，雷克斯参加了1900年8月的胜利游行，他对紫禁城的观感与其他人大致一样——他“太失望了”。他对在围困中幸存下来的女亲戚们说：“那是一个腐朽的地方，看上去就好像已经有一百年没人在那儿住了似的，肮脏、阴暗、到处是土。”（Henty: 1904: 370）不过，和其他许多曾经对紫禁城充满期待的人一样，雷克斯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现在有机会搞到中国珍宝了。他的叔叔，在天津开着一家商铺的贝特曼先生，在雷克斯即将前往中国时回到了英国。他对他的侄子说，士兵们会大肆进行劫掠，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弄到手的东西的价值，随时都会“非常便宜地”卖掉，雷克斯应该盯住那些古瓶和皮毛。带着叔叔对他的忠告，还有父亲给他的大量金钱，雷克斯进入了北京的劫掠物品市场，极其精明地以远远低于实际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了为数甚巨的瓷器、珠宝和皮毛，并且雇用苦力把这些东西运到了海边。在携带这些战利品离开中国的途中，他还顺便解救了几名中国妇女，使她们免遭被俄国士兵强奸的噩运。

英国和英语世界其他地区的青少年们从这些作品中所能学到的东西非常清楚。就像所有诚实而有骑士风度的英国人，雷克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并且在机会到来时为文明的事业服务。换句话说，他与这类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一样，展示了帝国的男子汉美德，供人理解和仿效。当然，亨蒂也避不开劫掠和暴力问题。他让雷克斯去解救那些无辜的人，以此来回应暴力问题。对于劫掠呢，他以下面的方式做出了解释：他承认在中国的劫掠活动违犯了国际条约，但同时又认为，从各种关联观点来看，中国人的暴行已经否定了这些条约（Henty 1904: 373 - 374, 376, 380）。无论如何，他的主人



公雷克斯没有进行劫掠。同时，他和英国军队一样都能摆脱与劫掠有关的污名。英国军队通过战利品处理程序摆脱了这一污名，而雷克斯的战利品则是在与道德范畴无关的供求市场上获得的。

就这样，亨蒂、斯特拉蒂迈尔和布鲁克斯的儿童冒险故事，或者有助于掩盖联军在中国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暴力，或者把这些暴力归咎于俄国人、法国人或者德国人，当然还有中国人。这种移置的运作方式和传教士撰写的殉道者传的运作方式相类似。就像殉道者们的鲜血把中国有效地纳入到基督教世界之中一样，青少年文学通过对使馆被围困和被解救的英雄事迹的描述，把中国和义和团纳入到帝国维持秩序行动的全球性叙事之中，使之在帝国未来统治中能够有一个“清晰的道德面目”^①。

以这样的形式，义和团事件就为其他媒体的利用敞开了方便之门。使馆被解救之后不到一年，“野牛比尔”的牛仔戏就把“天津战斗和占领北京中的各国联军”搬上了舞台，该剧的演员们穿着美国第9团、美国海军陆战队、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印度陆军部队以及几个欧洲国家的军装^②。同时，在英国，柏利维尤公园——一个以表现英国多次帝国战争的绚丽演出而闻名的户外剧场——上演了“北京的围困”（1901）。这一剧目与其他围困故事恰好构成了一个系列，这些故事包括“利德史密斯的围困”、“佩德堡的围困”和“马弗京保卫战”，都是义和团起义当年发生在布尔战争中的历史事件^③。

甚至新出现的媒体——电影也加入了进来。1901年，英国的沃尔特道公司根据欧美人有关义和团起义报道中最能煽情的两个故事，拍摄了“义和团攻打英国托儿所”和“义和团暗杀英国公民

① 这一措辞取自 Peter Brooks 1976，迈耶尔（Mayer 1992：186）引用了他的话。

② Russell 1960：419。感谢卡森（Joy Kasson）向我介绍这本书。

③ 见迈耶尔（Mayer 1992）关于柏利维尤公园的论述，尤其是192~194页。柏利维尤还于1861年把圆明园的毁坏搬上了舞台，见该书187页。

记”。同年，英国电影制作人威廉姆森（James Williamson）制作了电影《攻打中国传教站》。这部电影在他位于布赖顿的别墅中拍摄，由他的家人担任各个角色。在电影中，威廉姆森让这座传教站的妇女儿童们在即将被义和团杀死之际，被英国水兵救出。在法国，电影业先驱梅莱斯（George Méliès）拍摄了《中国对抗联军》，于1900年年末上映（Leyda 1972：4 - 5）。与此同时，在美国，费城的鲁宾工作室制作了一部42秒钟的电影《中国囚犯被斩首》，其中有一名中国刽子手^①。威塔格拉夫公司制作了《万国会议》。根据对这部影片的一个描述，片中的人物分别代表诸列强，有着约翰牛、日耳曼尼亚一类名字。就在列强马上就要瓜分中国的时候，自由女神像现身，稳定了局势（Leyda 1972：5 - 6）。毕竟，无论中国国内发生什么情况，中国的门户开放都得维持下去。

关于传教士超凡性、军事必胜论以及美国人提倡的西方在华公平竞争支配性叙事，就以这些不同的方式得到广泛传播，并且与帝国其他地区发生的神圣牺牲联系起来，进一步强化了大众印刷品和非印刷文化中那些受害者—英雄框架的故事。确实，正是通过我们这里讨论的各种媒体，才形成了有关世纪末中国和义和团起义的强有力“记忆”。半个世纪以后，伊萨克斯对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前20年里成长起来的一些美国人进行了口头采访，发现他们的中国形象可以追溯到义和团时代。在伊萨克斯的采访中，至少有一个被采访人直接提到，儿童文学，尤其是有关义和团排外行为的悲惨故事，成为他了解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情形的媒介^②。在最后一章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形象一直是西方大众想象中对于东方的基本认识。

① Gray Arbuckle, "An Exciting Novelty: The Exotic Orient in Early Film", <http://www.interchg.ubc.ca/arbgy/excite.html>, 1998年5月12日登录。

② Isaacs [1958] 1980. 该书第106页载有一名被采访人的回忆，称曾经在《青年之友》杂志上读过一篇有关义和团起义的儿童冒险连载故事《十字架与龙》。



军事记忆

当然，青少年文学并不是用来铭记和回忆士兵们崇高牺牲精神和无畏勇气的唯一方式。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收集战利品是参与在华军事行动的部队为确立它们参战的意义而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义和团的武器、战地枪炮以及清帝国的服徽，和在其他战斗中取得的物品一道，在各支部队的本部里占据着突出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也有可能被收集到部队的博物馆中^①。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部分指定物品被改造成更为适当的记忆形式。纪念在天津战死的美国第9步兵团指挥官的里斯库姆（Liscum）碗，是用清政府铸币厂里的银子做成的，由该团队负责保管^②。美国第14团仿而效之，把名义上是清政府在北京陷落后奖励的银锭熔铸成团队的一个潘趣酒碗。他们以泰蒂尤斯（Calvin P. Titus）的名字命名这只碗，泰蒂尤斯以其在攻打清朝首都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获国会荣誉奖章^③。

参战部队也把它们战斗的标记加到其战旗上，也有部队因为参加了在华战斗而改变了它们的徽记或绰号，如前面提到的两支美国部队美国第9步兵团和第14步兵团。第9步兵团不仅把它的绰号改为“满洲人”，而且把一条爪有五趾的中国龙加到它们的徽记和皮带搭扣上。第14团（“金龙”团）也在其徽记上增添了一条龙。把中国事物吸收到美国部队一直使用着的记忆形式中，是1900年那些历史事件的影响与时俱进的一种方式，这些影响今天还能在这些陆军部队的互联网网站上表现出来^④。

① 有许多物品就被送到了位于查塔姆的皇家工兵兵营和位于卡那封要塞的威尔士燧发枪团博物馆中。

② 见 <http://www.manchu.org/linage/liscum.html>, 2001年5月25日登录。

③ 见 www.25thida.com/14thinf.htm, 2001年5月25日登录。那只潘趣酒碗可以在下面网页上看到：<http://1-14th.com/titusbowl.htm>, 2001年7月1日登录。

④ 在2001年7月1日，可以通过搜索这些部队的绰号而找到它们的网址。

对解救使馆的中国远征行动的记忆，还有着第三种方式，它或许是持久保存军事记忆最常见的方式，这就是建立退伍军人的互助联谊组织。首先建立这类组织的是美国陆军。1901 年 2 月 13 日，查飞将军任命 3 名军官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中国龙军人会”（NARA, RG395, 906, box 4）。到该会建立起来时，入会的不仅有参战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大部分军官，还有其他 7 个国家的军官们。在该会 1912 年发行的一份出版物上，有它收藏的 100 多幅珍贵照片和一份成员名单。每个国家的成员人数见表 3。这些数字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其成员对这一军人会的个人兴趣。到 1912 年，表中前 3 名的国家已经组成了一个对抗沙皇俄国的“自卫”联盟。

表 3 中国龙军人会成员人数（1912 年左右）

国 家	人 数	国 家	人 数	国 家	人 数
美 国	346	德 国	75	法 国	19
英 国	416	意 大 利	35	奥 地 利	1
日 本	302	俄 国	28	总 计	1222

中国龙军人会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一直由美国军官控制。1914 年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该会构成的国际性土崩瓦解了。在 1915 年某个时间，这一组织更名为中国龙帝国会，并且修改了章程。战争结束后，它似乎与美国其他的退伍军人组织——包括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建立起了联系，并且参加了位于华盛顿的无名战士纪念碑的落成典礼。^①

该会本身的这一变化并无特殊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

^① <http://www.army.mil/cmh-pg/faq/memday/90-1-chi.htm>, 2001 年 7 月 1 日登录。



带来的新语汇。它的成员相互间表达友好的致意时，使用“你好，中国人”。有成员去世，就说是到“长城”那边去了。该会主席变成了“大总督”，他的在任期被称为“王朝”，他的总部是“大衙门”。各地方分部的负责人被授予“省级总督”的头衔，而一般成员则是“满大人”。使用这些从清朝官制中学来的名词，不仅和上面讨论的参战部队使用那些名词和徽记的情形有着相同的意义，而且还表现出对清朝知识某种程度的了解，尽管这种了解非常有限。或许，这些语汇是从该会的“文牒总管”那儿了解到的。这是一位名叫琼斯（Enoch R. L. Jones）的人，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该会通讯上发表了有关19世纪末中国历史的记载。这些记载似乎是根据诸如白克好司和濮兰德（O. P. Bland）合写的《慈禧外纪》、《清室外纪》一类所谓“权威性资料”写成的^①。该会采用了一些具有东方特色的语汇，也可以算是罗伯特·扬讨论殖民环境中文化叠合现象时提出的文化拼合体的一个例证了。在这个例证中，“大衙门”可以被理解为一段共同历史的产物，一种人造物品。它紧紧抓住那段共同历史中的某些碎片，以一种夸张的模仿形式再次出现。

最后，还有另外一种记忆也很值得注意。这一记忆也涉及中国龙军人会的美国成员。这就是在中国的实物标志上直接进行文字铭写，以纪念1900年的战斗。1905年4月，已经成为军人会主席的查飞将军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负责选择安放这些标志的地方。次年12月，7块铜制铭牌运到了中国，其中6块安放在美国驻华使馆的入口处，上面刻写着在使馆被围困和解救过程中死去的美军人的姓名^②。

① 这些语汇引自该会通讯。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该会每年至少发行两期通讯。见 USMHI, Lewis L. McKinney file 1898-W-619, Spanish-American War Survey Collection。

② 这些铜牌的照片见 Military Order of the Dragon, ca. 1912。

这些铜制铭牌并不是在中国建立的纪念美国死者的唯一纪念碑。哈耶斯（Webb Hayes）中校在写给军人会的有关这些铭牌安放仪式的报告中提到，天津的英国人社群已经为死去的美国人制作了一块铭牌，安放在戈登堂，一座以“中国的”戈登（Charles Gordon）的名字命名的建筑。我们还会记得，戈登曾经参加了英法联军 1860 年对中国的远征。此外，一座纪念在天津阵亡的美国第 9 步兵团指挥官里斯库姆的纪念碑就立在他倒下的地方。哈耶斯 1908 年到达中国时，这块地方已经属于拓展后的日本租界了。哈耶斯很高兴地报告说，日本人把里斯库姆纪念碑周围的地方建造成了一座公园^①。

新知识、记忆与旅游

1900 年事件纪念碑的建立和维护，和传教士在义和团起义之后的所作所为一样，是使人们忘记文明内部的野蛮行为并且围绕牺牲和勇敢精神来建构记忆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而被编码进纪念碑里的这些高尚的道德情操，又能成为另外一些活动的中心内容。譬如，它们可以成为重新建构的新北京的组成部分。在义和团之后的新北京，除了外交官、士兵、传教士和商人之外，还出现了全新的一类人：寻找最具异国风情去处的国际旅游者。《辛丑条约》签订后几年中，这些旅游者或者从陆路经西伯利亚大铁路或者乘船从上海或横滨来到北京。义和团期间曾经发生过事件的地方以及在北京的各种纪念物，成为制造另一种记忆循环的关键内容。与此同时，这些事件又被置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之中。这一历史，自从 1861 年第一批使馆建立以来，已经生产出了有关北京及其居民的全新知识。

深入考察 20 世纪初世界旅游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扩展，超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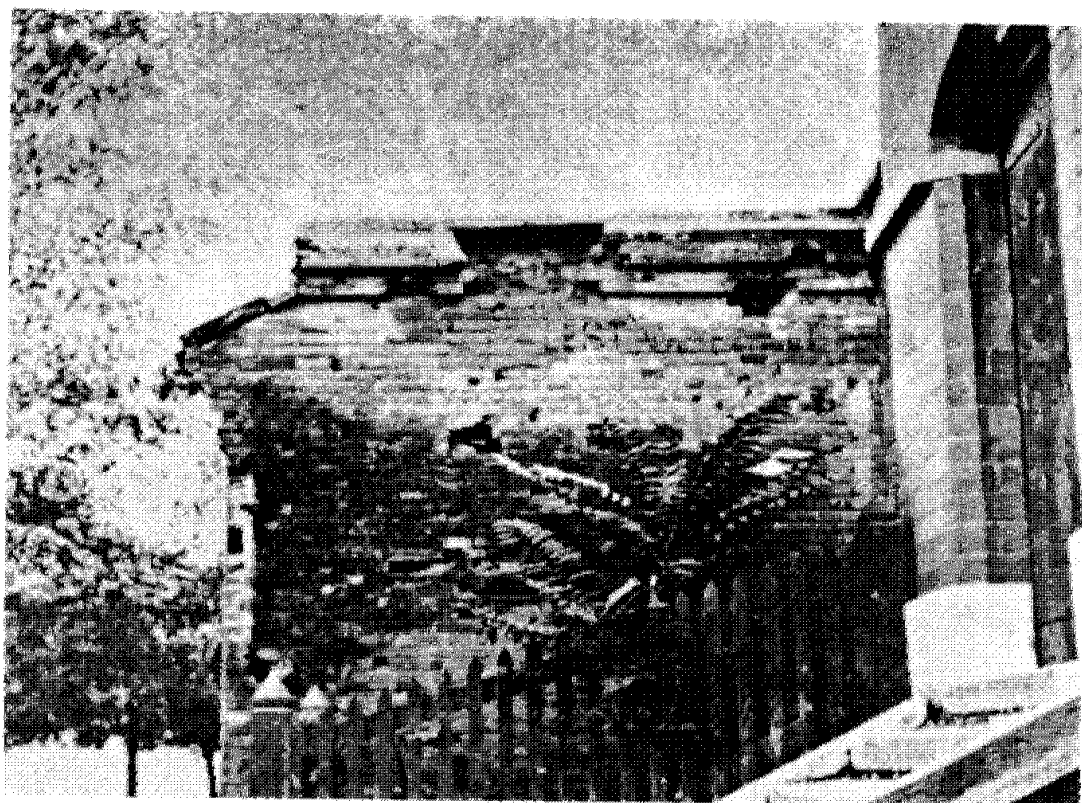
^① 见 *Military Order of the Dragon*, ca 1912: 101 - 105; 也见 NARA, RG92, file214。



了本书的研究范围。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十几年间写成的大量旅游指南清楚地表明，发生过中西冲突的地方是北京观光的重要部分。在最早旅游指南中，有一本是利特尔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写的。她广泛利用了帝国档案中有关北京的知识——包括卜士礼的作品和皇家亚细亚文会华北分会的出版物，来增加这本书的可靠性，使其显得更为真实。

利特尔夫人的这本旅游指南根据游客在北京观光的时间长短，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旅游组织成多条路线。通过这种组织方式，这本旅游指南为重要旅游景点建构起一个级层体系。从空间上看，这一级层体系以使馆区以及使馆区与紫禁城的关系为支撑点。例如，指南告诉游客们，第一天可以穿过克林德牌坊，用一天的时间去参观雍和宫、孔庙和十三经碑林、安定门外的西黄寺、城西北的大钟寺、“可能是史有记载最奇迹般的围困”的发生地北堂和“曾经安放闻名遐迩的天文仪器”的古观象台（Mrs. A. Little 1904: 5 - 6）。第二天，游客可以攀上城墙，了解紫禁城和欧洲人居住区——现在已经几乎全部重建了——之间的地理关系，可以从紫禁城观看欧洲人居住区，也可以从欧洲人居住区眺望紫禁城。然后，他们可以穿过使馆区，去看有关围困的各种纪念物。这些纪念物包括德国使馆里的第二座克林德纪念碑，英国使馆福音堂中的纪念铭牌——其中一块由围困中幸存的美国人赠送以示感谢，还有英国旧使馆的一段断壁残墙，上面有窦纳乐爵士写的“避免遗忘”（图片 38）。很显然，这句话取自吉卜林 1897 年首次出版的作品《退隐》。

如果游客还有时间的话，利特尔夫人建议他们去参观北京城外的景点，其中包括西山，那儿不仅有被义和团毁坏的英国人避暑别墅，还有许多有名的庙宇、宫殿和亭阁。利特尔夫人在简要地介绍这些景点对当地居民的意义（当然是取自她所熟悉的中国学资料了）后，往往会说明它们在 1900 ~ 1901 年那些事件中的重要性。



图片 38 英国驻北京使馆的“避免遗忘”墙

Military Order of the Dragon (ca. 1912).

换句话说，手持利特尔夫人的旅游指南，就能够在一次又一次地穿过哈德门大街上的克林德纪念牌坊的过程中，去追寻义和团和西方军队的活动。此外，根据利特尔夫人旅游指南，还可以看到 1860 年战争的一些重要景点——这是利特尔夫人旅游指南独有的内容——其中包括关押巴夏礼和罗亨利的那座寺庙（Mrs. A. Little 1904: 40）。

在利特尔夫人旅游指南之后出版的那些旅游指南，尽管没有一本完全以义和团为中心，但仍然可以明显地从中看到义和团这一话题以及利特尔夫人的旅游线路。例如，利特尔夫人指南出版的同一年，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旅游指南把北京加入到横跨亚洲的旅行当中。1904 年以后出版的贝德克尔指南中，“避免遗忘”墙、克林德牌坊和清西陵附近的景点都占据突出的位置（Baedeker



1904: 498, 501, 503; 1912: 533 - 534, 536; 1914: 557, 560, 562)。库科 (Thomas Cook) 也不甘落后, 于1910年出版了一本类似的旅游指南。到1917年这本指南扩充时, 又把整个被围困的使馆区和北京及近郊的一些景点加了进去 (Cook 1910: 22; 1917: 13 - 15; 1924: 12 - 15)。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 有越来越多的北京指南问世, 大都继续着这一模式。在其中一本中, 费歇尔 (Emil Fischer) 写道, 在英国使馆大门口附近有一座小方碑, 上面镌刻着使馆被围困的日期: “1900年6月20日至8月14日”。据费歇尔说, 法国使馆办公处的墙上有一些弹坑, 会使人们想到1900年的事件 (Fischer 1924: 16 - 17)。20世纪30年代《北平纪事》出版的北京指南, 虽然重点是介绍北京那些现代 的医院、大学、图书馆、大饭店和商业区, 但也提到了“避免遗忘”墙和德国使馆里的克林德碑 (*Peiping Chronicle*: 1933: 13 - 14)。

到20世纪20年代, 有关北京的大部头著作开始出现。和旅游指南不同, 这些著作多是由一些在北京居住较久的西方人写成的, 旨在记录民国以前北京城市的历史和生活。这些著作当中, 赫德爵士的侄女布瑞登 (Juliet Bredon) 撰写的一部 (1922, 1931) 最为有名。在有关使馆区的一章里, 布瑞登写到了英国大使馆里的“避免遗忘”墙, 并且不时地提及1860年和1900年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同样地, 阿林顿 (L. C. Arlington) 和路易森 (William Lewisohn) 在其撰写的旅行指南《寻找古老的北京》中, 也用了一章来介绍使馆区。他们回顾了1860年以来西方人在北京的历史, 详细讨论了义和团起义, 并且转述了为1860年关押中死去的欧洲人和锡克人竖立的纪念碑碑文的全文。我们还记得, 就是在这块纪念碑上, 刻着“原碑于1900年6月被中国人所毁, 特立此碑以代之”的解释。

作为对历史的重新铭写, 可以把这块石碑看做是本章讨论的所有活动恰到好处的说明。那些有关北京的旅游指南和更为详细的著

作，一遍遍地肯定着欧美列强在中国的活动及其正当性，一遍遍地重复着好意的西方人反而成为中国人排外主义或野蛮行为受害者的论调。就像俄国人墓地中被中国人毁坏的1860年纪念石碑又被重新树立起来所表明的那样，中国人删除或是改造这一历史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新一代的西方人，无论是偶然路过中国北方，还是在这儿长期居住，都会感受到并且逐渐习惯于对华条约使列强公民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地位。

“打旗的那家伙”

本章集中讨论了把1900年事件的意义固定下来的许多活动，特别是建构权威性叙事和利用公共性建筑来制造记忆的那些活动。上面讨论的这些活动，无论是纪念碑的修建，还是把1900年事件纳入各种历史之中，还是旅游网络的产生，都进一步把中国再疆界化。此外，与这一重建秩序过程相联系着的各种意义形式，通过欧洲和北美散布和传播到各个通商口岸，然后又回到欧洲和北美，成为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图标式护符。从实质上看，正是这些图标形成了弗莱明半个多世纪后所说的基本知识的基本素材。与此同时，它们也在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社群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把两者隔离开来。在这方面，北京使馆区就是一个缩影。它的四周现在包围着高高的院墙，而且禁止中国人在其中居住。然而，这一分割并不是绝对的，也有潜流渗过这一界线，并且产生出自己独有的特殊类型的杂交体。这其中比较有意义的一种形式出现在天津，在新建的租界中。

《辛丑条约》允许列强在北京和天津驻扎军队。1912年，美国第15步兵团——因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和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等人曾在该团服役而闻名——在天津的美国兵营里开始了其长达26年的在华驻扎。像天津其他的外国租界一样，天津的美



国兵营当中也定期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在义和团时期死去的人们（Tuchman 1971：99；Bickers 1999：107）。20世纪20年代末，在该团服役的芬尼（Charles Finney）注意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退役陆军士官仍然居住在美国租界。据芬尼说，他们中有许多人和年轻的中国妇女在一起居住。尽管这些人使用驻军的医院和电话局，但他们与兵营里的现役士兵保持着一定距离，并且有自己的私人俱乐部。一个偶然的时机，芬尼和其中一人——军士长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交上了朋友。一段时间以后，史密斯把芬尼介绍进了他们的俱乐部，并且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和史密斯同居的有一个中国妇女，史密斯说她是满人。（Finney 1961：245 - 258）

有一次，史密斯的满族女友为他们做饭，为他们准备热毛巾，为他们上饮料，还为他们的脖子做了按摩。在她做完这一切以后，史密斯对芬尼说：“她还会画画呢。”然后，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幅卷轴。这幅画卷慢慢展开，似乎在讲着一个故事。芬尼对这幅画的描述和史密斯对它的评论，很值得在这里全文引述：“开始的场景是一条河流的河口，炮台上的大炮正在向海面上的军舰开炮。史密斯说：‘你知道，这就是海河河口上的大沽，那些被毁坏了的炮台现在还在那儿。’随着画卷逐渐打开，可以看到外国军队溯海河挺进、与天津的义和团作战并且解救北京使馆的场景。史密斯说：‘我告诉她这些事，她再把它们画出来。那个时候啊，她还没有出生呢。你知道，我可是亲身参加了那一仗。假设那个人就是我吧——打旗的那家伙。’”（Finney 1961：257）

可以看出，这又是另外一种记忆。这种记忆，已经深入到决定要在战争和条约在中国制造出的特权地带度过余生的一小伙老兵的日常生活之中。无论如何，如果认为史密斯军士长只是一个例证的话，那些老兵们也都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都可以实践其各自形式的穿越，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离群索居，和多数外国人保持距离。他们的“他者”身份，他们对外国人和中国人交往中习惯边

界的背离，代表了驻华使馆得到解救之后另外一种形式的回忆和铭记，另外一种形式的跨文化接触。

芬尼的记载展现出一位满族妇女的美妙形象：手执毛笔，专注地倾听一位士兵的讲述，或许是讲他自己的经历，或许是讲他在俱乐部里听到的故事。如果我们像本杰明式的蒙太奇那样去凝神想象，也许能够在一瞬间看到那只手，那只把大沽到北京一路的情景在画卷上表现出来的手。在这里，从大沽到北京的那条在中国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道路，已经成为一条文化叠覆和文化层积的道路。正是这样一个形象（从第一次读到芬尼的叙述后，我始终都没有能够摆脱掉它），以其所具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和义和团起义之后在中国修建的任何纪念碑——它们现在都已经消失了，被革命所铲除——相比，都更持久地一直纠缠着现在。

第九章

被压迫者的回报、 再循环和中国爱国主义

帝国战争及其对清帝国强制性的秩序重建，对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与北大西洋民族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政府在 20 世纪初的改革屡屡失败，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和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的终结。大规模的革命和战争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旋律，而 20 世纪下半叶的突出内容则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历届政府一直都在对付列强的种种阴谋诡计，不过随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列强从外部进行的诸多干涉戛然而止。中国共产党正式废除了所有仍在实施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绝大部分被割让的领土和租界。尽管在华西方帝国主义的时代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但中国与列强之间往往是敌对的关系并没有终止。“大博弈”也没有结束，而是转变为一场冷战，一场极力遏制共产主义从苏联和中国向更为广阔的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扩散的冷战。

很显然，19 世纪的历史事件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和欧美领导人的行动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此外，它们也始终影响着现代中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理解，同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也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的回应。本章试图超越 19 世纪末的这些历史

事件，去探讨它们在中国、欧洲和北美 20 世纪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文化生产中的地位。换种方式说，我想要进一步考察循环的各种模式以及我们讨论过的诸多形式的英国课业在欧美和中国静止下来的那些场所。我的目的在于说明历史是如何被有意无意地嵌入了我们的世界，说明在占领北京结束的一个世纪以后，这段历史如何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来自东方的幽灵

如果……吸食鸦片的嗜好有朝一日像在美国那样在英国流行起来，或许就有理由担心，英国不辞劳苦地为中国种植的这一毒品，最终可能会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找到市场——一种可怕得让人不敢去想的报应，不过也是需要高度警惕其可能发生的报应。

——戈登·卡明（C. F. Gordon Cumming）1886 年

作者是在 1885 年中国之行后写下上面这段警告的。它提到了一段历史，对于像她那样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这段历史不过是极其普通的知识：英国使中国向西方“开放”以及英国所借助的工具——罪恶的毒品鸦片。卡明生活和周旋在基督教道德世界中，她知道欠下的账目通常是要清算的，罪恶将会得到报应。那个时代的中国非常虚弱，还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反击，但遭到中国人报应的担心始终都没有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种不安还没有公开显露出来，只是在不时出现的、偶尔也会使英国各阶层公众难辨真假的外族跨越海峡侵入英国的虚妄想象后面，可以看到它潜伏着的影子（Pick 1993：115 - 135）。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切全变了。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英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毒品



恐慌。

尽管就像卡明 1886 年所说的话所表明的，对外来毒品向英国渗透的担忧至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 (Berridge and Edwards 1981; Milligan 1995; Parssinen 1983)，但 20 世纪 20 年代初发生的那次恐慌，似乎来源于把没落贵族、伦敦剧院舞厅区的社会下层和有色人种联系起来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混杂文化。它的直接起因是几名歌女和女演员由于接触毒品而引起的死亡。据当时的小报报道，所有这些女人都是在黄种人和黑种人的引诱下，死于非法性行为和危害性极大的毒品。另外，对白种女人与鸦片和有色男人搞到一起表示关注的，还不仅仅是些通俗小报。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 的电影《娇花溅血》(1919) 就选择了同样的主题，其中有一些白种女人慵懒地躺在伦敦莱姆豪斯区的鸦片烟馆中的场面 (Marchetti 1993: 32 - 39)。使人们注意到白种女人、鸦片和有色男人这三者结合的，至少按通俗小报的说法，是因为伦敦女人死亡的背后，显然有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一个旨在使白种女人堕落并且破坏英帝国中心的道德力量和肉体力量的大阴谋。这个大阴谋产生于英帝国的边界，也就是大博弈进行的地方，那些既不在帝国范围之内也不在帝国范围之外的接触地带——通常被称作“势力范围”的地区。

这里所讨论的边界地区就是中国及其周边地区，那里种植的鸦片销往广阔的中国市场和全世界。也就是从这些地区，一个犯罪团伙把鸦片走私进英国。这个团伙的首领是一个犯罪天才，一个狡诈的“中国佬”。部分是因为传说中他的聪明才智，部分是因为他那毫无东方风格的穿着，媒体把他称为张“英明” (“Brilliant” Chang)。张于 1924 年被捕，被控犯有持有可卡因罪而被驱逐出境。然而，就像莫利亚蒂教授^①和傅满洲——他们俩也都威胁着帝国中心的稳

① 莫利亚蒂教授是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中的人物，被称为“犯罪界的拿破仑”。——译者

定和健康——等通俗小说中的反面主角一样，张并没有从此消失。据说，张在被遣返中国的途中跳船逃走，在苏黎世、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甚至巴黎等地重操旧业。在此后十多年里，张被描写成为领导着一个“毒品大网络”的“毒品皇帝”，在整个欧洲制造了许多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事件^①。

无论是在通俗报刊上，或者是在西欧和北美那些帝国中心于 19 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社会性展览领域中，这样一些涉及种族、堕落、性属和阴谋的话题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看到对男性有色人种威胁白种女人的担忧，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它只不过是关注被殖民者各种秘密行动的殖民地官员杞人忧天式的担忧在帝国中心的一种再现而已。这个问题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没有把背景置于通常使用的那些殖民地，而是放到了中国新成立的共和国。或许，卡明 30 多年前那段话所涉及的那段历史，事实上要比人们原本料想的更有生命力。

例如，出现了一种想象文学。这类文学和通俗小报一样，骇人听闻地讲述有关性、毒品和东方报应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恰好是青少年英雄故事的反面。这类文学的一位著名作家是沃德（Athur Ward），人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儒默（Sax Rohmer）——傅满洲的创造者。在两部非傅满洲系列的小说——1915 年第一次出版的《黄瓜》^② 和 1919 年出版的《大麻》——中，他就描写过像张英明一样诡计多端的华人罪犯。他们在英国策划各种毒品阴谋，企图诱骗上层社会的贵妇、女演员以及女人气的男人进入吸食毒品的邪恶圈子，以毁坏英帝国高尚的道德秩序。傅满洲系列小说反复宣传睡醒后的亚洲将会威胁白人的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虚幻想象，使得

① 而且，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他仍然还非常有名。对英国毒品恐慌的描述摘自 Kohn 1992。张的故事也见 Parssinen 1983: 169 - 172。

② 《波士顿环球周日报》（*Boston Sunday Globe*）从 1916 年 4 月 2 日至 5 月 28 日连载了这一小说，同年 9 月开始连载傅满洲系列小说。



这类忧虑一直延伸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①。

由此看来，儒默的小说对 20 年代毒品恐慌的预见，似乎来源于卡明所表述出来那一类忧虑（即帝国会给英国带来报应的问题）之中，而这些忧虑又来源于人们对 19 世纪英国与中国交往的那段历史的普遍性理解。如前所述，西方已经生产出一个巨大的有关中国知识的档案，这一档案到 20 世纪初已经形成为有关中国和中国人性格的常识。儒默的小说正是从这一档案中获取知识，来制造有关中国人对西方抱有野心的虚幻想象。同样地，傅满洲系列小说也提供了一个极其有用的定位点，帮助我们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各强大帝国构建之间全球性冲突和竞争的广阔话语中，寻找中国的确切位置。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傅满洲这个“来自东方的幽灵”^②是西方对全球性跨文化关系深刻忧虑的突出标志。同时，在许多人眼里，他也是一个已经被彻底分割成或许不可调和的东方和西方的世界的符号^③。就像儒默笔下那名英勇的英国主人公奈兰·斯密所说的，傅满洲不仅仅是“黄祸的化身”[Rohmer (1913) 1975: 17]，他和那些从外国来到或将要来到西方的大量黄色人种、黑色人种以及棕色人种一道，会像洪水般在西方泛滥，形成巨大的威胁^④。

-
- ① 坚定不移的白人们挫败了这一阴谋。但儒默的小说也清楚地表明，在全球性帝国和帝国资本主义的时代，许多形式的社会污染所造成的威胁从来没有完全被消除。
 - ② 这一表述出自 1975 年金字塔出版社再版的傅满洲系列小说的第一部《阴险的傅满洲博士》的封底。
 - ③ 儒默在 1913~1959 年间共创作了 13 部傅满洲系列的小说，比这样漫长的写作时期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些小说的流传范围及其向其他传播媒介的转换。据傅满洲网站（网址为：<http://www.njin.net/~knapp/FuFrames.htm>，2002 年 6 月 17 日登录）称，傅满洲系列小说已经有世界 20 多种语言的翻译本，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系列广播节目、连环画和棋盘游戏。
 - ④ 儒默极其厌恶地描写了多种族混杂的伦敦，见 Rohmer [1916] 1975: 62。儒默 [Rohmer (1917) 1976: 99-103] 对停泊在伦敦的商船上的老鼠与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人进行了生动的对比。

然而，这一种族形象尽管看上去似乎很有力量，但它本身还不足以解释傅满洲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的亚洲想象中一个最具影响力并且历久不衰的标志性人物 [Isaacs (1958) 1980: 86, 116 - 122; Moy 1993]。无论是要探究傅满洲所构成的威胁的程度，还是要考察他仍在发挥着作用的象征性意义，都需要对儒默赖以组织其前4部傅满洲小说的某些基本的结构性元素进行必要的概括归纳 [Rohmer (1913) 1975, (1916) 1975, (1917) 1976, (1930) 1976]。

傅满洲像他那个“种族”的其他人一样，表现出了标准的中国人性格：聪明机智、奸诈狡猾、对自己和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残忍、勤劳、讲究实际。他还受过良好的教育，老于世故，冷漠无情，傲慢自大，并且置中国一再被西方列强在军事上击败的事实于不顾，坚信他的国家和他自己具有优越地位。也就是说，儒默创造的这个人物，差不多可以说是清朝上层“满大人”惟妙惟肖的翻版，是正直的英国人的对立面。这样一个形象，来源于外交官、领事和清朝海关雇员们的报告，来源于1860年以后洪水般从中国涌出的各种记载和回忆录。此外，傅满洲也像清帝国上层精英的其他人一样，颓废放纵，嗜食鸦片。他兼具女性气质和男性气概，有着能让人失去戒备的魅力。有时，他会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言而有信的人，但也会玩“中国士人生活中常玩的那些幼稚的小把戏儿”。[Rohmer (1916) 1975: 79] 换句话说，他就是巴夏礼和威妥玛等人曾经向其传授过英国课业的那些中国官员的化身。

另一方面，傅满洲（与张英明同样地）又具备一些旧的上层统治者以及普通中国人所不具备的特性。他既掌握神秘的东方知识（例如“印度—中国的戏法”和巫术），也掌握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这两者的结合给了他超常的独特力量，使他“似乎不受自然规律的束缚”^①。这

① 这些本事似乎包括道家炼丹术和喇嘛教巫术。关于后者，见 Rohmer [1917] 1976: 130 - 138；也见 Rohmer [1913] 1975: 16 - 17, [1917] 1976: 49。



诸多因素结合到一起，就使傅满洲所造成的威胁比之相对说来较为直接明了的欧洲人关于东方蛮族入侵的幻想更让人不安，也比“苦力”劳工将在欧洲和北美泛滥的耸听危言更为深刻。他对东西方知识的融合直接威胁到帝国档案本身，因此就有可能破坏帝国的整个结构以及白人在全球的优越地位，使英帝国和其他西方帝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土崩瓦解。

傅满洲挑战的全球性和彻底性极其重要，它不仅仿效英国的帝国档案工程并且产生出对这一工程安全的担忧，而且直接指向在华信息收集网络制造出来的对中国的普遍“误读”，也就是这样一种认识：因为中华帝国在历史上把自己看做是“中央之国”，是天下的中心，所以中国皇帝也就一定会声言要统治整个世界^①。与这种妄自尊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12年在南京成立的西方式的共和制民族国家。但是，傅满洲并没有参与这一改革运动。相反，他是一个复辟派，是清帝国的满大人，因此，他试图对那些羞辱并贬抑中华帝国的人进行报复。换言之，他的计划是要恢复旧有秩序，并且扩大它的统治范围。他要在全世界创建一个“大一统的黄色帝国”[Rohmer (1916) 1975: 162]，第一步先把俄国纳入版图，然后吞并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从而改变权力在知识论帝国中流动的方向，彻底地终结大博弈。

傅满洲要重新创建一个中华帝国，主要依靠手中的两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一个叫做西番的秘密组织。西番的总部设在西藏高原[Rohmer (1913) 1975: 155]，是一架“庞大的秘密机器”，是“神秘东方的神秘之最”。用奈兰·斯密的话说，在这一组织“喇嘛教面纱的后面”，是一个“能以某种形式控制东方人心智的依洛希斯式的神秘组织，它声称其成员遍布整个东方”[Rohmer (1917) 1976: 8,

^① 皇帝的确会自称位居世界其他君主之上，但这种观念与他们的天下观有关，而非个人自大的表现。见 Hevia 1995b; Zito 1997。

19, 67]。它还是一种中央情报机构，傅满洲便是这个机构的情报首脑。傅满洲就以这一身份，通过一些前线组织来实施他的阴谋。所有这些前线组织都取材于对英帝国之内或者边界地区的亚洲和非洲反叛者的丰富想象，它们包括狂热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教派、贩毒团伙、传统的中国秘密结社以及一些极端的反英分子，比如崇拜卡莉女神的印度强盗杀手和身怀绝技、抢劫杀人的缅甸武装土匪^①。

通过这些组织，傅满洲就对各个地区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他侵入了伦敦，帝国最辉煌的中心。然而，儒默笔下的主人公尽管非常熟悉这里的地理情况，他却很少能感受到像在家里那样舒适安逸。的确，傅满洲只能在英帝国中心的地下和周边活动，但他有能力把伦敦变成一个光怪陆离阴森恐怖的异域空间。他动员起各种黑暗的神秘力量，导致其他人产生“可怕的幻象”，会白日做梦，出现“自己感觉的幻想症状”。由于现实变得越来越扭曲，像奈兰·斯密和皮特里博士那样的帝国典范人物们就越来越难于把幻觉和真实区别开来，从而在他们身上制造出一种深刻的认知危机^②。

傅满洲使人们混淆事实和幻觉、破坏白种男人理性的能力，实际上是傅满洲超乎寻常的智力的表现。这种超乎寻常的智力，就是他用以创建新帝国的第二个工具。傅满洲那巨大的大脑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古代东方科学的大师，一个极其狡猾的中国佬，一个操纵各种毒品活动的大毒枭。他还掌握西方科学的百科知识，这些知识是他在欧洲的大学里学到的——而他想学的知识甚至更多！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首先秘密潜入到英帝国殖民地外围，然后再来到帝国

① 据称西番到1930年已经控制了全球的地下社会，见 Rohmer [1930] 1976: 88 - 89。

② 这里讨论的小说有许多这类描述，但第一部小说就已经精妙地勾画出了一般模式。见 Rohmer [1913] 1975: 82 - 92。



的中心地区。在伦敦，他着手暗杀那些对他的密谋有怀疑的人，并且（我认为这或许是儒默疯狂想象中最精彩的部分）绑架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把他们运回“头脑中心”，强制性地榨取他们的知识 [Rohmer (1913) 1975: 140, 154, 168]①。

这些光怪陆离的计划就是那个绝对超常的高智慧天才的产品。傅满洲融古今知识于一炉，能够改变他自己的身体，进行变形。他变形的主要特征，那颗非同一般的大脑袋和那双翡翠绿色的眼睛，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不仅仅懂得如何操纵鸦片和其他那些能够改变人类心智的毒品，而且还能够通过这样的变形来增强他那已经令人敬畏的智慧力。接下去，他会用他那变异的大脑去解开大自然的其他秘密，去创造另外一些像他本人一样可怕的异形人②。

这些虚构的傅满洲的密谋活动，把儒默的描述与大博弈中的各种阴谋诡计、英国在西藏的利益以及异域档案对英国现实中的认知帝国所构成的威胁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类忧虑通常都是和欧洲的那些英国竞争者们的秘密活动有关，但有关傅满洲的描述所关注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档案，担心这一档案可能会在东方漫长的沉睡之后突然醒来，并且试图改变大博弈的方向。如同在傅满洲这个角色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个异域档案并不满足于始终只是东方档案，它也在努力改变自己。它吸纳其他档案，接收这些档案的各种网络，试图以此来扭转信息流动的方向，使之流向远离伦敦的异域中心。然后，它还要在它自身古老的、秘密的知识储藏（这些知识大都尚待英国媒介进行解码）中增加现代技术知识，从而为帝国国家制造出一个不可战胜的对手。

① 在第二部小说中，傅满洲差点就成功地绑架走奈兰·斯密的助手、华生似的角色皮特里博士。见 Rohmer [1916] 1975: 106 - 110。

② 见《邪恶的傅满洲博士》[Rohmer (1913) 1975: 87 - 88] 中与皮特里的鸦片交易；也见 Rohmer [1936] 1976: 113。

像这样一方面是有色人种策划邪恶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是白种男人粉碎其阴谋的故事情节，并不仅仅见于儒默的小说之中。然而，儒默小说的这种想象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不能仅仅把它简单地看做是对黄祸的忧虑。在儒默笔下，一个突然觉醒的中国成了英国掌控亚洲的最大威胁。由于人们普遍担心中国人可能会因为鸦片贸易和西方对华侵略而进行报复，儒默对中国的这种建构很容易被接受。事实上，至少有一部根据儒默早期小说改编的电影中，傅满洲就是因为妻子和家人被镇压义和团起义的联军士兵杀死而开始进行报复的^①。另外，从帝国的网络可以双向流通的事实中，从各种技术和科技知识在非白色种族中的传播所引起的忧虑中，从帝国引起的永无休止的热战和冷战中，傅满洲威胁存在的合理性都能够得到证明。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也许很容易去想象也很容易会相信中国人的阴谋，或者某些聪慧的东方人有可能会把古代和现代的科学知识融合起来。从这样的忧虑向前再走一小步，就会想象出一个能够领导东方反抗西方帝国的中国，首先要赶走那些大博弈的竞争者们，然后从亚洲清除掉所有的殖民政府，把欧洲势力赶回到它历史上所占据的位于广袤欧亚大陆上与世隔绝的西部边缘的那个小小的半岛上。

从异域档案到冷战的遏制政策

虽然可以把傅满洲理解为 20 世纪早期英国对中国担忧的产物，但他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儒默把中国知识和大博弈中那些富有象征性的代表人物编织进傅满洲故事的框架之中，从而确立了一套

^① 片名为《神秘的傅满洲》，1929 年由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主演华纳·厄兰（Warner Oland）后因扮演陈查理而名声大噪。进入 <http://www.njedge.net/~knapp/FuFrames.htm> 网页可链接到该影片，2002 年 9 月 13 日登录。



条目清晰的叙事元素，成为支撑着这一世纪档案国家的一系列虚幻想象的主要素材^①。那些威胁始终是全方位的，追逐的战利品始终都是这个世界，而胜利从来都不是彻底的，危险也从来都没有完全消失。傅满洲可以在一部小说的结尾被一颗子弹击中巨大的脑袋而死去，也可以在下一部小说中重新出现，恢复了他那邪恶的生命。

这类令人可怕的故事所引起的忧惧，与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出现的战后毒品恐慌有关。这种忧惧已经成为我们集体文化的一部分，它向英帝国档案的传人——美国及其北大西洋盟友们——灌注着持久的不安感，感觉这个世界始终都处在混乱的边缘，有着永无休止的全球性危机、外来的恐怖行动以及那些扬言要破坏西方生活方式的恐怖分子。在我们中间有谁还能记得没有冷战的年代？有谁还能记得国家不需要公布紧急状态的时日？有谁还能记得亚洲不被看做全球性威胁的岁月（红色中国、成为老大的日本、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以及新近的包括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的“邪恶轴心”）？什么时候，那种神秘阴谋的感觉不曾是档案国家语言中司空见惯的内容，或者还没有深深扎根于大众文化之中？从雷蒙德（Alex Raymond）的《飞侠哥顿》^②中“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的秘密计划，到电影《血溅太阳旗》中卡格尼（Jimmy Cagney）所揭露的日本称霸世界的阴谋，再到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诺博士》，档案工程与现代化中的东方威胁结合起来的危险一直都是大众意识的主要内容^③。那些秘密计划几乎千篇一

① 儒默的小说现在仍有出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一些新作品在《科利尔》杂志上连载。完整的出版目录见 <http://www.njedge.net/~knapp/FuFrames.htm> under Collier's Magazine; 2002年9月13日登录。

② 这个特殊的变种影响极大，以至于1995年为之发行了一张纪念邮票，“无情的明”在这张邮票上恰到好处地占据了最显著的位置。

③ 我们还记得，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喜欢詹姆斯·邦德；见 Nadel 1995: 157。

律——精神控制、致命的突变技术、秘密侵袭以及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出现^①。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十几年后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对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的忧惧再次被激活。在这一过程中，傅满洲叙事又东山再起，为刚刚过去不久的冷战文化及其全球性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注入了新的活力。阴险的傅满洲博士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自我复制，复制出的傅满洲化身继续破坏着白种男人的精神健全和智慧力量。在小说和同名电影《谍网迷魂》中，一个“像傅满洲一样微笑着的”中国共产党的巴甫洛夫心理学家，给美国在朝鲜的战俘“洗脑”，让他们“做那些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情”^②。在电影《从地心攻击》（1967）中，红军在一名中国官员模样的人的领导下，发明了一种核动力钻孔设备，在太平洋、美国所有的大城市和军事基地下面挖掘隧道。在电影《檀岛警骑》中，中国共产党的特工人员何发在越南战争期间策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全球阴谋。不过，这些阴谋都被奈兰·斯密的转世化身、影片中的史蒂夫·麦格雷特所挫败^③。

在此同时，在中西接触历史中名副其实的倒退时期，卡尼夫（Milt Caniff）的每日连载漫画《斯蒂夫峡谷》、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证人们以及一些“权威性”出版物，其中包括联邦毒品与麻醉品管理局首脑和美国亚洲劳工联合会的一名代表的作品，都指控红色中国已经成为鸦片和海洛因国际交易的中心。他们声称，其目的是要把毒

① 英国人对于秘密侵袭的担忧，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关于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的讨论；见Pick 1993。

② 在影片中，心理学家阎罗夸耀他控制美国人精神的力量，而马尔科少校与傅满洲和难以启齿的恶行有关。卡登（Richard Condon）1959年的小说也与儒默1936年的小说[Rohmer (1936) 1976]有某些类似的地方。

③ 附带说明一下，在《谍影迷魂》和《檀岛警骑》中扮演东方阴谋家的迪耶格（Khig Dhiegh），在1978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出演的影片极少。但在1989年北京学潮之后，他又有短暂出现，在梁衡和夏皮罗（Judith Shapiro）罗曼史的电视版《中国之夜》中扮演无情的书记。



品当作一个谋求世界霸权的手段来毒害西方^①。在一个弥漫着把中国妖魔化、对污染的忧惧以及对红色中国科技的焦虑的氛围中，傅满洲本人又再次出现在1965~1968年间英国制作的5部电影之中^②。

更为晚近一些，随着苏联解体和人们对大博弈历史重新发生兴趣（Hopkirk 1992, 1995），来自已经死去的傅满洲身上的那些修辞，又成为表述来自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西方威胁的极其有用的方式。高居哈佛大学俄林基金会主席职位的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就怀有一个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白日噩梦。他认为，一个既有自制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又不受法治约束的“儒教—伊斯兰教”同盟，对西方文明构成了威胁^③。与此同时，在小说《太平洋霸权下的和平》中，克兰西（Tom Clancy）的合作者皮尔岑尼克（Steve Pieczenik）对中国的“中央帝国情结”与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经济结合起来而产生的后果忧心忡忡。就像儒默可能会说的那样，“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场究竟哪一种道德、伦理和宗教的哲学，是东方的哲学还是西方的哲学将最终支配这个世界的竞争。”^④ 另外一些人，比如伯恩斯坦（Richard

① 见 Caniff 1987: 118, 127;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he Improvements in the Federal Criminal Code of the Committee in the Judiciary, U. S. Senate, 84th Congress, 1955, especially vol. 3: 739, vol. 8: 3894 - 3899; Anslinger and Tompkins 1953: 10 - 11; Deverall 1954。麦考伊（McCoy 1973: 145 - 147）在其有关海洛因贸易的权威著作中，推翻了以上这些著作中的所有主观臆测。这些指控不仅仅是反共宣传，还非常可能是中央情报局为了保护它的情报人员网络——其中有些人从事毒品贸易——而有意进行的虚假信息活动。

② 这5部影片是《不死的毒王》（1965）、《傅满洲的新娘们》（1966）、《傅满洲复仇记》（1968）、《傅满洲之血》（1968）和《傅满洲的城堡》（1968）。

③ 在后来发展成一部著作的最初文章里，亨廷顿的标题后面有一个问号（Huntington 1993）。到1996年，他原来可能怀有的疑虑和这个问号一起消失了。

④ Pieczenik 1995: 153。事实上，儒默也确实多少表达过这层意思；见 Rohmer [1913] 1975: 86。傅满洲的失败，是因为尽管他有着非凡的大脑，能够仿效英国同类社会圈中的某些品质（勇敢、守信），但他却低估了英国人的阳刚气概和那个社会圈的忠诚和道德。

Bernstein) 和芒罗 (Ross Munro), 也表达了对于美国和掌握尖端军事科技并向外扩张的中国之间发生一场“即将到来的冲突”的忧惧 (Bernstein and Munro 1997)^①。这些作家都认为, 冷战根本就没有结束, 依然有必要遏制来自东方的危险, 需要使用更多更好的知识来防御新的中国“威胁”。由此看来, 正如那些勤奋的英国媒介在19世纪建构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始终没有多少变化一样, 档案国家的工程也是如此。它们一成不变地团结在一起, 似乎永无休止地重复着儒默小说的基本情节: 异域档案的危险性和坚决遏制它的必要性。即使是那些可能会拒绝傅满洲重新出现的人, 那些了解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历史的人, 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必须让中国人知道“扩张没有好处”^②。

再 循 环

如果说, 欧美在中国的暴行所得到的回报, 是傅满洲的邪恶形式困扰着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 那么, 其他形式的回报和循环就与19世纪在中国确立的政治经济模式相关联。这里, 我想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来说明中国一浪又一浪的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历史, 是如何继续被层积并叠覆到当代欧美文化之中的。我首先讨论《北京55日》, 这是一部1963年发行的关于解救各国使馆的影片, 在美国经典电影有线电视台定期播放。然后, 我将考察圆明园的劫掠

① 伯恩斯坦是《时代》(Time) 杂志1989年驻北京的通讯记者; 芒罗是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和人权组织亚洲观察的成员。

② 这句引文出自李洁明 (James R. Lilley) 的一篇文章, 李是前中央情报局驻北京的负责人, 1989~1991年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这篇题为《“傅满洲”问题》的文章见 *Newsweek*, 24 February 1997: 36。同时, 李洁明非常推崇《太平洋霸权下的和平》, 认为很少有人能像皮尔岑尼克 (Pieczenik 1995) 一样, “用戏剧形式表现东西方的长期冲突”。



物品通过拍卖市场在欧洲和亚洲散布的现实情况。

《北京 55 日》拍摄时，正值美国出兵越南的前夕，也正是好莱坞不惜血本制作史诗片的时期。在影片中，赫斯顿（Charlton Heston）饰演美国海军陆战队派驻美国使馆的指挥官马特·路易斯少校，奈文（David Niven）饰演英国公使亚瑟·罗伯逊爵士，罗布森（Flora Robson）饰演慈禧太后，加德纳（Ava Gardner）饰演娜塔莉·伊万诺夫男爵夫人，是路易斯少校逐爱的对象（这可是一部好莱坞影片）^①。尽管电影中有关种族与性属的处理大有可以商榷之处^②，但我在这里所关注的，是该影片如何简洁地向另一代人重现欧美对中国和亚洲的教育工程的。进行这类规训的关键时刻，或许就发生在使馆被围困前亚瑟爵士与慈禧太后之间的一次交涉当中。

这次交涉发生在紫禁城的一座宫殿里。尽管这只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件，但情节场面的处理都像确有其事一样忠实于英国人对 19 世纪中国的认识。亚瑟爵士走向前去，觐见清朝太后。像吴士礼一样，他直接走到御座前面。在交谈之前，他先优雅地用皮靴尖把一个精美的垫子移到旁边——英国公使不会在东方君主面前叩头，然后泰然自若地与太后彼此寒暄一番。亚瑟爵士前来觐见是要对义和团杀死德国公使提出抗议的，但未等他开口，慈禧太后就向他指出，义和团一定会得到处置，但中国人的愤怒却不会消失——西方列强做得太过分了。外国的船舰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外国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要塞，外国的商人掌握了中国的银行，外国的上帝

① 影片由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导演，联艺公司发行。影片在西班牙的一个摄影棚中拍摄，比较逼真地再现了使馆区和紫禁城的城墙。关于冷战和好莱坞影片的讨论，见 Nadel 1995。

② 男爵夫人有一位中国情人，是最终使她被杀害的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一个中国妇女和美国军官生下的女儿，在使馆被围困的过程中成为了孤儿。在影片最后，尽管路易斯少校此前曾经表示过异议，但是当海军陆战队在解救使馆后从北京撤退时，他还是带走了这个孤儿。

也冒犯了中国祖先的神灵。她说：“人们起而反抗，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她又补充说，中国就像一头任人宰割的牛，外国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挤它的奶，而是想把它分而食之。亚瑟爵士非常有礼貌地聆听着，接着便开始给慈禧上课：义和团的暴力反抗并不能解决问题，尤其是“中国已经领教过西方人维护和平的艺术了”。如果中国能够忍耐，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中国如果不能忍耐了呢？”太后问。亚瑟爵士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能忍耐，如果使用暴力和焦躁急切的意见占了上风，那么，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流血，痛苦就会持久地存在下去。”

慈禧太后没有听从这一意见，也没有从中学到什么。相反的，她建议各国使节撤离北京，以保护自身的安全。亚瑟爵士退下后返回使馆，并向其他公使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各国公使投票表决，同意撤离北京。美国弃权——美国公使说，美国在中国没有租借地，美国也不想取得租借地。在这种情况下，亚瑟爵士再次上课。他使得其他公使们相信，如果他们留下来并且保持团结，就能够维护中国的和平，甚或是整个世界的和平。最后，他被证明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影片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怀疑英国立场合理性的路易斯少校，最后不仅承认亚瑟爵士是正确的，而且认为，有一天或许其他人也会记住这一课。

这一课当然是19世纪的教程，但如果考虑到核时代的全球性冷战造成的紧张局势和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遏制，它所传达的信息就非常清楚。中国依然不会忍耐，中国历史悠久的排外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者那儿又获得了新的动力。因此，白种人很有必要学习亚瑟爵士和路易斯少校。如果生活在核时代的一代人忘记了怎样才能坚定不移，可能真的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流血，痛苦真的就会持久存在下去了。

尽管如此，至少还有人承认，中国所遭受的苦痛并不是一种虚幻的想象，列强确实曾经挤过这头牛的奶，也确实曾经想把这头牛分割掉。但是，在英国博物馆的陈列中，或是在国际拍卖市场上，



却很难清楚地看到类似的承认。在那里，不带任何歉疚地展示和销售着来自中国的劫掠物品。换言之，被去疆界化了的清朝宫廷物品和北京权贵豪门的艺术品，通过市场机制和博物馆的惯常方式在西方继续被再疆界化。在本书自1986年开始的15年研究过程中，我曾经见到、读到或者听到过大量1860年和1900年在中国劫掠的物品，并且发现其中有些物品在出售或者在博物馆中展出。现在对其中一些物品进行分析研究。

前面提到过，现在已经很难确定1900年劫掠物品的下落。然而，有些劫掠物品以军队战利品的形式，被陈列在位于卡那封城堡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博物馆和位于西点军校的美国军事研究院中。毫无疑问，在欧洲和北美洲的其他一些军事博物馆中，也会有着类似的收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战利品被陈列在军事基地。悉尼的花园岛海军船坞藏有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赠与中国皇帝的一尊加农炮，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中藏有一口青铜制的寺庙大钟（Nicholls 1986：127 - 129）。在美国，诺福克海军船厂陈列着一门清朝军队的野战炮^①。

似乎无处不有的1860年的劫掠物品，恰到好处地弥补了可以确定为1900年北京劫掠物品的“匮乏”。英国查塔姆皇家工兵博物馆里安放着一把中国皇帝的御座，是神奇的基督徒“中国的”戈登送回英国的。1987年我第一次见到这把御座时，它陈列在军官食堂的一个中心壁柜内，外人观看需要事先得到批准。现在，这把御座已经被陈列在博物馆内，对公众开放^②。在维多利亚与阿尔

① 见 <http://www.nnsyl.navy.mil/History/SEMIAUTO.HTM>，2001年7月11日登录。也可以通过网站购买这一时期的纪念品，如 [Http://www.collect.at/boxer-rebellion.htm](http://www.collect.at/boxer-rebellion.htm)，2001年9月13日登录。1997年，我曾发现有网站拍卖据称是义和团时期刽子手使用的刀；见 www.auctions-on-line/wallis/auction/b970429/page69.html，1997年10月28日登录。

② 西蒙·琼斯（Simon Jones）1992年6月12日私人通信。

伯特博物馆和其他一些博物馆布满灰尘的档案中，可以找到把“来自中国皇帝的圆明园”的物品作为遗产赠送给博物馆的记录。还有一些记录表明，皇家工兵博物馆曾在1912年把一个御座衬垫带到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与该馆所藏的御座衬垫进行比较^①。此外，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还藏有好几把御座，其中包括一把红漆御座，据说是乾隆皇帝的御座。博物馆于1922年购进的这把御座，显然是1900年从北京城外南苑宫殿中得来的。维也纳民族志博物馆藏有与其配套的红漆屏风^②。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还收有来自北京的藏书以及《皇朝礼器图式》——一部1860年取自圆明园的有关礼仪器具和冠服样式的图解书——的许多书页。尽管直到1998年，这些博物馆的展室里都很少看到写有“来自中国皇帝的圆明园”的说明文字^③，但查询档案还是可以确定还有其他一些物品也来自圆明园^④。

把来自中国的劫掠物品陈列展出的并不仅限于英国的各种机构。前面已经提到，巴黎城外枫丹白露皇宫的欧仁妮皇后中国博物馆重新恢复并对艺术品鉴赏家和旅游者开放。1861年《伦敦图片新闻》绘画的物品（见本书第四章）的原件都可以在该馆馆藏中找到，其中一件文物还被印制到明信片上。有关“璐蒂”——一只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北京狮子狗——的故事甚至还在继续流传，

① 见 Victoria and Albert Acquisition Records, “Miss Gordon file”。我于2001年6月24日参观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时，博物馆陈列着那个御座衬垫，它是维多利亚女王逝世100周年纪念展展出的展品。

② 见 Clunas 1991: 44 - 50, 1994: 336 - 338; Nominal File; J. P. Swift,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Registry。

③ 一个例外出现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逝世100年的展览上，上文提到的御座衬垫和一件景泰蓝冰鉴被标明来自圆明园。

④ 例如，大英博物馆1987年曾向女王借用了一件玉制佛经（OR. 54）和几本书，包括《十全记》（乾隆时代的十大战事，OR. 1234），该书于1872年登记在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还有乾隆时代的御玺（T. 80474/04）。



不仅古登 (Rummer Godden 1977) 把这个故事作为她写的北京狮子狗历史的中心点缀, 而且在斯马伦 (Ivor Smullen 1991) 新近为新加坡航空公司飞行杂志《银剑》写的一篇文章中, 也提到了璐蒂。璐蒂出现在这一杂志上或许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尤其是考虑到这一杂志的目的在于刺激旅游者能在亚洲市场上购买到精美物品 (就像来自圆明园的那些物品) 的欲望^①。

事实上, 圆明园劫掠物品不断出现并制造出新闻恰恰就是在市场上。19世纪开始出现的从私人收藏流向市场的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1988年, 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掉一些它标注为“来自北京圆明园的原画”, 并且附有这些画于1863年在伦敦首次出卖时的文字说明, 作为它们来历的证明。实际上, 这些画是《皇朝礼器图式》的一些书页。它们的建议起拍价为8万到10万英镑^②。1993年, 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一只白玉碗, 据称是通过一个美国私人收藏从1860年英国远征军第一师指挥官米歇尔爵士的遗产中得到的, 它的索价在15万到25万美元之间^③。一年之后, 佳士得拍卖行又拍卖“戈登”香炉, 最后卖得2万英镑^④。甚至就在最近,

① 感谢塔尼·巴劳 (Tani Barlow) 向我推荐斯马伦的文章。恩隆 (Enloe 1989) 和特若昂 (Truong 1990) 很好地考察了新殖民主义和通过《银剑》一类杂志来推销的旅游业之间的联系。

② 见 Sotheby's 1988: 34-39。根据拍卖品目录提供的证明文字, 这些画第一次出售是1863年2月4日, 卖主为普迪克 (Puttick) 和辛普森 (Simpson), 买家为托马斯·菲利普斯 (Thomas Phillips) 爵士。感谢克雷格·克伦纳斯 (Craig Clunas) 使我注意到这次出售。

③ 感谢韩书瑞 (Susan Naquin) 告诉我佳士得拍卖行于1993年12月2日在纽约进行的这次拍卖。

④ *Daily Telegraph*, 12 November 1994。这件物品可能是威尔弗雷德·匹克博物馆1929年处理其馆藏时出售的同一件物品。这次出售的通告实际上刊登于7月2日的《中国快讯》(*China Express and Telegraph*)。感谢毕克思 (Robert Bickers) 告知我这一信息, 他还注意到据称来自圆明园的物品在两次大战之间出现在《泰晤士报》的私人广告中。

在香港佳士得拍卖行 1996 年举办的“宫廷物品拍卖会”上，仍然有被认为来自圆明园的物品。根据吉林厄姆（Michael Gillingham）发表在《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上的文章，其中部分物品曾经出现在 1915 年伦敦伯灵顿艺术品博览会上。吉林厄姆说，那次展出还包括 1900 年从北京得到的一个玉制马和一个玉制水牛，它们现在藏于剑桥大学的菲兹威廉姆博物馆^①。

最后，佳士得和苏富比在香港的拍卖行 2001 年举办了第二次“宫廷物品拍卖会”^②，其中有 4 件物品来自圆明园。两件青铜制动物头像（青铜猴头和青铜牛头）原来安放在乾隆皇帝委派耶稣会传教士修建的圆明园欧洲建筑前面，是大水法的十二动物生肖头像的一部分。这次拍卖被证明是一根导火索。被激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要求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撤销这些物品的拍卖。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以后，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内地的公司参加拍卖，并且以超过 600 万美元的价格购得这 4 件物品，超过底价的 3 倍。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执行董事罗嘉彤（Carleton Rochell）竟然把这次交易和意料之外的丰厚收益看做是劫掠物品被送回中国的一个范例（*New York Times*, 29 April, 1 and 3 May 2001）！那些认为市场原则至高无上的人士，无疑会为罗嘉彤的评论而大声喝彩。

而我则更愿意认为这只不过是最近的一次英国课业：如果中国愿意支付高价，这些宫廷珍宝就可以被“送回”。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授课，不过事实是，除了 1900 年来自尼亚加拉瀑布城的李鸿章的汤匙和法国政府拒绝接受的物品（见本书第六章）这几个特例而外，几乎没有一件物品不是通过带有敲诈性的市场返

① 见佳士得拍卖行目录 *The Imperial Sale, Hong Kong, 28 April 1996 (1996)*; *Daily Telegraph*, 19 April 1996, 18。

② 两家拍卖行拍卖圆明园流失文物的时间为 2000 年。——译者



回中国的。据我所知（如果我的知识是错误的话，我会很高兴），自1901年以来，只有一次流失文物真正被送回中国的事例，它发生于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5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庆典中，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总理把德国军队1900年掠夺的义和团旗帜和其他一些古代器物交还给周恩来^①。然而，在流失物品回归中国的暗淡记录中的这唯一一次例外，并不能减轻最近几代中国人的国家耻辱感。

国耻、解放与中国爱国形象的建构

当代欧美人或许既可以炫耀也可以忘却他们的过去，而中国人则没有这样可资挥霍的历史。1900年北京被占领，使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对清朝主权的侵犯达到顶点。它后来被证明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看来，中国人从中学到并且记住了一些教训。再也不可能为虚弱的清朝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了，清朝主权的物质力量和象征力量都已经被西方列强彻底摧垮，不再是一个可以独立生存下去的政治实体了。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就像其他殖民环境中的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知识分子也建构起一种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虽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但仍然接受了“后启蒙理性主义思想所创造的知识体系”，因为这一体系赋予了欧洲人获取“力量与进步”的属性（Chatterjee 1986: 50-51）。确切地说，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英国课业的功效，也说明西方向中国的渗透，与向亚洲其他地方和非洲的渗透一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因为它证明了这样的逻辑：中国人不具备类似的属性——客观证据就在那儿，在大沽炮台的废墟之中；而且，正如义和团所表明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创

^① Felber and Rostek 1987: 43; 柏林自由大学余凯思（Klaus Mühlahn）的私人通信。

造出这样的属性。如果中国想摆脱外国压榨的枷锁，恢复“主权权利”，它就必须建立一个有着新国民的新中国（Wright 1968：1 - 4）。中国人思想意识的这种殖民化，导致的不是反叛，而是革命，是一种从英国课业中得出的、全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民族主义者们谋求历史变革的核心是两个相互联系的理念，两堂学得很好的课业。第一，西方的帝国国家之所以能在中国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们拥有优势的军事技术，这不仅造成了清政府接二连二的军事失败，而且也使全体中国人感到耻辱。从这里得出了第二个理念，中国许多年轻的进步思想家认为，中国要重新获得尊严，不仅要摒弃它陈旧过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式，还要拥有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以保卫自己，并以此逐渐培育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这样两个要素——获取军事技术和消除民族耻辱感——像一条线贯穿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始终。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理念表明，中国人已经明白，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是在那以后，显然都是蓄意要羞辱清朝皇帝和中国人民。换句话说，前面几章所论述的列强以象征为目标的战争，实际上并不是、也不能被解释为偶然的、毫无联系的暴力行为，而是精心策划的手段，目的是要贬抑清朝统治者和人民，并且教育他们不要藐视这些特殊的外国人。秋瑾，一位早期的革命女英雄，以及其他一些经历过1900~1901年北京被占领的耻辱的人们，肯定也都有过这样的理解（Spence 1982：84）。

帝国列强所讲授的课业被学会了，不过学习方式可能与帝国列强想象的方式有所不同。就像柯文所指出的那样，在义和团起义之后不久一段时间里，“国耻”一词就被中国民族主义者们用来在反帝运动中争取广泛的支持（Cohen 1997：242 - 243）。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世纪之交的改革者们，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利用了中国人的屈辱形象。更有意义的是，就这两个人来说，他们的耻辱感在看到来自圆明园的劫掠物品在美国和法国的博物馆公开展出时，变得更为



强烈——梁启超 1893 年到过纽约^①，而康有为在义和团起义几年以后到过巴黎。梁启超写下了羞耻感（汗颜），康有为则谈到让他伤心并深感痛苦的创伤 [Yuanming yuan (YMY) 2: 17, 158 - 159]。正是这样一类体验，使康有为组织了“知耻会”（Spence 1982: 47）。

这种集体耻辱感和个人痛苦可以通过各种直接的行动得到发泄，比如抗议游行，或者清除屈辱标志的积极行动。举例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战败之后，克林德牌坊被迁至午门西南面的中山公园，改而纪念孙中山 [Arlington and Lewisohn (1935) 1987: 150]。到 20 世纪 20 年代，通过贯串全年的一系列纪念日，国耻又被普遍地制度化为一种集体性忧患意识（Steve Smith 2002: 78, 197）。学校和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公认的此类纪念日多达 24 天。从 1 月到 11 月，每月都有两天或三天是国耻纪念日，其中包括西方列强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和《辛丑条约》的日子，中国领土被租借给外国的日子（如威海卫被租借给英国的日子），有游行被杀害的抗议集会的日子（如上海“五卅惨案”），以及外国列强在 1860 年和 1900 年进驻北京的日子（NARA, RG127 - 38, box 3）。作为一种公众纪念的形式，这些国耻纪念似乎为建立一个现代的中国民族意识提供了基础。新的历史自我，新的民族自我，无论是一个个体的还是一个集体的，都会是一个强有力的、纯粹的、富有牺牲精神的反帝形象，一个超越历史耻辱并要求收回中国主权的反帝形象。这一比生命更为伟大的形象，后来成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男女们的典范。

由此来看，国耻和由此引发的反帝思想的基本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核心因素。毫无疑问，人们可以认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基础的，正是争取从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耻辱中得到解放所造就的团结一致精神。1949 年 9 月 21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前一个多星期，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① 梁启超到纽约的时间应为 1903 年。——译者

第一届全体会议发言时，把他讲话的标题定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且补充说中国“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Mao 1977, 5: 17）。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实行冷战“遏制政策”，这样的象征性表达形成大量的文字宣传和视觉宣传。在支配中国公共空间长达 20 多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骄傲地蔑视帝国主义挑衅的人物形象（图片 39）。

我不知道每月都有的国耻纪念日是否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不过，在铭记和超越所谓百年屈辱的基础上形成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强有力的反帝基调，显然已经成为大众艺术、学校教材、广播、电影和后来的电视中最常见的主题。此外，19 世纪的中国历史被划分成两个阶段，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为近代史，而 1919 年以后的历史为现代史。后一个年代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意识的产生，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其高潮。

在这一历史分期内部，中国历史学家以毛泽东关于西方帝国主义性质的一些论断为指导，把清朝失败的故事改造成为中国农民和爱国官员英勇反抗西方入侵的历史叙事。在这一过程中，制造出了另外一类殉道者，那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献出生命的烈士们。这样形成的历史，成为英帝国历史学——包括受其影响的学者——的反叙事。总的来说，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学家大都批评这种反叙事，认为历史事实被硬硬地塞进到为政党—国家服务的意识形态框架或者神话框架之中^①。然而，应该说，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立场中，有许多要素很难予以忽视，而且这些要素至少可以在美国的反帝历史学中——这一历史学，从马克·吐温一直伸展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反越战运动——找到某种程度的共同点^②。

① 后一种评价在费维恺的著作（Feuerwerker 1968）中有很好的表述。近年，柯文（Cohen 1997）也讨论了对过去的神话化。

② 对于东亚地区，我特别想到了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他们既同情中国革命，也批评美国的太平洋政策。



图片 39 将美国和国民党坦克踩在脚下的社会主义英雄战士

在中国历史学家当中，可以在胡绳的著作里找到这种强烈而响亮的反帝基调。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Hu 1952, 1955）可能是这类著作在中国以外最有影响的一部。这部著作对西方列

强、清朝政府以及与它们“勾结”在一起的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严厉而尖刻的批判。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这类反帝思想一直都十分强烈，而且以英文和其他欧洲语言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例如，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撰写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一书的内容（Compilation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Series 1976），与胡绳此前出版的著作就非常相近，而且与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其他史书也一脉相承。书中大量使用毛主席语录，对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及其走狗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些著作尽管看上去有些老套，但仍然可以被读作真正的蔑视的表现，一种被法农认为是打破殖民主义精神枷锁、实现解放的过程的一部分蔑视 [Fanon (1963) 1966]。在这里，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被殖民者造成的普遍屈辱，被转化成为一种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东西，一种推动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被压迫人民站立起来的力量。在这些著作的英文版和中文版中看到的有关国际阶级斗争的战斗性语言，或许仅仅是某种象征性暴力，但其真实性和有效性丝毫不逊于列强1900年进行的象征战。这类语言在欧洲和北美也产生了影响，引起了对共产主义者支持的“第三世界”革命的诸多忧惧。

这些作品之所以引起注意，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咄咄逼人的批判性。在许多方面，它们的论述都直接借助欧美帝国档案，大量引用英国议会文件（蓝皮书）和个人回忆录等。有关义和团起义的研究引用了兰道尔、辛博森和绿蒂等人的著述，比如外文出版社编写组的著作就引用了瓦德西元帅对所有8个国家的士兵和非军事人员在北京大肆劫掠的记载，来强调说明，无论从哪种意识形态框架来分析，对北京的占领都具有重要意义（Compilation Group 1976: 67, 79, 81, 90-96）。稍后，我还会再来讨论使用西方资料的问题，这里只需指出，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结构可以提出批评，但无论如何，他们都知道如何利用欧美帝国档案来支持他们的反帝论述。



毛泽东时代的史学编纂还有另外一点值得注意。它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与新近出现的被称作后殖民研究的现象有着某种共鸣。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以在1968年出版的名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学》(Feuerwerker 1968)^①的论文集中找到。这本论文集集中的文章几乎都是西方历史学家撰写的，对共产主义中国历史编纂的缺点和非历史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回顾。但其中至少还有一个声音来自中国，这就是刘大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杂志编辑（应为副主编——编者注）。他的文章的两点看法值得注意。第一，西方历史学家一直把欧洲置于世界历史的中心，而把世界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都看做是落后的。第二，他注意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的基础，是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的观念。刘大年告诉读者，这些习惯看法——欧洲中心论和种族化的世界观——是欧洲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主义的产物（Feuerwerker 1968: 364 - 365）。这类观点并没有消失，尽管到1968年，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地区已经从欧洲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

在被证明是中国现代历史另一个转折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胡绳、刘大年和编写组的著述中这种尖锐的反帝思想仍然十分突出。就像柯文指出的那样，在1966~1976年持续了整整十年的内部斗争中，诸如义和团运动这样的历史事件就能够被用作一种有力的武器。里通外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务和走狗一类罪名，与对待义和团或者其他群众运动——包括反对刘少奇的运动、批孔运动以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运动——的所谓态度相联系，被随便加以运用（Cohen 1997: 261 - 288）。义和团的历史确实曾经为了现实政治运动的需要而被扭

① 尽管这些文章对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编纂提出了许多批评，但并没有对研究中国的西方史学家所使用和偏爱的史学方法、理论框架或者叙述结构进行任何批评。

曲，但在这些运动中，义和团作为农民无产者英雄的形象却特别有力。当中国将要遭受欺凌羞辱之际，义和团挺身而出，挽救了中国。在全球冷战的气氛中，在与美国军队在中国边境作战的情况下，义和团反帝斗争中的爱国信息对所有人来说都必定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宣告终结。反对帝国主义的尖锐音调逐渐减弱，并且发生了改变。就学术界来说，这意味着对19世纪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义和团一类反帝民众运动，开始进行新的、更为深入的分析。在随之出现的各种论著中，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意义以及由此延伸而来的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斗争的性质、意义，进行了探讨、争论和再研究^①。

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非常不同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历史学中那种一元的意识形态结构被消解了。例如，路遥（1987，2000）尽管没有完全放弃义和团刀枪不入的仪式是一种迷信的观点，但他已经不再把义和团的各种思想简单地划分为进步的或者封建的。相反，他把义和团信仰置于中国民间宗教的背景中，以期对它们获得更为全面的理解。这种做法与周锡瑞和柯文把义和团人性化的努力，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在其他一些研究中，年轻一些的学者试图赞扬传教事业，认为它在高等教育、医药和自然科学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王立新 1997；陶飞亚、吴梓明

① 例如，在山东大学，一些研究者对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区域进行了口述历史调查和文献考察，其中部分资料由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于1980年整理发表。他们还领导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并且于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组织了3次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的出版物见《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集》（1982）；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讨论会论文集》（1992）；苏位智、刘天路：《义和团研究一百年》（2000）。最后一部书包括500页的有关义和团的中文、日文、韩文、英文、法文、俄文和德文的资料目录。在山东大学举办的1980年讨论会论文的优秀翻译见Buck 1987。徐绪典（Xu 1981）和包德威（Buck 1991）分别对1980年和1990年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讨论。



1998)。然而，即使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这样一些重新评价，爱国的反帝精神并没有就此消失。这一时期，中国义和团研究的主要基地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出版了《八国联军侵华史》一书。在有关1900~1901年列强占领华北历史各种语言的著作中，该书是唯一最为全面的一部。合著者李德征、苏位智和刘天路降低了胡绳著作中激愤的音调，但在大量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原始资料的支持下，对西方的暴行进行了同样严厉的指控。

上面讨论的历史解说方面的转变，以及李德征、苏位智和刘天路的著作所体现的、能够维持中国近代历史主线的以经验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与其他实践领域中的各种发展有着一致的方向。驱动和推动这些发展的，是毛泽东去世后掌权的新一代领导人所实行的改革政策。在这一生机勃勃的变化过程中，就像欧洲和北美的民族国家一样，政党国家本身也“把民族的生活盗挪进国家的生活之中”^①（Chatterjee 1986: 161），成为生产、保存和修复国家历史的主要角色。国家不仅保护紫禁城、天坛和颐和园等场所，而且还要通过申请加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性保护工程^②——和其他一些活动，使它们国际化。这类国家资助的历史保护工作，显然只是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外旅游业，或许还可以把封建的过去和革命的历史安全地隐藏在遗产这样的非政治的、净化了的符号之中^③。尽管如此，这样的行动依然有着可以进一步加强爱国话语和民族自豪的作用。

① 可能会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也有一个类似的过程，但我认为两者的目的不尽相同。前者的主要目标不是要重建国家的历史，而是要重建世界范围内各社会阶级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历史，其特别强调的重心在中国农民阶级。

② 中国现在有28项世界遗产，全部名单见 <http://whc.unesco.org/nwhc/pages/doc/mainf3.htm>，2002年6月17日登录。

③ 我在《世界遗产，民族文化和承德的修复》一文（Hevia 2000）中曾经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一问题，那篇文章的重心是清朝夏宫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项目的联系。

这种类型的文化产品在某些国耻感最为强烈的地方尤为清晰，英国人 1860 年毁坏的圆明园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例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圆明园的遗址并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有段时间里，园中的土地曾经被一个人民公社使用，并且成为附近大学的教授和教师为了提高阶级觉悟而进行体力劳动的场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已经没有老师再在那儿劳动，但仍然有农民继续在圆明园的遗址上生活、耕种。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成立了一个历史研究机构，并且于 1981 年发行了一份刊物，还修建了一座小型陈列馆。这座陈列馆的物品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表现 1860 年英国士兵抢劫圆明园情景的立体模型（图片 40）。



图片 40 抢劫圆明园的英国士兵的泥塑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圆明园又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在逐渐变为一个略显俗气的休闲中心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复原历史遗迹并使之成为博物馆的努力：圆明园要被重新改造成为表现历史的优秀文化艺术的标志，同时也要被改造成为一个独特类型的历史记忆文本^①。如果像我在前面所讨论过的，改革时期的特征之一，是正统意识形态在有关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著作中明显地弱化，过去被重新改塑为一笔交织着耻辱与反抗的遗产，那么，这一时期的圆明园与这些走向似乎相去不远。例如，有的作品不吝笔墨地描述圆明园美不胜收的景色，也有的计划用电脑技术再现昔日的部分园林^②，园中各处还有许多介绍该景点艺术历史的大型标志牌。从这些事例来看，圆明园的意义被定位在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美学评价方面^③。另一方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几十年相比较，对于英国毁坏圆明园这一历史的关注表现得甚至更加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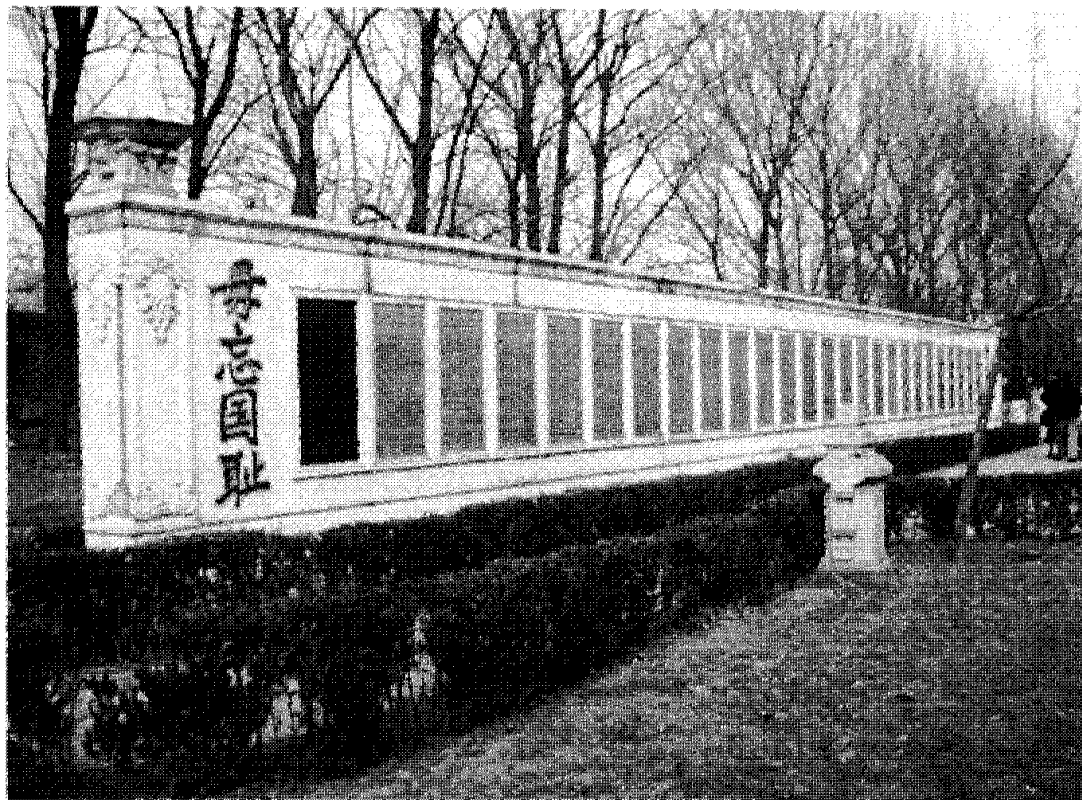
1997 年，在圆明园的西洋楼区域建立起一些新的纪念性建筑物，作为香港回归中国民族国家的官方庆典的一部分。这些建筑物中有一面镶嵌着 51 块面板的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简要地叙述了从 1840 年直到 1945 年中日战争结束期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紧靠着第一块面板，有四个烫金大字“毋忘国耻”（图片 41）。附近的一所博物馆中，展示着圆明园被毁坏的历史，包括以前制作的有关劫掠的立体模型和记录 1900 年列强占领北京的照片和文字。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贝亚托于 1860 年、其他西方摄影家于 1900 年拍摄的照片。

就像外文出版社 1976 年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中引用西方文献

① 圆明园的一部分被改造成了游乐园，有机动游艇和卡丁车，彩弹球场和射击场，园中一个湖中的一个岛上还有一个古怪的“原始图腾”展览；见 Barmé 1996: 142 - 154。

② 北京的朱达（Zhuda）电脑公司负责这一工作；见 Barmé 1996。

③ 比如可见 D. Wang 1999; Barmé 1996: 153。还有一个在网上建立虚拟圆明园的工程；见 <http://www.cs.ubc.ca/spider/wang/>，2001 年 7 月 10 日登录。



图片 41 圆明园的“毋忘国耻”墙

一样，对这类资料的运用无异于是帝国主义者自身对帝国主义的有力谴责。另外，至少还可以听到一个西方的声音，维克托·雨果（Victor Hugo）的声音。他的一些评论以法文和中文的形式，富有感情地谴责了对圆明园的劫掠和毁坏。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圆明园的展览也反映出公众对圆明园劫掠物品现在藏于何处这一问题的格外关注。在其中一面墙上，展出了一些宫廷物品的照片。这些物品是孟斗班将军 1860 年送给欧仁妮亚皇后的，用以扩充她的东方收藏品。这些图片选自萨莫约特韦莱（Colombe Samoyault-Vetlet）的《欧仁妮亚皇后的中国博物馆》一书——该书出版于 1994 年这座博物馆修复后在枫丹白露宫重新开馆之际^①。这里的信息十分清

^① 原照片见 Samoyault-Verlet 1994: 21, 24 - 25, 52, 59, 67。感谢克伦纳斯（Craig Clunas）赠送我这部书，感谢蒂里埃（Regine Thiriez）1997 年帮助我参观了这一博物馆。



楚：既然改革的中国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和世界强国，它又怎么能够容许这些象征国耻的物品在国外出现呢？2001年香港拍卖圆明园劫掠物品引发的骚动，部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前面曾经说到，圆明园博物馆是一项新的计划，但它并不是唯一一项国家机构参与建设的这类工程。另一个这类项目是大沽炮台。尽管大沽炮台周边贫瘠的盐碱地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准备修建一个新的港口，尽管炮台遗址南面和北面的海岸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避暑旅游设施，然而，在这个新的“中国时髦”的内部和周边，还建成了一座中等规模的博物馆，也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一百年的国耻。

2001年3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我第一次参观了大沽炮台。我们还会记得，这座炮台已经遵照1901年《辛丑条约》的有关条款而被拆毁。炮台遗址上现在矗立着一座四周有墙的高台，上面放置着一门古代大炮。高台下面有一个很大的石制纪念碑、一座包括一个博物馆在内的中等建筑物、一架朝鲜战争时期的米格喷气战斗机（在中国北方的公园和历史遗址中，有时候会看到这类现代军事的标志）。纪念碑上面简要记载着发生在大沽炮台的历次军事行动，同时标明此碑是天津市政府于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而建造的。在博物馆里面，按照年代陈列着1840~1900年的历史屈辱。详细的地图追寻着19世纪的全球鸦片贸易；一幅幅图表显示着1858年、1859年、1860年和1900年在大沽炮台进行的战事；表现中国士兵的绘画描绘着奋勇冲向有着先进武器的外国军队的英雄形象。博物馆中还藏有包括《天津条约》在内的一些原始文件的副本，里面那些最令人气愤的段落用红色标了出来。博物馆还展示着一幅洗劫塘沽情景的绘画，贝亚托为额尔金爵士、克林顿和巴夏礼拍摄的照片，巴夏礼的照片上被愤怒地乱划上了一些字迹。此外，还有一幅表现一队西方士兵在欢迎陆军元帅瓦德西的仪式上列队走向午

门的照片。这同样一幅照片，也出现在圆明园。

天津和北京的这些视觉证物使得有关国耻的记忆经久常新，但人们却很有理由怀疑，刘大年对西方史学批判中同样的耻辱感以及对于这种耻辱感的超越，在现时是否还能引起注意。毕竟，刘大年的批判涉及根本不同的两种历史认识，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些不同认识都已经被深深地建构到过去一个半世纪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进程之中了。在被殖民化的一方，西方帝国主义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未曾愈合的创伤。此外，在刘大年发表评论的年代，还不能说完整形式的帝国已经成为过去——非洲一些地区的“非殖民化”只是刚刚完成，另外一些地区仍然处于白人统治之下，东南亚地区也经常出现殖民类型的战争。而在另外一个方面，欧美民族国家的人民和学者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暴力，就像刘大年所暗示的那样，或者心安理得地无视这一暴力的野蛮性，或者是蓄意把它隐藏起来。或许，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全球性冲突不是那样激烈的话，如果中国没有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话，刘大年的评论本来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痛苦的喊叫，一种呼吁，呼吁以某种形式承认，一直被用来证明对清王朝和中国人民使用暴力的正当性的那些理由，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看待“毋忘国耻”墙和大沽炮台纪念馆呢？在它们和产生刘大年观点的那个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间，可能会存在着什么联系呢？对于这里概括论述的与各种全球化力量——这些力量，在将国家去疆界化的同时将中国再疆界化——相联系着的由新国家主持的历史生产，我们，或许还有当代中国人民，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呢？中国政府正在急切地将自己整合进全球性经济之中，而这个全球性经济，在几十年前还是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的主要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官方中国历史的作者们正在组织生产的，就远远不只是历史遗产。或许，他们也有着某种怀旧之情，怀念着那个道德是非更为泾渭分明的纯净时代。



然而，他们还能比我们更糟糕吗？也许，当代的欧美人要在与现时中国政府交往时保持道德崇高的立场，就必须继续忽略 19 世纪的那些历史事件。但是，不去了解西方在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很难理解中国政党官员和普通百姓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中国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后西方的反应，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这一消息公布之后，西方报纸如实报道了北京在 2001 年 7 月 13 日突然迸发出来的强烈感情。但是，除了个别例外，这些报纸都没有提及 20 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政治秩序的不合理性上面^①。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中国政府对这一消息的反应中，提到了中国过去所遭受的屈辱，也提到了中国现在赢得了世界——至少是世界上部分国家——的尊重。

过去一个世纪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人的爱国感情和反帝主张是受国家宣传的影响，甚至把它们理解为残存的、尚未消解的对所有外国人的敌视。1900 年事件发生以后，奥地利驻华公使纳色恩（Arthur von Rosthorn）——他也是使馆围困的幸存者——就警告人们不要怀有这类看法。他的评论值得我们重新回顾。纳色恩摒弃了他的同僚们有关中国排外主义的传统观点，指出：“在欧洲人看来，亚洲人不具有那种会让我们感动的爱国主义感情。”他认为，这种目光短浅的看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引自 Mackerras 1989: 69）。在今天，这样的看法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① 2001 年 7 月 14 日的《华盛顿邮报》和 2001 年 7 月 13 日的《芝加哥论坛报》确实提到了过去的历史。《华盛顿邮报》说，人们普遍认为，在外国列强带来的“耻辱”正式结束后几十年，许多中国人仍然感到外国政府在继续迫害中国。

余 论

本书开始时使用了一幅在北京公开行刑的骇人照片，其中的内容象征着帝国教程的两面：惩处性一面与建构性一面，中国的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尽管运用中国中心观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探讨了这一历史的许多方面，但他们很少把本书所涉及的那些历史过程视为英国的课业，或者去探求它们的全球性意义，而是把帝国主义解释为欧美国家自然而然的扩张令人遗憾的结果，并且认为殖民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除了少数例外（Cohen 1997；Bickers 1999；Scully 2001），他们总是把西方看做是一个已知数，不太需要对之进行更为深入的质询。我在本书中，试图在中国中心研究取向的地理特征和理论特征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突破，去探究以下问题：欧美国家在 19 世纪中国的活动中，有哪些殖民性表现？欧洲和北美的哪些政治和物质发展形式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怎样才能通过它们对中国的影响来阐明这些跨国性的进程？

毫无疑问，按照理解 19 世纪殖民主义的一般标准，中国并不是欧洲的殖民地。但我认为，这些主要涉及政治控制程度的标准，未能全面反映 19 世纪欧美帝国构建过程的多方面表现。如果用更



宽泛的文化标准来理解殖民主义，或者把殖民主义理解为一系列建立霸权的工程，那么，欧美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和士兵们在中国的作用，就与他们在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作用极其相似。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西方民族国家在中国施展的各种形式的暴力。这些暴力既是一种身体力量的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力量的强制，被用来纠正桀骜不驯的他者们的行为和意识。那张照片所表现的那类场面，远远要比我们所能留心记下来的更为普遍。除此而外，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在种族、思想和宗教方面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还时时会让人感到屈辱。

中国与其他殖民环境的第二个关联，是伪科学的种族类型的普世化。这些殖民环境中的概念机器，一旦被动员起来并遍布各地时，就把每一个人都组织进一间间式样统一、有着恒久不变的物质形态和精神特点的囚室中。这样一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企图逃出帝国教程这一死胡同的任何努力，都被彻底地堵塞住了。因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越过有关种族本质差异的那些差序森严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已经成为“常识”。对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始终是西方家长式行为关照下的病人；而对欧美人来说，则意味着“文明”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他们的一员像肮脏的他者们那样行为的时候。

关于文明和野蛮问题的忧虑是中国与其他殖民环境的第三个重要关联。这种性质的忧虑有许多种表现方式。到19世纪末，一些评论家不断地把杀戮、劫掠等暴力行为看做是西方人心灵中的返祖性残存。这些行为也让评论家们看到，文明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虚饰。有关文明的话语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如同对其他殖民环境的看法一样，欧美人也认为中国文明的成就存在于以往的历史之中。但不同的是，对在亚洲其他地区人民性格中看到的文化退化的表现，他们一概不以为意，而却有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只不过是处在某种睡梦状态。这至少意味着，如果中国人有一天会觉醒、并且接受西

方的技术和神启宗教的话，他们还有可能得到拯救。帝国教程的重心也就因之更多地放在较温和的一面，放在学堂里的课业上。

能够把中国和其他殖民环境联结起来的第四个区域，是军队的劫掠行为、公共展览活动以及艺术品市场。毫无疑问，在英国征服印度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一些军事活动，也被转置到了中国。此外，尽管英国军队确实有着最为精细的处置劫掠物品的程序，但其他国家也效仿了这些程序的形式和至少一部分内容。同时，在帝国中心，在为树立新形式的欧美帝国的统治权威而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和博物馆里，通过展品的布展序列把中国有系统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与太平洋群岛上土著居民的手工制品一样，中国物品也被作为珍贵的古玩来陈列，从中可以反映出它们的市场价值。

当然，中国物品的表现形式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在19世纪后40年中，随着普通欧美人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些物品的布展序列也发生着变化。可以说明这种变化的，是在华殖民主义与亚洲非洲其他地区殖民主义之间的另外一个类似之处：有关中国的正面知识的生产以及这种知识赖以流布、储存的帝国档案的构建。尽管本书未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的生产方式与其他殖民环境知识的生产方式毫无二致，这些知识在某些事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也与其他殖民环境相类似。帝国档案中国部生产出来的知识不仅通过改变中国物品在收藏和交易市场上的地位而改变了它们的日常状态，而且如同在印度和东南亚某些地区一样，从这些知识之中，产生出在中国再疆界化的组织计划和分类计划，并且因之在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上制造出一些新的相互关系。这些外部力量的结果之一，是中国的“殖民现代性”，它是在与跨国力量和跨国构建的不断对话中逐步形成的。这样一些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当代中国人试图从与英国课业的斗争中打造出一个有用的过去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它们。

最后，与其他殖民环境一样，被殖民者的反抗制造出有关受难



的殖民者的有力话语。所有死于本土人民反抗斗争的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殖民者，都被看做是残忍的野蛮行为的无辜牺牲品。就中国来说，传教士作家们担当了关键性的角色，他们不仅把这样的意义加诸于1900年的那些事件，而且把这样的解释推延给后来的时代。结果，中国与此前的一些殖民地一样，被认为曾经拒绝了被引导进入基督教现代文明的机会。

如果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和欧美人，像我在第九章中所论述的那样，始终被历史上的英国课业所缠扰着，那么，应该同样清楚的是，和其他殖民环境里的情形一样，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还没有与对方达成和解。相反，过往那个世纪饱受创伤的历史还活着，通过有关东方威胁和毋忘国耻这类梦魇似的幻象折射出来，被扭曲，被误用。或许，从过去两个世纪里造就全球史的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之间的强力震荡中，也不可能再指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了。但是，因为从来未曾达成过和解，因为过去不断地被现在有选择地窃取着，那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伤疤就依然存在，并塑就着目前一代的意识。在像中国那样十分详细地记载着屈辱历史的地方，对西方人过去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当代中国人就会时而感到困惑，时而感到憎恨。而在北美和欧洲，尽管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质疑，但直到现在，这类质疑所依据的，仍然是被弗莱明（错误地）称之为造就一般性知识的那些基本素材。中国人仍旧被认为曾经毫无理由地攻击过外国人，而外国人则依然被认为曾经在使馆被围困时以无可非议的高尚方式进行过英勇的反抗。

然而，幻象偶尔也会中断，对大沽到北京的历史画卷不断进行着的超现实摹画，有时也会暂时停止。1958年，在竖立着1900年殉道传教士拱形纪念碑的欧柏林学院，一些包括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在内的教师学生们，修建了一座木制拱门，来纪念1900年被杀害的中国人。在校友联欢会举行的头天晚上建立起来的这座与原有纪念碑针锋相对的拱门，就竖立在殉道传教士纪念碑对面的泰本广

场上。尽管学院行政当局把它拆毁了，但为死难中国人设立纪念物的思想并未消失。最终在1995年，安放了一块铭牌以示纪念^①。与此同时，早先那座拱形纪念碑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不断地被当作抗议社会不公以及抗议包括越南战争在内的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场所。

对欧伯林拱形纪念碑意义的修订非常具有启发性。它告诉我们，无论1900年事件的记忆机器多么强大，它所承载的意义还是会变动的。欧伯林事例还告诉我们，在现在为过去铭写新意义的一种方式，就是为19世纪的历史事件建立另外一种可视的替代性版本，把在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叙述中被压抑或被边缘化了的那些内容凸显出来。本书要进行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并且试图以近来有关亚洲非洲其他地区的后殖民研究所表现出的同样精神，来做到这一点。本书也试图把其他一些有关过去的视野、一些并非仅仅关注民族屈辱的视野带进到中国内部。或许，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欧美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在我们的想象中，展开由那位无名的满族画家、史密斯军士长的女伴所绘制的画卷，重新去思考构建我们共同历史的方式，那些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的尊严的方式。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能抛开英国的课业，一起向前超越，西方就会超越傅满洲式的病态恐惧，人民共和国也会超越对国耻的过分执著。

^① OCA, letter from Tom Firor, 10 July 1991; *Oberlin Alumni Magazine* (summer 1991): 6.

参考文献

档案资料 and 公共文件

- British Library and India Office Records, London (IOR)
- British Museum, Acquisition Records, London
-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 National Army Museum, London (NAM)
- Oberlin College Archives, Oberlin, Ohio (OCA)
-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Gardens, London
 -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FO)
 - War Office Archives (WO)
 - Wolseley Papers
- Royal Engineers Museum, Brompton Barracks, Chatham
 - Acquisition Records and Collections
- United States Army 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Carlisle, Pennsylvania (USMHI)
 - Spanish-American War Era Veterans Survey,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NAM)

War Office Records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MSS. Acquisition Records. Liqi tush
plates; Arthur Wells Bequest; Miss Gordon File; and National Art
Library, Auction Sales Catalogues, 1861 - 190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

对外关系：参加觐见名单

朱批奏折

报章杂志

Blackwood's Magazine

Celestial Empire (CE), Shanghai, 1900 - 1901

Chinese Repository, Canton, 1832 - 1851

Daily Telegraph, London, 1994, 1996

The Graphic, London, 1900 - 1901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ILN), London, 1860 - 1861, 1900 -
1901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NCBRAS*), Shanghai, 1859 - 1948

La Vie Illustrée, Paris, 1900 - 1901

Le Monde Illustré, Paris, 1900 - 1901

Leslie's Weekly (LW), New York, 1900 - 1901

L'Illustration, Paris, 1900 - 1901

Literary Digest, 1900 - 1901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2001

North China Herald (NCH), Shanghai, 1900 - 1901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1900 – 1901

Review of Reviews, London, 1900 – 1901

出 版 物

Adams, Charles F., ed. 1853.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10 vols. Boston: Little, Brown.

Adams, John Q. 1909 – 10. “J. Q. Adams on the Opium War.” *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43: 295 – 324.

Adas, Michael. 1989.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hmed, Aijaz. 1992. *In Theory*. London: Verso.

Allen, Rev. Roland. 1901.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London: Smith, Elder.

Allgood, George. 1901. *China War 1860: Letters and Journal*. London: Longmans, Green.

Altick, Robert. 1978. *The Shows of London*.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Ament, William. 1901a. “A Bishop’s Loot.” *Independent* 53: 2217 – 18.

———. 1901b. “The Charges against Missionaries.” *Independent* 53: 1051 – 52.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Anglesey, George C. 1975.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avalry, 1816 to 1919*. 4 vols. London: Leo Cooper.

Anslinger, H. J., and W. F. Tompkins. 1953. *The Traffic in Narcotics*.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 Dea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rlington, L. C. , and W. Lewisohn. [1935] 1987.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Reprint,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kins, Martyn. 1995. *Informal Empire in Cris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yers, J. 1985. "The Early China Trade," 259 – 266. In O. Impey and A. MacGregor, eds. ,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s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Backhouse, Edmond, and John O. P. Bland. 1911.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London: W. Heinemann.

———. 1914.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London: W. Heinemann.

Baedecker, Karl. 1904, *Russland nebst Teheran*. Leipzig: Karl Baedeker.

———. 1912. *Port Arthur*. Leipzig: Karl Baedeker.

———. 1914. *Peking*. Leipzig: Karl Baedeker.

Bail, J. Dyer. 1893. *Things Chinese*. London: Sampson, Low and Marston.

Bannister, Robert. 1972. *Social Darwin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anno, Masataka. 1964. *China and the West, 1858 – 1861*.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rfield, Thomas. 1989. *The Perilous Frontier*. Cambridge, Mass. : Blackwell.

Barlow, Tani. 1993. "Colonialism's Career in Postwar China Studies." *positions* 1. 1: 224 – 267.

———, ed. 1997.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Barmé, Geremie. 1996. "The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 A Life in Ruins." *East Asian History* 11: 111 – 158.

Barrow, George de S. 1942. *The Fire of Life*. London: Hutcheson.

Barrow, John. [1806] 1972. *Travels in China*. Reprint, Taipei: Ch'eng Wen.

Basu, Dilip. 1993. "Barbarian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Xenology and the Opium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Beyond Orient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12 – 13 November.

Bayly, C. A. 1996. *Empire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zancourt, César Lecat. 1861. *Les expéditions de Chine et de Cochinchine; d'après les documents officiels par le baron de Bazancourt*. Paris: Amyot.

Beeching, Jack. 1975. *The Chinese Opium Wa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Benjamin, Walter. 1969.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217 – 251. 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 1999.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

Bennett, Tony.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New York: Routledge.

Bernstein, Richard, and Ross Munro. 1997.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Berridge, Virginia, and Griffith Edwards. 1981. *Opium and the People*. New York: St. Martin's.

Bevans, Charles I. 1918 – 30.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76 – 1949*.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Bhabha, Homi. 1983. "Differen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 194 – 211. In Francis Barker et al., eds., *The Politics of Theory*. Colchester, England: University of Essex Press.

Bickers, Robert. 1993a. "History, Legend and Treaty Port Ideology, 1925 – 1931," 81 – 92. In R. Bickers, ed., *Ritual and Diplomacy*. London: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Wellsweep Press.

———. 1993b. "Treaty Port History and the Macartney Mi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Marking the Bicentenary of the First British Mission to China*, Chengde, PRC, 14 – 18 September.

———. 1999. *Britain in China*.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Biggerstaff, Knight. 1934 – 35. "The Tung Wen Kuan."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 307 – 340.

———. 1961.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ishop, Heber. 1900. *The Heber Bishop Collection of Jade and Other Hard Stone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lofeld, John. [1961] 1989. *City of Lingering Splendor*. Boston: Shambala.

Bongie, Chris. 1991. *Exotic Memor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ttomore, Tom, et al., eds. 1983.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London: Blackwell.

Boulger, D. C. 1879. *England and Russia in Central Asia*. London: W. H. Alien.

———. 1885. *Central Asian Questions: Essays on Afghanista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T. F. Unwin.



- . 1897. *The Life of Gordon*. London: T. F. Unwin.
- . 1900. "The Scramble for China." *Contemporary Review* 78: 1 - 10.
- Brantlinger, Patrick. 1988. *Rule of Darknes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reckenridge, Carol. 1989. "Th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 Collecting: India at the World Fair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1. 2: 195 - 216.
- Bredon, Juliet. 1922. *Peking*.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 . 1931. *Peking*. 3d ed.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 Brooks, Elbridge S. 1901. *Under the Allied Flags*. Boston: Lothrop.
- Brooks, Peter. 1976.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roomhall, Marshall. 1901. *Martyred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with a Record of the Perils and Sufferings of Some who Escaped*.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 Brown, Arthur J. 1904.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 Brown, Frederick. [1902] 1970. *From Tientsin to Peking with the Allied Forces*. Reprint, New York: Arno Press.
- . 1913. *China's Dayspring after Thirty Years*. London: Murray and Everden.
- Buck, David, ed. 1987. *Recent Chinese Studies of the Boxer Movement*. Armonk, N. Y. : M. E. Sharpe.
- . 1991. "The 199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Boxer Movement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Republican China* 16. 2: 113 - 120.
- 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 1878. *Exhibition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Works of Art. London: John C. Wilkes.

——. 1895. *Catalogue of Blue and White Oriental Porcelain exhibited in 1895*. London: Printed for the 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

——. 1896. *Catalogue of Coloured Chinese Porcelain exhibited in 1896*. London: Printed for the 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

Bushell, Stephen W. 1899. *Oriental Ceramic Art: Collection of W. T. Walters*. New York: D. Appleton.

——. [1904] 1924. *Chinese Art*.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 1908. *Chinese Porcel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77. *A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shell, Stephen, and W. M. Laffan. [1904] 1907. *Catalogue of the Morgan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rcelain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tler, Smedley D. 1933. *Old Gimlet Eye*.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Cameron, Nigel. 1970.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niff, Milt. 1987. *Steve Canyon: May 15, 1953 - April 30, 1954*. Princeton, WI: Kitchen Sink Press.

Cannadine, David. 1983. "The Context, Performance and Meaning of Ritual: The British Monarchy 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 1820 - 1977," 101 - 164. In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rl, Katherine. 1907.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New York: Centur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14. *Signatures, Ratifications, Adhesions and Reservations of the Convent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Hague Peace Conferences*.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Carter, W. H. 1917. *The Life of Lieutenant General Chaffe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mberlin, Wilber. 1903. *Ordered to China*.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hatterjee, Partha.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Cheng, Tien-fong. 1957.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Chia Ning. 1992. "The Li-fanYuan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Ph. D. di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hien, Helen Hsieh, trans, 1993. *The European Diary of Hsieh Fucheng*. New York: St. Martin's.

China No. 2. [1869] 1975.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ttack on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t Yang-Chow-Fu, August 1868*. Reprint,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China No. 1. 1876. United Kingdom.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China No. 3. 1877. United Kingdom. House of Commons. *Sessional Papers*.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China No. 3. [1891] 1975 (CC9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Reprint,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China No. 1. [1892] 1975 (CC92).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Reprint,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196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rol, Valentine. 1896.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London: Macmillan.

Chrisman, Laura. 1990. "The Imperial Unconscious? Representations of Imperial Discourse." *Critical Quarterly* 32. 3: 38 – 58.

Christie's. 1996. *The Imperial Sale*, Hong Kong, 28 April 1996.

Clubb, O. Edmund. 1971. *China and Rus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lunas, Craig. 1991. "Whose Throne Is It Anyway?" *Orientalism* 22. 7 (July): 44 – 50.

Cochran, Sherman. 2001.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d. 1999. *Inventing Nanjing Road*. 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Cocks, A. S. 1980.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The Making of the Collection*. London: Windward.

Cohen, Paul. 1978.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543 – 590. In J.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art 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7. *History in Three Ke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hn, Bernard. 1987. "The Census, Social Structure and Objectification in South Asia," 224 - 254. In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lombos, C. J. 1940. *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Prize*. London: Grotius Society.

Colquhoun, Archibald. 1898.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Harper.

———. 1900. *Overland to China*. New York: Harper.

Coltman, Rev. R. 1901. *Beleaguered in Peking: The Boxer's War against the Foreigner; The Yellow Crime*.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ilation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Series. 1976. *The Yi He Tuan Movement of 1900*.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Conger, Sarah P. 1909. *Letters from China*. Chicago: A. C. McClurg.

Cook, Thomas. 1910. *Cook's Tourist Handbook to Peking, etc.* London: Thomas Cook and Son.

———. 1917. *Peking and the Overland Route*. London: Thomas Cook and Son.

———. 1924. *Peking, North China, South Manchuria and Korea*. London: Thomas Cook and Son.

Cooley, James. 1981. *T. F. Wade in China*. Leiden: E. J. Brill.

Cooper, Frederick. 1997. "The Dialectics of Decolonization: Nationalism and Labor Movements in Postwar French Africa," 406 - 435. In F. Cooper and 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oper, Frederick, and Ann Stoler, eds. 1997. *Tensions of Emp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rdier, Henri. 1876. "A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Articles Print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ety to the 31st of December, 1874." *JHCBRAS* 9: 201 - 215.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 - 1859 (CESM). 1859. Parliamentary Papers.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 1859 - 1860 (CRAC). 1861. Parliamentary Papers.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Costin, William C. 1937.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 - 18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vell, Ralph. 1978. *W. A. P. 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Washington: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Cranmer-Byng, J. L., ed. 1963. *An Embassy to China*. Hamden, Conn. : Archon Books.

Crary, Jonathan. 1988. "Modernizing Vision," 29 - 44. In Hal Foster, ed., *Vision and Visuality*. Seattle: Bay Press.

Crosby, Christina. 1991. *The Ends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Crossley, Pamela. 1999. *The Translucent Mirr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row, Carl. [1913] 1973. *The Travelers Handbook for China*. Reprint, Taipei: Ch'eng Wen.

Curzon, George. 1967. *Russia in Central Asia in 1889 and the Anglo-Russian Question*. London: Cass.

Daggett, A. S. 1903. *America in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Kansas City: Hudson-Kimberly.



Davidson-Houston, J. V. 1960. *Russia and China*. London: Robert Hale.

Davis, John. 1887 - 1906.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Queen's Royal Regiment (Royal West Surrey)*. 6 vols.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3.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nby, Charles. 1900. "The Duty of Securing Protection for Foreigners in China." *Independent* 52: 2485 - 86.

Deverall, Richard. 1954. *MaoTze-Tung: Stop This Dirty Opium Business! How Red China Is Selling Opium and Heroin to Produce Revenue for China's War Machine*. Tokyo: Toyoh.

Devereaux, Leslie, and Roger Hillman, eds. 1995. *Fields of Vis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Hérrison, Maurice. 1901. "The Loot of the Imperial Summer Palace at Peking," 601 - 635.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illon, Edward I. 1901. "The Chinese Wolf and the European Lamb." *Contemporary Review* 79: 1 - 31.

Douglas, Robert K. 1894. *Society in China*. London: A. D. Innes.

Duden, Alexis. 1999. "Japan's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Terms," 165 - 191. In Lydia Liu, ed., *Tokens of Exchange*.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yvendak, J. J. L. 1939. "The Last Dutch Embassy to the Chinese Court (1794 - 1795)." *T'oung Pao* 34. 1 - 2: 1 - 116.

Eagleton, Terry. 1990.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lackwell.

Eames, James. [1909] 1974. *The English in China*. London: Curzon Press.

Eastman, Lloyd. 1967. *Throne and Mandari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dwardes, Michael. 1975. *Playing the Great Game*. London: Hamilton.

Edwards, E. H. [1903] 1970. *Fire and Sword in Shansi: The Story of the Martyrdom of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Reprint, New York: Arno Press and New York Times.

Eliade, Mircea, ed. 1987.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16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Elliott, Mark. 2001. *The Manchu W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llis, Henry. 1817.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Elvin, Mark,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1974.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nloe, Cynthia. 1989.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ne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sherick, Joseph.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vans, John. 1987. *The Russo-Chinese Crisis*. Newtonville, Mass.: 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

Evans, Martin, and Ken Lunn, eds. 1997. *War Mem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erg.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airbank, John K. 1942.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Far Eastern Quarterly* 1: 129 - 149.

———. 1953.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7. "Synarchy under the Treaties," 204 - 231. In J.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58.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8. "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257 - 275. In J.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 - 1985*.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ed. 197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 - 1911*. Vol. 10, part 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irbank, John K., Katherine F. Bruner, and Elizabeth M. Matheson, eds. 1975.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irbank, John K., Martha H. Coolidge, and Richard J. Smith. 1995. *H. B. Morse*.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Fairbank, John K., and K. C. Liu, eds. 198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 - 1911*. Vol. 11, part 2.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non, Frantz. [1963] 1966.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Farquhar, Judith, and James Hevia. 1993. "Culture and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positions* 1. 2: 486 - 525.

Farwell, Byron. 1972. *Queen Victoria's Little Wars*. New York: Norton.

——. 1981. *Mr. Kipling's Army*. New York: Norton.

——. 1989. *Armies of the Raj*. New York: Norton.

Favier, Adolph. 1901. "An Answer to Charges of Looting." *Catholic World* 74: 387 - 390.

Felber, Roland, and Horst Rostek. 1987. *Der "Hunnenkrieg" Kaiser Wilhelms II: Imperialistische Intervention in China 1900/01*.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Feuerwerker, Albert, ed. 1968.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Finney, Charles G. 1961. *The Old China Hands*, New York: Doubleday.

Fischer, Emil. 1924. *Guide to Peking and Its Environs Near and Far*.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Fisher, Arthur. 1863.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ree Years' Service in China*. London: Richard Bentley.

Fleming, Peter. 1959. *The Siege of Peking*. New York: Harper.

Fletcher, Joseph. 1978a. "Ch'ing Inner Asia c. 1800," 35 - 106. In J.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 - 1911*, vol. 10, part 1.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8b. "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 351 - 408. In J.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 - 1911*, vol. 10, part 1.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8c. "Sino-Russian Relations, 1860 - 62," 318 - 350. In J.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 - 1911, vol. 10, part 1.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02. *Affairs in China*.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Forsyth, Robert C. 1904.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Forsyth, Thomas D. 1875.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and*. Calcutta: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Forsythe, S. A. 1971.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 - 190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43.

Fortune, Robert. 1857.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London: John Murray.

Foucault, Michel. 1991. "Governmentality," 87 - 204. In Graham Burchell,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x, Grace Estelle. 1940. *British Admirals and Chinese Pirates, 1832 - 1869*.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Foxe, John. 1856. *Foxe's Book of Martyrs*. Philadelphia: James B. Smith.

Frodsham, J. D. 1974. *The First Chinese Embassy to the West: The Journals of Kuo Sung-t' ao, Liu Hsi-hung, and Chang Te-y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atrell, T. J. N. 1901. "The Expedition to Paotingfu." *Independent* 53: 148 - 150.

Gibson, Tom. 1969. *The Wiltshire Regiment*. London: Leo Cooper.

Giles, Herbert. 1898. *A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the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15. *Supplementary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les, Lancelot. 1970. *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A Diary*. Nedlands: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

Gillard, David. 1977. *The Struggle for Asia 1828 - 1914*. London: Methuen.

Gilman, Sander. 1985. *Difference and Path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odden, Rumer. 1977. *The Butterfly Lions: The Story of the Pekingese in History, Legend and Art*. New York: Viking.

Goldman, Charles, ed. 1905. *The Empire and the Century*. London: John Murray.

Gordon Cumming, C. F. 1886. *Wanderings in China*. 2 vols. Edinburgh: Blackwood.

Gould, Stephen J. 1981.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Norton.

Graham, Gerald. 1901. *Lif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Lieut. -General Sir Gerald Graham*. Ed. R. H. Vetch. London: Blackwood.

Greenhalgh, Paul. 1988. *Ephemeral Vistas*.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Gregory, Adrian. 1994. *The Silence of Memory*. New York: Berg.

Guha, Ranajit. [1981] 1996. *A Rule of Property for Bengal*.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ll, Ronald. [1931] 1966. *Eminent Authorities on China*.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Haller, William. 1963. *Foxe's Book of Martyrs and the Elect*



Nation. London: Jonathan Cape.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1830 - 91. Ser. 3; vols. 1 - 356. London: T. C. Hansard.

Hao, Yen-ping. 1970.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o, Yen-ping, and Erh-Min Wang. 1980. "Changing Chinese Views of Western Relations, 1840 - 95," 142 - 201. In J. K. Fairbank and K. C.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part 2.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David. 1999. *Of Battle and Beauty: Felice Beato's Photographs of China*, Santa Barbara, CA: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

Harris, James. 1912. *China Ji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Hart, Robert. 1901a. "China and Non-China." *Fortnightly Review* 75: 278 - 293.

———. 1901b.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Hastings, James, ed. 1916.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13 vols. New York: Scribner's.

Haswell, Jock. 1967. *The Queen's Royal Regiment.* London: Hamish Hamilton.

Hayford, Charles. 1985. "Chinese and American Characteristics: Arthur H. Smith and His China Book," 153 - 174. In Susan Barnett and J. K.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adland, Isaac. 1902. *Chinese Heroes.* New York: Eaton and

Mains.

Headrick, Daniel. 1981. *Tools of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When Information Came of 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athcote, T. A. 1974. *The Indian Army*. New York: Hippocrene.

Henty, George A. 1884. *By Sheer Pluck*. London: Blackie.

——. 1884. *With Clive in India*. London: Blackie.

——. 1901. *With Roberts to Pretoria*. New York: Scribner's.

——. 1902. *With Kitchener in the Soudan*. New York: Scribner's.

——. 1904. *With the Allies to Peking*. London: Blackie and Son.

Hevia, James. 1993. "Lamas, Emperors, and Rituals: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Qing Imperial Ceremoni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6. 2: 243 - 278.

——. 1995a. "An Imperial Nomad and the Great Game: Thomas Francis Wade i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6. 2: 1 - 22.

——. 1995b.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Imperial Guest Ritual," 471 - 487. In Donald Lopez, ed., *Religions of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Postpolemical Historiography: A Response to Joseph W. Esherick." *Modern China* 24. 3: 319 - 327.

——. 2000. "World Heritage,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hengde." *positions* 9. 1: 219 - 244.

Hibbert, Christopher. 1970. *The Dragon Wak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Hinsley, E. H. 1969.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275 – 288. In W. J. Stankiewicz, ed., *In Defense of Sovereign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Sovereignt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rth, Friedrich. 1885 – 88.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with a vocabulary for the special use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Hobsbawm, Eric. 1989. *The Age of Empire, 1876 – 1914*. New York: Vintage.

Hochschild, Adam. 1998. *King Leopold's Ghos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oe, Susanna. 2000. *Women at the Siege, Peking 1900*. Oxford: Holo.

Hofstadter, Richard. 1955.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Boston: Beacon.

Holmes, R. 1896. *Naval and Military Trophies and Personal Relics of British Heroes*. London: John C. Nimmo.

Hooker, Mary. [1910] 1987. *Behind the Scenes in Peking*. Reprint,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pe, E. 1885. *General Gordon, The Christian Hero*. London: Walter Scott.

Hopkirk, Peter. 1992. *The Great Game*.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 1995. *On Secret Service East of Constantinop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stetler, Laura. 2001.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sü, Immanuel C. Y. 1960. *China's Entry into the Family of*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Nation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5a. *The Ili Crisis: 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 1871 - 188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65b. "The Great Policy Debate in China, 1874: Maritime Defense vs. Frontier Defen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5: 212 - 228.

——. 1990.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4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 Sheng. 1955.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Hummel, Arthur. 1943.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Hunt, Michael. 1979. "The Forgotten Occupation: Peking, 1900 - 190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8: 501 - 529.

——. 1983.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3: 22 - 49.

——.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Hurd, Douglas. 1967. *The Arrow War*. London: Collins.

Ichiko, Chuzo. 1980.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1901 - 1911," 375 - 415. In J. K. Fairbank and K. C.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1, part 2.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mpey, O. 1977. *Chinoiseri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 "Japan: Trade and Collect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267 - 273. In O. Impey and A. MacGregor, eds.,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s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Impey, O., and A. MacGregor, eds. 1985. *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s of Curiositie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Isaacs, Harold. [1958] 1980.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John Day.

Jackson, S. M., ed. 1910. *The Schaff-Hersog Encyclopedia of Religious Knowledge*. 12 vols.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Jay, Martin. 1988. "Scopic Regimes of Modernity," 3 - 23. In Hal Foster, ed., *Vision and Visuality*. Seattle: Bay Press.

Jenks, Chris, ed. 1995. *Visual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Jensen, Lionel. 1997.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s*.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Johnston, Reginald. [1934] 1985.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Reprint,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nes, D. V. 1984. *Splendid Encount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ies.

Kaestlin, J. P. 1963. *Catalogue of the Museum of Artillery in the Rotunda at Woolwich, Part I: Ordnance*.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Kelly, John S. 1963. *A Forgotten Conference: The Negotiations at Peking, 1900 - 1901*. Geneva: Librairie E. Droz.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Vintage.

Ketler, Isaac C. 1902. *The Tragedy of Paotingfu*.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Kiernan, V. G. 1986.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ipling, Rudyard. [1901] 1981. *Kim*. Mahwah, N. J.: Watermill.

Kipnis, Andrew. 1995. “ ‘Face’ : An Adaptable Discourse of Social Surfaces.” *positions* 3. 1: 119 – 148.

Kirshenblatt-Gimblett, B. 1991. “Objects of Ethnography,” 386 – 443. In Ivan Karp and S.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Knight, Charles R. B. 1935.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Buffs*. 3 vols. London: Medici Society.

Knollys, Henry. 1875. *Incidents in the China War of 1860 compiled from the private journals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 1894. *Life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 2 vols. London: Blackwood.

Kohn, Marek. 1992. *Dope Girls: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Drug Underground*.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Kolb, Robert. 1987. *For All the Saints*.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Krausse, Alexis. [1899] 1973. *Russia in Asia*. Reprint,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 [1900a] 1973. *China in Decay*. 3d ed. Reprint, Taipei: Ch'eng Wen.

———. 1900b. *The Story of the China Crisis*. New York: Cassell.

Kuhn, Phillip. 1978. “The Taiping Rebellion,” 264 – 317. In J.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Late Ch'ing, 1800 – 1911*, vol. 10, part 1.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o, Ting-ye. 1978. "Self-strengthening: The Pursuit of Western Technology," 492 - 542. In J.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art 1.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mb, Alastair. 1960.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London: Routledge.

Landes, David.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Norton.

Landor, Henry Savage. 1901. *China and the Allies*. 2 vols. New York: Scribner's.

Lane Poole, Stanley. [1901] 1968. *Sir Harry Parkes in China*.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Langer, Walter. [1935] 1965.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 - 1902*. 2d ed. New York: Knopf.

Latour, Bruno. 1990. "Drawing Things Together," 29 - 68. In Michael Lynch and Steve Woolgar, eds., *Representations in Scientific Practi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ttimore, Owen. 1940.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ee, Leo. 1999. *Shanghai Moder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onard, Lawrence. 1944. *Catalogu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Museum*. West Poin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Leslie, N. B. 1970. *Battle Honours of the British and Indian Armies, 1865 - 1914*. London: Leo Cooper.

Lewis, Reina. 1996. *Gendering Orient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Leyda, Jay. 1972. *Dianying: Electric Shadows*.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Little, Mrs. Archibald. 1901. "Peking Revisited." *Eclectic Magazine* 137: 501 - 511.

——. 1904. *Guide to Peking*. Tientsin: Tientsin Press.

Little, L. K. 1975. Introduction, 3 - 34. In J. K. Fairbank, K. F. Brunet, and E. M. Matheson, eds., *The I. G. in Peking*.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Liu, Danian. 1968. "How to Appraise the History of Asia," 356 - 368. In A. Feuerwerker,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Liu, Kwang-Ching. 1978. "The Ch'ing Restoration," 409 - 490. In J.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art 1.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u, Kwang-Ching, and Richard J. Smith. 1980. "The Military Challenge: The Northwest and the Coast," 202 - 273. In J. K. Fairbank and K. C.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part 2.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u, Lydia.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Legislating the Universal," 127 - 164. In Lydia Liu, ed., *Tokens of Exchang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o, Hui-min, ed. 1976.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3 vo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ch, Henry B. [1869] 1900. *Personal Narrative of Occurrences during Lord Elgin's Second Embassy to China in 1860*. London: John Murray.

Longworth, Alice R. 1933. *Crowded Hours*. New York: Scribner's.



- Loomba, Ania. 1998.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Loti, Pierre. 1902. *The Last Days of Peking*. Boston: Little, Brown.
- Lowe, Donald. 1966. *The Function of "China" in Marx, Lenin, and Ma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82. *History of Bourgeois Percep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owe, Lisa. 1991. *Critical Terrai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u Hanchao. 1999. *Beyond the Neon Ligh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u Yao. 1987.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s," 42 – 86. In David Buck, ed., *Recent Studies of the Boxer Movement*. Armonk, N. Y. : M. E. Sharpe.
- Lucas, Christopher, ed. 1990. *James Ricalton's Photographs of China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Lewiston, N. Y. : E. Mellen.
- Lynch, George. 1901. *The War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MacDonnell, John. 1901. "Looting in China." *Contemporary Review* 79 (March): 444 – 452.
- MacDonnell, Ranald, and Marcus Macauley. 1940. *A History of the 4th Prince of Wales's Own Gurkha Rifles, 1857 – 1937*. 2 vols.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 MacGregor, John. 1850. *Commercial Statistics*. 5 vols. London: Wittaker.
- MacKenzie, John M. 1992. "Heroic Myths of Empire," 109 – 138. In John MacKenzie, ed., *Popular Imperialism and the Military*.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ckerras, Colin. 1989.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Murray, John. 1921.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 - 1919*. 2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han, Alfred Thayer. 1899 - 1900. "The Problem of Asia."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100: 536 - 547, 747 - 759, 929 - 994.

———. 1900.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Boston: Little, Brown.

Malone, Carroll B. 1934.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ancall, Mark. 1971.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ni, Lata. 1985. "The Production of an Official Discourse on Sati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engal," 1: 107 - 127. In Francis Barker et al., eds., *Europe and Its Others*. Colchester, England: Essex University Press.

Mao Zedong. 1977.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vol. 5.

Marchetti, Gina. 1993. *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rshall, Peter, and G. Williams. 1982. *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London: J. M. Dent.

Martin, W. A. P. 1900. *The Siege of Peking*.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Mason, P. 1974. *A Matter of Honour*. London: Jonathan Cape.



- Mateer, A. H. 1903. *Siege Day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 Matheson, James. 1836. *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rade with China*. London. Smith, Elder.
- Mayer, David. 1992. "The World on Fire... Pyrodramas at BelleVue Gardens, Manchester, c. 1850 - 1950," 179 - 197. In John MacKenzie, ed., *Popular Imperialism and the Military*.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yers, William F. [1877] 1966. *Treaties betwee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 . [1897] 197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3d ed. Revised by G. M. H. Playfair.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 Mayers, William F., N. B. Dennys, and Charles King. [1867] 1977.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Reprint,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 McClintock, Anne. 1995. *Imperial Leather*. New York: Routledge.
- McCoy, Alfred W. 1973.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McCulloch, John R. 1842. *A Dictionary,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 McFarland, Earl. 1929. *Catalogue of the Ordnance Museum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New York: U. S. Military Academy Printing Office.
- McNeill, William. 1982. *The Pursuit of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agher, Paul, et al. 1979.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Religion*. 3 vols. Washington: Corpus Publications.
- M'Ghee, R. J. L. 1862. *How We Got to Peking*. London: Richard

Bentley.

Michie, Alexander. 1864. *The Siberian Overland Route from Peking to Petersburg*. London: John Murray.

——. 1893a. “Balance of Power in Eastern Asia.”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154 (September): 397 – 308.

——. 1893b. “The Russian Acquisition of Manchuria.”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153 (May): 631 – 646.

Middleton, Ben. 2001. “Spectres of Imperialism, Scandals of Empire: The Boxer War and the Japanese Public Sphe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900: The Boxers, China and the World*, London, 24 June.

Miles, Robert. 1989. *Racism*. London: Routledge.

Military Order of the Dragon, 1900 – 1911. ca 1912. Washington: Press of B. S. Adams.

Millard, Thomas F. 1901. : Punishment and Revenge in China. “*Scribner’s Magazine* 29: 187 – 194.

Miller, S. C. 1974. “Ends and Means: Missionary Justification of For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249 – 282. In J.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illigan, Barry. 1995. *Pleasures and Pain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Millward, James. 1998. *Beyond the Pa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iner, Luella. 1903. *China’s Book of Martyrs*. Cincinnati: Jennings and Pye.

Mitchell, Timothy. 1988. *Colonizing Egypt*.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The World as Exhibi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1. 2: 217 – 236.

Morgan, Gerald. 1981.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 1810 – 1895*. London: Frank Cass.

Moriarty, Catherine. 1997. “Private Grief and Public Remembrance: British First World War Memorials,” 125 – 142. In M. Evans and K. Lunn, eds., *War and Mem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erg.

Morrill, Samuel. 1926. *Lanterns, Junks and Jade*.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Morse, Hosea B. [1905] 1907. *Currency, Weights, and Measures*. Reprint,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 1908.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Longmans, Green.

———. 1909. *The Gilds of China*. London: Longmans, Green.

———. 1910 – 18.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 1926 – 29.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43*. 5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y, James S. 1993. *Marginal Sight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Mumm, Alfons Freiherr von Schwarzenstein. 1902. *Ein Tagebuch in Bildern*. Berlin: Graphische Gesellschaft.

Murphy, Rhoads. 1974.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17 – 71.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Hugh, et al. 1836 – 43. *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 3 vols. London: Simplin, Marshall.

Mutrécý, Charles de. 1862. *Journal de la campagne de Chine 1859 – 1860 – 1861*; par Charles de Muttécý; précède d'une preface de Jules Noriac. 2 vols. Paris: A. Bourdilliat.

Nadel, Alan. 1995. *Containment Culture*.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Nicholls, Bob. 1986. *Blue jackets and Boxers*. Sydney: Allen and Unwin.

Nora, Pierre. 1989.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 – 24.

Norie, E. W. M. [1903] 1995. *Official Account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 – 1901*. Reprint, Nashville: Battery Press.

Oliphant, Laurence. [1859] 1970.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 '58, '59*.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udendyk, William. 1939. *Ways and By-ways of Diplomacy*. London: Peter Davies.

Paine, S. C. M. 1996. *Imperial Rivals*. Armonk, N. Y. : M. E. Sharpe.

Pakenham, Thomas. 1979. *The Boer War*. New York: Avon.

Palgrave, F. T. 1862. *Handbook to the Fine Arts Collec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London: Macmillan.

Parker, E. H. 1886. "From the Emperor of China to King George the Third." *Nineteenth Century* (July): 45 – 54.

———. 1901. *China*. New York: E. P. Dutton.

Parry, Benita. 1987. "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ies of Colonial Discours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9. 1 – 2: 27 – 58.

Parssinen, Terry. 1983. *Secret Passions, Secret Remedies*.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Pauthier, J. - P. G. 1861. "Des Curiosités Chinoises." *Gazette des Beaux-Arts* 9: 363 - 369.

Pearce, Nick. 1998. "From the Summer Pala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 25 - 28 June, Leiden.

Pearl, Cyril. 1967. *Morrison of Peking*.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Peiping Chronicle. 1933. *Guide to "Peking."*

Pelcovits, Nathan. [1948] 1969. *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Reprint, New York: Octagon.

Perdue, Peter. 1996.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0.4: 757 - 793.

Pick, Daniel. 1993. *The War Mach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ieczenik, Steve. 1995. *Pax Pacifica*. New York: Warner.

Playfair, G. M. H. [1910] 1978.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hina*. Reprint, Taipei: Ch'eng Wen.

Pomian, K. 1990. *Collectors and Curiosities: Paris and Venice 1500 - 1800*.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Pong, David. 1975.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Kwangtung Provincial Archives Deposited at 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Lond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rter, D. 1983. "Orientalism and Its Problems," 179 - 193. In Francis Barker et al., eds., *The Politics of Theory*. Colchester, England: University of Essex Press.

Porter, Whitworth. 1889. *History of the Corps of Royal Engineers*.

7 v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Pratt, Mary Louise. 1992. *Imperial Eyes*. London: Routledge.

“Progress in China.” 1863. *Blackwood's Magazine* 93: 44 – 61.

The Queen. 1862. Exhibition Supplement 20, 18 January.

Rabinow, Paul. 1986.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234 – 261. In J. Clifford and G.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lston, David B. 1990. *Importing the European Ar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wlinson, Henry. 1875.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 J. Murray.

Rawlinson, John L. 1967.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 – 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wski, Evelyn. 1998. *The Last Emper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wski, Thomas. 1970. “Chinese Dominance of Treaty Port Commerce and Its Implications, 1860 – 1875.”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7: 451 – 473.

Read, S. P. 1900. “Similarities in the Peking Expeditions of 1860 and 1900.” *Independent* 52: 2627 – 2629.

Reid, Gilbert. 1901. “The Ethics of Loot.” *Forum* 31: 581 – 586.

———. 1902. “The Ethics of the Last War.” *Forum* 32: 446 – 455.

Rennie, David F. 1864. *The British Arms in North China and Japan: Peking 1860; Kagoshima 1862*. London: John Murray.

———. 1865. *Peking and the Pekingese*. 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realis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Army Prize; with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1864.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Ricalton, James. 1901. *China through the Stereoscope.* New York: Underwood and Underwood.

Richards, Jeffrey. 1992. "Popular Imperialism and the Image of the Army in Juvenile Literature," pp. 80 - 108. In John MacKenzie, ed., *Popular Imperialism and the Military.*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 John. 2002. "The Opium Industry in British India."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39: 149 - 180.

Richards, Thomas. 1990. *The Commodity Culture of Victorian Engla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The Imperial Archive.* London: Routledge.

Richthofen, Ferdinand von. 1877 - 1912.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n Ferdinand freiherrn von Richthofen.* 7 vols. Berlin: D. Reimer.

Ridpath, John. 1893. *Great Races of Mankind.* 8 vols. Cincinnati: Jones Brothers.

Rockhill, William W. [1905] 1971. *Diplomatic Audiences at the Court of China.* Reprint, Taipei: Ch'eng Wen.

Rohmer, Sax [Arthur Ward]. [1913] 1975. *The Insidious Dr. Fu-Manchu.* New York: Pyramid.

———. [1915] 1966. *The Yellow Claw.* New York: Pyramid.

———. [1916] 1975. *The Return of Dr. Fu-Manchu.* New York: Pyramid.

———. [1917] 1976. *The Hand of Fu-Manchu.* New York:

—— 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Pyramid.

——. 1919. *Dope*. New York: A. L. Burt.

——. [1930] 1976. *The Daughter of Fu-Manchu*. New York: Pyramid.

——. [1936] 1976. *President Fu-Manchu*. New York: Pyramid.

Rowe, William. 2001. *Saving the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ussell, Don. 1960. *The Lives and Legends of Buffalo Bill*.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Rydell, Robert W. 1984. *All the World's a Fai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moyault-Verlet, Colombe. 1994. *Le Musée chinois de l'impératrice Eugénie*. Paris: E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Sand, Jordan. 2000. "Was Meiji Taste in Interiors 'Orientalist'?" *positions* 8. 3: 637 – 673.

Scully, Eileen. 2001. *Bargaining with the State from Af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eagrave, Sterling. 1992. *Dragon Lady*. New York: Vintage.

Shanghai Mercury. 1967. *The Boxer Rising*. Reprint,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Sharf, Frederic, and Peter Harrington. 2000. *China, 1900*. London: Greenhill.

Simpson, Bertram L. [1907] 1970. *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 Reprint, New York: Arno Press and New York Times.

Singh, Sarbans. 1993. *Battle Honors of the Indian Army, 1757 – 1971*. New Delhi: Vision Books.

Skidmore, Eliza. 1900. *China the Long-lived Empire*. New York: Century.



- Smith, Arthur. 1894.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rt Washington, N. Y. : Kennikat Press.
- . 1900. “The Punishment of Peking.” *Outlook* 66: 493 – 501.
- . 1901a. “China a Year after the Siege in Peking.” *Outlook* 68: 969 – 975.
- . 1901b. *China in Convulsion*, 2 vol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 . 1901c. “China Six Months after the Occupation of Peking.” *Outlook* 67: 865 – 871.
- . 1901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king.” *Outlook* 68: 157 – 162.
- Smith, D. Warren. 1900. *European Settlements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Scribner’s.
- Smith, Judson. 1901.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ritics.”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2: 724 – 733.
- Smith, Richard, John Fairbank, and Katherine Bruner, eds. 1991.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 – 1866*.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 Smith, Stanley. 1901. *China from Within: or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Crisis*.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 Smith, Steve A. 2002. *Like Cattle and Horses*. Durham, N. 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mullen, Ivor. 1991. “Pekes of Perfection.” *Silver Kris* (January): 116 – 120.
- Sotheby’s. 1988. *The Library of Philip Robinson: Part 2, The Chinese Collection*. Auction catalogue. London.

Spence, Jonathan. 1969. *To Change China*. New York: Penguin.

——. 1982.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New York: Penguin.

Spivak, Gayatri. 1985. "The Rani of Surmur," 128 - 151. In Francis Barker et al., eds., *Europe and Its Others*, vol. 1. Colchester, England: University of Essex.

Springhall, John O. 1986. "'Up Guards and at Them!'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Popular Art," 49 - 72. In I. MacKenzie, ed., *Impe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tallybrass, Peter, and Allon White. 1986.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s. 54 (1814), 61 (1821), 72 (1832).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Steam, Roger. 1992. "War Correspondents and Colonial War, c. 1870 - 1900," 139 - 161. In J. MacKenzie, ed., *Popular Imperialism and the Military*.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teel, Richard A. 1985. *Through Peking's Sewer Gate: Relief of the Boxer Siege, 1900 - 1901*. Ed. George W. Carrington. New York: Vantage.

Stephenson, Frederick. 1915. *At Home and on the Battlefield*. London: John Murray.

Stewart, Norman. 1908. *My Service Days*. London: John Ouseley.

Stocking, George W., Jr. 1968.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Stoler, Ann. 1991.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51 - 101. In Micaela di Leonardo, ed., *Gender at the Crossroads of Knowled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tratemeyer, Edward. 1900. *On to Peking*. Boston: Lothrop, Lee and Shepard.

Student interpreter. 1885. “*Where the Chinese Drive*”: *English Student Life at Peking*. London: W. H. Allen.

Swinhoe, Robert. 1861. *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London: Smith, Elder.

Swisher, Earl. 1953. *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s: A Stud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41 - 1861, with Documen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anaka, Stefan. 1993. *Japan's Ori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ussig, Michael ~ 1987. *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1963.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New York: Atheneum.

Thackeray, William M. 1991. *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Esq.* Ed. Donald Haw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 Nicholas. 1991. *Entangled Objec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Licensed Curiosity: Cook's Pacific Voyages,” 116 - 136. In Roger Cardinal and John Eisner, eds., *The Cultures of Collect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son, H. C. [1902] 1981. *China and the Powers*. Reprint,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Torr, Dona, ed. 1968. *Marx on China, 1853 - 1860*.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Truong, Than-dam. 1990. *Sex, Money and Morality*. London: Zed.

Tsiang, T. F. 1929. “China after the Victory of Taku, June 25,

185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5. 1: 79 – 84.

Tsin, Michael. 1999.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uchman, Barbara. 1971. *Sand against the Wind*. New York: Macmillan.

Tulloch, Alexander B. 1903. *Recollections of Forty Years' Service*.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Twain, Mark. 1901a. “To My Missionary Critics.”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2: 520 – 534.

———. 1901b. “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2: 161 – 176.

Unique Photographs of Executions of Boxers in China. Ca. 1901. Brighton: Visitors' Inquiry Association.

United Kingdom. House of Commons. 1971.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BPP)*. Sessional Papers,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China, 22 vols. Reprint, Shannon: Irish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Kingdom. War Office. 1884, 1887, 1893, 1899, 1907, 1914. *Manual of Military Law*.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U. S. Navy. Hydrographic Office. 1919. *General Catalogue of Mariner's Charts and Book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War Department. 1901. *Reports on Military Operations in South Africa and China*.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 S. War Department, Adjutant General's Office. 1900. *Notes on China*.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arin, Paul. 1862. *Expédition de Chine, par Paul Varin*.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Vattel, Emmerich de. 1916. *The Law of Nations*. 3 vols.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e.

Vaughan, H. B. 1902. *St. George and the Chinese Dragon*. London: Arthur Pearson.

Volontaire au 102e. 1861. *Lettres d'un volontaire au 102me/ recueillies et mises en ordre par émile Maison*. Paris: B. Duprat.

Wade, Thomas F. [1867] 1886. *Yü Yen Tzu 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3 vol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 [1867] 1905. *Wen-chien tzu-er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designed to assist students of the language as written by the officials of Chin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Wakeman, Frederic. 1966.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 - 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75.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Wakeman, Frederic, and Carolyn Grant, eds. 1975.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keman, Frederic, and Yeh Wen-hsin, eds. 1992.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aldersee, Alfred von. 1924. *A Field Marshal's Memoirs*. Trans. Frederic White. London: Hutcheson.

Waley-Cohen, Joanna. 1991. *Exile in Mid-Qing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alker, C. P. Beauchamp. 1894. *Days of a Soldier's Life*.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Walrond, Theodore, ed. 1872.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 Eighth Earl of Elgin*. London: John Murray.

Wang, Tseng-tsai. 1971. "The Audience Question: Foreign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 1858 - 1873." *Historical Journal* 14. 3: 617 - 633.

Ward, A. W., and G. P. Gooch. 192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783 - 1919*. 3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Waring, J. B. 1863.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and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3 vols. London: Day and Son.

Weaver, Lawrence. 1915. *The Story of the Royal Scots*. New York: Scribner's.

Weinrich, William. 1981. *Spirit and Martyrdom*.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Williams, Frederick W. [1889] 1972.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LL. D.: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Reprint,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Williams, S. Wells. [1848] 1883. *The Middle Kingdom*. 2 vols. New York: Scribner's.

Wilson, Angus. 1977. *The Strange Ride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Wilson, James H. 1901. *China*. 3d ed. New York: D. Appleton.

———. 1912. *Under the Old Flag*. 2 vols. New York: D. Appleton.

Winter, Jay. 1995. *Sites of Memory, Sites of Mourning*.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lseley, Garnet J. [1862] 1972.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 Reprint, Wil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 1904. *The Story of a Soldiers Life*. 2 vols. New York: Scribner's.

Wong, J. Y. 1976. *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 Kuang, 1852 - 8*.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3.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839 - 18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8.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 - 1860) in Chin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Mary C. 1968. "Introduction: 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 1 - 66. In M.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ykes, Alan. 1968. *The Royal Hampshire Regiment*. London: Hamish Hamilton.
- Xu Xudian. 1981. "The 1980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xer Movement." *Modern China* 7. 3: 379 - 384.
- Young, L. K. 1970.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 - 1902*. Oxford: Clarendon.
- Young, Marilyn. 1968.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cy, 1895 - 190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Robert. 1990.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 . 1995. *Colonial Desire*. New York: Routledge.
- Younghusband, Francis. [1910] 1985. *India and Tibet*. Reprint,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ule, Henry, and A. C. Burnell. [1886] 1994. *Hobson - Jobson*. Ed. William Cooke. Reprint, New Delhi: Munishiram Manoharlal.
- Zito, Angela. 1997. *Of Body and Bru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8册，中华书局，1979。
- 《大清历朝实录》，13卷，台湾华文书店，1964。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2。

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李文海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

刘北汜、徐启宪：《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紫禁城出版社，1994。

路遥：《山东秘密教门》，当代出版社，2000。

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

苏位智、刘天路编《义和团研究100年》，齐鲁书社，2000。

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王道成编《圆明园》，2卷，北京出版社，1999。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义和团史料》，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

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备委员会主编《圆明园》，第2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

西人姓名汉译表

(以汉译名拼音为序)

阿礼国	Rutherford Alcock
阿林顿	L. C. Arlington
阿美士德	William Amherst
阿姆斯特朗	Amstrong
艾伦	Roland Allen
爱丽丝·罗斯福	Alice Roosevelt
安德森	Anderson
安森	Anson
奥尔古德	George Allgood
奥基夫	Cornelius Francis O'keefe
巴巴松	Barbazon
巴罗	Barrow
巴麦尊	H. J. T. Palmerston
巴特勒	Smedley Butler
巴夏礼	Harry Parkes
白克好司	Edmond Backhouse
白劳德	Bailloud
柏克	Edmund Burke

邦吉	Chris Bongie
包令	John Bowring
宝复礼	Frederic Brown
鲍尔比	Bowlby
贝德克尔	Karl Baedeker
贝勒	Emile Bretschneider
贝亚托	Felice Beato
本杰明	Walter Benjamin
比肖普	Heber Bishop
绿蒂	Pierre Loti
毕得经	Horace Pitkin
毕克思	Robert Bickers
毕瓿	Edward Biot
璧利南	Byron Brenan
波莉·史密丝	Polly Condit Smith
伯恩斯坦	Richard Bernstein
伯驾	Peter Parker
卜舫济	F. L. Hawks Potts
卜克斯	S. M. Brooks
卜士礼	Stephen W. Bushell
布尔布隆	M. de Bourboulon
布尔格	D. C. Boulger
布戈尔·辛格	Bughel Sing
布坎南	Buchanan
布朗	Arthur Brown
布雷肯里奇	Carol Breckenridge
布瑞登	Juliet Bredon
布鲁克斯	Elbridge S. Brooks



布鲁斯	James Bruce
查飞	Adna Chaffee
查克拉巴蒂	Dipesh Chakrabarty
查理·金	Charles King
达格特	A. S. Daggett
戴闻达	J. L. Duyvendak
道格思	Robert Douglas
道伊尔	Francis Hastings Doyle
德埃里松	Maurice d'Hérrison
德尔比	Derby
德拉马	Abbé Delamarre
德拉蒙德	William Drummond
德鲁兹	Gilles Deleuze
德吕斯	Abbé Deluc
德呢克	N. B. Dennys
德诺曼	de Norman
邓罗	C. H. Brewitt-Taylor
狄克曼	J. T. Dickman
狄龙	E. J. Dillon
丁赍良	W. A. P. Martin
都春圃	E. G. Tewksbury
窦纳乐	Claude MacDonald
俄理范	Laurence Oliphant
额尔金	Elgin
法农	Frantz Fanon
法思远	Robert Forsyth
菲普斯	Phipps
费奇	Frank Fitch

费歇尔	Emil Fischer
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芬尼	Charles Finney
弗莱彻	Joseph Fletcher
弗莱明	Peter Fleming
福里	Henri Nicolas Frey
福赛斯	Forsyth
傅兰雅	John Fryer
盖斯利	Alfred Gaselee
冈代尔	Gundell
高第	Henri Cordier
戈登	Charles Gordon
戈兰德	W. G. Golland
格雷厄姆	Gerald Graham
格雷格	Gregg
格里尔森	J. M. Grierson
格里菲斯	D. W. Girffith
格列森	Grieson
格林	Green
格罗夫	Leslie Grove
格罗特尔	Otto Grotewohl
葛罗	J. B. L. Gros
葛络干	B. J. de Cologan
古登	Rummer Godden
古尔德	Gould
顾盛	Caleb Cushing
瓜塔利	Felix Guattari
哈里斯	Harris



哈切森	Grote Hutcheson
哈耶斯	Webb Hayes
海恩波	Marshall Broomhall
海格斯	Hykes
海内吉	Heneage
汗·辛格	Khan Sing
何德兰	Isaac Headland
贺璧理	Alfred Hippisley
贺布	James Hope
赫伯特	Sidney Herbert
赫德	Robert Hart
赫斯顿	Charlton Heston
黑福德	Hayford
亨蒂	George A. Henty
亨利·金	Henry Churchill King
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华若翰	John Ward
霍布森	John Hobson
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霍尔	Ronald Hall
基利厄	C. A. Killie
稽洛尔	Valentine Chirol
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吉林厄姆	Michael Gillingham
吉内	P. W. Guiney
加德纳	Ava Gardner
加兰迪迪尔	Ernest Grandidier
加特雷尔	T. J. N. Gatrell

贾宁	Janin
金奈尔	James Ginnell
卡格尼	Jimmy Cagney
卡明	C. F. Gordon Cumming
卡那封	Caernarvon
卡尼夫	Milt Caniff
凯南	George Kennan
凯帕尔	Keppel
凯斯特伦	Kaestlin
凯特勒	Isaac Kettler
康格	Edwin Conger
柯乐德	Victor von Grot
柯乐洪	A. R. Colquhoun
柯文	Paul Cohen
柯曾	George Curzon
科宾	Paul Leaton Corbin
科布登	Richard Cobden
科尔波	Robert Kolb
科林森	Sam Collinson
科努里	Arthur Conolly
克兰西	Tom Clancy
克劳斯	Alexis Krausse
克里什唐	William Crishton
克林德	Clements Von Kettler
克灵顿	James Hope Grant
肯尼迪	Thomas Kennedy
库科	Thomas Cook
库克	Cook



库克斯	Anna Cocks
库珀	Frederick Cooper
拉比诺	Paul Rabinow
拉姆斯顿	Lumsden
拉塞尔	Russell
拉图尔	Bruno Latour
兰道尔	Henry Savage Landor
兰斯代尔	Henry Lansdell
雷蒙德	Alex Raymond
李佳白	Gilbert Reid
李洁明	James R. Lilley
李泰国	Horatio Nelson Lay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里卡尔坦	James Ricalton
里斯库姆	Liscum
理查兹	Jeffry Richards
利伯尔	Francis Lieber
利涅维奇	Linievitch
利特尔夫夫人	Mrs. Archibald Little
列卫廉	William B. Reed
林奇	George Lynch
隆沃思	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
鲁特	Elhu Root
路崇德	J. W. Lowrie
路易森	William Lewisohn
律劳卑	William Napier
罗伯特·扬	Robert Young

罗布森	Flora Robson
罗亨利	Henry Loch
罗嘉彤	Carleton Rochell
罗林森	Henry Rawlinson
罗斯切尔德	Rothschild
罗兹	C. D. Rhodes
马地臣	James Matheson
马蒂尔	A. H. Mateer
马顿斯	Charles de Martens
马格里	Halliday Macartney
马汉	Alfred Thayer Mahan
马嘉理	Augustus R. Margary
马嘎尔尼	George MaCartney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马姆斯伯里	Malmesbury
马士	Hosea B. Morse
马绍尔	Marshall
马歇尔	George C. Marshall
迈尔斯	Miles
麦都思	W. H. Medhurst
麦考利	Macaulay
麦克拉斯	Mackerras
麦克内尔	William McNeill
麦克唐奈尔	John MacDonnell
麦库洛奇	John R. McCulloch
麦美德	Luella Miner
满乐道	Robert Coltman
芒克豪斯	Cosmo Monkhouse



芒罗	Ross Munro
梅德赫斯特	Thomas Medhurst
梅辉立	William F. Mayers
梅莱斯	George Mèlès
梅威良	William Ament
美理登	M. de Méritens
孟斗班	Cousin Montauban
米尔沃德	James Millward
米切尔	Timothy Mitchell
米歇尔	John Michel
密迪乐	T. T. Meadows
密勒	Thomas F. Millard
明恩溥	Arthur Smith
莫吉	R. J. L. M'Ghee
莫莉尔	Morril
莫理循	G. E. Morrison
莫伊斯	Moyse
默里	Hugh Murray
姆特雷西	Charles de Mutrécy
内皮尔	Napier
纳色恩	Arthur Von Rosthorn
奈文	David Niven
诺里斯	Knollys
欧登科	William Oudendyk
帕莱奥洛	Georges Paleologue
皮尔岑尼克	Stove Pieczenik
皮尔斯	Nick Pearce
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蒲柏	Pope
濮兰德	O. P. Bland
普莱特	Mary Louise Pratt
普鲁斯	Frederic Bruce
普罗宾	Probyn
普提雅廷	Putiatin
钱伯林	Wiber Chamberlin
乔治·史密斯	George Smith
乔治亚娜·史密斯	Georgina Smith
琼斯	Enoch R. L. Jones
荣赫鹏	Francis Younghusband
柔克义	William Rockhill
儒默	Sax Rohmer
芮尼	David Rennie
萨克雷	William Thackeray
萨拉·康格	Sarah Pike Conge
萨莫约特韦莱	Colombe Samoyault-Vetlet
萨特尔	Octave Du Sartel
塞弗兰斯	James R. Severance
赛义德	Edward Said
施瓦岑施坦因	Mumm von Swarzenstein
施文贺	Robert Swinhoe
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
史密斯	Judson Smith
司快尔	Herbert Squiers
斯当东	George Staunton
斯蒂尔	Steel
斯蒂芬森	Frederick Stephenson



斯基德摩尔	Eliza Skidmore
斯马伦	Ivor Smullen
斯匹瓦克	Gayatri Spivak
斯坦利·史密斯	Stanley Smith
斯特拉蒂迈尔	Edward Stratemeyer
斯图尔特	Norman Stewart
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塔洛克	A. B. Tulloch
泰蒂尤斯	Calvin P. Titus
泰平	Gartside-Tipping
汤姆森	H. C. Thomson
汤姆斯	Peter Thoms
田贝	Charles Denby
图弗纳尔	Thouvenel
托马森	Thomson
托马斯·理查兹	Thomas Richards
瓦德西	Alfred Von Waldersee
瓦林	Paul Varin
威尔默特	Wilmot
威尔逊	J. Wilson
威迩逊	Wilson
威廉姆森	James Williamson
威廉斯	Williams
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韦恩	Wynne
韦尔斯·史密斯	D. Warres Smith
韦弗尔	Charles Wafer
维奥	Julian Viaud

卫三畏	S. Wells Williams
文翰	George Bonham
沃德	Athur Ward
沃恩	H. B. Vaughan
沃克	C. P. B. Walker
沃里	John Werry
吴士礼	Garnet Wolseley
西马糜各厘	Michael Seymour
西摩	Edward Seymour
西摩尔	Francis Seymour
熙利尔	Guy Hillier
禧在明	W. C. Hillier
夏德	Friedrich Hirth
谢卫楼	D. Z. Sheffield
辛博森	Bertram Simpson
亚当斯	John Quincy Adams
叶守真	E. H. Edwards
伊恩·弗莱明	Ian Fleming
伊格那提业幅	Ignatiev
伊萨克斯	Harold Isaacs
有雅芝	A. R. Hewlett
约翰斯顿	Reginald Johnston
翟兰斯	Lancelot Giles
翟理思	Herbert Giles
詹姆斯	D. Willis James
周锡瑞	Joseph Esherick
朱利昂	Stanislas Julien
庄延龄	Edward Harper Parker

译后记

何伟亚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和我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相互之间经常进行各种学术交往。2003年，经他推荐，我到他当时所在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坡）做访问学者。在这期间，有幸读到他的新作《英国的课业》的原稿，并且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和他进行过详细的讨论。我感到，和他的前一部著作《怀柔远人》一样，他的这部新作运用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起义时期的近代西方对华关系史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把它从一段人所熟知的历史变成了一段令人感到新奇的崭新历史。对于中国学者和读者来说，这部著作在资料、理论、方法和视野等诸多方面，都会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因此，当这部著作于当年年底正式出版后，我欣然接受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建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全部翻译工作。希望该书中译本的出版，能够对推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和在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研究有所助益。

这部书由我和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的邓红风教授合作翻译，由我定稿。感谢在翻译过程中提供各种帮助的朋友。另外，本书书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名的中文翻译借用了罗志田先生在《怀柔远人》译序中的翻译，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刘天路

2005年8月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已出版书目

1. 《中国新史》
〔葡〕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
2. 《中国近事报道》
〔法〕李明著，郭强等译
3. 《清初扬州文化》
〔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
4. 《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上、下册）
倪瑞英等译，刘海岩校
5. 《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
6. 《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刘新利校
7. 《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
〔英〕赫德著，叶凤美译
8. 《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
9.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
〔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彭雨新、鲁西奇校

10.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
〔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
11. 《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张士尊、信丹娜译
12. 《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
〔日〕安冈昭男著，胡连成译，王晓秋审校
13. 《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
〔比利时〕高华士著，赵殿红译，刘益民审校
14. 《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
〔日〕佐藤公彦著，宋军、彭曦、何慈毅译
15. 《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
〔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陈开科审校
16. 《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
〔瑞典〕托米·本特森、〔美〕康文林、〔美〕李中清等著，李霞、李恭忠译，李恭忠校，史建云审校
17.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美〕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刘海岩审校